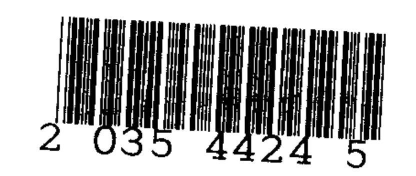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拿破仑时代

上卷

〔法〕乔治·勒费弗尔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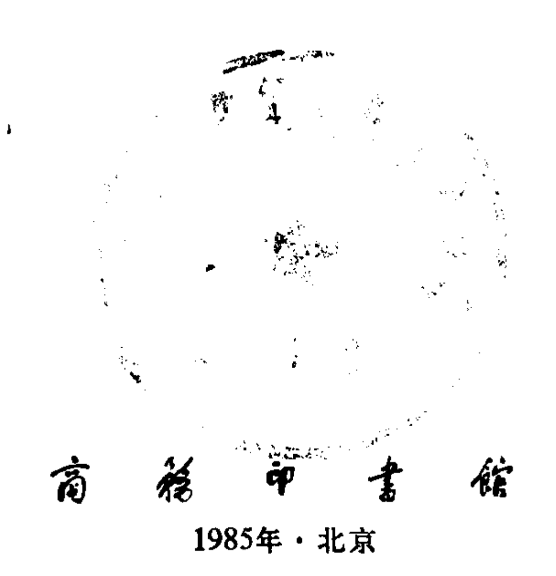
拿破仑时代

上卷

〔法〕乔治·勒费弗尔 著

河北师大外语系《拿破仑时代》翻译组译

端木正校



商务印书馆

1985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 版 说 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3 年 5 月

出版说明

本书是法国出版的题为《民族与文明》丛书的第十四卷。《民族与文明》是一部以欧洲和法国为重点的世界通史丛书，其中第十三卷《法国革命》① 和第十四卷《拿破仑时代》是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撰写的。

乔治·勒费弗尔（1874—1959年）是法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从1914年发表第一部关于法国革命的著作到逝世前的四十五年里，一直从事法国革命史的教学与研究。1932年他继阿尔贝·马迪厄当选为“罗伯斯庇尔学会”会长和《法国革命年鉴》杂志主编，1935年起在巴黎大学主讲法国革命史。勒费弗尔保持了马迪厄学派注重社会和经济问题和推崇雅各宾民主专政的史学传统。他对革命前和革命期间的农民问题有较深入的研究，著有《法国革命期间诺尔郡的农民》、《恐怖时期的农民问题》等著作。关于法国革命的各个阶段，也都有专著论述。

本书是勒费弗尔于三十年代初执教斯特拉斯堡大学时，边讲课边撰写的，1935年完稿出版，到1953年已出了第四版。他的学生阿尔贝·索布尔在他逝世后负责整理他的遗著，1965年印行了由索布尔增订的第五版，1969年值拿破仑诞生二百周年之际，又印了第六版。索布尔对原著正文增订不多，但对勒费弗尔开列的参考书目则有所补充。这部书从出版后四十多年来，一直被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界公认为关于这一时期历史的一部优秀著作，并译

① 《法国革命》一书最初系由勒费弗尔与居约、萨尼亚克合著，1930年初版；1951年由勒费弗尔全部改写。从这一版起改由他单独署名出版，1968年印行了第六版。

成多种文字。

本书不是一部拿破仑个人的传记，而是一部从拿破仑·波拿巴取得政权到他失败这段历史时期(1799—1815年)的法国和欧洲的历史。作者不仅把拿破仑时期同法国大革命时期从纵的方面衔接起来，使读者看清这两个阶段的连续性，而且把拿破仑统治时期的法国放到世界史范围内加以考察，从横的方面同欧洲各国历史联系起来。勒费弗尔一方面肯定了拿破仑顺应历史潮流，在巩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推进资本主义发展方面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他与封建势力的妥协和对雅各宾派的压制。在论述拿破仑通过征战把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推广到欧洲其他地区所起的积极影响时，作者也揭露了拿破仑建立欧洲甚至世界帝国的野心和他所进行的战争的扩张侵略和掠夺的性质。此外，本书对当时欧洲列强的争霸以及英国和俄国的扩张侵略政策也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揭露。总的说来，作者对这段法国和欧洲历史的叙述比较全面细致，条理清晰，对当时法国国内外各种矛盾也有所剖析；对拿破仑本人性格的刻画，有些地方也是比较深刻的，有助于我们了解法国和欧洲的这段历史。

应该指出，勒费弗尔对于拿破仑的对外政策的分析是缺乏说服力的。尽管他也谈论法国同欧洲之间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冲突，法英、法俄争夺霸权的矛盾，以及欧洲民族主义反对法国统治的斗争，但是他没有紧紧抓住这些对立和冲突，进行阶级分析，揭示它们的转化规律，却认为拿破仑所追求的各种目的是互相矛盾的，因此断言："没有任何合乎理性的解释可以把拿破仑的对外政策统一起来，……归根结蒂，还是要回到他的'野心'上来。"(161页)但是这种"野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作者无可奈何地又归之于拿破仑的"性格"："勇于冒险，迷于幻梦，任性冲动而不能自制"(同上)，并概括地说："拿破仑其人主要地就是他的气质。"(68页)

我们并不否认一个英雄人物的性格对于历史发展所起的某种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①但是任何性格都脱离不了一个人的思想倾向,特别是政治思想,而政治思想也不可能是抽象的,超阶级的。拿破仑的称霸野心正是法国大资产阶级本性的集中表现。

勒费弗尔无法解释为什么拿破仑既满足了法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同时又进行“没完没了的战争”,以致损害了法国的民族利益。于是他又用“此人的性格较之他的天赋更不能安于和平与节制”(64页)来说明。实际上,在当时欧洲的政治制度下,一国之所得就是他国之所失。而且每次战争总是以拿破仑作为胜利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而告终,从而播下了新战争的种子。归根结蒂拿破仑“野心”的根源不应从他的“浪漫主义”性格中去寻找,而应该从他作为大资产阶级代表的特殊政治观点和政治利益中去寻找。正如马克思指出:**“拿破仑已经了解到现代国家的真正本质;他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社会的无阻碍的发展、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等等是这种国家的基础。他决定承认和保护这一基础。”**②这就是说,拿破仑建立帝国这个政治上层建筑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保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但是,拿破仑的称霸野心又是无止境的,他把建立霸权看作最高的政治利益。**“只要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重要的物质利益(即商业和工业)一和他拿破仑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他也同样毫不珍惜它们。”**③正是拿破仑的不断战争论导致了法国的失败和帝国的崩溃。

---

①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393页。

② 马克思:《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57页。

③ 同上,第158页。

作者还多次嘲弄“历史决定论”，宁愿强调偶然因素，例如他认为“拯救英国的不是自由主义经济的‘自然规律’，而是俄国的冬天。”(144 页)他也未能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在涉及亚洲和中国的部分，他只把远东地区看成殖民和传教的对象，而抹煞了这个地区的独立发展。他还主观地推断，如果不是由于欧洲的战争，远东早已被西方列强侵占了，“欧洲的内哄拯救了远东达四分之一世纪有余！”(299 页)这些错误论点希望读者加以注意和批判。

原著书名为《拿破仑》，为了更符合本书的内容，中译本书名增加“时代”二字。本书原为一卷本，中译本分上下卷出版。上卷由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拿破仑时代》翻译组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69 年出版的英译本译出；下卷由中山大学《拿破仑时代》翻译组根据法文原著第六版译出。全书由中山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端木正同志根据法文原著参照英译本进行了校订。中译本除增加一些译注外，还选用了英译本的少量注释。

原著开列大量的参考书目，分别附在各编、各章节的页下。我们只择其要者选录，把参考书目集中附在上下卷正文后面。

原著索引全部译出，索引中的页码和译文旁边的页码均为原书页码。

1977 年 7 月

目　录

第三编

提尔西特条约前帝国的对外征服（1802—1807 年）

绪　言

当拿破仑·波拿巴取得法国政权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和欧洲已交战七年有余；除了短暂的间歇外，战争要一直延续到1815年。在这场战争中，雾月十八日本身并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般认为以亚眠和约带来的和平期间为界，把这场战争划分为两个时期，也许会更为合乎逻辑。但若论及法国国内历史时，则雾月政变无疑地使个人专权得以恢复，而就这一点来说，拿破仑时期和法国革命时期是迥然不同的。但是，这种不同并不能掩盖联系这两个时期的深刻的一致性。正是法国大革命使波拿巴能有如此非凡的命运；他之所以能把自己强加于共和制的法国，是因为只要旧制度的党徒还在勾结外国力图复辟，就有一种内在的需要注定这个国家要实行专政统治；波拿巴和救国委员会①在统治方法上存在有许多共同的特征，这些共同点比人们通常所愿承认的要多得多。他之所以能保持法国人领袖的地位，正是因为他尊重了制宪议会的社会立法成果；他的军事胜利保证了这些成果能够保持下去，并且使这些成果能够在法国永远根深蒂固。不仅如此，他的军事胜利还保证了把这些成果推广到欧洲各地，其迅速和功效，是宣传而尤其是自发传播所无从比拟的；如果他不曾把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移植到他所控制过的各国，那么他以雷霆万钧之势所

---

① 救国委员会旧译"公安委员会"，1793年4月6日国民公会选举九人组成，权位在其它委员会和政府各部之上，7月27日罗伯斯庇尔加入后，救国委员会成为雅各宾专政的领导机构。热月反动后权力削弱，1795年10月27日解散。本书谈到救国委员会时，均指它在1793年7月至1794年7月发挥专政作用的时期。——译者

进行的许多征战是不会留下任何东西的。他曾致力于创建新的皇统和新的贵族阶层，但都枉费心机；在他同时代的人看来，他依然是法国大革命的战士，而他也正是作为这样一个人物而载入欧洲文明史册的。

然而，从他成为法国的主宰时起，他自然地就占据了世界历史的中心地位，以致尽管他的统治与法国革命这一悲剧之间贯穿着深刻的一致性，我们对以他的上台为界标的传统分期方法，仍然不能置之不顾；本书采用的就是这种分期方法。

本书不是一本拿破仑的传记，这点几乎已无庸赘述。正如这套通史其它各卷一样，本书不仅力图阐明法国人和拿破仑所征服过的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主要线索，而且力图阐明他所未能压制的各种独立力量所起的作用，以及他的权威所不及的各国的特征。英国和美国保持了它们的自由传统；资本主义继续在发展，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在准备夺取政权；宗教生活照样进行，拿破仑未能改变它的进程；他正在奠定基础的世界帝国已遭到各民族的反抗；尤其是在德意志，浪漫主义抚育了思想、认识和行动的新方式；拉丁美洲已在争取独立；这场欧洲大斗争的影响也不免一直波及到远东，虽然这种影响不是正面的，因为如果欧洲不是被这场内部争战牵制住兵力的话，远东遭受欧洲的入侵就会早得多。透过拿破仑的天才所竭力造成的表面上的整齐划一，十九世纪变化多端的轮廓已经端倪可察。这个时期虽然为时短暂，但在这段期间里，在拿破仑面前似乎一切都黯然失色，左右历史进程的正是此人。因此本书以他的名字命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一编　革命的遗产

3

第一章　旧制度与革命的冲突

十年的演进，而尤其是战争，深刻地改变了法国革命的进程。欧洲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法国领土向"自然疆界"的扩 4 张显然打破了欧洲的均势。波拿巴所接受的遗产对他的政策有重大影响。阿尔贝·索雷尔①认为波拿巴是他的命运的产物而不是他的命运的创造者；即使我们不同意这个论点，明确他所接受的遗产的一些特征还是适当的。

在这些特征中，最深刻的是法国革命从一开始就与欧洲之间的冲突。首先是社会冲突：特权阶级和受第三等级的其余阶层支持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其次是政治冲突：因为君主专制象特权一样受到了责难，此外，把贵族置于自己保护之下的帝王们，冒着和贵族同归于尽的危险。最后，还有宗教冲突，这种冲突是由于人们一般把法国革命理解为笛卡尔理性主义的产物而发生的，因为笛卡尔的无情批判摧毁了神秘和传统，人们认为这是构成旧制度的基础。各大国争夺霸权的斗争使上述各种冲突模糊起来，但却没有把这些冲突从当代人的意识中消除。这些冲突顽强地支配了拿破仑时代的历史。

---

① 索雷尔(1842—1906年)，法国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是八卷本《欧洲与法国革命》(1885—1904年出版)。——译者

一、社会的和政治的冲突

热月9日以后，法国革命的退潮已经很明显了。共和三年(1795年)宪法使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他们虽然真诚地拥护新秩序，但却反对民主，他们不能把民主和雅各宾主义的经验加以区别。他们同斯塔埃尔夫人和空论家们一道，设想了一种寡头政治，它比英国的寡头政治更加现代化，但在本质上相类似；它要在富人的利益和"贤达"的智慧之间搞平衡。同时，资产阶级逐渐着手摧毁山岳党人的成果，甚至对制宪议会议员的成就也不放过。他们废除了家庭法庭和仲裁程序，恢复了债务监禁和公证人费。共和二年遗产继承法的"追溯既往"的特征消失了，私生子的权利受到了猛烈打击。国有产业①的出售，除对富人外，不再对任何人有利；共和七年，把那些被抵押的国有产业，无代价地给予了持有这些产业的人。村社公地的分配中止了；政府又力图把农民从1789年以来就自由使用的森林中驱逐出去。

但是这一切对于欧洲贵族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尽管法国革命是为了争取资产阶级理想的实现，可是它仍旧是一场争取公民平等的革命。它的军队所到之处如比利时、来因地区、荷兰、瑞士，法国革命都摧毁了旧制度；教皇成了囚徒；奥伦治亲王、来因的选侯们和瑞士的贵族们都逃跑了。只有苏沃洛夫的胜利夺回了意大利，恢复了那些正统王侯的地位。颠覆性的宣传秘密地渗入了法国的邻邦，到处都在议论法国农民的解放以及无套裤汉胜利的消息。作家和新闻记者所作的努力，其效果比不上这些不胫而走的传闻；他们几乎都由于恐怖时代的过激行动而感到幻灭，或者

① 字面意思是国家的财产，实际指法国革命时期国家从僧侣、贵族和其他人手里没收的财产，——英译者

被迫沉默了。希望和法国人一致行动的人到处都能找到，例如在南部德意志就有。甚至在普鲁士，拒服劳役和抗交封建赋税的也越来越多。谣传国王将废除这些苛捐杂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即位时就收到了大批请愿书。在大洋的彼岸，纳里尼奥翻译了《人权宣言》；在美国，华盛顿及其随从怀疑杰佛逊和共和党人①已被平等狂毒害了。

各处的贵族，甚至在辉格党的各大家族中，都吓得惊慌失措而聚集在国王的周围；各国的政府都加紧了控制。除了屈服于保罗一世的残暴专制下的俄国之外，奥国是首屈一指的，因为在那里，科洛雷多从此成了实行愚民政策的警察国家的化身，而梅特涅后来又被认为是始作俑者。在普鲁士，直到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死前企图实行同样制度的沃尔纳险些被解职。在耶拿，费希特因为宣传无神论而被控告，遭到了魏玛公爵的抛弃，并在1799年被迫放弃了教授职位。在英国，1794年以后，人身保护法停止执行，"煽动性的"社团和出版物也遭到了禁止。1799年，皮特强迫印刷商表明他们的忠顺，把非法组织的成员流放七年。在美国，联邦党人利用和督政府断绝关系而通过了针对法国民主主义者的"移民法案"，还通过了针对社团和报纸的危害治安取缔条例。在拉丁美洲，已经有人为自由事业献出了生命。"雅各宾派"所激起的恐怖，虽然并非全无根据，但却是被人夸张了。那些少有的赞美法国的人，象康德、费希特和在着手批判伯尔尼的贵族和符腾堡的寡头政治的年青的黑格尔，都非常谨慎地规定自己只响往合法的与和平的进步。没有一个国家自发地效仿法国；传播法国革命原则的，就是法国的军队。 6

① 美国资产阶级政党之一，于1791年由杰佛逊领导建立，1794年改名"民主共和党"，是1828年建立的民主党的前身。现在共和党的前身是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译者

虽然反动势力很猖狂，但不能说它们谴责了所有的改革。开明专制已经表明：某些改革是可以同君主专制政体和贵族社会相调和的。旧制度的各国政府承认法国制宪议会的成就并非一无可取，因而羡慕法国行政上的统一和它对财政特权的废止。英国的例子进一步向欧洲大陆上的农业国表明了圈地的优越和农奴制的落后。然而，只有在德意志，尤其是在巴伐利亚和普鲁士才进行了改革，这种改革把西方影响和本国传统结合起来。

德意志的启蒙运动虽然在学者中间失去了威望，但已经教育了资产阶级和政府官员。在巴伐利亚新掌权的蒙特热拉伯爵就是启蒙运动的信徒之一。在柏林，奥国的大使尖刻地说过，普鲁士的官僚谴责法国的敌人想“把理性的统治从地球上清除掉”，而普鲁士的伟大正应是归因于理性的统治。普鲁士的高级文官形成了社团，事实上采用互荐的方法吸收成员，保持了强烈的团体精神。他们很不高兴地注视着国王不断扩大“内阁”权力，以至一切都由国王和他的“秘密顾问”来决定；国王及其“顾问”对西里西亚和波兰的一些省份的亲自治理，曾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些大官愿意把国王置于法治之下；1794 年完成了弗里德里希法典起草工作的威廉·卡莫，就在法典中写入了关于个人自由、法官的终身任职以及宗教宽容等条文。他们同时也认识到：弗里德里希的国家实行的是农奴制，各省都珍惜自己的特殊制度，彼此为关税壁垒所分隔，都认为自己是一个自治的“民族”，因而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最后，象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一样，普鲁士二十几年来已经变成大量出口粮食和纺织品的国家；开明人士注意到，萨克森的农学家阿尔贝·塔埃开始把英国的农耕方法介绍到丹麦的范例。他们对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同样感到兴趣，这种学说在汉堡由比施讲授，在维也纳由瓦特罗特讲授，而在科尼希斯贝克以克里斯蒂安·克劳斯的讲授最为著名。

他对这个君主国的两位杰出的治理者舍恩和施勒特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最倾向于接受新思想的人都是普鲁士从德意志西部或国外招来的客卿:弗兰科尼亚的卡尔·阿尔滕施泰因,汉诺威的卡尔·冯·哈登堡——他治理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从丹麦来的施特吕恩塞，尤其最重要的是来因帝国骑士的后裔施泰因，他在 1804 年出任大臣之前治理过克累弗和马尔克,这两个省从来没有采用过“普鲁士的制度”。

这还不是一切。和某些历史记载相反，施泰因和某些政治家仔细地考察了法国的实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让国民在法律、赋税和行政管理等问题上有一些发言权,政府就能增加力量和威望。然而,因为他们只把贵族和富有的资产阶级看作国民,所以他们就把注意力首先转向英国。在他们看来,在皮特的领导下,英国似乎已经把王室特权和宪法准则、党派竞争和维持秩序与政府稳定、贵族优势和资产阶级野心、贵族利益和全国利益等等都协调起来。勋爵们的“私囊选区”、“腐朽选区”[①]保证了皮特在议会里获得多数,因而皮特也就迁就他们,但他并不同意他们的偏见。在他提名晋封的九十五名贵族中,有很多“新人”,他们是银行和商业的巨头,他们使贵族恢复了生气,并帮助贵族保持富裕生活和活动能力。由于伯克的缘故，这种平衡和智慧的奇迹使得许多法国革命的敌人归附英国，尤其是象马莱·迪庞和德·伊韦尔努瓦那些资产阶级和新教徒出身的人。甚至在法国亡命者中间也有赞美英国的人。在德意志，亲英派在汉撒城市和汉诺威数以倍增是很自然的，汉诺威的格廷根大学完全受他们的支配。雷贝格和布兰德斯给施泰因介绍了英国的思想，而施泰因运用它充实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们能在威廉·冯·洪堡的个人主义教义中找到这种思想的 8

① “私囊选区”指由一人或一家控制的议员选区。“腐朽选区”指具有同等选举权但居民比其他选区少得多的衰落选区。——译者

痕迹，因为他主张国家只掌握警察和军权，而象在英国一样把其它各项管理职责都交给公民的自发组织；在洪堡的思想中，这就意味着使几乎全部社会生活置于贵族的保护之下。

特权阶级中大多数人象憎恨"雅各宾派"一样地憎恨这些改革家；面对着特权阶级的抗议，君主们动摇或退缩了。皮特本人就是一个例子。他虽然沒有摈弃早年的计划，但却把它推迟到后来再实行。在奥国，约瑟夫二世的土地改革被利奥波德二世中止了，后者的继承人弗兰茨二世在1798年终于保留了封建义务和劳役。在里沃尼亚省①，保罗一世满足于使省议会通过某些和缓农奴制的措施；在多瑙河各公国，他的特派专员吉谢廖夫也沒有更多的作为。在普鲁士，容克地主已经迫使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修改弗里德里希法典。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则很快地放弃了他在1798年考虑过的废止豁免赋税等财政特权的改革计划。的确，他在自己广大的领地上坚决地继续解放农民，并改革农业经济，但他不敢把这些改革扩展到领主们的领地上去。普鲁士的贵族仍然垄断着高官显职。1800年，在六、七千名官员中只有六百九十五名出身平民。施泰因自己只在财政方面实行了一些技术性的改革；他甚至沒有能够废除国内的关卡。

就这样，法国以外的改革家几乎和"雅各宾派"一样无能为力。只是拿破仑的统治，或者说，是他的军队的猛烈冲击，才使旧世界得到更新。因此法国一直成为欧洲帝王们和贵族的眼中钉。那不勒斯的玛丽亚-卡罗莉娜写道："我不同情，而且一辈子也不会同情法国人；我将永远把他们看成是杀害我的妹妹和王族的凶手②，是一

① 里沃尼亚省在波罗的海沿岸，原以里加为省会，该省现分划入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译者

② 玛丽亚-卡罗莉娜是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亲姐姐。——译者

切君主的迫害者。”德意志作家施托尔贝格把法国人称做“西方的匈奴”;英国的纳尔逊虽然不是出身于贵族，但也轻蔑地把他们叫做“法国坏蛋”。执政府和帝国虽然日趋保守,也一直沒能使这些人显著地平息下来。关于反法联盟,过去惯用国家利益来解释,而将整个这场大搏斗归结为一个均势问题，或者归结为如皮特所说的安全问题。这个结论并不是沒有道理的,因为对法国人的恶感从来沒有妨碍过各国君主在认为有利的时候同法国打交道;但尽管如此，各国君主并沒有放弃顽固的敌视态度，而且他们的亲信也一直公开表示他们对法国的憎恨。这是一个难以衡量而又不容轻视的因素。只是为了安抚辉格党人，托利党人自己才公开否认企图强加给法国一个由他们挑选的政府。1795 年 12 月 22 日，格伦维尔在和平条件中包括了大赦亡命者以及归还他们的产业，这就透露了他的眞实思想。1800 年 1 月，他在和平条件中又增加了一条恢复君主政体。这位高贵的勋爵由于必须同共和派谈判而感到厌恶，因为他不能把他们看做是“正人君子”。而皮特不得不容忍那个被他在 1800 年 2 月 3 日称之为“革命彩票的最后冒险家”的人,这对他也决不是件愉快的事。

二、思想的冲突

政治的和社会的反动必然会在思想界反映出来。权威和传统再次流行起来，为数日增的作家和政论家公开地宣扬这些思想。[10] 有些人是从信念出发,另一些人则由私利所驱使,因为各国政府都认识到宣传的重要性，并为这个目的而拨了一些款项。在那些人[11] 中，重要的是法国和日内瓦的亡命者，象里瓦罗尔和巴吕厄尔方丈、德·伊韦尔努瓦和马莱·迪庞。在英国，坎宁由于出版《反雅各宾》杂志而加入了这一行列。法国发生的事件通常都被用来对

12 人民进行恫吓。巴吕厄尔方丈一直很成功地恢复了霍夫曼对“光明会”和共济会的攻击。但是某些作家在反对理性主义的批评中，把为传统思想提供新的论据从而提高论战水平，视为一种个人荣誉攸关的事。

在这方面，幷沒有什么嶄新的东西，因为十八世纪期间由于休谟而变得保守、由于边沁而变得更加保守的英国的经验主义，曾想要重新树立权威和道德习俗。这个学说的论点是：正象理性能够通过观察和经验而找出物质世界的规律，幷顺应这些规律而支配物质世界一样，理性也能够通过观察社会生活，从而证实传统制度由于能长期存在而完全符合“事物本质”。在伯克的哲学中，这种实用主义由于增加了从医学上借来的社会生机论而变得复杂起来，这种生机论十八世纪在法国蒙彼利埃医学院讲授过，督政府时13 期由比夏讲授过。它认为人是由自发的幼芽发展而成的，这种幼芽产生于一种被称为生命的非理性的力量。同样地，伯克把社会看成是一种植物或动物，而个人只是它的器官之一，因而社会的权威是作为个人的生存条件而强加在他身上的，他不能拒绝这种生存条件就象他不能拒绝身体的需要一样。这种和神秘主义混合起来的、有些类似浪漫主义的经验理性主义，从英国传到了德意志，对雷贝格和布兰德斯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据说，早在1793年就翻译了伯克的《法国革命感言》的弗里德里希·冯·根茨，甚至梅特涅，都是从这个思想学派中得出他们自己的政治哲学的。

和这些思想非常接近的是路易·德·博纳尔和约瑟夫·德·梅斯特；1796年，前者的《政权与教权论》和后者的《法兰西论评》同时出版。他们也把个人放在从属于社会的地位，而且博纳尔也经常引据事物的本质，但他们都用上帝的创造来代替生机论。主张专制和威权的博纳尔象醉心天主教教义一样珍爱王政的传统；他认为上帝为社会安排的结构是永恒不变的。具有历史感的约瑟

夫·德·梅斯特，作为一个忠实的教皇至上论者，不大在乎世俗政府的形式；在他看来，上帝满足于以其无限明智和灵活手段来保护这个社会；因此，人必须在事实面前低头。

有时甚至连政治经济学也不免对崇高的理性进行攻击。马尔萨斯对当时的英国加以观察，在1798年他坚持认为，人类无限进步的概念只不过是一种妄想；因为尽管有科学技术的努力，人口增长的趋向仍然比生活资料的增长迅速得多。因此，有助于增加人口的一切社会改革只会产生加重祸害的恶果；而只有疾病、瘟疫、饥荒和战争才能调整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可是，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马尔萨斯，通过规劝穷人禁欲而找到了一种解脱。然而传统主义的思想家一致认为，马尔萨斯对孔多塞和戈德温的希望给予了致命的打击。

传统主义者把法国革命和理性主义等同起来，他们毫不迟疑地以理性主义所遇到过的最可怕的敌人，即仇视智慧至上的运动，来全力反对革命。这个曾经启发了卢梭和“狂飙运动”的运动，在十八世纪末年正在向着通常被称为初期的德意志浪漫主义发展。 14 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断定智慧将能够解释宇宙之谜，并且主张理性要保卫自己的自由，不受本能和感情的侵犯，而本能和感情则是受原子机械运动的物质所支配的。这是一种奋发努力的哲学，科学和幸福就是这种哲学的报酬。但是，总有一些神秘主义者期待着体验纯属天赐的启示的神迹；总有一些放荡不羁的人希望偶然的机会能给他们带来幸福，或者甚至在冒险中寻找乐趣；总还有一些艺术家倾向于想像和幻觉。现在，时代的车轮带来了新的一代，他们为了赢得发迹的机会而探索崭新的东西。因此，他们恢复了感情的地位，提出了一套形而上学的提纲，这种形而上学赋于感情以通过直觉而达到“绝对”意境的能力，而认为理性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有些哲学家具有与此完全相同的见解。特别是康德，他摧毁

了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然后又借助于道德感而创造了另一种形而上学，这种道德感归根到底就是神圣的直觉。

另一方面，一直没有被理性主义所窒息的神秘主义，在十八世纪末期非常流行。它通过斯韦登堡、德·帕卡利斯和圣马丹的神灵学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并且开始渗入到共济会和光明会教义里。它伪装立足于科学理论和科学发现：从医学上它也借用了生机论，从物理学上借用了磁力学，磁性也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梅斯梅尔的讲道坛象梦游一样，使精神达到恍惚昏迷的状态，于是精神便接触到超自然的世界了。甚至天主教教义也不能使约瑟夫·德·梅斯特那样虔诚的教徒不受神秘主义的诱惑。

然而，对于任何一个这样的运动，如果只考虑到它的思想意识，而不考虑到它的拥护者的气质和社会状况的话，就不能看出它的深度。大多数神秘主义者都不能使自己适应社会环境，或者去适应而还没有成功。他们之中包括病患者和精神不安者，这些人内心空虚，一筹莫展，便注定了他们陷入忧郁，甚至自杀；也包括一些青年人，他们渴望自立和欢乐，但却受到社会的限制因而愤激；还包括那些谋求出路的人，他们受到那些因地位、财产或名望而享有特权者的阻塞而不能得志。这些人想使扶善锄恶的"绿林好汉"的形象理想化，那是不足为奇的；其中很多人后来由于年龄和成就而变得聪明起来，那也不使人感到意外。过去总有一些"浪漫主义者"，但在十八世纪，这些人数以倍增，因为资产阶级的兴起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越来越多的有才干但很贫穷的青年人变得愤世嫉俗或是心灰意冷。

文学和艺术或多或少受到反理性主义的反动影响。法国人以理性的名义，强制人们接受一些严格的美学准则，这些准则大大限制了人们发挥独创性的机会。法国作品成为各地的样板，因而评论家们，尤其是德意志的评论家，就很容易把这种"古典"艺术斥责

为外国进口货。在文学艺术这个领域里，沒有修养的个人主义者有获得成功的许多机会而很少需要冒险，而且实际上还大有成名的希望。在大自然中，在不为人熟知的国度里，在东方、中国和美洲，或在被遗忘了的过去的著作中，有人到处寻觅新意创见。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心醉神迷地欢迎伪造的奥西安的诗①，法国人发明了“行吟诗体”。文学体裁的分门别类遭到攻击，法国古典戏剧中的时间、地点和情节的三一律也遭到攻击，而莎士比亚则被人用来证明这一切攻击都是正确的。为了摈弃十七世纪的审美观点，甚至引证刚刚开始发现的希腊精神。变化较少的造型艺术沒有得到同样程度的解放。十八世纪末，从古代和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寻找源泉的古典精神，由于达维德和卡诺瓦的天才，再度赢得了胜利。与此相反，器乐的发展有力地激发了新精神。器乐是现代的艺术，它创造了自己的规律，而且因为它采用的方法是暗示而不是描绘，同时它的感染力主要是感觉上和情绪上的，所以就特别富于浪漫色彩。

革命的大动荡似乎在许多方面必然有利于这种新精神。法国革命解放了个人，并向一切传统宣战，宣告了出版和戏剧演出的自由，取缔了以确保古典清规戒律为己任的特权团体。革命激发了人们的热情，它的瞬息万变和恐怖转折使很多人心慌意乱，他们对变幻无常和情节恐怖的东西养成了一种病态的癖好，安娜·拉德克里夫的小说风靡一时就足以证明这种倾向。最后，法国革命使一种悲剧感又流行起来，这是从许许多多的不幸事件的景象以及人对大自然和命运的无情力量作斗争的景象中产生的。然而这个运动并不是在各地都产生了同样的影响。

① 《奥西安诗选》是苏格兰作家麦克孚生在1760年伪造出版的。奥西安是传说中公元三世纪的苏格兰吟游诗人，麦克孚生假托是从古代凯尔特语翻译来的，其实是他自己写的。诗歌情调哀怨悱恻，风行一时，也为波拿巴所爱好。——译者

16　欧洲南部各国当时几乎还没有受到影响;甚至在法国和英国,浪漫主义也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尽管有威廉·考珀和湖畔诗人①,1800年左右在英国风行起来的却是威廉·海利的古典主义,而乔治·克雷布则仍忠于朴实适中的现实主义。在法国,革命的激情鼓舞了演说词和歌曲的写作,但它没有使戏剧、小说和诗恢复生气。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可能是由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原因。在英法两国,青年人在思考和艺术的范围之外,找到了活动的领域。在英国,他们被商业和议会政治所吸引,而反对法国的斗争又渐渐加强了对英国国教的信仰。华兹华斯、科尔里奇和索赛在被社会孤立的压力下,最后屈服了。在法国,青年人或者参加革命队伍,或者亡命国外。到1815年止,战争一直在吸引着他们的想像力,诱使他们追逐荣誉和财富。拿破仑本人就是个浪漫主义诗人,后来转化成一位活动家,夏托勃里昂则没有经历同样的转化,这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必须如此。

德意志的情况有所不同,它仍旧被束缚在中世纪的框框里。热情而意志脆弱的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是和韦尼奥②同类的人,他原来并不熟知革命,就连战争也没有能吸引他;因为德意志的爱国主义当时还不是政治性的,只是领导政治的那些王侯和贵族的事。

事实上,德意志的两位大诗人歌德和席勒在度过狂热的青年时期之后,也随波逐流,前者成为魏玛公国查理-奥古斯特的大臣,后者成为耶拿的教授。他们研究了古希腊,宣称发现了怎样能使人的不同倾向在艺术领域内和谐起来,即使生命的活力与激情

① 由于华滋华斯、科尔里奇和索赛三位诗人都住在英国北部的沿湖区域,因此被称为“湖畔诗人”或“湖畔派”。——译者

② 韦尼奥(1753—1793年)是法国革命中的演说家,吉伦特派头面人物,1793年10月上断头台。——译者

同理性调和起来。他们的新人文主义号召个人自我孤立起来，以便“整体”地自我教养；这种人文主义在哲学上倾向于泛神论观点，在一段时期里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威廉·迈斯特》（1794—1796年）、《沃伦斯坦》三部曲（1798—1799年）和《钟之歌》（1799年）等杰作引人入胜，传诵一时。威廉·冯·洪堡投入了古典主义运动，弗里德里希·赫尔德林也并非置身于这个运动之外。

然而，这种吸引力是短暂的，这也不是偶然的现象。在任何其他国家，神秘主义都没有这样强大。它是路德教派的核心；通过虔信派和摩拉维亚修士派，人们可以发现十七世纪的鞋匠和通神论者雅各布·伯梅和浪漫主义者之间的联系。象亚伯拉罕·维尔纳、卡尔·里特尔和弗朗茨·巴德尔这样的学者都读过伯梅的著作，他们以自己对他的著作的实际理解，竟作了一些最意想不到的象征性的解释。康德之后，直觉主义继续在德意志哲学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终于把哲学引到了先验论的唯心主义。费希特在1794年出版的《知识学基础》一书中，通过精神的洞察力，把“自我”当作纯粹活动中出现的唯一真实。然后，他又树立了“非我”，以便给“自我”提供一个企图吸收“非我”的动机。后来，谢林又赋予“非我”一种独立的存在，尽管这种存在纯粹是唯心主义的。他相信自然和“自我”只是“绝对”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无意识的同一性被思考所分开，但是艺术家的天才可以通过直觉掌握它们，并把它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最后，音乐在德意志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海顿那时候正在创作他的最伟大的乐曲《四季》和《创世纪》，他的艺术仍然散发着十八世纪的满面春风的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的气息。另一方面，贝多芬的悲剧精神已在他某些初期的奏鸣曲中有所激发。

十八世纪将近结束之前，一群脱离了歌德以及更脱离了席勒

的人，把“浪漫主义者”和“浪漫主义”作为他们号召的旗帜，并且因而取得了成功。1798 年，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在他的兄弟奥古斯特的帮助下，在柏林发行了一个叫做《雅典娜神殿》的杂志，这份杂志出版了三年。他们 1798 年在德累斯顿，1799 年又在耶拿（奥古斯特在这里任教）会见了诺瓦利（他的真名是冯·哈登堡男爵）、谢林和蒂克。当时，蒂克刚刚出版《一个艺术之友、世俗修士的倾诉》，这部著作是他的一位早逝的朋友威廉·瓦肯罗德遗留给他的。他们共同议论出一种哲学，1804 年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在他的文学教程里采用了这种哲学，但是它本身却始终沒有形成一个系统的、连贯的思想。由于他们都是古典作品的门徒，他们首先把世界看成是生命力创造物的无穷无尽的变化。在谢林和其他学者的影响下，他们把“普遍同情”的概念引入了他们的哲学，这种同情，例如在化学的亲合力中、在磁力中和人类之爱中，到处都显示出来。后来，他们被施莱尔马歇倾吐的宗教思想所感动，从伯梅那里借用了“中心”的概念；所谓“中心”就是世界的灵魂和神圣的原则。无论如何，只有天才的艺术家通过直觉，或甚至通过梦幻和魔术，才能接近真正的现实：在他的手里，这种神秘的体验转化成艺术品。这是一种奇迹哲学，诗人变成了传教士。不幸的是：还不能说有人真正地创造过这种奇迹，因为这些浪漫主义者沒有留下伟大的作品，最好的也不过是诺瓦利的那些作品，其中主要的是《夜之颂歌》（1798—1799 年）。

然而他们的确播下了丰富的思想种子。在这方面，1801 年至 1804 年间，奥古斯特·施莱格尔在柏林的一些讲演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那些演讲里，他给浪漫主义下了定义，并且宣称艺术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民族灵魂的象征。施莱格尔给历史以这样的教训：美沒有普遍性，研究和欣赏艺术必须首先联系艺术产生的环境。至于民族，它本身必然导致出这样的结论：为了达到

完全的民族自觉，最好的措施莫过于研究民族的历史遗迹。已经开始政治复兴和社会复兴的德意志，正是通过浪漫主义运动，才也成为欧洲思想的一个中心。浪漫主义运动波及到法国较晚，但传到英国却很快。已经发现直觉功效的科尔里奇在德意志旅行时，开始接触到浪漫主义哲学，并且满脑子吸收了这种哲学思想。

浪漫主义本身不是一种政治学说，但是因为它象在其它领域里一样，在政治方面也依赖于情感，所以它的信徒们也就随遇而安。随着反动势力的得势，浪漫主义的信徒也大有作为，他们很快便成为狂热的反革命分子。此外，他们从历史上发现了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统治。从1799年起，诺瓦利就歌颂为中世纪大增光彩的基督教的统一；天主教的祷告书和音乐使他们深受感动，诺瓦利并且为圣母玛利亚写了一首赞美诗。他自己仍然是新教徒，但由于在奥国有作官机会，而且奥国比较坚决抵抗拿破仑，所以诺瓦利的许多朋友就为奥国服务，而且改信了天主教。

不管这些思想是多么值得注意，但却决不能夸大它们对舆论的影响。大多数憎恶法国革命的人并不是由于哲学的动机所促使，假如他们感到需要哲学，他们总是到宗教里去寻找。十八世纪末年宗教势力一度重振，它得力于保守的实用主义和多情善感的直觉主义的赞助，但它也是自行滋长起来的。贵族象聚集在君主政体周围一样，深感与国教休戚相关，并且同意这样的看法：魔鬼就是雅各宾派的始祖。此外，大灾大难和旷日持久的战争总是把那些心神不安和胆战心惊的群众引回到祭坛面前。 19

天主教亟需这样的复兴，因为，它首当其冲，创巨痛深。法国及其所占领各国只不过是“传教区”而已。在德意志，新的灾难迫在眉睫：巴塞尔条约和坎波福米奥条约宣告了一项普遍的世俗化运动的来临，而甚至反对革命的新教徒也都热心地盼望“把黑袍军赶出来因河地区”。另一方面，开明专制一直把教会置于自己的监

护之下。在德意志和奥国，国家在大学里培养僧侣，并把教区神甫更多地视为小学教师而不是教士；在西班牙，戈多伊的继任者萨尔维拉和乌尔基霍，从1798年以来就一直以哲学家自命；1799年，禁止向罗马教皇法庭上诉，要开辟财源时就想攫取教会的产业。庇护六世作为督政府的俘虏刚刚死去，奥国几乎不掩饰它想和那不勒斯王国一起瓜分罗马教皇世俗领地的愿望。可是同敌人的期望相反，教会的不幸反而变得对它有利，因为不幸引起了同情。英国热情地迎接了被放逐的法国神甫，这些人后来为英国天主教的复兴播下了第一批种子。伯克为了同爱尔兰人妥协，也一直不停地主张他们应享有宗教自由。在德意志，明斯特一个叫做“神圣族家”的热心的小组聚集在菲尔斯滕贝格和奥韦尔贝格的周围，哥里津郡主和蒙塔居侯爵夫人（拉法叶特夫人的姊妹）这样的人物也活跃在这个小团体里。对于他们来说，施托尔贝格在1800年的改变信仰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喜讯。俄国皇帝保罗一世也激起了很大的希望。约瑟夫·德·梅斯特和格律贝尔神甫已经说服他要求重建耶稣会，而且他已经把马耳他骑士团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被选为骑士团的首领。

直到这时几乎还没有受到法国革命触动的新教，从宗教的恢复中得到的全是好处。在德意志，施莱尔马歇在他1799年出版的《论宗教》一书中，重新激发了新教的神秘的热情，而威廉·瓦肯罗德和浪漫主义者正在通过美学直观的方法寻找他们返回宗教的道路。在荷尔斯泰因的恩肯多夫，雷文特洛是一个虔诚的团体的领导人，这个团体和明斯特的“神圣家族”很相似。施托尔贝格在改变信仰之前曾在这里面呆过，甚至天主教徒波塔利斯也和这个团体有联系，他在签订教务专约后出任宗教大臣。在英国，20 卫斯理已于1791年逝世；他既建立世俗传教士制度，又创立了一个互选补充成员的教阶组织，从而使循道教派更加接近英国国

教。[1]这种情况在1797年引起了循道会派内部的第一次分裂，可是这个教派由于在群众中煽动神秘主义而继续得到发展。循道教派对“非英国国教信徒”[2]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浸礼会派[3]由于效仿循道教派的做法而得到了进展，而普利斯特利的索西教[4]的长老派和普赖斯的理性主义的长老派却在迅速衰亡中。甚至在英国国教中也形成了一个福音派的小核心，其中最出名的是威尔伯福斯，他们想使国教恢复生气，但是沒有成功。复振后的非英国国教信徒抛弃了对法国革命的同情，他们对于人民群众的保守的影响即使有被夸大之处，但这种影响的存在也是无可争辩的。

法国似乎依然是世界上理性主义的堡垒，至少是在批判的形式下，反对传统和基督教，就象十八世纪所采取的形式一样。理性主义的代言人德斯蒂·德·特拉西、卡巴尼斯、多弩和沃尔內，都固守在国民公会设立的科学总院和高等学校的重要机构里。他们通过然格內控制着《哲学旬刊》，他们的门徒在各个中心学校里任教，这种学校几乎在所有的郡里都成立了。然而理性主义正在起变化。“空论家”中少数仍然是唯物主义者，大多数也不再留意形而上学，而在科学的影响下，只注意对现象的研究，日趋倾向于经验实证主义。因为法国革命在公共教育中给科学以显著的地位，所以科学在法国很兴盛。德斯蒂·德·特拉西和卡巴尼斯打算建立一种思想的科学，一种从形而上学分离开来，却和生理学联系起来的心理学。加尼埃和萨伊研究政治经济学也想发展成为实验科

---

① 约翰·卫斯理(1703—1791年)，英国牧师，1729年在牛津创立循道教派（我国也译作“卫理公会”、“监理会”），虽反对英国国教腐化而自立山头，但卫斯理晚年又渐接近英国国教，现在成为基督教主要派别之一。——译者

② “非英国国教信徒”(dissent)指不奉国教的其他各教派的新教徒。——译者

③ 浸礼会派（也译作“浸信会”）出现于十七世纪，主张只为成年人施洗礼。——译者

④ 索西(1525—1562年)是意大利新教徒，反对耶稣的神性，开创了一个异端教派。——译者

学，但是基础不够。这是一个内容丰富多采的运动，但是直到很久以后它才充分展开。此外，这种实证主义由于反映了百科全书派的精神，因此与英国的经验主义大不相同。这种实证主义也出现在拉普拉斯的«宇宙体系解说»中，出现在拉马克攻击生机论的著作中，以及迪皮伊的«一切宗教的起源»中。虽然从社会观点看来，政府和共和派资产阶级日益变成保守派，但他们却仍然敌视基督 21 教。在人民群众中，宗教习惯的确大大淡薄了，因为红衣主教孔萨尔维在签订教务专约时写道："大多数人民都是冷漠的"。

然而，不应该忘记，在十八世纪，理性主义哲学不但远没有被所有法国人接受而且遭到许多通常缺乏才能却并不缺乏读者的作家的攻击。在革命大动荡的高潮中，传统的卫道士不仅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反而变得更加顽固了。他们的队伍由于一部分老资产阶级分子的参加而扩大了，这些人被通货膨胀搞得破了产，因而产生了对新思想的厌恶。法国也没有免于受到神秘的和情感的直觉主义的影响。神灵学在法国拥有一批忠实信徒，到1800年左右特别是在里昂和阿尔萨斯最盛行；在里昂是以韦雷尔莫兹为中心人物，在阿尔萨斯，奥贝兰把神灵学和德意志的影响结合在一起。事实上，感情的哲学只是在法国才找到了它的最优秀和最有影响的首领；因为卢梭的吸引力一直没有消失，相反，摈弃他的政治理论的人恰恰是那些最热衷于在文学和宗教方面把感情置于首位的人，夏托勃里昂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最后，象在其它各地一样，有些法国人重新皈依天主教是象儒贝尔一样由于感情的缘故；或者是象丰塔内一样出于保守思想；或者是象罗兰夫人的朋友邦卡尔·德·伊萨尔一样，仅仅是为了寻求一种慰藉。后来，当波拿巴改弦易辙而和教皇订立教务专约的时候，这些人都支持他，尽管遭到那些原来拥戴他上台的人的反对，甚至也违背了他自己军队的意志。

如果理性主义的传播因此而达到了它的极限的话，那并不是由于反革命的实用主义起了作用，因为博纳尔和德·梅斯特的著作是在国外出版的，还没有输入法国；德意志的思想也没有什么影响。法国的浪漫主义没有它的哲学；甚至在艺术上也没有取代古典主义。人们阅读北方文学只是为了要发现可以利用的主题，或者为了欣赏它生动的描绘，或者观摩它刻划感情的笔法。当时最流行的是"奥西安"的诗，玛利—约瑟夫·谢尼埃把它译成了法文。在"奥西安"著作的影响下，阿尔诺写了«奥斯卡»和«高卢人之歌»。波拿巴也和别人一样喜爱"奥西安"的著作。但在1800年，当斯塔埃尔夫人第一次把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加以对照时，她只奉劝法 22 国古典主义者从北方文学那里摹仿那种忧郁伤感的情调。法国公众中的大多数对哲学上的理性主义与传统的冲突仍然漠不关心，而这种重要情况的确最能说明波拿巴的成就了。那些从出售国有产业中、靠投机和政府合同而发财致富的、不学无术的新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很少关心伯尼奥所说的"原则病"。政府中那些出身旧贵族的人，象巴拉斯和塔列朗等，都是公认不讳的贪污腐化分子和叛卖的专家，他们对此表现了冷嘲热讽的蔑视态度。经常出入于塔利昂夫人、阿姆兰夫人或者雷卡米埃夫人的时髦沙龙的上层人物所想的只是寻欢作乐。更为严重的是，在动乱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学浅识少还不以为忧；这一代人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只想出人头地的发迹问题；战争为他们开辟了一条成功之路，而勇气则是一个足够的条件。只要波拿巴无往而不胜，这些现实主义者就听任波拿巴为所欲为，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决不愿恢复旧制度。他们对各种思想都漠不关心，把法国革命的成就当作既成事实来接受下来，因为他们从革命成就中或多或少也得到好处。因此，全国大多数人始终忠于革命事业，而法国和欧洲之间的鸿沟则继续存在下去。

三、民族的觉醒

法国革命和旧制度之间的斗争具有普遍性，它是阶级对阶级的战争，民族情绪起初似乎还沒有起作用。而且在十八世纪里，人23们幷不认为这种感情是重要的。君主们和各个分支的贵族构成了一个统治者的世界性的社会；他们不考虑各民族的起源特性，把各族人民当作交他们看管的羊群一样地彼此瓜分；当时有国家而沒有民族。尽管有见识的资产阶级很明白人类可以分为各种不同的种族，但他们基本上把人类看成是能够具有共同文明的一个整体；而且，虽然理性主义使基督教世界的概念世俗化了，但却也使这个概念延续长存下去。法国革命一开始，路易十六就呼吁各国君主团结一致，而且法国亡命者也向所有贵族发出了同样的呼吁。这种呼吁幷不是毫无效果的。1790 年以来，伯克就鼓吹建立反对法国革命的十字军，1800 年左右弗朗索瓦·德·伊韦尔努瓦也这样地鼓吹过。同样，对革命者来说，所有的人都是兄弟，所有的暴君都是他们的敌人。直到 1815 年，斗争大致都保持着这种特性；法国在国外始终有一些朋友，而在国内，也始终存在着一些不可调和的敌人。

法国革命号召人民起来治理自己，根据同样的原则，它确实也唤起了民族的意识。革命党人自豪地把自己称做“爱国者”；对他们说来，法国是“民族”。然而，当革命一开始他们深信一切民族都会欢迎法国的福音，幷且深信，这样一来，文明就会保持它的普遍性。他们从沒有想到各民族会变成敌人，他们深信只是暴君才挑起了战争，民主能给所有的人带来和平与博爱。相反地，君主和贵族都敌视民族这个概念，因为它好象是与人民主权和公民平等联系在一起——“民族这个词，听起来象雅各宾”。在尼德兰，贵族和

僧侣宁可回到奥国的奴役之下，也不愿意丧失他们的特权。在波兰，同样的恐惧削弱了民族反抗的事业。在匈牙利，豪绅们仍旧忠于哈布斯堡皇室，这些人一旦被允许对农民为所欲为时，他们甚至自愿局部日耳曼化。至于君主们，他们除了自己的利益以外，仍然什么也不考虑。他们完成了瓜分波兰。匈牙利议会要求维也纳作出一些让步：以匈牙利语为官方语言，给以关税的优惠待遇，以及通过合并达尔马提亚或阜姆以便取得出海的通道，可是这一切都毫无结果。尽管匈牙利摄政王约瑟夫大公多次提出建议，但皇帝弗兰茨二世却对这些要求置若罔闻。爱尔兰在1798年爆发了起义，皮特决心摧毁爱尔兰还残存的独立地位，取消了都柏林的政府和议会。此后，一百名爱尔兰议员和三十二名爱尔兰勋爵便参加 24 了英国议会。这个岛屿保留了它的债务和国内税收，但要负担帝国的开支十七分之二。英国答应向爱尔兰开放英国市场，更重要的是皮特在康华里总督和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国务大臣的支持下，透露了他的企图，即要废除禁止天主教徒参加议会的“宣誓条例”；① 他甚至还暗示把天主教“树立”为爱尔兰国教的可能性，如果政府有权对主教的选择进行监督的话。对这一点，有十个主教表示同意。而只是这一点，就足以使很多爱尔兰的新教徒起来反对合并，这些人起初由于害怕曾拥护过这个合并计划。皮特无奈，只好采取分封爵位和奉送大量金钱进行贿赂，不过这些钱还是出自爱尔兰身上。合并问题终于在1800年2月5日在都柏林表决通过，5月间在伦敦得到了批准。

逐渐引起从世界主义转变到民族主义的是战争。受到各方面

① 英国宗教改革后通过的一系列法律，总的内容是除英国国教徒外，任何人不得充任公职，要求文武官员就职时均须宣誓效忠英王，承认英王为教会最高首领等等，爱尔兰天主教徒对此反感极大。英国到1829年，爱尔兰到1871年才废除此项法律。——译者

攻击的法国人，首先从自己的思想上倒退了。他们蔑视那些仍然处于“奴隶”地位的外国人，而以自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而自高自大起来。共和国在转向对外征服的时候，利用这种感情来激发自豪感和自利心；然而，这种感情同时也就开始背离革命的理想主义，从而失去了它的纯洁性。波拿巴从一开始就喜欢这种大大有利于他准备执掌政权的演变。与此同时，英国由于对法国作战，最后也染上了民族狂热症。起初，仍留在辉格党内的人士在福克斯的领导下附和了民众各阶级的情绪，认为战争只是皮特和托利党的事。但是当法国准备入侵爱尔兰，并且去征服埃及的时候，情绪就开始转变了。对瑞士的入侵改变了科尔里奇的态度，他在《法兰西咏歌》中斥责背信弃义与不敬神奉教的敌人是轻浮与残酷的民族。从这时起，皮特就能要求全国作出努力了，但在公众情绪改变以前，他慎重地还没有这样做。

同时，法国在荷兰、西沙尔平共和国① 和瑞士根除了旧制度，从而实现了领土统一和国家统一；这就促进了这些地方民族情绪的觉醒和发展。法国的干预特别有利于意大利，那里的民族统一派比通常人们所想像的要多得多，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但是，法国迫于战争的需要，把这些国度当做前哨阵地来对待，而它们由于担负了供应法国军需的重担，不久就体会到独立的价值。于是，罗伯斯庇尔曾预见到的一种致命的逆转局面出现了：法国引起了这些国家的仇视。1799 年当俄国人和奥国人侵入意大利的时候，他们被当做解放者而受到了欢迎。这种危险还不太大，因为德意志还没有受到影响。虽然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以及浪漫主义所激起的“回到过去”的思潮，都在知识界大大激发了民族情感，但这种民族情感还没有采取政治的形式。同

① 意即(阿尔卑斯山)山内共和国。——译者

政治上已经组织起来的民族，及这些民族之间的野蛮厮杀相对照，德意志是个“文化之邦”；德意志人甚至从自己弱点中找出优越性和神圣使命。这种傲慢的自甘落后态度在法国入侵以后就不复存在了。

同时，针对法国革命的民族概念，德意志已经提出自己的民族概念，法国人认为，民族实际上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虽然并不忽视决定个人选择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但是民族是在个人自愿加入的“结盟”公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相反地，赫德尔和他以后的浪漫主义运动，都把民族视为一个有生命的存在，象其他的生物一样，也是从生命力(即“民族精神”)的无意识的活动中产生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语言、民歌以及艺术，无非都是这种“民族精神”的表现。我们再次发现，德意志处在欧洲发展转化的中心。它将成为反对革命法国的集结地，这不仅因为它作为一个民族出现，而且还因为它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民族概念——民族是一种集体存在；在这种集体存在中，个人丧失了全部自主权，而自由，则象神秘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存在于愉快的逆来顺受之中；这种集体存在否认理性主义的普遍性的文明，并且赋予自己的需要和激情以神圣的价值。

大约在同一时期，日本也出现了同样的发展。在那里，汉学学者早就赋予他们的讲学以批判的理性主义的调子；他们争论天皇的祖先是否是太阳，他们宣称：天神并不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但是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在贺茂真渊和他的门徒本居宣长（死于1801年）的领导下，日本重现了一种神秘主义和感伤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在尊崇佛教和它的戒律的同时，重新树立起神道和这个民族过去的威望。这个运动的政治影响非常深远。按照这些革新者的意见，天皇又成为天神之子，幕府将军成为篡权者，日本人成为注定要统治一个世界帝国的优等民族。在松平定信的独裁和改

良的摄政(到 1793 年为止)之后，幕府将军德川家齐①同京都宫庭和解了。尽管如此，皇室革命的种子还是播下了。在这里又看出人类思想中两种永恒的趋势在交替，这是不足为奇的；然而，由于欧洲和远东之间还没有文化上的联系，处于世界两端的这种不谋而合的情况却是很值得注意的。

① 原著误为德川家治(Iyeharou,1736—86 年)，现改为家齐(Iyenari,1773—1841 年)。家治是第十代将军(1760—1786 年在职)，而第十一代将军家齐在 1787 年继位，因未成年始有松平定信摄政，1793 年家齐成年而摄政结束。原著第四版(1953 年)索引有 Iyenari，而无 Iyeharou 是对的，但第六版(1969 年)索引却只有 Iyeharou，便与正文同误。——译者

第二章　战争的后果与和平的条件

27

由于不存在民族仇恨的问题，各国的传统野心从一开始就使法国和欧洲的冲突复杂化起来。反法同盟各国投入战争时，不仅仅是要扼杀法国革命：大陆列强还要肢解法国，英国要夺取法国的殖民地并摧毁它的商业和海军，以便有利地结束从路易十四以来的英法竞争，并恢复它那由于美国独立战争而受到危害的海上霸权。但是，十八世纪期间使列强彼此冲突的问题并没有全部解决：普奥同盟终于因波兰问题而垮台；俄国在东方和地中海的野心使皮特忐忑不安；西班牙一直对英国心怀忧惧。各同盟国从来没有有效地使彼此的作战努力协调起来；他们各自所得到的利益是悬殊的，这只能有助于加深他们的分裂。大陆各国被打败了；法国能够同普鲁士议和，并且能把西班牙争取过来，同自己结盟，还能够到达和越过它的“自然疆界”。1799 年，第二次反法同盟又夺回了意大利和瑞士的一部分，但象第一次反法同盟一样，它本身已处于瓦解 28 之中。相反地，英国在海上取得胜利，但它缺乏陆军，因而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打败法国，它的经济形势也不是没有弱点的。问题在于，从欧洲的分裂中得到了好处的法国，能否取得胜利并获得持久和平，以保持它的“自然疆界”。所有研究拿破仑的史学家都认为，这是支配他的命运的问题。

一、大陆各国

欧洲各国的君主都是非常庸碌无能的：在奥国，弗兰茨二世是

一个虚有其表的庄严君主,他不重用他的兄弟查理大公,而愿和他的忠诚的但能力有限的首席顾问大臣科洛雷多伯爵一起指挥一切。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一个诚实、善良但却不大机敏的人,他虽然优柔寡断,但却极力维护自己的权威。俄国的保罗一世,是个半疯的人,残忍而反复无常。甚至战争也没有使这些君主们学到什么教训。例如,奥国仍旧实行强制在农民中招募或以抽签的办法来征召新兵,仍是终身服役。军官差不多都是贵族,他们仍旧是购买军职。1798年,查理大公打算把团改编为师,但是战争迫使他放弃了这个计划。无论是战术、战略、或是后勤供应,都没有任何改进。

大陆各国并不缺乏兵员。据估计,从1792年到1799年,他们的损失是:死亡十四万人,受伤二十万人,被俘十五万人;这个数字无疑是很庞大的,但他们的人力远远没有耗尽。最缺乏的是钱。在奥国,尽管增加了赋税,但年度赤字却从约瑟夫二世统治末期的二千万盾(或福林)[1]增到1796年的九千万盾。政府不得不采用强制公债的手段,而债务就由1793年的三亿九千万上升到1798年的五亿七千二百万。英国给予奥国以补助金,另外还保证或准许在伦敦向私人借款。尽管如此,财政偿付能力只能靠发行纸币来维持,而纸币的价值又不得不强制规定,以便为1800年的战役提供经费。流通的纸币总额由1793年的二千七百万增加到1801年的二亿。从那时起,奥国的盾就开始贬值了。1801年,在奥格斯堡交易所里,盾的价值下跌了百分之十六。俄国的卢布更为虚弱,在来比锡只按它的票面价值的百分之六十来兑换。保罗一世统治时期,俄国主要在荷兰欠下的债务就由四千三百万盾上升到一亿三千二百万盾,而且政府每年还要发行一千四百万新的纸卢布。瑞典

[1] 这种货币单位约值五十法国索尔。

也采取了印刷纸币的措施，纸币的价值在1798年下跌了四分之一以上。如果没有英国的补助金，反法同盟各国的确很难继续进行战争。但是，这个同盟是否仍然存在呢？

虽然保罗一世大事宣扬他如何仇视法国革命：他把路易十八庇护在米塔瓦，并且维持了孔代的军队，然而要等到埃及战役才使他决心参战。这是因为从那以后东方问题对于俄国的外交政策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不满足于肢解土耳其帝国各属邦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已经在那里赢得了特权地位：即对这些地方的基督教臣民境况有一定的权利过问，以及俄国商船自由通过两海峡的权利。这种特权只是在1799年才给予英国，1802年才给予法国的。土耳其帝国的瓦解给俄国人得寸进尺的机会。1793年以来，塞利姆三世一直在竭力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但是在很多省份里他的权力有名无实。阿里-泰布兰尼在阿尔巴尼亚和埃皮鲁斯为自己开拓领地；帕斯万·奥格卢占领了维丁，并且在向亚得里那堡进军时自封为帕夏；杰扎尔控制了叙利亚；瓦哈比教派的首领阿卜杜勒·阿齐兹征服了整个内志，并且威胁着圣城和巴格达的帕夏。希腊人，特别是塞尔维亚人，也在引起人们的忧虑不安。前者乘战争的机会，利用土耳其当时守中立而遍布于地中海上；他们乘着俄国的船只深入黑海；在各大港口都形成了希腊人的集居点。他们从柯勒爱斯和来格斯的作品中知道了法国革命，并且看到了飘扬在爱奥尼亚群岛上的法国三色旗。这一切使希腊精神复苏。被土耳其近卫军步兵的掠夺所激怒的塞尔维亚人在上次土耳其战争中曾经援助过奥国。他们的首领卡拉一格奥尔吉和奈纳多维奇只是在等待时机，以便帮助俄国对土耳其重开战。 30

波拿巴远征埃及的结果使俄国获得了进入地中海的机会。保罗一世变成了土耳其苏丹的盟友后，使土耳其对俄国军舰开放了两海峡。他伙同土耳其人和艾奥尼纳的帕夏，占领了爱奥尼亚群

岛，在这个群岛上建立一个受他保护的共和国。保罗在被选为马耳他骑士团大统领后，企图久据该岛；1799年11月3日，格伦维尔不得不答应他：英国如从法国手里夺到马耳他，也不会留在那里。保罗还垂涎科西嘉岛，他的军队在那不勒斯王国登陆，并且答应使撒丁国王复辟。这样，保罗一世通过改变俄国对土耳其的传统政策，获得了一种俄国从未有过的势力。一心想重新占领埃及的英国，只得坐视俄国势力的扩张。但是弗兰茨二世却不愿意让俄国人在意大利为所欲为，保罗把苏沃洛夫在苏黎世的战败归因于奥国的背叛，因而召回了他的军队。由于反对参加反法同盟的罗斯托普钦接替潘宁出任外交大臣，俄国军队回国后也就不会再度出征。保罗脱离反法同盟的结果使奥国陷于孤立，并且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如果英国认为今后它得以放手占有马耳他的话，则将导致英俄冲突。以前，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曾纠集过一些中立国家反对英国的海上霸权，①并对英国关闭了对它的商业无比重要的波罗的海。

31　在此期间，奥国不得不单独承受战争的重担。帝国议会正式地支持这场战争，但是自从巴塞尔和约签订以来，神圣罗马帝国只不过是个影子罢了。普鲁士保证了包括汉诺威在内的北德意志的中立。在分界线以北——奥国的胡德里斯特称之为“迷人地带”——的德意志诸邦，享受着和平和大量商业利润带来的益处。普鲁士的威望因此大大提高，弗里德里希-威廉很快地成为一颗“北极星”，成为一位“与皇帝抗衡的皇帝”。根茨在1799年劝说弗里德里希-威廉坚持中立政策，其实这是完全多余的；因为他已经打定了主意，并指望成为一个北德意志邦联的首领。他还做着扩张领土的美梦，他急不可待地要实现教会产业世俗化，垂涎汉诺威，

① 指在美国独立战争后期，从1780年到1783年俄国、瑞典、荷、普、奥、葡等国组成的第一次武装中立联盟。——译者

同时还策划要吞并纽伦堡。被赶出北方的奥国，由于丧失了来因河左岸而在南方感到耻辱；它还感到关于巴伐利亚的意图被出卖了，虽然在1799年继承了查理-特奥多尔的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时刻在为他的继承权担心。至于符腾堡公爵弗里德里希二世，他已被卷入到一场与各省等级议会长期纷争的局面里，这些议会已经擅自向巴黎派出了密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德意志的诸王侯只是出于恐惧才跟随着奥国，他们都在等待和法国和好的时机。因此，一个反法的德意志诸邦的同盟就不可能实现了，而神圣罗马帝国本身的消亡则看起来非常可能，戈雷斯甚至已经讽刺地为它拟好了死亡证。奥国大臣图古特并不为此过分担忧，更不惋惜尼德兰的丧失。他没有忽略在波兰寻求补偿，但是象他的十八世纪的前任们一样，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意大利。在吞并了威尼西亚诸邦之后，他希望在这个刚刚驱逐出法国人的半岛上取而代之。在这种情况下，他估计总的看来，奥国最终将无可怨尤，这不是毫无根据的。

法国会不会把俄国人争取过来，并且通过把意大利让给奥国从而使它保持中立呢？假如是这样的话，英国起码会因此而孤立无援。

二、英国的战争努力

32

英国的行政制度也没有经历什么变化。它依然是陈旧过时和叠床架屋的，充满闲差冗员并日趋腐败。然而，议会制的政府证明是稳定的，并且具有政策观点的连贯性，这是会使大陆上的专制君主们羡慕不已的。统治英国的寡头集团把国家当做是自己的世袭财产，这一集团中富有才干的人虽不是很多，但是他们却能用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一定的纪律来捍卫英国。他们的领袖威廉·皮特主

政以来饱经忧患,[①]但是他们却称赞他的使英国人免受强制和牺牲的坚韧性和谨慎的经验主义，直到最后，他们认识到处境危险时,才开始大声疾呼,要求强化统治和做出牺牲。英国强征海员和招募士兵派出去参战，这些人都是来自贫穷的阶层。他们都是由出身贵族的志愿参军的人率领的,这些军官的职位都是用钱买的。为了保卫本土建立了国防军,民兵逐渐扩充到十万人。原则上,这些士兵都是由抽签办法挑选的，但实际上可以雇人顶替，许多教区往往用钱买足征兵名额；这样一来，正规军招募的兵源最终变得枯竭了。1794 年到 1799 年间，招募的正规军被用在殖民地上，而那些靠英国补助金维持的盟国则担任了大陆上的牵制攻击任务，这对英国很有利；格伦维尔坦白承认，他宁可资助大陆各国也不愿给他们增派援军，因为后者将会剥夺英国工业上的人力；此外，由于那些钱还是化费在英国市场上购买军需品、所以钱并没有白白损失掉。

这是一种代价很大的政策。支出从 1792 年的二千六百万英镑[②]上升到 1801年的九千一百万英镑。皮特稍微提高了间接税，这些间接税在 1797 年提供了百分之七十五的岁入，但是这还是不够的。1792 年，岁入只抵偿了支出的百分之六十八，而 1797 年则抵偿了不足百分之二十九。英格兰银行只好谨慎地贴现财政部证券：1792 年为八百五十万英镑，1797 年为一千七百万英镑。由于黄金支付的中止，英格兰银行变得比较慷慨了，以至于在 1801 年流动债务超过了二千四百万英镑。但是最重要的来源还是只付利

---

① 小皮特(1759—1806 年)第一次出任首相是在 1783 年至 1801 年，是法国革命的死敌，拼凑前两次反法同盟，先后失败。1804年 4 月再度组阁，第三次反法同盟又告战败，1806 年 1 月忧愤而死。——译者

② 1791 年一英镑相当于二十法郎(一个金路易)，十三马克，十一荷兰盾，八卢布或四点五美元。1791 年的一英镑等于现在(指 1967 年。——译者)的五英镑五先令。——英译者

息的固定公债，它的本金从1792年的九百万英镑上升到1801年的三千六百万英镑。皮特在偿还债务时能保持兑换率不变，这表明英国贵族对自己的未来的信心达到了何种程度，并且也证明英国已经从它的贸易和殖民地中获得巨款。尽管如此，英国的支撑力还是依靠信贷。由于英国资本家的活动也是依赖于信贷，所以在法国人看来，这个在当时不为人熟知的制度是虚假而脆弱的，这是可以理解的。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法国在整个时期一直对英国进行了经济战。

从1794年起，当欧洲大陆的战局变得恶化时，英国政府竭尽全力激励全国做出新的牺牲。然而，只是到坎波福米奥条约之后，当英国陷于孤立，在爱尔兰遭到攻击并在埃及受到威胁时，形势才有了决定性的变化。随着1797年黄金支付的中止，皮特坚持要进行财政改革，以限制通货膨胀。这一次，那些拥有土地的贵族和资产阶级较少受到照顾：土地税增加了，并且实行了所得税。与1972年的三百万英镑相比，1801年直接税的收入达到一千零五十万英镑。但是，决不能夸大这些改革的重要性，因为在1801年间接税仍然占岁入的百分之六十五，而公债则相当于支出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到这时已变得很明显，要继续进行战争就需要再做出新的努力。

改进新兵的招募更为困难。在1794年如遭入侵要征召数以万计的志愿兵是容易的，因为在没有遭到实际入侵之前他们都是呆在自己的家里，并且免除在民兵里服役。他们是民间自动组织起来的，并且同意在由他们自己所确定的一定地区内作战。人们期望他们会象在旺代暴乱那样地作战；事实上他们与法国革命的志愿军唯一共同之处只是个名称而已。对英国说来，侥幸的是他们从未经受过同样的考验。与此同时，正规军里的情况非常危急，因此，在1796年政府要各教区用抽签方式提供一万五千名正规军士 34

兵。如有不足，课以罚款。然而这一着完全失败了，因为各教区宁愿交付罚款。最后，在1798年，只得建议民兵转入正规军，凡转入者给以奖金。但是这个意见遭到各郡郡长的强烈反对。他们任命民兵的军官并且用土地税的收入来维持民兵，因此他们把民兵当作自己的私有部队。不过，这个办法最后在1799年7月12日还是在议会里通过了，而且一直延续采用到1815年。民兵响应了号召，参加了对荷兰以及后来对埃及的远征。皮特到此止步，沒敢再进一步实行强制兵役制。皮特也沒有结束在军政方面的混乱状态，当时军政是由邓达斯、温德姆、约克公爵和内政部共同掌管的。实际上，作战则是由皮特、格伦维尔和国王指挥的。但是，军事技术还是有了一些进步：1797年创建了骑炮兵中队，1799年炮兵被编成一支独立军团。除了驻防部队之外，英国军队能派出的远征军只有一万人左右；这支远征军队除了1799年在荷兰遭到惨败外，在1794到1807年间只是在殖民地作战。首先是法属岛屿，接着是荷属各地，后来是特立尼达岛，最后在1801年瑞典和丹麦的安的列斯群岛都相继被英军占领。但是1798年当杜桑-卢维杜尔与松托纳①结成同盟从圣多明各岛驱逐英国人时，七千五百英军死在这个不得不放弃的岛上。在殖民地作战的这些胜利自然应归功于舰队的战斗行动，这是英国对反法同盟的主要贡献。

舰队扩充得更加庞大了，但是它的扩充并不是沒有困难的，因为商船队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扩大着。从1793年起，英国军舰不得不招募外国人，直到全部水兵的四分之三由外国人组成。各国的水手、战俘、罪犯、罢工者和政治嫌疑犯都一律被强迫服役。由于船上生活仍然令人难以忍受，所以哗变层出不穷。1797年，哗变发展成一次蔓延甚广的叛乱，这次叛乱通过杀一儆百的办法，但主

35

① 松托纳(1763—1813年)是法国革命议会从1792年起就派到圣多明各岛的代表，他采取发动黑人抗英的政策。——译者

要靠增加军饷和战利品奖金的办法，才被平息下去。造船工艺几乎没有变化。标准的战列舰的船身仍然是二百呎长，船体中部横梁五十呎宽，装备七十四门大炮，有两层战斗甲板和六百名水兵；高耸的三层舰的数量也还是逐渐增加了。1801 年前一直是海军大臣的斯潘塞勋爵，在建造战舰方面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障碍，英国的橡木和冷杉木或者苏格兰的林木仍然可以弄到。美洲的白松和从波罗的海地区来的木材也都能用上，而法国人再也买不到这些。

1796 年以前，海战一直进行得毫无效果。冬季里，豪和布里德波特把他们的军舰停泊在港口里，这样就中断了封锁。而后，与西班牙的决裂导致了对科西嘉和地中海的放弃。1798 年，当圣文森特伯爵杰维斯海军上将组织了辅以军需供应和定期轮换的经常的近海巡逻时，封锁就又恢复了。如果法国人企图冲破封锁，巡逻舰队就奉命在英吉利海峡的入口处集中。同年，皮特决定强行进入地中海以援救那不勒斯；他虽然没有成功，但却设法夺取了西西里和梅诺卡岛；这时，那不勒斯和葡萄牙的海军加入了英国舰队。1799 年，荷兰舰队被拿捕了，纳尔逊已经在阿布基尔摧毁了布律埃斯的舰队。在埃及的法国军队完全被隔绝海外，马耳他也被包围了。看起来，除非保罗一世加以反对，否则地中海即将落到英国手里。但是法国海军还没有完全被清除出地中海：1799 年 4 月，海军上将布律克斯还能从布勒斯特启航而到达土伦，并且又回到原泊港口。英国舰队的将领们至少能保护他们的交通线，制止私掠船①的活动，以及摧毁敌人的商船。由于采用了军舰护航的航行办法，英国船主平均每年只损失五百艘船只。这个数字占英国船只总数的百分之三，几乎不多于通常在海上遇难所造成的损失。在

① 战时交战国颁发“私掠船证书”给私人船只，让这些船只参加对敌海战，特别是拿捕敌国商船。这样参战的私人船只称为“私掠船”，这种制度在 1856 年的巴黎会议上正式宣布废除。——译者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海上的保险率曾高达百分之五十，而在1793年到1800年间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到1802年和平以后，甚至降到了百分之十二。英国拿捕了七百四十三艘海盗船，而从1798年起俘虏了二万二千名水手。法国人只剩下了二百艘二百吨以上的商船，这仅仅是他们1789年实力的十分之一。

在所有的反法同盟国家中，只有英国达到了它的目的。它的盟国认识到这一点，都谴责它沒有给它们派遣军队；而这不能使同盟得到巩固。但是英国还沒有懂得：仅仅靠它的海军力量是不能迫使法国投降的，最后胜利必须在大陆上赢得。

三、法国及其盟国

随着反法同盟各国的分裂，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地位却正是十分强有力的。除了阿维尼翁、蒙贝利亚尔和牟罗兹之外，法国还吞并了比利时、马斯特里赫特和荷兰弗兰德、来因河的左岸（至少是一直到科布伦次以下离开来因河、到达并顺沿罗尔河一线）、以前的巴塞尔主教邦（包括波伦特鲁伊、圣伊米耶山谷和明斯特山谷以及比尔）、日内瓦、萨伏依和尼斯。法国仍然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战争使它死伤和失踪了约六十万人；然而，这些被公认为骇人听闻的损失并沒有危及到法国的有生力量；法国如果善于使用这些有生力量，无疑能击败任何攻击。何况法国已不再象1793年那样孤立了。

在“全国皆兵”的名义下作为临时措施而采用过的强制兵役制，根据共和六年果月19日（1798年9月5日）的儒尔当法已被规定为永久性的征兵规则。除非处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这项法律只要求那些用抽签或征募的办法产生的一定的人数服兵役。但是在共和七年，那些适龄的青年人利用共同招募志愿兵以凑足他

们所在公社的军队数额的办法，而得以逃避这项法律的规定。波拿巴后来只不过是增加了个人顶替的规定，这项办法是原曾实行过，以后被他的前任又禁止了的。此外，督政府还使"混合编制"臻于完善①，显著地改进了骑兵队，并改变了军官的产生办法；由士兵选举军官的办法已因共和三年芽月14日(1795年4月3日)的法令而大大减少了。军队的精神面貌起了变化。如同在市民生活中那样：追求荣誉，甚至追求金钱逐渐代替了革命的热情。然而，尽管有受王党煽动宣传而发生的哗变，军队依然是法国革命的后盾。作为战争的工具，它是无与伦比的。任何勇敢的人都有迅速晋升的机会，这仍然是深得人心的平等象征，它吸引着雄心勃勃和富于战斗精神的青年人。法国革命使激发个人力量成为现代世界的主要原则，这个原则在战争中显示了它的价值；这个社会原则的优越性使法国军队显然比旧制度的军队高超得多。

和它的敌人一样，法国的弱点也在于筹措战费日益困难。督政府不得不用宣布破产的办法来废除纸币而恢复了硬币。由于只剩下税收，督政府格外地陷于通货紧缩常有的窘境：价格调整、经济瘫痪、收入减少。这种本不应由督政府承担罪责的财政状况一直贯穿在它整个的历史中，而使它声名狼藉。实际上，督政府尽了很大努力来改善这种财政状况。它调整了直接税的基数，甚至还制定了新的基数；它催促编造纳税名册并设法加速税收，多少获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又不至剥夺选举产生的各机关的职权。督政府还增加了间接税，并且在共和七年成立了征收注册税、印花税和抵押税的机构；又开征了运输税和公路通行税，并且还授权城市征收城市 39

① 指新兵入伍即与经过锻炼的老兵混编，以便使新兵在开往前线的途中就学习战争的基本技术的过程。这样，由于免除了正规的军事训练，法国军队就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获得所需要的补充兵员。这个最初试行于1793年的原则被后来的共和政府以及在执政府和帝国时期都越发频繁地采用过。——英译者

通行税[①]来帮助它们。督政府完全懂得，要确保大量的经常的收入，必须对重要的消费品（例如盐）征税，但是这些是它自己也感到没有足够力量去冒险采取的措施。因此，它除了削减支出别无它法，而这种削减接着又迫使它拒绝支付公债的三分之二，并且置公共事业于不顾。

即使督政府还能保持正常预算的平衡，它也还要为战争提供军费，这只有依靠借贷才能做到。可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强制公债成了借贷的唯一手段。银行家都不愿意贷款给政府，以维持国库的运转。因为收税官尽量长期地保存税款以便从中牟利，所以有人谈论要恢复"期票"，这就是说，1789年以前包税人对预定的税收开出的期票。然而，谁会来贴现这些期票呢？银行家确实曾建议成立一个国家银行，但那将只不过是一个要用来贴现他们自己的票据的银行。简而言之，督政府不得不用债券偿还债务[②]，支付养老金和薪金等，这使人们极端憎恨督政府；它也不得不把军需供应让给诈取政府钱财的私人公司去筹办，而政府还得把国有产业、木材采伐、预收税抵押给它们，或者用没有银行能兑现的支票给他们作补偿。

这些构成变相通货膨胀的权宜措施，引起了狂暴的投机浪潮，而且也使许多政府官员和政客腐败起来，因为承包商贿赂他们以取得付款。军队深受其害，他们对这些"中间人"很气愤。由于警察缺乏战胜盗匪的手段，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恶化，盗匪为数日增，公共秩序越发难以维持。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个国家的生活和道德：穷困使督政府为了养活军队而剥削荷兰，并且扩张到意大利和瑞士去，军需承办商推波助澜；将军和军事特派员都热衷于

① 指对运入城市里的商品征税，因此叫做城市通行税。——英译者

② 指各种各样的政府债务，诸如：债券、年金和其它证券（以及应付的利息），所有这些构成了公债。——英译者

追求自己的私利。军队，甚至国家，都依靠战争过活；这样就从战争中产生出一个主战派，它具体体现在波拿巴身上。

正如执政府后来所表明的那样，社会秩序和财政的恢复需要时间，但最需要的首先是一个有权威的当局。督政府很好地组织了自己的工作；例如它的"国务秘书部"后来被波拿巴重新采用；再如它的警务部，其中就有富歇，他是在共和七年进入警务部的。但是督政府却没有能巩固自己的权力。首先，共和三年宪法重建了广泛的地方分权制，而且在巴黎也实行分权制度，这种分权的情况剥夺了战争所需要的国家行政机构的活动能力。行政机构没有控制国库，它和立法机构之间，或立法机构两院彼此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妨碍了它的工作。其次，只要原来的特权阶级还是不向新秩序屈服，在法国就仍然存在着酝酿叛乱、内战和叛国勾当的顽固的骚乱因素，这种因素削弱了政府的力量，或者迫使政府采用暴力。共和七年，法国西部就曾再次发生武装叛乱，西南部也有叛乱发生；在普罗旺斯和弗朗歇一孔泰，有人勾结外国并拿英国的钱，也正在策划到春季发动暴乱。

只要反革命还得到部分天主教僧侣的支持，那么就不能指望它放下屠刀。1794 年 9 月 18 日，"教士法" 随着宗教预算的取消而不复存在。现在对神甫的要求只是宣誓忠于共和国，但许多神甫仍拒绝这样做。这些人遭到了追捕，被拘禁在罗什福尔或雷岛的囚船上，然后流放到圭亚那。他们都和罗马以及先前那些顽抗的主教多少有些联系，这些主教多数都靠拿皮特的津贴住在英国。无论他们主观愿望如何，他们的忠实信徒都可能参加叛乱。那些已服从法律的罗马派教士和恐怖时期以后曾经改组过教会的老宪政派教士对督政府都没有好感，因为督政府和资产阶级共和派以及空论家一样，总不放过任何机会表示对天主教的敌意。督政府卖掉了许多教堂，强迫实行第十来复日制，根据法律禁止一切公开 41

的宗教仪式，甚至把第十来复日礼拜和“博爱宗教”①引进了教堂，以同天主教相对抗。果月18日以后，督政府开始攻击私立学校，这些学校主要是天主教办的。除非它们保证进行市民道德的教育，否则就得关闭；而且禁止政府公务员送自己的子弟进这些学校。假如共和国对宗教放弃这种敌视态度而实行一种真诚的中立政策的话，它无疑将会把宪政派教士和宣誓派教士争取过来，并且将会削弱那些顽抗派教士的影响。不过，这是个长时期才能见效的政策。为了迅速取得成就，有必要和罗马教皇达成协议，可是已经监禁和流放了教皇的督政府处于无可转圜的局面。而无论如何，督政府的支持者也决不会允许它同教皇谈判。全国的统一，即使至少是表面上的统一将能加强国家，但是要实现全国统一，首先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

在法国的同盟国中，唯一名符其实的是西班牙，它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它的一支分舰队甚至就停在布勒斯特。但是对于西班牙来说，战争却是灾难性的。它在圣维森提角②被击败的舰队已不能防止梅诺卡和特立尼达的丧失；西印度群岛的白银好不容易才能运来，西班牙对美洲的属地提心吊胆；而罗马教皇以及巴马和那不勒斯的波旁王室的命运使查理四世感到悲哀。然而，督政府对这个盟国却诛求无已。它鄙视这个仍有异端裁判所的国度，由于王后与戈多伊关系暧昧，它也鄙视这样一个国王；它垂涎路易斯安娜，它抗议西班牙对葡萄牙所表示的体谅，而没有注意到正是被葡萄牙人所贿赂的塔列朗在暗中捣鬼。被法国触怒了的西班牙终于听从了英国的建议。虽然还不是一切都已无可挽回，但是法国

---

① 资产阶级共和派倡导的一种新宗教，只承认上帝的存在和灵魂不死。(汉译或为“敬神博爱教”、“自然神教”)——译者

② 圣维森提角海战发生在1797年2月14日，英海军在此战中打败西班牙舰队。——译者

和这个财力有限、只能缓慢行事的旧制度的君主国言归于好还是必要的。西班牙的财政状况也很可怜：1799年，票面金额下跌百分之五十的皇家债券[①]才有了固定的兑换率。同圣卡洛斯银行创办人卡瓦鲁斯有联系的乌弗拉尔已经承担供应西班牙舰队的给养，他梦想在这个被法国人视为黄金国的国度里进行大规模的投机。

除了西班牙这个盟国外，法国还有一些附庸共和国。在意大利的附庸共和国都丧失了。在苏黎世战役中，马塞纳仅能解救出半个黑尔维谢共和国。巴达维亚共和国几乎不保，英国人夺走了它的军舰。这两个卫星国都供养了法国军队，并提供了战略要地。要它们提供比这更多的东西，就需要有稳固的政府，但是督政府却没有给它们建立起这样的政府。在这两国里也存在着社会秩序问题。因为法国人宣告了旧制度的结束，所以那些特权阶级不是移居国外就是退隐不出；而资产阶级是比较乐于参加政府的，只要法国人授与他们政治权力的话。这种权力也是唯一真诚的亲法分子雅各宾派所要求的。这两派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代表人物密谋发动政变。荷兰的温和派资产阶级领袖席梅尔佩宁克希望在和平带来独立之前，能重建一个和法国关系融洽的荷兰。但只是在1798年7月，他才建立起一个具有确定的组织的巴达维亚督政府，而这个政府仍然还是不稳固的。在瑞士，战争使得拉阿尔普能够强制推行他的独裁统治，但是温和派却在策划推翻他。承受着军事占领的沉重负担的平民各阶级，在荷兰表现出情绪敌对，在瑞士则是态度犹豫。要想把他们争取过来，就需要象在法国那样去帮助农民。在荷兰什么也没做。在瑞士，1798年无偿取消了对人的封建赋税以及非主要农作物产品的“小什一税”，但对物的赋税和主要农作物产品的“大什一税”却是要赎买的。虽然国家承担

42

① 指西班牙政府为了偿付它当时的债务而作为纸币发行和流通的带有利息的皇家债券。——英译者

部分补偿，但那是打算用国有产业来进行的，因此这些补偿几乎到不了农民手里。而且；旧的封建赋税还沒有废除，就又实行了土地税。结果，法国的统治使人人都感到不满。在这些国家里，国家的改革也势在必行。督政府也是这样想的，它甚至着手进行了一些在本国内也不敢进行的改革尝试，不过它却缺乏实行的权威。法国在同欧洲的斗争中最欠缺的是一个具有救国委员会的毅力的政府。

四、封锁与中立国

可是，欧洲大陆上的战争使法国要成功地争夺英国海上霸权的希望破灭了。因此，法国在经济斗争方面制定了一个新的方针：43 它试图用十八世纪英国人已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对付英国。十八世纪期间，封锁虽给敌人造成麻烦，但它却不能使敌人瘫痪。按照重商主义的原则，海上强国把封锁主要看做是一种制止敌国的出口以夺取它的市场，并取代敌国而垄断硬币的手段。即使这样，还是存在有购买敌国某些原料，或是乘机购买敌国食品的好处。从重商主义的观点看来，也沒有任何理由拒绝把货物卖给敌人，除非是战时违禁品。这样，英国就以一种明智的经验主义运用封锁，按照它的需要颁发特许证，甚至准许开放那些被它的舰队有效地封锁着的港口。由于这些港口从来为数无多，所以中立国也就总有办法44 回避这一封锁政策。英国还以它独特的方式制定了一个海洋法：即使是用中立国船只运载的敌国货物也被宣布为合法的捕获品，而且敌国的全部或部分海岸都被宣布处在“虚拟封锁”之內——这样，任何往来于这些海岸的船只都被视为破坏封锁的船只。最后，英国通过在公海上临检所有商船而强制实行这个制度。于是，海洋就被置于英国的统治范围之內了。

中立国对于这个针对着殖民地的规定特别不满。在国际贸易中，殖民地的贸易一向是极为重要的，在和平时期每个宗主国都垄断与自己殖民地的贸易。但是正在同英国交战的法国，后来是西班牙，都放弃了他们的“专营贸易权”①，并对中立国开放了它们的殖民地。1793 年以后，同 1756 年一样，英国禁止中立国获得这个意外的好处，它企图强使英国船只到敌人的殖民地去。然而，为了安抚美国人(他们认为自己受损害最重)，英国允许走“迂回路线”，即允许那些要到欧洲以外的中立港口去的中立国船在西印度群岛装货，然后，如果这些货物成了中立国的财产，就又允许他们再运出这些货物。此后不久，由于缺乏船只和希望利用中立国向法国出口货物，英国的航海条例暂时中止实施。1798 年，中立国船被允许在西印度群岛为英国或者为它们自己的国家进行贸易。这样，英国就在保持对殖民地产品几乎完全垄断权的同时，把中立国变成了它的帮手。英国根据自己的需要，还颁发给中立国一些特许证。这样一来，它的商业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种管制经济的面貌。那些中立国商人——斯堪的那维亚人、普鲁士人、汉撒人和美国人，纵然心怀不满，却是获得了巨额利润。荷兰被法国占领以后，汉堡继起成为英国和德意志之间的中转站，成了欧洲大陆上最大的银行业中心；反法同盟是通过汉堡的帕里什银行才得到英国补助金的。美国的销售额(其中一半来自殖民地产品)从 1790 年的二千万美元上升到 1801 年的九千四百万美元。他们供应粮食给安的列斯群岛和西属美洲，把木材和谷物运往英国，并且在法国市场和汉堡都赢得了重要的地位。美国人那时正在改进他们的造船技术，把巴尔的摩的“飞剪式”快船视为标准式样。由于中立国贸

---

① 表示殖民地贸易专有权的制度的术语。凭籍这个制度，宗主国禁止它的殖民地发展或生产任何可能与宗主国相竞争的商品、与别国进行贸易，或者在对外贸易中使用宗主国以外的任何船只。——英译者

易兴隆，它们的商人和金融家都成了坚定的亲英派。

法国是否要维持大部分海上贸易关系，甚至同英国的贸易关系，现在只取决于法国；由于中立国无不竭力违犯英国的规定，所45以情形就更加如此。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接受了这样一个办法，即，除禁运品外，中立国船有权保护它们的货物。这一办法使得法国能继续进行贸易，并赢得了与荷兰的同盟，而第一次武装中立联盟则是针对英国。后来国民公会采取了相反的政策，其基本原因是1786年的条约使得法国工业受到英国竞争的打击，战争为法国提供了一个与英国抗衡的极好机会。纺织企业家大声疾呼要求恢复禁止英国货入口，鲁昂的大商人丰唐内就是他们的代言人。他们支配着国民公会，就象后来左右拿破仑一样。而且人们坚持认为，英国的经济以及随之而来的信贷是依赖于货物出口的，因而，对英国的沉重打击莫过于对它关闭法国这个最好的主顾的门户。这就是1793年1月布里索和凯尔圣的论断，后来这也成为皇帝的逻辑。5月9日，一项法令宣布，中立国船运载的敌货为合法捕获品，并于10月9日禁止英国商品进口。

只要允许中立国与法国通商，这些措施就不能奏效，因为英国允许中立国船到法国完全是为了推销它自己的商品；此外，由于中立国来法国采购货物而使物价上涨，所以人民对这些国家深感不满。于是法国于8月宣布了禁运令。这样，法国使这次封锁达到了连英国人都没有做到的那样严密的程度。没有多久，法国就感到殖民地产品和原料的缺乏，首先是棉花的不足。这当然不是企业家所希望的。他们认为，这次封锁应该灵活一些，就象英国的封锁一样，以方便贸易利益。因为急于供应军队，救国委员会又重新对中立国开放了港口，热月党人恢复了中立国根据条约取得的特权。于是，英国货很快地重新出现了。但是在签订坎波福米奥条约之后，英国仍是唯一的敌人，而法国陆路贸易得以恢复时，那些保护贸易

主义者又重申前议。督政府再次禁止英国货入境，并于共和六年雪月29日（1798年1月18日）采取了一项空前措施来对付中立国：如果发现中立国船只运载任何英国产品或者只是在某一个英国港口停泊过，这些船就被视为合法的捕获品。这样一来，中立国的船只不再出现了，而美国则与法国断绝了外交关系。但是货物走私仍旧猖狂地进行着，而且法国的盟国也参与了走私活动。1798年法国合并日内瓦和牟罗兹的部分原因是为了限制走私活动。法国和荷兰两国在1792年进口了英国出口货物的百分之十八，1800年仍占百分之十二。督政府充分意识到，法国要想贯彻一项既行之有效而又可以接受的封锁政策，就需要开拓广阔的大陆市场。于是对别国的征服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经济斗争的需要。被占领各国和西班牙对英国是封闭的。人们指出，占领汉撒各城市会打开德意志的市场。这样便开始露出大陆封锁的苗头了。世界正在分为极不相等的两部分：法国及其盟国为一方，英国及所有其它各国为另一方。这两个主要交战国现在被迫巩固各自的阵地，以图生存。

法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最沉重的打击就是失去了它的殖民地贸易。1789年与殖民地的贸易占法国进口货物的三分之一，占出口货物的五分之一。欧洲大陆的一部分仍然对法国实行封闭；在其它地方，法国仍不能恢复其原有的地位。尽管法国的版图扩大了，但它的贸易额却从1798年的四亿四千一百万法郎下降到1800年的二亿七千二百万法郎。革命的危机已经影响到各个工业部门。有些工业历经困难才得以恢复。在里昂，开动的织布机不到一半。从1789年以来纺织品生产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遭受了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折磨之后，法国现在又发现自己成为通货收缩的受害者，这就又加深了已经普遍存在的不安情绪。硬币仍旧缺乏，信贷不复存在。月利率浮动在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七之

间，物价下跌造成了工业瘫痪。连年丰收本身应该起到一种稳定的作用，然而却招致了物价的进一步跌落，从而降低了农民的购买力。督政府除了多方鼓舞大家以希望之外无计可施。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危机。假如政府恢复力量，并且在欧洲大陆上重建和平，硬币就将会逐渐在市场上再度出现，新的销售市场将得以重开，生产将得以恢复。

法国革命已经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些条件是：由于废除行会而获得的经济自由；通过取消内地关卡、减少通行税和采用十进位制而实现的全国市场的统一；在被合并的各地区开辟了新活动场所，例如，法国的冶金业可以使用比利时和萨尔的资源。农村仍富有大量的劳动力。如果实行封锁不单是为了追求战争的目的，而是相机行事的话，那么就会给初期的资本主义提供必要的保护，从而只会产生有益的结果。事实上在冶金业、化学工业，特别是在纺织工业方面，封锁的确起到了有益的影响。纺织业仍然是最富于创造发明的工业，是对资本家最富有吸引力的部门。“珍妮机”得到大量采用，1797年奥伯坎普夫已经开动第一台花布印染机。一些工业界巨头出现了，并且建立了一些工厂：其中有图卢兹的布瓦耶-丰弗雷德，夏隆的里夏尔与勒努瓦，帕西和根特的鲍文斯。那时机器还仅仅处于幼年时期，在布匹织造方面还没有使用机器。一位跨过海峡来到大陆的英国机械师科克里尔刚刚被请到维尔维埃。丝纺仍旧采用沃康松的方法，雅卡尔还没有使他的织布机臻于完善。冶金术没有任何进展，除去昂赞矿之外，蒸汽机还没有被采用，直到1799年根特的鲍文斯才开始使用。但是免于受到英国竞争的法国却有暇发展自己的机械化。

不管怎样，法兰西共和国的人口大多数是主要保持自然经济的农民，如果十分必要的话，它是能够依靠自己的资源生存下去的。农业虽然已经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但是发展仍然缓慢。村社依

然保留着老习惯：如保留着强制轮作制、无用的公用牧场和其它习惯的权利。这种对于旧习俗的依恋是如此强烈，以暨在历届革命议会中从来没有人敢于提出强制重新调配土地的建议，以便根除这些习惯。大量的村社公地也还没有分配。虽然人造牧场、烟草、菊萵苣和马铃薯的收获略有增加，但土地的排水和灌溉，以及栽树育林则反而倒退了；道路失修，乡间警察尚未派驻。但是乡村的社会结构还是在改进之中，全国抵抗外敌的力量因而大有增长。小土地所有者的数量有了相当大的增加，至少在某些地区是如此，如：摩泽尔郡增加了一万三千名，科多尔郡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诺尔郡增加了一万名。与此同时，大规模的耕作一般地在减少之中，从而有利于中等规模的土地占有。当然，农村中仍旧还有很多没有土地的、几乎沦于乞讨的零散工，而乡村人口的平衡总是要看收成如何而定。但是自从什一税和封建赋税取消以后，政府除了要应 48 付一些短暂的骚乱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其它担心害怕的事。

英国既不能用炮舰打败法国，更不能用封锁迫使法国投降。而且，如果共和国能够恢复大陆的和平，它的经济地位就可能再变得令人满意。在这方面，要预料英国是否会面临崩溃的局面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五、英国资本主义的力量与困难。欧洲向全世界的扩张

英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巨大进展中获得了利益。物价的上涨继续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大约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的物 49 价上涨，经过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其基本原因在于：首先，由于美洲金银矿生产的增长，也由于信用货币在丹麦、瑞典、俄国、奥国、法国、西班牙和美国等国的出 50

现而造成通货的大量增加；并且战争又往往加速了纸币的发行。革命的危机造成了资本外流，从而导致外国现金储备的增加。大量的法国硬币流到了英国、荷兰、普鲁士和汉堡。包括伦敦的巴林，阿姆斯特丹的赫普和拉布谢尔，汉堡的帕里什，更不用提在英、法两国都开业的博伊德，以及在巴黎的一些外国银行家（其中著名的是佩雷高）在内的国际银行家组合对不断贬值的指券[1]投机而牟取暴利；拿破仑以后也要对付这个国际银行家的组合。现在人们几乎不知道欧洲大陆的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后果。从1793年到1799年汉堡的殖民地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很大，但是大量的货币似乎只是导致了投机的猖獗，而不是生产的发展。但无论如何，从通货膨胀中获利最大的是英国。

英格兰银行是发行纸币信誉卓著的唯一银行，因而在荷兰被法国占领以后，英国就变成最为可靠的资本避难所。1794年，这家银行购买了价值约为三百七十五万英镑的贵重金属，而不是以往每年平均化费的六十五万英镑。英格兰银行钞票的流通额从1790年的一千一百万英镑增加到1800年的一千五百万英镑。到1795年止，这家银行对商业证券的贴现率一直在百分之三以下；只是在1797年黄金支付中止之后，贴现率才开始增加：1800年增加到百分之六以上。此外，英国是银行业发展到地方上的唯一国家：1792年就有三百五十家地方银行不受任何约束地发行纸币，这些银行为地方企业提供了资金。这样一来，就引起了伴随着通货膨胀而来的信用膨胀。这些银行虽然在1793年的恐慌期间受到暂时挫折，但是后来比以往更加兴隆：1804年，银行的数目接近五百家。物价几乎不断地上涨。以1790年的指数为100，则1799年为156。1780年至1789年间，每夸特[2]小麦平均价格为四十五

51

① 指法国1789年用国有产业作担保所发行的纸币，到1797年作废。——译者

② 英国容量单位，等于四分之一吨。——译者

先令，但在随后的十年里却涨到五十五先令；而工资的相应增加则要少得多，这样就增加了利润的幅度。由于通货膨胀而使得货币贬值，因此一切都在激励着投资企业的热情。

价格的上涨会造成阻碍出口的后果，但是中止支付黄金使情况缓和些。货币充斥已能使皮特得到贷款，这样他就可以对付英格兰银行，但是皮特仍不得不迫使英格兰银行贴现为数日增的财政部证券。1795 年，英格兰银行的现金储备还不足五百五十万英镑，而它持有的财政部证券的总额竟接近于一千三百万英镑。此外，由于必须用现金支付远征军的费用，支付 1796 年购买谷物的费用，以及给予外国的补助金(从 1793 年至 1799 年总数高达二千八百万英镑之多)，皮特还无视法律，迫使英格兰银行在 1797 年初从不过一百多万英镑的现金储备中提取一部分支付给他。于是不得不宣布英格兰银行的纸币为不兑换纸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1823 年。由于英格兰银行是支撑经济的整个信贷机构的拱心石，因此，不兑换的后果本来会是灾难性的。但是这样做并没有引起恐慌。不懂得约翰·劳[①]的方法或纸币的人民没有意识到英镑处于危机之中。皮特也一再劝告资本家放心，用有力的财政改革来使他们相信他完全无意采用纸币。随着和平在欧洲大陆的恢复，他在 1797 年和 1798 年只化费了二百万英镑来维持在欧洲的武装部队和对外国的补助。英镑超过了票面以上的价格，英格兰银行 1799 年的现金储备达到七百万英镑。事实上，这家银行此后接受了一批数目更大的财政部证券，虽然存在着某种政府制造的通货膨胀，但还没有严重到象在法国那样毁坏通货的程度，这就使得英国免于遭受曾使督政府难以应付的通货收缩的祸害。但这只是暴风雨的暂时的平静。1799 年大陆战争重开，歉收又迫使政府

---

① 约翰·劳(1671—1729 年)是苏格兰的金融家，到法国开办银行，滥发纸币，进行大规模欺诈，最后导致银行破产。——译者

购买了价值几达三百五十万英镑的粮食。英格兰银行的储备减少了，这一次英镑兑换率下降了。1799 年在汉堡，英镑的票面价值失掉了百分之八，在加的斯失掉了百分之五。这场危机很快就挫伤这个国家的士气，但是英镑贬值本身却使大资本家捞到了好处：他们出口货物换回的是硬币，却用贬值了的纸币来支付工资。依照经验主义的方法制定的英国货币和财政政策证明运用自如，这是其它国家当时望尘莫及的。

工业革命得以继续进展应归功于这项政策，但是进展速度之慢有时出人意料之外。就是在发展最快的棉纺工业中，织布依然靠手工操作。埃德蒙·卡特赖特的动力织布机于 1801 年在格拉斯哥才首次被采用，只是在 1804 年左右威廉·拉德克里夫发明了上浆整理机之后，动力织布机的使用才得到推广。毛纺工业仍处于试验阶段，还很少采用“珍妮机”，而卡特赖特的梳毛纺纱机到 1803 年才完善起来。尽管扩建了铁路和使用了蒸汽机，煤矿业仍然处于落后状态。除了一些棉纺厂外，蒸汽机还没有在工业上使用；大多数棉纺厂依然满足于使用水力纺织机。在交通方面，注意力仍然侧重在开凿运河，结果是完好的道路寥寥无几。运输的迟缓和工资的不断下降使传统的制造业能够有力地维持下去，人们的集中注意力仍然是在商业方面，而不是在开办工厂。一些当时的工业巨头，如罗伯特·欧文的岳父达维德·戴尔和斯托克波特的拉德克里夫都是靠把活分散发给家庭制造的方式起家的。纺棉机虽然还没有被普遍采用，但却给予棉纺工业以巨大的推动力。针织品和机织的花边也蓬勃发展起来。冶金业广泛地实现现代化。工程师们——其中最著名的是水压机发明家布拉默——使工作母机的数量迅速增加。机器在各个工业部门得到采用，确保了英国在全世界的绝对优势。

按照十七世纪末叶通行的价格计算便览作出的海关官方估

价，英国本应始终处于贸易顺差的地位。如在1799年，英国的贸易支付余额达五百万英镑。人们把这归功于工业的进步；但是实际上，参考一下进出口货物的实际价值却得出相反的结论：除去非常有限的几年(从1798年至1815年间只有1802年一年)之外，英国的贸易差额一直出现赤字：1799年为一千零五十万英镑，1801年将近二千万英镑。即使工业品出口的数量增加了，工业品的价格也是在下跌；然而，这一因素却使得英国不仅能够保持原有的市场，并且能够获得新的市场，尽管存在着战争带来的困难。英国变得更加富有了。英国的支付差额是靠运费、保险费、手续费，尤其是靠对海外各地的剥削：贩卖黑人奴隶，投资于种植园的收益，东印度公司职员的薪水和养老金，私商在殖民地的投机生意，富翁们从殖民地带回的财富以及在那里投资的赢利等等来弥补的。

物价的上涨对农业也是有利的。当时英国已经不能再生产足够的粮食来满足本国的消费；战争使得粮价昂贵，因此，只要小麦仍然价格昂贵，“谷物法”就失去效用。因为种植小麦比畜牧业更为合算，结果是，小麦的种植面积扩大了。圈地空前大规模地扩展开来，这就为地主、同时也为农民创造了一个黄金时代。耕作方法在不断改进。1793年，约翰·辛克莱和阿瑟·扬格被任命为农业大臣。土地革命也影响到苏格兰。那里的部落首领就是大地主，他们乐意把土地用来饲养牲畜，他们赶走了苏格兰高地的佃农，这些人只好移居国外。就粮食供应而言，农业的繁荣加强了英国的力量，使得它不再象以前那样脆弱了。这也使得一些小土地所有者能够继续生存，甚至在某些郡里，他们的人数还有所增加。事实上，尽管留下的小土地所有者为数无多，他们对于自己的命运还是满意的；这些人和佃农一起构成了稳定的因素。

英国的资本主义尽管取得了进步，但还没有想到自由贸易。地主和农民绝不是要废除“谷物法”，而是要求强化它。工厂主仍

忠于重商主义，他们甚至要求禁止机器出口。但在国内，他们越来越多地违犯限制徒工数目和准许确立最低工资的规定。相反地，工人们则继续要求制定“劳工章程”，并且以抵制和罢工的方式作为支持自己要求的手段。虽然这样做在原则上是非法的，但是治安法官不愿对此判罪，因为雇主本人就已违法在先。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1799 年 7 月 12 日的“结社条例”。这项法案是在官方宣布废除有利于工人的法律时制订的，它规定要惩罚各种罢工工人的结社以及旨在支持罢工的募捐。对贫儿、女工和破产农民的雇用，以及机械化带来的进步，这一切使得工资下降。工资的增加远远落后于物价的上涨。此外，实物工资和任意专横的罚款更加降低了工人的工资。但是，从 1795 年开始，工资由济贫税的收入来补充，补足数额以面包价格计算。这就是劳动者阶层比较能够安于他们处境的原因。

除法国外，几乎没有任何国家能与英国的工业竞争。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除了几个采矿场和西里西亚巨大的冶金工业——几个由大资本家或国家垄断的企业——使用机器以外，还没有采用机器，并且还没有超过商业资本主义的形式。萨克森、瑞士和施瓦本的棉纺工业蓬勃发展起来，但是直到 1786 年“珍妮机”才传到了克姆尼兹，而针织机在 1797 年才出现。此外，战争也损害了传统的工业，如西里西亚的亚麻工业从此一蹶不振。

在农业方面，为出口而生产的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开始仿效英国。首要的任务是实现村社的解体，并且把小块经营的土地调整集中起来，大片经营就要除掉强制轮作制和公用牧场——总之，是向着圈地发展。国家也试图废除农奴制和赎买什一税、封建义务和劳役，以便使农民变为土地所有者或挣工资的零散工。这种改革从 1781 年就在丹麦实行开来，1800 年基本上扩展到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普鲁士国王也在自己的领地上实行了这种改革。

因为英国进口粮食，它只会从这些国家的农业改革中获得利益。它也同样以赞许的眼光看待美国的进步——当时美国还是个纯粹的农业国。“海岛棉”种植的发展使英国特别满意，这种棉花是1786年从巴哈马群岛移植到美国的；1792年第一次运到格拉斯哥的“海岛棉”立即受到棉纺工的赞赏。1793年，惠特尼发明的机器解决了轧棉问题之后，出口就增加到八百万磅，到1798年这个数字又增加了一倍。“海岛棉”种植的发展对美国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从那时起，奴隶制在南方成为一种基本的制度，而种植园主开始垂涎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然而，在这方面当时北方所看到的还只不过是一个有利于投资和海运业的机会；英国机械刚刚开始传入，阿斯特家族和吉拉尔家族的巨额财富正在靠贸易、航运和土地投机积累起来。

失去了法国所控制的市场但却摆脱了法国竞争的英国，却以牺牲其盟国和中立国的利益而得到补偿。它通过汉撒同盟各港口取得了德意志的市场：1789年至1800年间，它对不来梅和汉堡的出口货物增长了五倍。在法兰克福和来比锡国际博览会上，英国开始和瑞士人、奥国人、波兰人和俄国人打交道。英国的棉织品，特别是棉纱，排挤了瑞士和萨克森的产品。金融世界都依赖于伦敦。黑森选侯在伦敦投了资，法兰克福的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依靠帮助黑森选侯进行投资而扩大了他的业务；1798年，他的儿子内森在英国开业，很快就变成了富翁。另一方面，波罗的海地区也成为对英国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势力范围，因为英国从那里取得海军装备、粮食和纺织品供应。十九世纪初叶，英国百分之七十二的进口货物来自普鲁士和俄罗斯，四分之三的粮食来自但泽一个港口。在地中海，法国比较能顶住英国的势力。法国征服了意大利，这使得英国大受干扰，但是法国没有能把英国驱逐出地中海。而在1798年以后，法国却被从地中海东部的沿岸诸国

逐出。

海上战争增加了从地中海到北方诸海之间陆上交通的重要性。对来因河的封闭危及了通过法国、意大利、瑞士和荷兰的交通；而在这之前，陆上交通是靠通过这几国进行的。但是从1790年起，法国把海关推进到来因河上，这样就切断了沿来因河左岸的过境贸易；而法国对来因地区和荷兰的占领则是对这条贸易通道的一个新的打击。随着对来因河口的封锁，科隆的贸易到1800年就下降到原来贸易额的三分之一以下；只有通过埃姆登到法兰克福的部分贸易在断断续续的进行着；在另一方面，瑞士通往热那亚的路被切断了。象在路易十四时代一样，横贯大陆的通道向东推移了，它要通过汉堡和来比锡到达威尼斯，而更多的是到达的里雅斯特。

虽然我们仅仅有以海关估价（官方估值）为基础的不太可靠的56 估计，用来说明到1798年为止英国商业的波动情况，但这种对情况的判断还是显而易见的。出口货物从1790年的二千万英镑约增加到1801年的三千五百万英镑，连同进口货物加在一起，总额就可能从三千九百万英镑增加到六千七百万英镑。以实际价值计算，出口货物从1798年的四千二百六十万英镑增加到1800年的五千二百三十万英镑，连同进口货物加在一起，总额就从九千九百一十万英镑增加到一亿一千八百八十万英镑。离港船只的吨位也增加了三分之一，几乎达到二百万吨。伦敦各船坞就是在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船坞都设有保税仓库。棉纺工业从贸易增长中获得比其它任何工业更多的利润。它的出口从一百五十万英镑激增到1800年的六百万英镑；原棉进口从1797年的七十三万四千磅激增到1800年的一百六十六万三千磅。同年（1800年），还出口了二百万吨煤和一百五十万吨生铁和熟铁。

英国运往美国的货物也增加了一倍。象美国一样，它一直盯

着西属美洲，占领特立尼达主要是用来搞走私的。西属美洲的动乱给英国以可乘之机。美国的独立、"专营贸易权"的中止以及法属安的列斯群岛奴隶制的废除动摇了整个殖民体系。首先是土生白人要求贸易自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贝尔格朗诺成为贸易自由的鼓吹者；西班牙被迫允许中立国的船舶进入它的殖民地港口。但是一些殖民地也开始渴望取得政治独立。在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一些独立的密谋遭到了血腥镇压。米兰达将军首先求援于法国，但当西班牙变成法国的盟国后，他又转向英国。在伦敦他会见了纳里尼奥和沃伊金斯；他在伦敦似曾建立起一个"劳达罗支会"①，准备发动一次全面起义。无论如何，1798年他以一个由他发起在西班牙成立的委员会的名义向皮特求援，但皮特却只指使他到当时已与法国交恶的美国那里去求援。

称霸海洋的英国当时是唯一能够把白人权威强加于世界其它各地的国家，但是英国却不很愿意这样做。重商主义的舆论并没有采取边沁敌视殖民地的态度，但是美国的独立使英国人不愿进一步多占领殖民地；更确切地说，英国是商业帝国主义。然而大英帝国仍在继续扩大中，法属安的列斯群岛还是值得去占领的。由于大量资本投入荷属圭亚那，结果使那里的生产增长了十倍。海军需要象好望角这样的停泊地。贵族出身的殖民地官员自发地征服更多的殖民地来满足自己的战斗欲望。在非洲，1792年建立了塞拉利昂殖民地；芒戈-帕克探查尼日尔河远至廷巴克图；从荷兰人手中夺了好望角。1788年，菲利普船长把第一批囚犯运到澳大利亚的悉尼登岸。但是英国人扩张殖民地最多的是在印度，尤其是在莫宁顿伯爵，后来又封为韦尔斯利侯爵的理查德·考利到来之后。1799年，蒂普·萨希布死后，理查德·考利霸占了迈索尔的部分领土，并在1800年确立了对占有迈索尔其余部分领土的海德

57

① 共济会的基层组织，用秘密结社方式进行反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译者

拉巴的尼扎姆的保护权；然后又进攻马拉塔人。他密切注视着旁遮普，在那里兰吉特·辛格于1794年迫使阿富汗人割让了拉合尔；他也沒有放松对波斯和红海的注意。在波斯，1801年约翰·马尔科姆和波斯签订了一项准许英国人到海湾沿岸贸易的条约；在红海，1798年英国占领了丕林岛，以后又派遣霍姆·波帕姆去攫取阿拉伯咖啡生产的垄断权，并调遣在英军中服役的印度士兵准备远征埃及。

如果不是欧洲在进行着战争的话，远东也很可能已受到欧洲的侵略。在印度支那，法国的百多禄主教帮助阮福映从西山农民起义军手里夺回了交趾支那，他死前一直是阮福映的顾问。以后，阮福映逐渐再次征服了安南和东京，那里的黎氏王朝已被推翻，他于1803年称帝，年号嘉隆。然而法国的影响也消逝殆尽。在中国，乾隆统治时清朝达到了全盛时期，他平定了边远各省之后，于1799年死去。中国人不只移民到这些省份，他们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到了交趾支那和菲律宾，甚至远达暹罗和孟加拉。中国人是唯一被允许进入日本的外国人。在国內，他们只在澳门的葡萄牙洋行和欧洲人进行贸易。自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解散之后，除了英国人和美国人经常来做买卖之外，其它各国人几乎不到澳门去。1793年被派往北京的英国人乔治·马戛尔尼沒有能够获得任何特权。但是在乾隆死后，他的酗酒和残酷的儿子嘉庆①（1796-1820年在位）由于受到秘密会党煽动的叛乱威胁，再也不能抵御任何人的大举进攻了；然而，英国人正在忙于其它的事务。至于日本则更是闭关锁国。尽管粮食不能自给，饥馑不断地造成大量死亡，日本却依然禁止粮食进口和移民国外。它每年只允许为数不多的中国船和一艘荷兰船在长崎进港，出售给他们一些铜。军事力量十分薄弱的日本怀着不安的心情看着到来的英国船，特别是到达库页

① 应为嘉庆，原书误写为嘉陵(Kia-ling)。——译者

岛、千岛群岛、甚至在1792年到达北海道的俄国船。

传教士常常为商人和士兵开辟道路，但是在当时，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美洲。在中国，乾隆迫害了耶稣会士的继承者味增爵会修士①。他们发展新会员的活动因法国革命而中断，传教活动到1800年则完全停止。但是新教徒却有了新的发展，那时代表新教在海外的只有几个摩拉维亚修士。事实上，是英国改变了这种形势。1792年，首先发动的是浸礼教徒；1795年，英国国教会建立了“伦敦布道会”；1799年，马香在孟加拉登陆，在这里他受到东印度公司的极端冷遇。

白人移民几乎停顿下来。在北美洲，主要是由于出生率过高才使得定居者大量增加，他们披荆斩棘，向西部迁移。肯塔基和田纳西先后于1791年和1796年作为两个州加入美国，俄亥俄是1802年建州的。但是到1800年，在五百多万居民总数中，西部还只有三十七万人。温哥华从1790年到1795年探查了太平洋沿岸，俄国人也刚刚开始出现在那里，但是从大西洋沿岸至太平洋沿岸之间的联系只有哈得孙湾公司的一些驿站，这些驿站的分布远至哥伦比亚河。1793年，亚历山大·麦肯齐还宁愿深入荒僻的北极地带去探险。

当拉丁美洲市场还只不过是一种希望的情况下，欧洲和美国构成英国赖以生存的市场。这些市场迟早要受到威胁，这种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的。在欧洲大陆，工业不可避免地受到英国竞争的影响。为了拯救它们自己的纺织工业，瑞士，特别是萨克森，不得不革新它们的设备，1798年在克姆尼兹出现了第一台水力机。这样一来，禁止英国货入口就象对法国一样，对它们也是有利的。另一方面，英国的封锁政策也随时在引起外交上的困难。1794年，丹麦和瑞典策划结成一个新的中立联盟，但是它们本身的力量薄

① 味增爵会修士（Lazaristes），因其创始人 Vincent de Paul 汉译名为味增爵而命名。——译者

59 弱不足成事，如果俄国参加联盟的话，普鲁士和北德意志就会随着加入，这样就会关闭整个波罗的海。来自美国的威胁就更显得突出。除了封锁问题之外，还有个美国水手问题。英国从中立国船上寻找和劫走志愿服役的美国水手，把他们和英国国民混在一起。华盛顿和联邦党人对此只是提出抗议。但是1800年杰佛逊就任了总统，他可能并不象华盛顿及联邦党人那样好说话。

但是也不能忘记，由于战争，世界贸易的情况不是十分健全的。在伦敦、阿姆斯特丹和汉堡，殖民地商品的投机活动采取彼此间订立信贷协定的形式，而库存囤积造成了资金的冻结。1799年隆冬，当易北河整个封冻、航运停止时，汉堡的物价上涨到令人晕眩的程度；而在春季贸易之前，易北河解冻时，船舶开始进港，物价也随之跌落，糖价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二之多。同一时期，战争再起。到了8月，在被入侵前夕，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中断了信贷。在汉堡，一百三十六家商号倒闭了，帕里什银行的损失达一百多万马克。这次危机波及到全欧洲，特别是在伦敦，至少有二十个商人破了产。棉纺工业受到相当大的震动，工厂有的倒闭，有的削减工资。当时为了制止工人群众的骚动而通过了“结社条例”。财政金融形势适于此时恶化起来，再加上1799年和1800年的收成又特别糟糕，因而使得每夸特小麦的价格从1799年初的四十九先令上涨到1800年2月的一百零一先令。

法国没有达到把英国人拒之门外的目的，因为英国商业又找到了新的市场，并且比以往更加繁荣了。法国人认为英国的经济结构既脆弱又虚假，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不懂得“信贷的奇迹”。但是，英国的经济结构也确实是象一套需要不断自动检修的精密机械装置，若遇诸如其它国家的政策变化、歉收等一系列外部事件时，就可能被损坏。确实，这种威胁在英国隐隐约约地日益迫近着，因而一旦处境困难，英国也势必同意媾和。

六、和平的条件

为了从这样一种时机中获得利益，共和国就必须重建欧洲大陆的和平。因此它还要再一次战斗，并取得胜利；在签订条约之后，它还得重建国内秩序并解除反革命的武装。否则一遇危机，反革命又要向外国呼吁，而外国又会发动新的战争。但是能否获得大陆和平还取决于法国企图保留哪些征服地。

热月9日之后，法国政策就逐渐转向获得自然疆界的问题上。热月党人在共和三年宪法里规定，不得割让任何一块领土。在宪法通过时(1795年8月)，通过武力征服的法国领土仅仅包括萨伏依和尼斯。但是在共和四年的葡月9日(1795年9月30日)，国民公会合并了比利时，而这一新领土的获得被认为是经过合乎宪法的公民投票批准的。从这时起，1793年的几次公民投票又被用来证明法国保有来因河左岸是正当的；普鲁士在巴塞尔，奥国在坎波福米奥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在拉什塔特先后承认放弃来因河左岸。在果月18日之前一直是督政官的卡尔诺不赞成这样的领土扩张，就连那些把波拿巴推上统治地位的"空论家"实际上也持有同样的意见。1799年11月1日，他们之中就有一个人——大概是多努——在《哲学旬刊》上宣称：共和三年宪法固定了共和国的疆界就等于宣告"没完没了的战争和全体法国人同归于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共和派会象保王党那样，答应外国人以"旧边界"为基础进行谈判。法国仍旧可以向瓦伦区①和萨尔扩张。法国全国大多数人肯定会同意这种有节制的行动，因为他们首先需要的是和平，《哲学旬刊》这篇为政变做舆论准备的文章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然而，持这样一种态度所碰到的困难是决不可忽视的。在反对保王

① 指比利时南部，说法语的瓦伦人居住的地区。——译者

主义的斗爭中，督政府从来沒有停止过诉诸民族感情，以致共和派已经习惯于把革命与征服自然疆界看成一回事，从而就以完成了君主政体的事业而自豪。军队是不会赞成把他们征服的地方又丢掉的；如果军队以新的胜利赢得了和平，那么政府怎么可能会比它的前任要求更低的和平条件呢？

督政府已经听任波拿巴超出自然疆界建立了西沙尔平共和国，从而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后来督政府效法波拿巴又在罗马和那不勒斯[1]建立了共和国；督政府还久据皮埃蒙特，为了控制阿尔卑斯隘口，它在伐累州也建立了共和国；在荷兰和瑞士它发号施令，主宰一切。但是人们还可以说，这样一种政策只是为了战爭的需要。就是和约签订了，法国肯定不会对毗连"自然疆界"各地发生的情况坐视不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国必须在那些毗邻的国家驻扎军队：它完全可以满足于同其它强国一起保证这些国家的独立。在这方面，公众舆论无疑是会支持政府的。经受过许多的虚妄的经历之后，象吉伦特派那样对外宣传革命的热情变得淡薄了；沒有人会因为波拿巴沒有重建罗马共和国或帕尔瑟诺佩共和国而要责备他。

只要法国超越它的自然疆界，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但是如果法国不超越的话，大陆列强会不会因此而让它保有自然疆界呢？有人否认这一点，但却提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普鲁士想的只是在德意志其他各地得到法国所答应给的补偿；俄国参战也不是为了夺回来因河左岸；最难对付的是奥国，但是只要给它一些领土补偿，特别是如果法国放弃意大利的话，奥国也会安静下来。剩下还有英国。皮特多次宣称，在英国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他拒绝谈判，并且说，只要法国占领着尼德兰，英国就不可能得到安全

① 那不勒斯人的共和国，是法国军队在1799年1月建立的，不过四个月左右，法军就被第二次反法同盟（俄、奥）军队打败，这个共和国只是昙花一现。——译者

保障。他进一步申明，至少必须从法国手中夺回来因河左岸的大部分地方；后来，格伦维尔在1795年又补充说，并且要把这个地方同在奥国手中的比利时重新合并起来。但是说他们只关心英国安全，这是不眞实的；他们还想从法国手中夺去萨伏依。然而，不容爭辩的是，英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始终是不让法国控制尼德兰。而现在不得不重新夺回尼德兰，而如果沒有大陆盟国的帮助，英国就不能成功地实现这一计划。法国若同大陆列强达成协议，那么这就会是一场消耗战，那时英国的经济情况可能会使它安于现状，特别是如果沒有其它国家与它爭夺海洋和殖民地的话。1797年的危机曾迫使皮特提出这样的和解建议。1799年，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又会出现同样的局面。可是危险恰恰在于法国认为，英国[62]的困难沒有别的原因，而只是由于法国为了对抗它的封锁而采取的封锁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引起法国把封锁扩展到整个欧洲，用增加压力的手段来与英国爭夺海洋统治权。那么，大陆上的战爭就会再次爆发，并会眞正变成一场“沒完沒了的战爭”，但是战爭的起因并不是因为法国到达了它的“自然疆界”，而是因为超越了这些疆界。

即使在法国明智占了上风，那也并不意味着，十分敌视弑君的共和国的欧洲，将永远放弃收复法国所有的或部分的广大征服地的想法。但是不能这样来看这个问题。1799年同任何时期一样，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问题都不在于如何截断历史的进程。问题仅仅在于知道，法国在保住它所谓的自然疆界的同时，是否可能获得十年、二十年的和平；同时，法国是否可能有一个喘息的机会，以便准备比以往更加有力地保卫这些疆界。毫无疑问，回答是肯定的。但是督政府的共和派能否抓住这样的机会？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决不是肯定的。但是到了1799年末，决定权不再属于他们了。他们自己心甘情愿把决定权交到了一个人物的手里。

63

第三章　拿破仑·波拿巴登台

法国革命转向建立起独裁统治决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一种内在需要驱使它这样做，而且，这也不是第一次。这场革命终于导致一名将军的独裁统治，这也不是个偶然事件。而这位将军恰恰就是拿破仑·波拿巴，此人的性格较之他的天赋更不能安于和平与节制。因此，这样一个预见不到的因素就象一只砝码加在天平上，使天平向着“沒完沒了的战爭”的一端倾斜了。

一、法国的独裁统治

很久以来，共和派就想加强政府权力，从他们颁发给各附庸国的宪法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荷兰，督政府的成员控制了国库；在瑞士，他们任命了政府官员；在罗马，甚至还委派法官；在黑尔维谢共和国和罗马共和国，各郡都已经有了一名“郡守”。这里还沒有提到西沙尔平共和国，它成了波拿巴个人的采邑。不幸的是，在法国，共和三年宪法规定的修宪程序至少要迁延七年。果月18日的政变给西哀耶斯、塔列朗和波拿巴提供了他们所要寻找的机会，但是他们却放过了这次机会。然而，在共和七年，他们希望制造一次新机会。自从內战和对外战爭开始以来，就已存在一种趋势要把革命推向设立一名常任的并拥有绝对权力的行政长官，这就是说，朝着独裁统治推进；共和派不一定都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们在顺应这种趋势。因为法国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而被推翻了的贵族的反抗决不止于掀起叛乱而已。依靠敌人资助的贵族，利用战爭

64

造成的种种困难——这是不满情绪的无穷源泉——特别是利用货币和经济危机，企图煽动人民起来反对革命政府。法国人并不想恢复旧制度，但是他们在遭受苦难，他们要自己的领导人对此负责。在每次选举中，反革命总是希望重新上台。在 1793 年，山岳党人意识到这种危险，才宣布延长国民公会任期，直至和平的到来。热月党人曾经打算恢复民选政府，但是他们随即利用通过“三分之二法令”的手段，重新采取了雅各宾派的权宜措施。接着，在共和五年（1797 年）的选举中被挫败的督政府于果月 18 日又重建了独裁统治。可是只要共和三年宪法继续存在，这个独裁统治每年都要经受考验，就要采取接二连三的暴力措施，所以始终不能建立起来。还是得恢复 1793 年的原则，并且长期贯彻这个原则，直到重建稳定的和平之日，只有到那时反革命才愿接受新秩序。正是在这一点上，拿破仑的独裁统治才与法国革命史紧密相连。不论他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他本人或者他的敌人都决不可能割断这个共同一致的联系，全欧洲的贵族也完全理解这一事实。

象在 1793 年一样，雅各宾派在 1799 年想依靠无套裤汉迫使立法两院建立起民主专政。他们利用苏黎世战役胜利前的危机成功地强行通过了几项革命措施：发行强制公债、废除兵役顶替、实行“人质法”，取消给予银行家和军需供应商优先从国库收入中领款权，扣除所得税，以及实行各种征用。所有这些措施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以至使他们决定采取行动。在雾月 19 日当晚就恢复给予银行家和军需供应商优先向国库领款权，这是他们行动胜利的一个标志。聚集在奥德伊的孔多塞夫人周围或在斯塔埃尔夫人沙龙里的“空论家”们不想要民主专政，甚至也不要民主。1799 年，斯塔埃尔夫人在论述“结束革命”的手段和“共和国的基本原则”的某些片段中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设法建立一种能保证有钱的和有才的“新贵名流”享有权力的代议制度。成为督政官的西哀耶 65

斯从“三分之二法令”中得到了启示。他想同他的朋友一起选择新成立的政府机构的成员，然后这些机构依靠互选办法补充人员，而只给人民选举候选人的权利；那些已经当官的人从这一企图中看到了保持自己权力的可能性。

自从把人民排除出去以后，要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就只有依靠军队。督政府于共和五年果月18日已经动用了军队，尽管文官政府的威信受到严重的损害，但它还没有丧失控制军队的优势。可是这一次的情况迥然不同；他们要驱逐的不是保王党，而是坚定的共和派。因此，这个任务只有一位深孚众望的将军才能完成；波拿巴的突然归来注定了这位将军就应该是他。有人用全民的意愿来替雾月18日政变辩护，其实全民意愿并没有在这次政变中起作用。波拿巴回到法国的消息使举国欢呼，因为人民公认他是一名能干的将军；可是共和国没有他也打了胜仗，而且马塞纳的胜利已为督政府赢得了荣誉。① 因而，雾月18日政变的责任就落到被称作“雾月党”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共和派身上，他们的领袖是西哀耶斯。他们本无意屈从波拿巴，他们选择他仅仅是把他当作工具用。然而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条件，甚至也没有事先给新政权规定大政方针，就把他推上权力的宝座，这就暴露出他们是一帮难以想像的庸才。波拿巴没有抛弃那些新贵名流，因为他也不再是个民主派，并且只有他们的合作才能够使他进行统治。可是雾月19日晚，在匆匆忙忙地拼凑起一个临时的执政府的班子之后，他们就不应当再抱有任何幻想了。军队一直追随波拿巴，而且仅仅追随他一个人。因此他主宰了一切。不管他和他的辩护士可能

① 即上段开始时提到的苏黎世的胜利，1799年9月25—26日，马塞纳统帅法军在苏黎世附近大败沙俄苏沃洛夫和柯尔沙科夫的军队。9月19日，法军在荷兰击退英、俄联军登陆的企图。这些胜利使法国转危为安，而波拿巴当时还未从埃及回国。——译者

说过什么，他的统治从一开始就是军事独裁，也就是专制的独裁统治。这样，决定法国和欧洲命运的那些问题就将由波拿巴独断专行。

二、拿破仑·波拿巴

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我们很难给他勾画一幅肖像，因为他的形象异乎寻常地在不断演变：从在瓦朗斯和奥松驻防时一个 66 勤学苦读和沉思默想的军官，甚至在斯蒂维耶雷镇战役前夜还是个召开军事会议的青年将军，一直到变成晚年时醉心大权独揽和自信无所不知的皇帝。但是有一些基本特性贯穿在他一生经历 67 中：权力只能加强某些特性或减弱另一些特性。

他身矮腿短，肌肉发达，面色红润，三十岁时还很消瘦，但体格健壮耐劳。他的敏感和坚定令人赞叹，反应敏捷迅如闪电，工作能力无可限量；而又可以想睡就睡。然而他也有相反的一面：湿冷天气使他感到郁闷，引起咳嗽，排尿困难；与人顶撞时暴跳如雷；操劳过度时尽管有长时间的热水浴，饮食十分节制，适量而经常地喝点咖啡与吸烟，但仍往往引起短暂的神思恍惚，甚至黯然泪下。他的头脑是迄今最健全的头脑之一：永不松弛的注意力不倦地抓住各种事实与思想；记忆力就把这些事实与思想存入头脑并加以分类；想像力机动灵活地运用这些事实与思想，他的思想处于一种持久而隐秘的紧张状态，不稍懈怠地拟订着政策与战略的要点。这些政策与战略于忽而恍然大悟之机闪现出来，有如数学家和诗人的体验一般，特别是深夜猛醒之际，他自己称之为“精神火花的迸发”，“午夜后出现的精灵”。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现出的这种热烈的精神，使得这个“头发平滑的科西嘉人”在飞黄腾达时脸色仍然呈现“硫磺色”的面孔神采奕奕。正是这种炽烈的精神使他落落

寡合，而并不是如泰恩① 要让人相信的，他从中世纪声誉欠佳的意大利雇佣兵队长继承来某种粗暴残忍，经过他野蛮地施加到全世界。他给自己一个公正的评价："我甚至是相当善良的人"；而这是符合实际的：他为人宽宏大量，对接近他的人甚至是和蔼可亲的。但是，在一般人与拿破仑·波拿巴之间确实是没有共同语言，彼此毫无共同之点，因为一般人对工作草草了事，急于想多点休息消遣时间，而拿破仑·波拿巴则孜孜不倦，一心一意在工作。从他的身心体质产生出不可遏制的冲动要采取行动与发号施令，这就是人们所讲的他的野心。他很有自知之明："有人说我是野心家，说错了，我并非如此，或者至少可以说，我的雄心和我的存在是紧密交融，难以分辨的。"还能比这说得更好吗？拿破仑其人主要地就是他的气质。

他到布里埃纳念书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一个贫穷和受人嘲弄的，火热而又羞怯的异邦人，就从那时起，他已经从自高自大和藐视别人的意识中取得支持自己的力量。但是命运使他成为一个军官，这最适合了他要求别人绝对服从的发号施令的本能。虽然这位军事长官也多闻多问，甚至征求意见，但最后还是由他个人作主并作出判断。波拿巴的独断专行的自发倾向变成了职业习惯。在意大利和在埃及，他已把独断专行推广到政府中去。在法国，他想以一个文官的面貌出现，但是军官的烙印是难以磨灭的：虽然他多方咨询，但是他决不能容忍别人随意反对他；更有甚者是，他在习惯于展开讨论的一群人面前，就沉不住气，莫知所措，这就是他何以对"空论家"深恶痛绝的原因所在。群众虽然是一团混乱的，无组织无纪律的，然而却是令人生畏的，因此波拿巴

① 伊波利特·泰恩(1828—1893年)的名著《现代法国的起源》(1875—1894年出版)共十五卷，分为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一卷《拿破仑·波拿巴》(1891年出版)描述波拿巴的形象和性格颇为生动，但也引起史学家的争论。——译者

对群众总是既鄙视又恐惧。夺取政权的是波拿巴将军，他也就是作为将军运用政权的。服装和称号的改变都丝毫不能改变其将军本色。

然而，在这身军服下面实际上有着几个人，而他的吸引人的魅力正是来自这多种多样的性格，也同样来自他的多方面的聪明才智。共和三年的波拿巴，身无分文地浪迹于热月党人的宴饮作乐之中，周旋于当日的权贵、豪富与艳妇之间，他也燃炽过与常人无异的种种欲望。这个时期给他留下了某些终身的影响：使那些曾冷落过他的人屈居己下，他就感到某种乐趣；对富丽豪华的爱好；对家庭——这个曾同甘共苦的"氏族"——的无微不至的关怀；还有某些资产阶级贵人的难忘的言谈，如在加冕典礼之日，他感叹地说："约瑟夫，要是咱们的父亲能看见咱们该多好啊！"然而在这很久以前，他也并非不曾为一种更高尚的爱好所吸引，即想知道一切和了解一切，这肯定是对他有用的，但他求知本身首先就是一种满足，原无其他打算。

当他还是一个青年军官时，他孜孜不倦地博览群书和搜集资料，也从事写作；显而易见，如果不是进了布里埃纳军校的话，他原有可能成为文人。领兵作战之后，他仍然是一个脑力劳动者；这个军人最愉快的事莫过于在自己安静的书房里，置身于公文卷宗之中。这项特征逐渐减弱；他的思想变得更实际些，他曾自夸已经摈弃了"空论"；然而他却依然是十八世纪的人，是理性主义者和哲学家。他远非凭直觉行事的人，而是依靠推理，依靠知识和有条不紊的工作。"我习惯于在三、四个月以前考虑我应该做的事，并且估计到最坏的情况"；"每次作战都必须按照一定方案进行，因为靠运气是不能取胜的"；他认为他的一些机智表现是坚毅的自然成果。他心目中的统一国家是按照一个简单而系统的方案由一个整体构成的，这个概念是十足的古典主义。在罕见的一瞬间，甚至在他

身上以最鲜明的特征表现出理智主义：能剖析自己人格，既能正视自己的生活，也能忧郁地反省自己的命运。在获悉约瑟芬的不贞之后，他从开罗写信给他的哥哥约瑟夫说："我需要离群索居。壮丽豪华使我感到腻烦，感情的源泉已经枯竭，对荣誉索然寡味。年仅二十九，却已历尽沧桑。"不久以后，他同吉拉尔丹在厄尔默浓维尔散步时说："未来的事态将会表明，假如卢梭和我压根儿都沒有在世间活过，也许会对世界的安宁更有好处。"① 在陪同波拿巴巡视荒芜的杜伊勒里宫时，罗德雷感叹地说："将军，这是何等凄凉！" 才就任第一执政两个月的波拿巴回答说："是的，有如权势尊荣一样。"由此可见，夏托勃里昂和维尼的浪漫主义的忧郁，通过惊人的转折，渗入这个坚定而庄严的人的理智主义里。但是这从来只是一刹那，他立即就会恢复常态。

一切都似乎注定他要奉行现实主义的政策，而实际上他在执行政策时，直到细枝末节全部都是现实主义的。在他飞黄腾达的过程中，他摸透了人的种种情感，并且学会了播弄这些情感。他懂得如何利用自私、虚荣、嫉妒，甚至利用品德不纯；他深知从唤起人们的荣誉感和激发人们的想像力中，能从他们获得些什么；他也沒有忽视可以用恐怖使人屈服。在法国革命的成果中，他准确地分辨出哪些是全国人心所向的，哪些适应他的专制主义的。为了争取法国人的拥戴，他同时既以和平使者又以战神的面貌出现。因此之故，他应被列入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者的行列之中。

然而，他只是在实际行动中才是现实主义者。在他身上还可以看到具有英雄的某些特征的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从他在学校读书时，出于要支配那个轻视他的世界的愿望中诞生的；尤其是从

① 吉拉尔丹（1765—1827年）是法国将军和行政官，这段轶事出自他的《日记》。厄尔默浓维尔在巴黎东北的瓦兹郡桑利斯县，卢梭晚年卧病并逝于该村的吉拉尔丹侯爵的领地上；1800年8月，波拿巴到该村凭吊，这句话是他在卢梭墓前说的。——译者

比拟普鲁塔克①和高乃依②著作中的半传奇式的人物的愿望中诞生的。他最大的野心乃是荣誉："我只生活在子孙后代之中"；"死算不了什么，但是被打败而毫无荣誉，虽生犹死。"他的心目中只有世界上伟大的人物：东方的征服者、梦想征服世界的亚历山大；罗马帝国的创建者与重建者恺撒、奥古斯都、查理大帝，这些名字本身就意味着世界大一统的思想。这点并不涉及一个具体的概念，一个为政治事业提供规范、尺度与极限的概念；这些人物是激发丰富想象力的榜样，是赋予他的行动以难以形容的魅力的榜样。他最响往的还不是英雄的事业，而是这些事业所体现的精力充沛的热情。他是艺术家，是实践中的诗人，对于他来说，法国和全人类都不过是些工具；他在圣赫勒拿岛回忆洛迪大捷和他内心燃起的权力欲望时，表达了他对权势的感觉，他说过这样的豪言壮语："我看到地球在我脚下旋转，仿佛我已腾空而入云霄。"因此，要想探讨拿破仑给他的政策确定了什么目标，或者他准备达到的极限是什么，都是枉费心机；因为根本不存在什么目标和极限。他的部下曾因此感到不安，他听到后说："我总是这样答复：我不知道有什么目标和极限，"或者尽管用平庸的方式，却意味深长地说："要取得上帝老爹的位子吗？啊，我才不想哪，那是条死胡同！"因此，在这里又可以看到，头一眼就给人印象深刻的、他心理上的强有力性格。这就是浪漫主义者的拿破仑，一种自行扩张的力量，对他来说，世界只不过是冒险行动的场所。而现实主义者不仅要善于运用手段，还要考虑在可能条件下明确他的目标；如果想象力和权势欲能够驱使他行动，现实主义者会知道到何等地步就应适可而止。

① 普鲁塔克(生于公元45—50年间，逝于125年)，希腊历史学家，曾撰述古希腊、罗马杰出人物的传记。——译者

② 高乃依(1606—1684年)，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家。——译者

71 可是，正如莫莱[1]十分精确地观察到的那样，虽然拿破仑不正视现实，他的精神在其它方面却是非常善于把握现实的；这不仅归因于他的天性，而且应归因于他的出身来历。当他从科西嘉岛初履法国本土时，他自视为异邦人，而且直到1793年[2]被他的同胞逼迫离开科西嘉岛为止，他还是敌视法国人的。当然，他已充分地钻研法国人的文明和思想，足以归化其中，否则他决不可能变成法国人的领袖。但是他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完全和法兰西民族的社会融合在一起，遵奉法兰西民族传统，以致能把法兰西民族利益视为自己行动的尺度与界限。他始终感到自己是一个离乡背井的游子。他也脱离了自己出身的那个社会阶层而无所依附，他既不完全是绅贵，也不完全是人民，他相继在波旁王朝和大革命时期充当军官，但是他对哪一个政权都没有衷心拥戴过。而他后来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正在于此，因为他可以完全轻易地处于超党派的地位，并以民族统一的恢复者的面貌出现。但是，无论在旧制度下，或者在新政权中，他都没有汲取出可供他作为规范和限度的原则。他不象黎歇留[3]那样受效忠王朝原则的约制，这种原则使黎歇留把个人意志从属于君主利益；波拿巴也不受公民美德原则的约制，这种原则要求他献身为民族服务。

他是崛起于行伍之间的战士，是启蒙哲学家的弟子，因此他痛恨封建制度、社会的不平等、宗教的不容忍；他认为开明专制能够调协政府威权和政治与社会改革，他自己就成为历史上最后一个开明专制君主，并且是开明专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属于法国大革命的人物。然而，他的极端个人主义从来没

---

① 莫莱(1781—1855年)，参政官、帝国时期历任要职，后来到七月王朝时出任首相（1836—1839年）。他的回忆录经后人整理出版，成为颇有价值的史料。——译者

② 原著误为1791年，应为1793年。——译者

③ 黎歇留(1585—1642年)，法国红衣主教，路易十三的大臣。——译者

有接受民主，.他屏弃了使革命理想主义生气勃勃的十八世纪的伟大希望，即将来总有一天，人类文明会发展到使人类成为自己的主人。他沒有象其他人那样，为了顾虑自身安全而变得小心谨慎，因为，用一句通俗的说法，他已经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梦寐以求的只是通过英雄壮举与冒险行动而成就英名伟绩。还有道德约制问题；但是，在精神生活中，他与别人毫无共同之点；虽然他深知别人的情感，并巧妙地利用这些情感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可是他只留意那些能使人听他使唤的情感，却诋毁一切能激励人们牺牲精神的高尙情操：宗教信仰、公民美德、热爱自由等，因为他感到这些高尙情操对他个人企图构成障碍。这并不是说他对这些情操格格不入，至少在他青年时代尙非如此，因为这些情操能自然而然地导致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以后环境变了，使他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而闭目塞听，高高在上。在权力欲支配下的既庄严又可怕的孤立中，准则限度毫无意义。 72

“空论家”把他看成是自己人而沒有察觉他身上的浪漫主义的冲动。能够遏制他这种冲动的唯一办法也许就是把他置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之下，让他在一个从属的地位上为国效劳。但是雾月党人在把他推上最高权力的地位时，恰恰就已放弃了一切这类防患未然的机会。

第二编　内安法国　外和欧洲（1799—1802年）

73

第一章　法国独裁体制的组成

取得政权之后，拿破仑立即着手组织他的独裁体制。这项工作至少有一部分延续至今，构成现代法国行政机构的主体。但是这项工作不是能一蹴而就的，在倒台之前，他一直在进行工作，而其成效只能是逐渐地显现出来。同时，采取行动的需要又是不容迟缓的，他必须准备1800年的战役；因此波拿巴只得临机制策。这两个特点一直贯穿在他的统治的始终。他一生不停顿地致力于久远之计。但是，尽管他热切地想做力所不及的事，他却总是不得不临时对付每一项事业。

一、临时执政府与共和八年宪法

74

共和八年雾月19日（1799年11月10日）晚上，几名议员匆忙地批准成立一个负责起草新宪法的临时政府。行政与立法创议的大权全部落到三名执政手里：波拿巴、西哀耶斯和罗歇·迪科；20日，他们达成协议轮流担任主席；但事实上波拿巴从一开始就控制了一切。由二十五人组成的两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分为三个组）取代了元老院及五百人院，其职能仅在于准备新宪法。

由于法国革命和共和国看起来似乎都没有成问题，所以这次

事变并沒有引起任何剧烈的反抗：这不过是又一次政变而已。人们不过是热心地等着瞧波拿巴如何着手工作——谁知道他是否能维持得下去呢？然而，少数的左派及右派还是很快地开始形成了。执政府就其起源讲是反雅各宾派的；因为发动雾月政变的借口毕竟是一个莫须有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正是左派反对在圣克卢的集会，而且他们在外地某些地区也企图进行反抗。六十一名议员被取消了议席；五十六名雅各宾派，其中有二十名议员，被流放到圭亚那及雷岛，其他很多人被捕。共和七年的“恐怖主义的”措施——强制公债、人质法及强迫征用等——被废除了，这是军需供应商及银行家的胜利。“良善之辈”[①]对此表示满意；保王党在他们的书刊里和讲坛上表示了同样的感情。他们希望波拿巴会成为蒙克[②]。当那批顽抗派的教士又抛头露面时，各地都明显地有猛烈的教士骚动。但是波拿巴立即谴责了这种反革命活动，因为督政府的各郡行政机构依然保留着、并被置于由三执政任命的特派员的控制之下，所以他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反革命活动镇压下去。警务部长富歇一开始就站到左派一边；他取消了对雅各宾派的放75 逐令。波拿巴仍然忠于雾月政变的精神，同那些“新贵名流”一起统治，他们不是大革命的参加者，就是追随者。

与此同时，宪法起草工作依然由特别指定担任这一使命的立法委员会的两个组负责进行。他们就教于西哀耶斯，但是这位“圣人”声称他毫无准备，不过还是口述了意见。他的意见要点被布莱（默尔特郡人）、多努与罗德雷保存下来。尽管他们各人的记录彼此有些出入，但是有两点还是值得注意的。第一，雾月党人将在各组

---

① “良善之辈”（“honnêtes gens”）指既非出身贵族世家，又非出身低微的平民，即指富有的资产阶级，在政治态度上拥护既存社会秩序者。——译者

② 蒙克（1608—167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将领，1660年叛变革命而拥立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译者

成机构内先取得席位，这些机构然后将采用互选的方法从“新贵名流”① 中来补足其成员。西哀耶斯认为，因为权力必须来自上面，所以公务员也将不是由选举产生。但是他补充说，既然信任必须来自下面，重新得到普选权而成为主权者的人民就有权制定“新贵名流”的名单。这样，导致雾月18日政变的主导思想——“新贵名流”的独裁统治——仍然得以实现。但在另一方面，必须细致地划分权力。立法权分给三个议院，行政权分给三个人，一个是由元老院任命的“大选长”和两个是由“大选长”指定的执政。“大选长”终身任职，但得由元老院“吸收”而去职；两名执政分别负责内政和外务。在他们各自的职权范围内，两名执政连同他们的各部部长和各自的参政院都享有完全的独立地位。这里表现出西哀耶斯的真正个人独创的想法。他设想出这些复杂安排的目的就是在于保护个人自由，使之不受国家的专制统治的侵犯。但他这样做却低估了加强政府权力的必要性——这曾是这次政变的第二个目的，同时也很不合乎政变中他的同谋者波拿巴的野心。

波拿巴对于民选政府的消失以及许许多多议院的建立当然并不反对，但是他却断然要求独揽行政大权。塔列朗安排了一次波拿巴与西哀耶斯的会见，但这只能加剧两位执政之间的冲突。参与起草宪法的两个组的成员由于宣称反对西哀耶斯，从而结束了这场冲突。他们设立一个第一执政，虽然有两个执政的协助，但赋予第一执政绝对的权威，并授予任命所有官吏的权力。他们甚至也不支持西哀耶斯计划的其余部分，决定恢复有财产资格选举权及选举制度，因为他们可能意识到，如果不这样做，议会各院在波

---

① 新贵名流(notabilités)或译为“知名人士”、“贵人”、“闻人”。在本书涉及这一时期，实际上是以拥有财产为标准，其中虽有出身旧贵族的大地产所有者，但他们已被大革命剥夺了贵族头衔和封建主权利，而向资产阶级转化。更多的是新兴的资产阶级。这一阶级是拿破仑政权的支柱，故译为新贵名流，或简称“名流”。——译者

拿巴面前将变得软弱无力。

当多弩刚把宪法草案誊正好，波拿巴立即在他的官邸召集了 76 两个委员会的成员进行审议。在这次新的审议过程中，西哀耶斯又设法把互选原则、新贵名流名单以及普选权等写入了宪法。他这样做显然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因为波拿巴不得不同意这些内容。作为交换条件，波拿巴显著地增加了他个人的权力，他的两位同僚被贬低到只有咨询的地位，而他自己则取得了制定法令权。保民院被剥夺了参与对立法的创议权。这样，宪法的最后文本看来是一种妥协的产物，但在事实上，只要波拿巴把全部行政权集中在他自己身上，西哀耶斯所获得的成果就只能有利于波拿巴。毫无疑问，有些雾月党人跟着波拿巴走是为了想趋炎附势；然而另一些人支持他无疑具有更高的目的。他们认为拯救法国革命需要这样一位领袖。

由于这些辩论还不是正式的，法定程序的讨论应当先在五百人院的委员会内进行，随后再转到元老院。然而人们都希望结束这一讨论。霜月 22 日（12 月 13 日）晚上，当波拿巴要求议员们签字以表示同意这些条款，并立即要他们把三名执政的名字(波拿巴、康巴塞雷斯和勒布伦)写进去时，没有人反对这次新的政变。为了要法国人民批准新宪法而举行了全国范围的公民投票，结果以三百零一万一千一百零七票对一千五百六十二票通过。这部宪法在准备过程中就不符合正常程序，而在正式批准前的雪月 4 日(12 月 25 日)就开始生效了，这是再一次违法。[①]

这部共和八年宪法，仓促拼凑在一起有九十五条，除了夜间不得搜查民宅以外，并无一处提到公民权利。在国家权力的组织方面，这部宪法的规定也是极不完善的。这部“简短而含糊”的宪法是符合波拿巴要求的，给了他自由行动的余地。最主要的是宪法

① 投票到 1800 年 2 月 18 日才宣布计算出全部结果。——译者

规定了第一执政拥有无限的权力。除了媾和与宣战（这在当时还无足轻重)以外，拿破仑取得了全部行政权。他任命各部部长和其它高级官吏；只有治安法官才要通过选举产生。各部部长得受立法院弹劾，而这样其实使波拿巴更便于控制他们。至于第一执政本人以及他的官员则不对任何人负责，官员只有得到参政院同意才可被追究，而参政院的成员又是波拿巴自己指定的。他独自掌握了立法创议权。立法权只变成了一个单纯审议的过程，在听取 77 了参政院的意见后立法院成员只是在波拿巴提出的法案上写明“同意”或“不同意”而已。即使如此，讨论与投票还是分开进行的：有一百名议员的保民院进行讨论，而立法院的三百名“哑巴”投票表决。最后，波拿巴还不受约束地行使颁布法律的权力——这是革命议会过去为了执行法令而赋予首席行政官的权力，并由首席行政官规定或解释法令的详细内容。维护宪政的元老院则可以取消它认为违宪的法律，然而元老院议员的职务实际上只是个闲差，因为该院成了一个主要是进行选举的机构。

因此，人们说从全部宪法中所能看到的，就是个波拿巴；这句话流传很广，确实表达出眞相。然而还不是全部眞相；议会各院之所以全然不起作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取消了选举。各院成员的产生是沒有人民参与意见的，两位即将卸任的临时执政与新上任的第二、第三执政任命了第一批三十一名元老院议员，然后再由这些人来挑选出另外二十九名议员；以后，元老院就将继续以互选的方式来补足其成员。元老院指定保民院成员及立法院议员，并在现任三执政任期十年届满时任命新执政。结果所有那些被任命的人都确是在各级普选中选出的“新贵名流”。在每一个“乡镇区域”里，公民们选出为他们人数的十分之一的候选人，然后从这些“乡镇新贵名流”的候选人中又选出其人数的十分之一来构成郡的人名单。郡级人名单上的新贵名流通过相同的程序再构成全国

新贵名流名单。这所谓“乡镇区域”指的是什么？谁也还不知道。不管怎样，这种制度是无从实行的，到共和九年最后好歹算制定了各级名流名单，但也几乎根本没有采用。

人民是主权者，这是明确的，但没有人理会他们。雾月党人满意了，因为他们现在身居统治地位。但是他们只代表自己，不代表任何人。波拿巴毫不迟疑地告诉他们，“唯我一人代表人民。”尽管他们组成了所谓“代议制”机构，但事实上他们仍然是一伙被波拿巴召来、并在他认可的范围内协助他的新贵名流。以后在复辟王朝时，国王也是这么讲的。起初雾月党人不是这样想的。元老院成员是由西哀耶斯精心挑选的，由于他们控制了元老院，他们也就控制了保民院和立法院，所以这些人就自认为能够强迫波拿巴同他们合作。事实上，议会各院确曾表现出反抗的意图。但是由于 78 宪法里没有解决这些争执的办法，于是就以一系列政变的形式加以解决，而唯有波拿巴才具有搞政变的手段。从一方面来讲，执政府的历史，甚至于帝国的历史，都部分地表现为立法权逐步屈从的过程。从一开始波拿巴就侵犯了立法权。共和八年雪月5日(1799年12月26日)，他授权参政院以发布“意见”的形式来解释法律。他也时常毫不为难地按照自己的意向以行政命令的手段修改或曲解法律。共和十年宪法允许他授予元老院咨询权，从而剥夺了保民院和立法院的一切权力。这样，在极大地扩充他的制订法令权之后，波拿巴终于开始以直接发布法令的方式来立法。

有人津津乐道，说波拿巴和西哀耶斯让雅各宾派，即所谓“可靠的雅各宾派”充斥议会各院。他们才不这样傻呢！毋宁说，他们更为喜欢的是温和派。元老院成为仅次于法兰西科学总院的“空论家”的大本营。保民院的成员多是作家和演说家，诸如多努、谢尼埃、然格内、萨伊，而尤其是邦雅曼·贡斯当；那些不太著名的人物则安排在立法院。总共有三百三十名议员曾在督政府的立法两

院中占有席位，五十七人曾在大革命时期三届议会中占有席位；雅各宾派和归附的保王党贵族都只占极少数。波拿巴此时还不能摆脱这一批人，必须从他们中择优录用，因此参政院和政府各部的政治色彩，也不可能有很大差别。这就是为什么参政院甚至也有一定的独立性。在挑选其余两名执政的人选上，波拿巴就暴露了他的真实倾向。康巴塞雷斯曾经是国民公会的平原派，他仪表堂堂，讲究修饰，但忠心耿耿，极力对波拿巴施展一种温和主义的影响。勒布伦①曾任莫普②的秘书，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很不得意，波拿巴本人知道他是个保王党分子。在财政方面波拿巴依靠曾在革命前的财务总署任职的戈丹及莫利昂，结果造成了革命的资产阶级与那些旧制度遗留下来的、但已向新秩序妥协的人物混杂在一起，这是富有象征意义的情况。后来，波拿巴逐渐加大“旧人员”在政府里的比重，这样他就准备好了适应向君主政体过渡的人马。

二、波拿巴权力的组成与扩大

波拿巴于共和八年雨月 30 日（1800 年 2 月 19 日）移居杜伊勒里宫，并立即进入了自己的书房，以便不受干扰地工作。唯一获准进入书房的人是笔录他口授命令的秘书——最初是布尔里埃内，随后是梅内瓦尔或者是凡。每当他想与他的属下议事时，他总是到和书房相连的另一个厅里去。旧制度君主统治的先例也使他对部长们及其越权行为充满了不信任。他使部长们习惯于书面与他联系；不久他手边就有了以各部长，定期呈递给他报告的“卷宗”、陆军部的军事情报，以后又掌握了国内外额外的临时收益报

① 勒布伦（1739—1824 年），初为律师，1789 年当选为三级议会代表，雅各宾专政时期被捕入狱，热月反动后获释，1795 年又入选元老院。——译者

② 莫普（1714—1792 年）在路易十五晚年任大法官。——译者

告。他保留了督政府时期创立的国务秘书处这个机构，把它变成一个部并派马雷任部长。马雷负责集中政府各部、处的文件表报，并把他每天从早到晚从波拿巴那里收到的命令下达给有关部门。就这样，部长们变成只不过是波拿巴的办事员而已。波拿巴还增加了部长的数目：共和九年从财政部分出一个国库部；共和十年从参谋总部分出了一个军政部；此外，波拿巴还派参政官到一些部里，分别管理有关宗教、国民教育、国有产业、森林、公共工程等事宜。当今的督导官职位即由此发端。部长们因此感到不快；但是拿破仑也和路易十四一样对各部长间的倾轧感到高兴。只有外交部长塔列朗得到与主上一起工作的特权；塔列朗装出一副对波拿巴真正崇敬的样子。而蔑视他的波拿巴却不由自主地对他表示相当尊敬，这是一种暴发户对娴熟礼仪的名门贵族的尊敬。波拿巴对塔列朗的高贵气派悠然起敬，并非常乐于接见他。由于部长们被剥夺了决策权，并且也不构成一个团体，波拿巴就如伯尼奥[1]所说的"总揽一切"。象弗里德里希二世[2]一样，波拿巴是从书房里进行统治的。

波拿巴从未受过治国方面的正规训练，他缺乏很多必要的专门知识，关于他对任何事物都立即能理解的传说纯系讹传。他通过自学学到了很多东西，然而他真正的长处却表现在能器重那些82在法国革命期间有过行政经验的人，不时地向他们请教，并善于使用他们。从共和八年雪月4日(1799年12月25日)起，他从这些人中挑选出组成了拥有二十九名成员的参政院的大多数。除了布律纳与雷阿尔之外，这些人过去都以温和派闻名。在他们之中只

① 伯尼奥伯爵(1761—1835年)革命时立法议会议员，波拿巴的重要高级官吏之一，后来在复辟时期任大臣，此语出自他著的《回忆录》。——译者

② 旧译"腓德烈大王"(1712—1786年)，普鲁士国王，1740—1786年在位。——译者

有三名前国民公会的议员，在这三人中仅贝利埃一人曾为“弑君者”，就是他也曾赞成过国王的死刑缓期执行。与这些人同时入选的还有诸如尙帕尼、弗勒里厄、莫罗·德·圣麦利等人，他们肯定是同情王党的，对旧制度的灭亡不胜惋惜。在以后的几年内，这两个派别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前者增加了蒂博多和特雷拉；后者增加了巴尔贝-马尔布瓦、波塔利斯、迪马、比戈·德·普雷亚梅纽以及米雷尔。他们并非都受到这位统治者的信任。共和八年果月7日(1800年8月25日)，波拿巴从马伦哥得胜回来以后，即实行改进人事制度，从而使他能不动声色地解除那些引起他不快的参政官的职务，因为他认为人事变动引起太明显的注目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从此以后，波拿巴每隔三个月就准备两份名单，一份是那些执行正常公务的参政官名单，另一份为执行特殊公务的参政官名单，即那些负有特派外放任务的参政官名单；这样，这些人就不出席参政院会议了，虽然他们仍保留参政官的官衔和荣誉。任务一旦完成，他们就不必再重返原任，这就足以使波拿巴为掩盖某一参政官失宠而把他的名字从一张名单转至另一张名单。

参政院分为五个组，这五个组平时分别执行职务，不过定期召开全体会议，会议通常由波拿巴主持。参政院还设有一个由洛克雷领导的总秘书处。由于参政官是由第一执政任免，所以他们就缺乏独立性。而革命前王政时期的国务会议是有独立性的，因为它的成员是买来的职位，因而官爵终身，并且具有由于社会出身和职业联系而产生的一种团体精神。由于参政院没有决策权，所以它只是发表对波拿巴毫无约束力的意见而已。

然而参政院的作用还是相当大的，特别是在最初几年。它有诸如罗德雷、勒尼奥、夏普塔尔、克雷特、富尔克鲁瓦、波塔利斯、贝利埃以及蒂博多等许多著名的行政人才。正是在参政院里制定出了那几部重要的组织法及法典。参政院具有最高行政裁

决权，它在处理争议中起着逐步调整整个行政机器运转的作用。83 波拿巴很高兴参加该院的工作。他让参政官畅述己见，然后他自己就毫无拘束地以充沛的精力滔滔不绝地发表讲演。他只是把政治议题排除在参政院讨论范围之外，特别是教务专约与共和十年芽月18日法律即未交讨论，因为他知道这会遇到强烈的反对。

然而波拿巴不是单单听取参政院的意见，他还鼓励其他咨询团体发表意见。这些团体起初是临时召集的，但后来逐渐比较定期召集，称作"行政会议"。他经常召集有关的部长和他们属下各单位的负责人、一些参政官、甚至从各郡专门召来的某些官员来参加这些会议。这些"行政会议"虽然不如参政院那样有名，但却几乎起到了与参政院同样重要的作用。

象督政府一样，新政府从第一天起就为财政拮据所困扰。国库几乎一空如洗。这样，政府就不得不软硬兼施地几乎每天向银行告贷。这样，行政改革也就从财政部门开始。正是在这一部门，中央集权首战告捷。不等制订宪法完成，新财政部长戈丹在霜月初就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来开辟财源，充实国库。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霜月3日（1799年11月24日）采取的剥夺地方政府确定每年税额分配的权力以及征收部分直接税的权力，改由中央政府指派的代理人负责征收。在这一新的中央财政机构中有一名总监及数名副总监分别负责直接税收及各郡的税收。在他们之下则有会计检查官和督察官负责分配各公社纳税人的税额。虽然这些副总监指派地方估税员协助他们工作，但是税则则由他们自己拟订。但实际上，暂时并没有人对新订的税额给予太多的注意，会计检查官就着手开列拖欠下来的税单，并根据以往的税单着手订出共和八年（当年）的税单。在每个郡，由政府任命的其它官员包括一名收税员和一名出纳员，以及叫作一般收税专员和特殊收税专

员[1] 的税收经理人；在税额超过一万五千法郎的城市还有数名收税官。在另外一些地方，公社当局还保留了征税的权利，而一般都由出价最低的投标人承包。最后在霜月 6 日，一般收税专员规定的年度期票证券制度重新建立起来。[2] 这些期票按月份分十二次发行，但证券上规定的税额实际上在二十个月以上才付清。财政部内的主要机关——处理地产、关税以及公债的部门——很快地都有了参政院派来的督导官，国库当然采取了这一步骤；雨月 1 日 (1800 年 1 月 21 日)，它被置于迪弗雷纳的领导之下，他在 1789 年以前和在国民制宪议会时期曾经是国库雇员。直到共和十年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库部，由巴尔贝-马尔布瓦领导。84

困难的问题是销售由一般税收专员发出的期票。为了给期票提供信用支持，戈丹设立了一个抵押银行。他通过恢复由国库会计官发出的保证金券，和授权银行负责仓库及信托业务的办法为银行筹措资金。由莫利昂负责的抵押银行，还负责通过进行公开购买来维持政府公债的价格，以便降低利率，使国库的地位更加稳定。这样一来，这家银行很快就以"还债金库"而著名。但是期票的贴现仍然得依赖银行家。法国革命使得银行家有可能与一些大企业家联合创办若干发行纸币的机构，来满足他们各自的需要。这些银行中主要的是共和四年成立的由佩雷高、雷卡米埃和德普雷经营的"往来存款银行"，以及在共和六年成立的"商业贴现银行"。前者拥有准备援助国库的资金，当然假如有一国家银行来掌握这笔资金则会更好。往来存款银行的股东们正是想要得到国家银行的特权，以便能够扩大他们的业务。股东们就这样与政府达成了最后

① 一般收税专员为旧制度留下来的传统代理人，他们包括作为国库的代表和银行业务代理人的政府要员。特殊收税专员是 1800 年 3 月 18 日新规定的，他们也是国库经理人，专负责征收直接税及罚金等。——英译者

② 这些证券是根据预计的岁入提出的，由一般收税专员以预定支付的期票形式提交给国库，这些期票然后由银行家为国库贴现。——英译者

协议。雨月24日（1800年2月13日），他们的银行改组为法兰西银行，它拥有三千万法郎的基金，每股为一千法郎。二百名主要股东选出了十五名董事和三名监事；董事之中指定三人负责分配用于贴现的基金和制定贴现率。法兰西银行承担收购三百万法郎的期票。这家银行得到的报酬是，"还债金库"的一半保证金被划为该银行的股金，另一半则由银行用作现金支付。最后，法兰西银行还要经办政府公债利息及各种年金津贴。但是这家银行没有获准发行钞票的垄断权，因为有人认为，如果给予这一权利，它就会只给自己的股东贴现钞票，从而就会迫使各地的商人都走这家银行的门路；其实这正是作为协议基础的一项默契。尽管戈丹所做的工作值得称赞，但是他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只不过迈出财政改革的第一步而已，如果忘记这一点，势必会曲解执政府的历史。税则直至共和八年年底才准备出来，而且事实上仅有一小部分期票证券得到法兰西银行的贴现。即使法兰西银行贴现所有发出的证券，也不足以维持国家的开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波拿巴也象督政府一样听任银行家及承办商的摆布。

85 地方行政改革对于中央政府改革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见效较快。改革是由波拿巴在1800年1月间发动的，雨月28日（1800年2月17日）的法律作出决定，代表参政院提出这个法案的报告人就是夏普塔尔。郡、区以及公社仍然保留，由于取消了共和三年建立起来的区政府，公社又恢复了自治地位。介于公社和郡之间的真正的行政单位变成了县，这是旧专区的恢复，只是面积更大而已。各级行政区都由一名单一的行政长官领导：郡设郡守，由一名秘书长协助工作，取代了原来的"中心行政机构"；县设县长；公社设一名市长，连同一名或几名助理。同中央政府一样，地方行政改革的关键也是取消了选举制。从此以后，所有官吏均由中央政府委派，只有五千居民以下公社的市长及其助理则授权给郡守

委派。虽然郡、县和公社各级的地方议会仍然保留下来，它们的议员则也要由中央政府或郡守委派，而且议会的会议次数和职权都大大地削减到所余无几：地方议会听取财政报告，郡和县一级议会分摊租税，通过为地方所需的附加税，并且有权提出建议案；公社一级的议会有权规定公地的使用，并负责维修属于公社的公共建筑物。至于涉及到附加税及借款问题，公社议会只能发表意见。这样，公社就严格处在上级监管之下。各大城市于共和三年建立起来的割裂的行政区划被取消了。里昂、马赛及波尔多改由单一的市政厅管理，但在共和 13 年以前，它们一直还由几名区长负责。在巴黎，十二个区及其区政府依然保留下来，但是几乎所有的行政权都交给塞纳郡守；首都没有市政厅，而由塞纳郡总政务厅代行职权。

波拿巴对政治人员不够熟悉，所以他自己拟不出委派郡守的名单。这一任务就落到他的兄弟内政部长吕西安身上，或毋宁说，就是落到吕西安的秘书、立法议会前议员伯尼奥身上。但是康巴塞雷斯、勒布伦、塔列朗以及克拉尔克也参与提名，议会各院成员诸如肖夫兰、科尔多郡的克雷特等同样偶尔也参与其事。一般地说，波拿巴对吕西安提出的人选都是同意的。大部分郡守是在风月 11 日（3 月 2 日）任命的。这项人选又是主要来自温和派，其中约有半数在大革命期间曾任历届议会的议员。勒图尔纳甚至曾任督政府的督政官；让邦·圣安德烈曾经是救国委员会的成员，他的雅各宾派观点与其他人选的总的政治色彩截然不同，但他被派到一个并入法国的郡——托纳里山郡①。除了这些人，还派了一些将军和外交官出任郡守。郡守全部是富有经验的人物，大部分人都很有能力。郡守的人选曾大有助于提高波拿巴的声誉，但这是法国革命的遗产之一。正象中央机构人选的情况那样，郡守的人选

86

① 在今西德来因地区，并入法国时以美因兹为郡首府。——译者

也越来越多地起用旧制度下的旧官吏。

郡守都不是从地方上选拔的；不象级别较低的官员或地方议会成员实际上是由郡守和地方政界人物就地录用的。一般地说，郡守也同样优先选择那些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充任过地方议会议员的或领导过公务部门的温和派新贵名流。例如，在下塞纳郡，参加过1790年郡议会的半数议员在1800年再次复任。乡村遇到较大的困难。由于乡村中只有极少数村民具有丰富的地方自治的知识，曾经受过具备公益感和廉洁奉公思想的培养训练，法国革命曾深感困难。郡守们遇到了同样的困难，这一事实常被用来作为把公社行政管理交给旧贵族的口实。

虽然中央集权成为波拿巴改革的首要特征，但改革也促进了官员之间职权的专业化，这些官员都是彼此独立而直接向中央政府负责的。他们的管理职能的熟练程度必然会提高，然而地方自治权却进一步被削弱。革命给了行政机构对处理行政争议、直接税收及治安的裁判管辖权。雨月28日法令授权实际上由郡守主持的郡政务厅处理争议事件；戈丹取消了行政机构的征税权；公社很快地将丧失对违法事件的审判权。

波拿巴也把警察从地方行政机构里分离开来，以便把警察置于中央机构的控制之下，这本是符合他改革制度的逻辑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保留了由富歇在德马雷帮助下改组的警务部。87 德马雷原是"红色神甫"①，督政府时期曾出任公职，作为警务部保安警察的头子，他成为富歇的左右手。风月17日（1800年3月8日）在巴黎，以警察厅长的名义恢复了过去的警察总监，这给富歇提供了一个帮手。警察厅长负责维持首都秩序，后来在1802年10月4日建立的市卫队也归他管。曾担任高等法院检查官的杜布瓦

① 指法国革命期间直到雅各宾专政时一直拥护革命，从天主教会走出来反戈一击的低级神甫。——译者

当上了巴黎的第一任警察厅长，他是富歇一手提拔的人。警务部在郡里没有常驻代表。直至共和九年雾月5日（1800年10月27日）才在各大城市及边境线上派设了地区警务专员接管了地方当局的警察权，在有些地点，如布伦港，还派驻了特派员。与此不同的是，在大部分郡里，只有郡守是警务部的常驻代表，他们就象过去的巡按使那样有权发出逮捕状和搜查状。但是他们的上司不只是警务部长一个人；而且，由于郡守缺乏有专业训练的部下，他们往往直接从部长本人或从他派驻到郡里的代理人那里得到有关的情报。与警察并存的还有在蒙塞将军统辖下经过周密改组的宪兵队，它是单独执行其任务的。

所有这些各色各样的机构从一开始就行使了极大的权力。富歇把侦探及告密者遍布各地，在这些人中甚至有从社会最上层的阶级里招募来的。由拉瓦莱特领导的书信检察室严格监视书信来往。肆意逮捕遍于全国，郡守本人就能签署“密扎”，不但逮捕政治嫌疑犯，而且还徇情枉法，为了某些有权势家族的利害关系，而逮捕不能判定有罪的或已经法院宣告不予起诉的普通案件的被告。然而警察系统仍然缺乏政府其它部门所具有的那种统一和集中程度。这当然是由于波拿巴对富歇的不信任造成的；富歇在所有的部长中是最不可或缺的，最使人畏惧、也是最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从政府预算中要求极少，而从赌场中，从颁发护照和枪支执照的收费中、从没收反叛分子的资产中、从肆意向妓院勒索名目繁多的捐税中为自己开辟财源。因此，为了控制富歇，波拿巴宁愿有几个警察机构并存。他还有他自己的秘密警察，更不必说他有着一大批象菲埃韦，让利斯夫人以及蒙洛西哀那样的告密者；他还准许杜布瓦插手政治，支持他与富歇对峙。结果，这些相互竞争的警察机构都竭力想胜过对方，而不顾那些求诉无门的公民的利益。

行政制度的改革刚在开始付诸实施，共和八年风月27日

88 (1800年3月18日)法律也使得司法系统开始了改革。在民事方面,乡区保留了它的治安法官,每一县也象过去的专区的情况一样设有一个初审法庭。新设立的是二十九个上诉法院,这使人想起了高等法院。在刑事方面,治安审讯机关变成了简易警事法庭,而初审法庭和上诉法院则都有刑事宣判权;郡刑事法庭仍然保留下来,但从此有其专职法官。最高法院、起诉陪审团与判决陪审团,商务、军事以及海事法庭都保留下来。最后,选拔法院工作人员的方法也随之制订出来。公证人仍然由波拿巴指定;除了治安法官的执行吏之外,他还有权决定执行吏的人选,以及检察官(或公诉人)的人选。对后者他又恢复了"辩护士"的命名,但是不再强迫被告延请他们代为辩护。只有律师的职业依然是自由职业。

但是司法系统的调整并不是风月法律的最重要的特征。首先,除了治安法官以及商务法庭的法官外,法官不再由选举产生。第一执政任命所有的法官,只有最高法院的法官由元老院指派。虽然他们确实是终身任职的,然而他们的薪俸和晋级从此却仰仗着国家。勒布伦看见莫普改革的实现一定会心满意足,他很可能也曾在其中插过手。其次,国家检察官的职务完全重新树立起来,由此可见促进实行改革的原因在于稳定公共秩序。这不仅是一个整顿司法人员并保证其效忠于政府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在动乱的国度里加强镇压的问题。刑事法庭的公诉人的职能是与作为中央政权代表的政府专员的职能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公诉人接受司法警官的领导。治安法官及宪兵队长仍然有权签发传票和进行预审。然后就象过去一样,这些预审的内容转给初审法庭庭长,他是起诉陪审团主席,但从此由国家委派。司法系统的集权化尚未彻底,但是集中的程度很快增长。

司法官的遴选比郡守的遴选困难更大,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而且得要从地方上就地挑选。所以波拿巴只得听从别人的意见。要

求推荐官员的通知发到地方各级议会议员，并且要求提供各种背景不同的知名人士的情况。司法部长阿布里亚尔按照不同的地区准备了一份候选人名单；然后在该地政界人物的协助下，由康巴塞雷斯加以审查。尽管采取了这些谨慎的措施，法庭的组成还是带来一定程度的紊乱，并且在某些人选方面产生了令人遗憾的后果。在这一方面，参加过革命的人士还是受到了重用，由于法官是终身任职的，司法官员才不象其它机构的官员那样迅速地增多了旧制度下的旧人员。

共和八年的行政改革和司法改革在法国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就其重要性来说，仅次于1789年国民制宪议会的成就；但是，它应归功于后者的成就之处颇多。国民制宪议会已经废除了特权和中层机构①，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波拿巴只要盖上他的图章就行了，这就是他能够如此迅速进行改革的原因。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只是重新开始了共和二年的事业。救国委员会没有足够时间同样彻底地实行中央集权，然而它也曾有过同样的意图。圣茹斯特曾经设想在每一个郡或区设置一个单一的长官，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夏普塔尔说，"行政制度的力量完全在于能够确保不折不扣地贯彻政府的法律和法令……执行法令要一竿子插到底，从部长直到被治理的百姓，不容中断；它要把政府的法律和法令以电流的速度传达到社会组织的基层去。"罗伯斯庇尔本来也可能这样说的。这是无套裤汉非常喜欢做的一种比较。人们往往认为，共和八年的各项法律是波拿巴为了增加他个人的权力而制订的，这种看法并不是没有道理。宪法中从未提到关于取消地方议会的选举，与波拿巴同时代的人都很明白，他的个人独裁统治又向前跨了一大步。然而，在这些法律背后却隐藏着令人不能反对它们的更为深刻的

① 指制宪议会在1789年12月至1790年1月实行的废除旧省制，划分新郡区的改革。——译者

动机：国民制宪议会所实行的地方分权的政策曾使法国在战争时期受到了危害，而且只要战争延续下去，这种局面也会继续存在下去。为了应付这种局势，救国委员会才又抓紧对政权的控制，在热月党人的手中政权又松弛下来，波拿巴再次抓紧政权。他把一时权宜之计变成了统治的理想措施。他所以能够使他个人的统治欲望得到满足，只是因为这种理想当时完全符合革命的法国的利益，雾月党人就同意这种看法。

90 当波拿巴忙于建国工作时，他觉得不得不自卫以免受到非难。新贵名流已经摆脱了民主的威胁，并且占有了所有的重要地位。但是，因为任何事情都不再由他们决定了，于是这些人就心怀不满；斯塔埃尔夫人曾经希望通过波拿巴，至少是通过邦雅曼·贡斯当来统治法国，现在毫不掩饰这种不满情绪。保民院还有活动余地，于是反对的呼声就从这里爆发出来。保民院是常设机构，它选出自己的办事机构，并且推选多弩为议长。它有权发表"意见"，讨论请愿书，谴责各部部长，当它认为政府的措施违宪时，可向元老院提出弹劾。最重要的是，人们能把它作为一个发表演说的场所，当第一个议案提交保民院讨论时，邦雅曼·贡斯当于1800年1月5日就开始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波拿巴听到这种情况之后很愤怒，于是所有的人都躲避起来。西哀耶斯隐居到他的乡间住宅，接受了一份养老金，这使他大为丢脸。为了驯服那些温和派，波拿巴只要说一句"你们要我把你们交给雅各宾派吗？"就够了。雅各宾派自然更加感到不满。在外地，特别是在法国西部，他们受到"白党"威胁的压抑。郡守的任命使雅各宾派在原有的行政机构中失去了支持。他们经常攻击政府，如在第戎和图卢兹，直到夏季才真正遭到挫败。至于保王党，他们改变了腔调，因为波拿巴在接见他们的代表伊德·德·纳维尔和当迪涅时拒绝答应他们提出的要求。由于他们控制了大多数报纸，于是就大喊大叫地反对新的议

会各院，要求立即进行清洗。但是在1800年1月17日，波拿巴利用这一骚动一举封闭了当时七十三家报纸中的六十家。后来又有些报纸停刊了，到1800年底只剩下了九家。1799年12月27日以后，《政府通报》成为政府的机关报，并由马雷掌管。检查制度虽然没有正式恢复，事实上却由富歇执行起来。1800年4月5日，吕西安·波拿巴在戏剧演出方面也建立了这一制度。左派报刊当然也同时被清除掉了。

既然合法反抗已不可能，极端分子就开始想使用暴力。芽月里又出现了关于雅各宾派阴谋的传说。但是，唯一的严重危险来自军队，因为那里还有很多共和派，而心怀不满的人就更多，因为将军们没有一个不觉得自己也是适合做第一执政的。波拿巴使用了慎重的手段。他任命卡尔诺为陆军部部长，并且大大地增加了来因方面军司令莫罗的权力。他的最可怕的敌人仍旧是保王党分子，至少是那些决心拒绝一切妥协的人。可是，他们彼此既不能在原则上取得一致，因为有些人是主张君主立宪的，也不能在做法上取得一致意见。同达瓦雷和圣普里厄斯特一起流亡在俄国米塔瓦的路易十八把谈判和阴谋结合起来。巴黎的鲁瓦耶-科拉尔为首的王党组织被授命去试探波拿巴。于是他便托人交给波拿巴两封信，都没有得到答复。在施瓦本，一个由普雷西和当德雷掌管、并由威克姆资助的机构正在为保王党亡命者入侵普罗旺斯做准备。此外，这个机构还与里昂和图卢兹的保王党，特别是与波尔多（共和五年成立的“慈善学社”已深深扎根于此地）的保王党互通消息。住在英国的阿图瓦伯爵维持着在泽西岛①和巴黎的联络机关，但在5月间，伊德·德·纳维尔在巴黎的阴谋暴露了。然而，保王党的主要根据地是在西部。共和七年，那里舒安份子曾死灰复燃，但他们不

91

① 泽西岛在英吉利海峡，虽属英国，而更靠近法国诺曼底海岸。当时是英国对法进行特务活动的一个基地。——译者

久就堕落为土匪，当政府军10月到来时——埃杜维尔的部队在卢瓦尔河以北，特拉沃的部队在旺代——他们就立即被降服了。埃杜维尔和舒安份子的贵族首领们进行了谈判，1800年1月4日达成停战协议。波拿巴非常希望把全部兵力转来对付奥国，因而迫切希望平定西部。然而，和热月党人不同，他不愿平等对待乱党，而决心解除农民的武装。因此，他提出赦免那些放下武器的人。但是没有得到响应，他把布律纳将军和勒费弗尔将军派到西部去。在那些郡里暂时中止了宪法的实施，并且下令枪毙那些携带武器的人或是鼓动叛乱的人。实际上几乎没有进行什么战斗，贵族出身的首领如道蒂钱普和布尔蒙在1月里投降了。布列塔尼的非贵族出身的首领坚持得更久一些；卡杜达尔是在2月14日最后一个投降的。弗罗泰在得到安全保证的情况下到阿朗松去谈判，但在2月15日至16日的夜间在诺曼底被捕了。2月18日押送他到巴黎去的分遣队在韦纳伊遇见了一名传令官，他带来立即就地交付军事法庭的命令，于是弗罗泰当天就和他的六名同伙一起被枪毙了。由此可见，波拿巴在同叛党进行斗争中，也继续了共和二年的传统：他完全是个恐怖主义者。希农的一位编年史作者写道："从罗伯斯庇尔统治时期以来，法律从未曾如此严厉过。"

然而，波拿巴小心翼翼地不把这种手段普遍化。他比雅各宾派灵活，不过惩一儆百，而欢迎一切投降的表示。他没有等到全部解除反革命武装的和平时期的到来，就采取了措施以加速在全国招降。这样做肯定会使很多人高兴，因为结束混乱就会恢复繁荣，使那些从革命中得到好处的人安下心来。确实让人担心的是，那些人的归顺并不是那么真心诚意的，而在这一点上波拿巴也从不抱任何幻想。不过，只要他还在继续赢得对外战争的胜利，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主要的困难在于使资产阶级共和派，特别是使军队，接受那些

有利于顽抗派教士和亡命者的宽大措施。因此在马伦哥战役之前，波拿巴只采取十分谨慎的措施。1799年12月28日，他批准天主教徒使用那些沒有卖出的教堂。他允许他们享有每天（甚至在星期日）做礼拜的自由，只有第十来复日是例外，这一保留沒有什么重要意义，因为他实际上废除了第十来复日礼拜和几乎所有的革命节日。他只是要求神甫们答应忠于共和八年宪法而已；有一个时期，他似乎相信他们会趁此机会屈服顺从。可是，沒有产生什么结果。那些原来拒绝宣誓的教士现在大多数都不顾埃梅里方丈的劝告而继续顽抗。秘密的宗教礼拜继续存在，教堂的钟声和敬神巡行仍旧是无数冲突的起因。波拿巴很快就意识到，为了平息教士的反抗，就必须和罗马教皇和解。此外，参政院还宣称，宪法默认取消了禁止原来贵族和亡命者亲属充任国家公职的规定。然而，参政院也决定保留有关对付亡命者本人的法律。但在1800年3月3日又作出决定，只有那些在1799年12月25日以前逃走的人才包括在亡命者的名单中。于是一个为了审核亡命者申请回国而设立的委员会接到了很多这样的请求。原先的恐怖主义者巴雷尔和瓦迪埃，那些因果月事件被放逐的人，以及包括拉法叶特在內的国民制宪议会议员中多数的老“爱国党”成员，都被毫无异议地召回了。可是，名单上的亡命者仍有十四万五千人，而委员会的审核工作不能操之过急。富歇亲自建议除少数人以外大赦全部亡命者。但是，时机还未成熟；要冒这样的风险就象准备教务专约所冒的风险那样，波拿巴就必须首先取得胜利与和平来提高自己的威望。

三、仓猝上阵的1800年战役

93

波拿巴个人权力的保持和扩大有赖于1800年的战役，所以他

就满腔热情地准备这次战役。人力不成问题，因为当年的新兵在3月8日已全部入伍交给他来支配了。但他反对雅各宾派和督政府所采用的方法。现在断然不是模仿共和七年大征兵的时候，何况也缺乏款项。此外，如果我们相信一位非常偏袒他的史学家的话，波拿巴很知道，“全国战争热情的高度和愿去打仗士兵的人数成反比”。所以他就满足于统帅三万名士兵了。那些富有的阶级是容易对付的，因为法律允许他们可以出钱雇人顶替。来因军已经准备就绪，一支新的后备军还有待建立。这就需要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倾出训练站的新兵，召回西方军的老兵，成立意大利军团，在行军途中训练那些新兵掌握战斗技术。但是骑兵极少，而炮兵更少。在这样的条件下，波拿巴要全力以赴地出征意大利，就需要有非常的胆量和自信。

最难的问题是为战役提供军费，据说大约需要六千五百万法郎。替代了强制公债的额外军费捐献以及加速征集税收的措施都不能开辟急需的财源；由于捐献和租税可以用督政府发出的票据和支票来支付，而此时这些票据却毫无价值了，于是情况就更加严重。此外，军需供应又委托给了承包私商，这些人都以动产的收益作为担保。戈丹希望依靠征收间接税，但是，对自己的力量仍没有多大把握的波拿巴只准许统一城市通行税，但这项税收专用于济贫院和城市本身。开支被压缩到最低限度，可是执政府最后不得不采用督政府所用过的权宜措施。政府停止了实行承包制度，并且恢复了征购的办法。但是征购时发出的票据又不能用来缴纳租税。政府最后决定部分延期付款；国库中的少量余款每隔十天给各部发放一次。此外，政府还发行了不兑现的支票。最后，它就依靠银行家和承包商了，他们同意每月按百分之五来贴现票据。政府也求援于在热那亚、汉堡等地的国外金融家，他们被强制垫款六百五十万法郎。

94

这个专制政府在财政政策上的唯一新奇特点就是它的高压手段。政府要求那些沒有得到政府付款的承包私商：如果他们希望用新指券来补偿他们的话，他们就要交出五千二百万法郎。但是这种债务证券立刻就丧失券面价值的百分之五十。已经被捕入狱的著名金融家乌弗拉尔被迫向政府交出一千四百万法郎。因此政府只能过一天算一天。虽然政府做了极大的努力，可是，不应以其结果来欺骗自己。由于政治原因而最受优待的来因方面军总共得到了六百二十万法郎，在雨月还拖欠了一千五百万法郎薪饷。徐徐前进的后备军，除了沿途从农民那里得到给养之外，既无军饷又无军粮。象在革命时期一样，战役准备中财政上的巨大不足造成了军队的苦难。在财政方面，象在政治方面一样，一切都取决于胜利。如果不要求全国作出牺牲（这种牺牲曾使得国民公会和督政府不得人心）的话，那么，这场战争就不可能长期打下去。

至少人民是这样推论的，而且每一个人都相应地作了准备。当波拿巴于5月6日离开巴黎的时候，雾月党人就纷纷开始考虑万一他不能回来的话，有哪些可能解决的办法。西哀耶斯又在巴黎露面了，于是有人开始议论起什么新的督政府，什么新的第一执政来——卡尔诺、拉法叶特、莫罗。也有人提到奥尔良公爵。波拿巴的弟兄约瑟夫和吕西安也跃跃欲试。在这种形势下必然会有某些猜测；但是，肯定有很多显要人物会幸灾乐祸地指望着他的失败。除了他的失败以外，自由主义者和某些雅各宾派沒有别的指望。斯塔埃尔夫人后来写道，“我在指望波拿巴失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暴政统治。”就保王党人而言，他们仍旧无所不用其极地帮助敌人。卡杜达尔6月30日从英国回来，打算再策动舒安份子的叛乱。如果波拿巴失败了，这就肯定会意味着法国亡国和革命失败。在波拿巴和他的敌人之间，法国人民再无犹豫的余地。

95

第二章 欧洲和平的实现

尽管进行战争并迫使敌人讲和对波拿巴是有利的，但让法国人相信他并非战争祸首对他也是同样重要的。为了完成他的备战工作，特别是为了挽救在埃及的军队（它的损失将成为法国在地中海和东方的不可挽回的挫折），他本会乐意签订一个停战协定。但是要在自然疆界的基础上媾和在他是难以想象的。他后来说，放弃意大利“会挫伤想象力”，也就是说，有损于他的威望。他也不愿意听取普鲁士国王的建议，国王对博浓维尔说，体现和平的诚意的条件是从荷兰、瑞士和皮埃蒙特撤军。塔列朗的得力助手德·奥特里夫不久后出版的《共和八年法国的状况》一书可以认为反映了波拿巴的思想。此书建议欧洲成立一个以法国为盟主的大陆国家联盟来代替传统的均势政策。

但是敌人拒绝了波拿巴的和平建议，这反而成全了他。实际上，奥国宰相图古特颇有试探和平条件的手腕，但是当塔列朗提到坎坡福米奥和约中所规定的领土界限时，图古特强烈地表示反对；96 当提出以现有边界为谈判基础时，他却又加以回避。因为只要图古特还没有被打败，他就梦想着收复尼斯和萨伏依，以便迫使撒丁国王割让皮埃蒙特的一部分给奥国作为报酬；建议与法国谈判的奥国大公查理失去了对德意志军队的统帅权。图古特对英国人微微暗示，对法国一些地方的征服可以用来作为恢复君主政体的条件。他至少相当慎重，没有公开说这件事情。然而皮特和格伦维尔却失策地泄露了贵族同盟的内心愿望。他们向众议院宣布，与波拿巴签订条约不能保证未来，并且对法兰西共和国无礼地宣称，最

可靠的保证是“让原来的王室复位。这个王室在统治法国数百年中，使法国国内繁荣昌盛，备受外国的尊敬”。被他们收买的根茨突然极端狂热地鼓吹发动反革命的十字军。这样法国就别无其它选择，只有战斗。

一、1800年战役与吕内维尔和约

俄国已经退出这场斗争。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就只希望使法国和解，这样做可以使自己免于一切风险。然而选他做仲裁人幷不合波拿巴的心意；波拿巴一方面恢复迪穆里埃和丹东的政策[①] 97 （他们本人就是法国外交上反奥传统的继承者），一方面却向弗里德里希建议结盟，而这种联盟会使普鲁士沦于从属地位。国王拒绝了，这样一来，战争仍然是法国与奥国之间的一场决斗。

一心想着意大利的图古特让克赖在来因河后面驻防，同时命令在意大利的梅拉斯（他的兵力经过很大的困难才扩充到十万多人）进攻法军，后者自11月就已经撤到亚平宁山后面。图古特还命令梅拉斯攻入普罗旺斯，那里的维约和皮韦尔侯爵计划挑起一场叛乱。奥国人指望着在梅诺卡岛的英国人的帮助，但正象往常一样，邓达斯不能聚集必需的兵力。只得到五千名士兵的斯图尔特提出了辞呈，而他的继任者艾伯克龙比直到马伦哥战役之后才到任。梅拉斯当时把他的一半兵力分布在平原上和阿尔卑斯山各山口；另一半兵力则采取攻势。4月6日他把法军截为两段，包围在热那亚的马塞纳，幷把絮歇赶回瓦尔河畔。结果，纯粹出之政治上的考虑的图古特的军事战略，只是使奥国军队把法国人赶到了西南方，幷沒有获得决定性的战果；而法国人则仍然控制着瑞士，因此得以从侧面攻击两支奥国军队。

① 1792年迪穆里埃任外交大臣，与丹东皆主张以奥为主要敌人。——译者

起初，波拿巴把他的后备军分布在夏龙和里昂之间。3月，他企图说服莫罗率领他的全部兵力在沙夫豪森附近渡过来因河，以便切断克赖的交通联系，然后各个击破①。那时后备军将开进瑞士，而且得到获胜的部分来因军的增援，尽可能向东前进，至少在圣戈塔德山口越过阿尔卑斯山就可以用同样战术对付梅拉斯。但莫罗完全沒有理解这种速战速决战术的意义，而这时梅拉斯就发动了进攻。波拿巴置莫罗于不顾，在4月底把自己的后备军集中在下伐累地区。同月27日，根据工兵搜集的情报，他决定带领军队向大圣伯纳德山口进发。法国军队于1798年和1799年曾两度通过这个山口，所以他们很熟悉这条道路。尽管如此，5月5日他还是命令莫罗派蒙塞率领二万五千人经圣戈塔德山口到他那里。然而莫罗只愿派去一万五千人。可是这却仍然削弱了莫罗刚刚开始的进攻，而给敌人决定性打击的功劳却归于波拿巴。这是他们二人感情破裂的起点。

通过大圣伯纳德山口的进军是从5月14日至15日夜间开始的，到5月23日结束。由于部队必须排成纵列行进，艰难地通过巴尔德堡垒的猛烈炮火扫射，因此只有十门大炮能够通过，在部队到达米兰之前，这就构成了整个炮队。先头部队拉纳夺取了位于波河平原前沿的伊夫雷阿要塞，从这里波拿巴可以同沿瑟尼山口和热内弗尔山口而下的蒂罗部队汇合起来，向热那亚进军。在这种情况下，梅拉斯如果被击败，仍可主动地集中他的兵力退往伦巴第。可供波拿巴选择的另一条路线是向米兰进军，这样来切断梅拉斯的退路。于是，打一场胜仗将是有决定意义的，并会把意大利交给法国人。然而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只要在米兰的法军沒有重新开辟一条通过圣戈塔德山口的战线，梅拉斯就能在波河北岸发动一次进攻而切断法军的交通线。波拿巴需要打一次胜仗，

98

① 把敌人分割在分散的孤立的包围圈里，然后各个击破。——英译者

而且是一次立即取得的胜仗。他因此选择了后一条路线，虽然冒险，然而一旦成功必将产生惊人的战果。主力部队在拉纳掩护下向东迂回，于6月2日到达米兰，在这里与蒙塞会师。奥国的武卡索维奇已撤退到奥利奥河后面，奥军发现他们被分割成力量十分悬殊的两部分。法军各师然后向南进发，渡过波河，转而向西，夺取了斯特拉代拉的隘路。在这里，拉纳于6月9日攻占了芒泰贝洛村，然后向马伦哥平原进军。6月13日先头部队到达能看到亚历山大里亚的博尔米达河畔。波拿巴做到了既使他的师团挺进，又确保安全。他把部队编成独立的兵团，并且使各兵团尽可能地集中。与此同时，马塞纳不得不同意于6月4日撤离热那亚，并与絮歇重新会师。而絮歇正在击退厄尔斯尼茨，并使奥军蒙受巨大的损失。波拿巴以为他们可以包抄梅拉斯。虽然他们沒有能够这样做，但是却牵制了大量的敌人骑兵。

梅拉斯在亚历山大里亚从剩下的七万多人中仅仅集中起了三万人。象下赌注一样，他竟沒有保留骑兵，但他还有大约二百门大炮。波拿巴对他的确切下落一无所知，但是他知道奥军可能试图渡过波河，或者沿亚平宁山逃掉。因而在6月13日他调遣了一个师到波河以北，另外两个师在德塞统帅下南进，他仅留下了二万二千人和二十二门(或二十四门)大炮。此外，由于他沒有破坏博尔米达河上的桥梁而铸成大错。6月14日上午9时，他的先头部队遭到二万名奥军的攻击。两个师匆忙赶去营救，但被敌人的左翼包围，于是法军丢下了他们的大炮怆惶溃退。对他们来说侥幸的是，奥军左右两翼的师团，只注意他们的前面，而并沒有企图包围法军。波拿巴匆忙召回派去执行拦截任务的部队，但是只有布代的部队（五千人和五门炮）被德塞及时撤回。德塞集合起法军残部，从正面攻击前进中的奥军。直到这时，战局仍胜负未定，但当克勒曼率领四百名骑兵从侧面冲击奥军时，敌人惊慌失措，纷纷溃

99

散；而他们的左右两翼尚未遭到削弱，掩护了撤退。德塞死于混战中，但未被人发现。这正是波拿巴曾经想要获得的胜仗，它的确是一场令人赞叹的战役的顶峰；但是如果战斗象开始时那样打法，他本来会打败仗的；后来他煞费苦心地搞了关于这次战役的虚假报告，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蒙蔽了史学家。如果他失败了，部队也可以撤退出来，因为部队保留着一条退却的路线，但是这样一来，波拿巴的政治生涯无疑地将会从此告终。在战争中和在人生中一样（即使这人是天才），不能预见的因素所起的作用从未象这样明显地表现出来。奥军的失败也尚未陷入绝境，因为法军也疲惫不堪而且弹药缺乏。但是梅拉斯却沮丧万分。奈珀克伯爵说："看上去他的面容象他身体一样在颤动。"这位注定会赢得一些名声的伯爵，当时是被派去与"暴民"谈判的奥国军官之一。按照6月15日在亚历山大里亚签订的停战协定的规定，奥国人撤退到明乔河以东，这样就保住了托斯卡纳和罗马教皇国属地。

与此同时，莫罗在德意志缓慢前进。在对克尔发动了一次佯攻之后，他的部队于4月28日至5月1日在从布赖扎赫到沙夫豪森之间渡过了来因河。然后继续越过黑林山，向统帅法军右翼的勒古布将军的方向前进。这就化费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分散的兵力不能集中作战。只有莫罗带领着中路部队，能够支援勒古布。克赖措手不及，他也没有能够集合起自己的队伍，以便利用这种混乱局面。由于莫罗的士兵坚强刚毅，使他于5月3日在恩根和施托卡克，5月5日在默斯基尔克占了上风。他得以继续朝着伊勒河和福腊耳贝克前进，在克赖和他占领提罗耳的部队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后来克赖就退到乌尔姆。莫罗由于被抽调一万五千人到意大利去而力量遭到削弱。他只剩下了九万人来对付奥军的十四万人。因此他便机动迂回而不敢攻击克赖。最后于6月19日他在赫克施塔特强渡多瑙河，迫使奥军放弃乌尔姆向北撤退，然后又

折回到多瑙河，并且渡过河要占领伊扎尔防线，但是法军由于占领 100 了慕尼黑而击退了他们，使他们后退到因河。7月15日在帕尔斯多夫签订了停战协定。

自从6月16日以来，波拿巴已经再次写信给弗兰茨二世，邀请他举行和谈。但是这个建议的提出不是时候。6月20日，图古特与明托勋爵缔结了一项条约，条约规定，由英国人资助奥国，但以后者不单独签订和约为条件。为了赢得时间，奥国宫廷还是派了圣朱利安伯爵出使巴黎，非正式地探询和平条件。塔列朗的欺骗和波拿巴的威胁使得圣朱利安被迫签订了和约的一些初步条款，规定把整个来因河左岸割让给法国，奥国为此可以在意大利得到未加详细规定的补偿。圣朱利安一回到维也纳，签订的条款沒有得到承认，他本人并被捕入狱。同时，英国采取了有利于奥国的行动，声称准备参加和谈会议。在这种情况下图古特同意正式谈判。由于停战协定行将到期，波拿巴就利用这一机会要求全面停止战斗，并要求给他供应马耳他粮食和增援他在埃及部队的权利。格仑维尔终于拒绝了他的要求；而马耳他则于9月5日投降了。奥国为这种僵持的局面付出了代价，因为只有在奥国放弃菲利普斯堡、乌尔姆和英戈耳施塔特的条件下，波拿巴才同意了延长停战。与此同时，在维也纳，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即以得到那不勒斯的卡罗莉娜和皇后支持的图古特一方与查理大公一方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图古特拒绝承认由圣朱利安签订的协定，并且辞去了大臣的职务，而由路易·德·科本兹继任，他曾在圣彼得堡参加过对波兰最后两次瓜分谈判。尽管如此，由于科本兹亲自去吕内维尔参加谈判，图古特通过科洛雷多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影响。首先被波拿巴召到巴黎去的科本兹直到1800年11月5日才开始在吕内维尔同法国的代表约瑟夫·波拿巴谈判。然而吕内维尔的谈判毫无结果，因为第一执政对法国将在意大利作出的让步拒绝

明确表态。波拿巴在西沙尔平共和国、热那亚和皮埃蒙特一直在建树自己的势力。缪拉率领的第三后备军就在这些地方驻扎着。更有甚者是杜邦借口英国人在里窝那，而不惜破坏停战协定，占领了托斯卡纳。因此到停战协定满期时，冬季战役便开始了。

当时法国在意大利的兵力有十万人，但其中只有五万七千人是由布律纳将军统率。布律纳固守明乔河一线，与奥国的贝勒加德将军对峙，后者统帅的八万人分布在福腊耳贝克与波河之间。统率着第二后备军一万八千名士兵的麦克唐纳占领着瑞士的格劳宾登州，他越过施普鲁根山口攻入提罗耳时，就可以增强布律纳的左翼。在巴伐利亚，莫罗率领着一支九万五千人的队伍，奥军以十万人的兵力与之对抗。这支奥国军队名义上由年轻的约翰大公率领，而实际上由劳尔将军指挥。奥热罗率领着一万六千名法军和巴达维亚军队守在美因河上。把奥热罗、麦克唐纳、甚至缪拉的兵力与莫罗的部队联合起来全力进攻维也纳，这是很自然的部署，但是波拿巴打算由他自己在意大利来给予敌人以致命打击。

这场战役的解决比波拿巴所预料的要快得多。莫罗为了部署渡过因河，已把他的一些师团分布在沿河一带，手边只有六万人的军队；这时候劳尔带领六万五千人从右侧发起了攻击，巧妙地威胁安普芬法军的左翼。当两军相对时，莫罗赶忙集合起沿霍恩林登森林分布的一切可利用的兵力。战斗于12月3日在这里爆发了。奥军在通过森林时以独立的、互不联系的纵队前进，他们发觉自己不能从森林小路进入开阔地了。与此同时，德凯恩和里什庞斯迂回到奥军的左翼展开进攻。然后，里什庞斯从背后袭击奥军的中锋，使其溃散。奥军损失了一万二千人到一万五千人，大炮一百门。这次莫罗十分迅速地追击，追赶溃散之敌，俘获了二万五千人。奥国为了保住维也纳，于12月25日在希太尔签署了停战协定，并同意单独缔结和约。与此同时，麦克唐纳经过一场出色的山

地战斗之后到达阿迪杰河上游，而布律纳也最终能够发动攻势。然而，在布律纳的率领下，军队横渡明乔河配合得很差；正是由于敌军的指挥同样拙劣，才使得杜邦于12月5日在波佐罗免除了一场灾难。由于法军渡过了阿迪杰河和布兰塔河，1801年1月15日在特雷维佐签订的停战协定使奥国人撤回塔利亚曼托河后面。因此，结束了这场战争的是莫罗，也正因为如此，波拿巴永远不宽恕他。至于缪拉，他侵入了托斯卡纳和卢卡并把奥军逐出卢卡，还迫使那不勒斯人在福利尼奥签订了停战协定(2月18日)。

在吕内维尔，科本兹竭力抗拒波拿巴的要求，随着消息越来越坏，他才一步一步地屈服了。在同意以神圣罗马帝国的名义谈判并放弃曼图亚之后，他企图保住托斯卡纳。但是英国在这件事上无能为力，而且保罗一世已经明确地与英国断绝了关系，并向法国靠拢。1801年2月9日，和约终于完全象第一执政命令的那样签订了。神圣罗马帝国完全无条件地割让整个来因河左岸，只是把教会的土地分配给被剥夺了领地的各诸侯作为补偿。摩德纳公爵 102 得到布赖斯高，而托斯卡纳公爵也将在德意志得到补偿。法国人控制着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西沙尔平共和国扩展到阿迪杰河，合并了维罗纳和波利齐内；从皮埃蒙特夺来的诺瓦腊已经给了西沙尔平共和国，以便它打开辛普朗通道的路；最后从罗马教皇国夺来的属地也都并入了西沙尔平共和国。和约没有提到撒丁国王和那不勒斯国王，也没提到罗马教皇，这样就可以听任波拿巴随意处理他们。诚然，和约的确保证西沙尔平共和国、热那亚、荷兰和瑞士的独立，但是这一诺言又有什么价值呢？

对于关心意大利命运的人来说，不久就明白了。波拿巴已经重新改组西沙尔平共和国，首先给它成立了一个"谘询会议"，然后又实行了他自己创造的三头政治。在热那亚，他还建立了一个执政委员会。由于撒丁国王查理－埃曼努埃尔四世拒绝回都灵，波拿

巴就在都灵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俄国人与法国大使圣马桑就皮埃蒙特的前途问题的谈判——它完全是看在沙皇的面子上进行的——在保罗一世死后立即中断了。皮埃蒙特变成了法国的一个军管区，下面设郡，并与法国本土一样实行同一行政和财政制度。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四世于3月28日在佛罗伦萨签订了和约，按照和约的规定他撤离了罗马，割让了厄尔巴岛和皮昂比诺公国，同意对英国船只关闭他的港口，并且还答应法国派遣部队占领奥特朗托和布林的西，为期一年；这些部队可以从这两个港口乘船到埃及去。卢卡变成了一个共和国。而托斯卡纳则成为波拿巴对西班牙政策，甚至殖民地政策的一张王牌。1801年3月21日，阿兰胡埃斯条约把托斯卡纳大公国，作为伊特鲁利亚王国授与巴马公爵的儿子，他是西班牙王后的侄子，一位西班牙公主的丈夫。给与西班牙的这块地方是对它于1800年10月1日把路易斯安那交还给法国的补偿；① 而法国则应取得巴马，年迈的巴马公爵的确对这一交易置若罔闻，波拿巴搁下此事直到公爵死后才办。波拿巴的代表在意大利各地都享有很高的权威：布律纳在米兰，儒尔当在都灵，德让在热那亚，萨利切蒂在卢卡，克拉尔克在佛罗伦萨，莫罗·德·圣麦利在巴马，阿尔基埃在那不勒斯，缪拉在罗马——在这里，1800年2月在威尼斯举行的教皇选举会选出的罗马教皇庇护七世已接着在夏天即位。象半岛上其它王侯一样，教皇完全在拿破仑的控制之下。马伦哥战役和二百八十五年前的马利尼亚诺战役② 一样，将会在有利的情况下进行缔结教务专约的谈判。

---

① 路易斯安那原是法国从1699年起在密西西比河右岸侵占的殖民地，故以路易十四之名称其地，1762年在法、西联合反英战争中，为补偿西班牙殖民地的损失，法国把路易斯安那割让给西班牙。——译者

② 马利尼亚诺在米兰附近，1515年法国弗朗索瓦一世大败瑞士等国联军于此，在争夺意大利的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翌年，法国与教皇里奥十世在波伦亚签订有利于法国的教务专约。——译者

从一开始，波拿巴就象快刀斩乱麻一般，一举而解决了意大利这个疑难问题。他不是为了确定征服自然疆界的战果，并为巩固这个战果准备与奥地利言归于好，而是超越了法国的自然疆界。103 波拿巴既是西沙尔平共和国的创建者，如果不把它据为己有，对他个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但他远不是就此止步，他明确表示要把奥国赶出意大利；同时吕内维尔和约还为法国在德意志与奥国相争提供了法律根据。如果波拿巴坚持这些意向，则欧洲大陆的媾和只能是暂时的休战而已。

二、武装中立联盟与英国的危机

在夺去英国的盟国的同时，波拿巴也力图直接威胁英国。在保罗一世的协助下，他开始策划大陆国家反英联盟，这是以后在提尔西特成立的体系的雏形。

1800年期间，波拿巴开始改组海军的后方勤务和发展海军军备，特别在布勒斯特是如此。在吕内维尔条约签订之后，他建立布伦大营准备登陆英格兰。此事在英国即使没有引起英国政府不安，也立即引起公众舆论的惊慌情绪。1801年8月纳尔逊曾先后两次进攻由拉图什-特雷维尔率领的法国小舰队，但是遭到惨败。由于荷兰在海上已不能有所作为，波拿巴就对西班牙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他在意大利扩张自己的势力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更好地控制西班牙，因为波拿巴后来宣称，谁控制意大利，谁也就控制西班牙：这令人回忆起十八世纪和家族条约的政策①。然而那不勒斯的波旁王室没有参加恢复这一政策并不取决于波拿巴。但是，1802年出现的费迪南四世的儿子和一位西班牙公主、阿斯图里亚 104

① 指1761年（路易十五时）法国、西班牙和那不勒斯波旁王室之间为对抗英国而缔结的条约。——译者

斯亲王和那不勒斯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两桩婚事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希望。

不幸的是，波拿巴同督政府对西班牙持有同样的看法。他也同样鄙视这个有着异端裁判所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国王、王后和他们的宠臣戈多伊；在乌尔基霍于1800年12月13日失宠后，戈多伊通过塞瓦略斯①，恢复了对国事的控制。因此，波拿巴蔑视地对待他们。他相信这个王国是极为富有的，所以对它提出很多要求；它提供得迟缓就认为它是不情愿。同时，他的左右亲信也把西班牙视为掠夺的对象。塔列朗勒索了大量贿赂，与贝尔蒂埃分赃。他从不错过任何机会来表示他对查理四世的仇恨，而查理四世也从不掩饰对他的蔑视。乌弗拉尔也在期待着从西班牙获得巨富，他一直与埃尔巴斯保持着联系；此人是居住在巴黎的西班牙银行家，他的女儿嫁给了迪罗克。光靠西班牙舰队本身对抗英国是不行的，由海军上将格拉维纳率领的主要舰队仍然停泊在布勒斯特。然而，在西班牙的那边，英国的"采邑"葡萄牙是脆弱的。吕西安·波拿巴被派往马德里去说服西班牙人进行联合远征。这件事结果成为一场真正的喜剧。心抱怀疑的戈多伊没有等待法国军队。他在1801年5月16日占领了奥利范萨要塞，5月18日围攻埃尔瓦什。在结束了这场"橘林之战"以后，他立即着手签订和约。和约的条件是由葡萄牙割让奥利范萨省，并答应给西班牙一千五百万法郎赔款。吕西安曾参与其事，他带着大批战利品回到巴黎。塔列朗也伸手捞一把，因为他已被葡萄牙收买，并且曾是改嫁给葡萄牙大使的弗拉奥夫人的情人。甚至英国也准备必要时占领巴西而从这一局势中牟利。英国拒绝给若奥亲王——他以他的疯癫的母亲的名义做了葡萄牙的摄政王——和他的大臣科蒂尼奥提供军事援助，只是劝他们为避免国土沦陷而求和。多方的愚弄激怒了

① 戈多伊的侄子，当时被任为国务大臣。——译者

波拿巴，但是恼怒毫无用处，他除了把赔款数字提高到二千万法郎外别无他计可施。

波拿巴得到的援助主要来自日益敌视英国的保罗一世；同时也来自追随俄国的榜样的中立国。同督政府的政策相比，波拿巴对中立国家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节制，这种节制令人难以预测到大陆封锁。从12月开始，他就废除了他的前任的过激措施，恢复了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法国所采取的态度；此外，他在有关海上捕获品的裁判权方面也做了某些变动。美国使节很快到达了法国。他们是 105 亚当斯总统为急欲避免战争而同意派出的。既然法国承认除战时禁制品外，中立国旗可保护敌货的原则，所以双方很容易达成协议，并于1800年9月30日在莫尔丰塔尼缔结了一项条约。美国人尤其切望波拿巴不再坚持1778年的联盟，这样他们就可以遵循华盛顿一贯叮嘱他们的孤立(不卷入)政策。波拿巴的态度使得英国的态度在斯堪的那维亚人、普鲁士人和俄国人看起来更令人生气。此外，保罗一世越来越担心马耳他的命运。他于8月29日宣布对英国所有船舶的封港令，当他听到马耳他岛已经失陷时又重申了这一禁令；此外，格伦维尔于10月17日决定保有马耳他。最后瑞典和丹麦追随俄国并于12月16日同俄国一起组成了保护中立国贸易联盟。普鲁士于12月18日参加了这个联盟。这样英国就从波罗的海被排斥出去；在防止法国占领的借口下，丹麦人占领了汉堡，普鲁士占领了汉诺威。这样就有效地阻止了英国在德意志各河流和汉撒各城市的贸易。而德意志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却是英国的两个主要市场。

波拿巴殷切地希望保罗一世的反英步骤不会到此为止，并且希望一个法俄联盟将正式联合欧洲大陆来对抗英国。从1800年7月起，他就提出把法国扣留的俄国战俘交还给沙皇，不是作为交换，因为俄国人没有扣留法国战俘。为此目的，斯普连格波尔琴被

派往法国。12月在波拿巴和保罗之间同时交换了一些友好信件；前者命令中止对俄国船只的敌对行动，后者驱逐了路易十八。然后在1801年3月科利切夫被派往巴黎签订和约并商讨成立联盟的条件。保罗激烈反对英国，他决定要远征印度，并派出哥萨克骑兵先锋队向中亚草原进军。尽管如此，他还是无意放弃他已经到手或可能攫取的利益。罗斯托普钦向他呈递了一个重新安排欧洲的计划：俄国和奥国瓜分土耳其帝国，并且创建一个置于俄国保护之下的领土辽阔的希腊国。保罗一世仍然垂涎马耳他；他期望法军撤出那不勒斯王国，并且恢复撒丁国王的王位；他还保持着对德意志的保护权①。可是波拿巴既然已经拒绝把意大利交给奥国（这样做将会保证和平），也不会把它让给俄国的。他也更不准备把"土耳其大皇帝"交给俄国控制。那么波拿巴不给俄国任何好处，又怎样能争取到俄国呢？何况事实上科利切夫同稍后在7月接替他的马尔科夫一样，不仅是保罗一世的、而且也是仍然非常敌视法国的俄国贵族的顽固代表，他把保护意大利各王侯的利益视为一个荣誉问题。波拿巴必须作出抉择。但是就英国而论，前途依然非常危险。

106

英国的工业遭受了1799年危机的打击，这一年的收获又造成饥馑：1800年至1802年间英国进口了将近三百五十万夸特的小麦；在这种情况下，武装中立联盟所给予它的打击就更加沉重。波罗的海航运的中止引起了谷物市场的恐慌，1801年4月25日，每夸特小麦涨价到一百五十一先令。一磅面包的价格高达五辨士以上，相当于七个法国苏。虽然议会针对这类情况发布法令采取了通常所采取的措施，可是到处发生了骚动；因为人们认为谷物涨价应

① 俄国对德意志的保护权是根据1779年的特欣条约而来的。这个条约结束1778年的普奥战争，并确认了过去德意志各邦间签订的一系列和约。俄国因调停普、奥战争而被缔约各方承认为条约保证国之一，从此取得干预德意志的权利。——译者

归罪于投机买卖，而实际上是农民联合起来维持高价。那些诸如号召“面包或血”的威胁性的标语，被认为是雅各宾主义和法国宣传的产物，激怒了公共舆论。与此同时，财政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形势：1801 年黄金升值百分之九，白银升值百分之十七；英格兰银行的现金储备再次减少到四百五十万英镑；对盟国的补助金（五百六十万英镑）连同维持驻防军的费用（二百八十万英镑），以及购买粮食的款项共达二千三百三十万英镑。这笔钱于 1800 年和 1801 年流入大陆。1801 年，英镑在西班牙的外汇损失了几乎百分之十六，在汉堡损失了百分之十三。但是不论是贵族还是商人都不赞成提高所得税。在这些情况下，如同 1797 年一样，和平很快又变成了人民普遍的要求，福克斯则利用了这一点。1800 年 10 月 9 日格伦维尔的兄弟写道：“面包的缺乏和由此引起的穷人的困苦如果继续下去的话，我相信，它会迫使你——不管愿意与否——要与法国讲和。”《每月杂志》指出，“既然那种要饿死法国国民的人道的和值得称赞的政策不能实现，也许试图用媾和来防止我国人民饿死可能是善策。”

皮特和格伦维尔对是否应与法国议和举棋不定，然而一个内政事件却使他们幸免蒙受被迫求和之辱。合并爱尔兰既已实现，英国政府就应兑现默许天主教徒的废除“宣誓条例”的诺言。然而 9 月 30 日，大法官拉夫巴勒宣称反对取消“宣誓条例”；他的意见在全体新教徒中立即赢得共鸣，而且国王也公开宣称他持有同样的意见。内阁为此争端而陷于分裂，皮特于 1801 年 2 月 5 日提出辞呈。国王那时召见了阿丁顿，让这样一个平庸的人组织政府，以保证自己在处理政务中有更多的影响。这些麻烦引起乔治三世的疯癫症复发。但是很快就复原了，他把发病归咎于皮特。急欲恢复自己职位的皮特厚颜无耻地答应，国王在世期间永不再提及天主教问题。可是，格伦维尔拒绝收回原来的承诺；而且，由于阿 107

丁顿不愿意让位，皮特于3月14日被迫辞职。可以想像，皮特下台虽然不无耿耿，但当时的形势，使他未尝不稍感宽慰。新任外交大臣霍克斯伯里2月21日就向法国提出了开始和平谈判的建议。阿丁顿政府是由于皮特的容忍才得以继续存在，它的政策，包括亚眠和约的签订，都得到了皮特的赞成。据认为，皮特看到和平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乐得逃避签订和约的责任。

霍克斯伯里和塔列朗的谈判立即在埃及问题上发生了冲突。他不反对让法国人呆在那里；他甚至发出了召回开往埃及的远征军的命令，然而这一命令到达得太迟了。但他想要保留英国的大部分征服地做为补偿，而塔列朗却不动声色地只同意交出印度；实际上，英国的建议只是助长了波拿巴指望联合俄国以摧毁英国的希望。而另一方面，阿丁顿虽然决心谈判，但却期望着产生一种较好的结果，说不定缔约的过程会对英国产生有利的结果。果然这种拖延策略有利于英国。

三、亚眠和约(1802年3月25日)

几乎同时发生的两个事件打破了大陆联合的迷梦。1801年3月23日夜间，保罗一世被暗杀。这个事件的发生并不意外。因为与英国的绝交会使俄国贵族失去他们出售粮食和木材的市场，所以，保罗一世的残暴和变幻无常的性格威胁着所有的官员，已被他这种性格所激怒的俄国贵族才被迫采取了这一行动。这一阴谋是由潘宁、帕伦与亚历山大共同策划的。皇太子似乎曾提出要求：不要伤害他父亲的生命。后来他表现很悲伤，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幻想是十分天真的。亚历山大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谋求与英国和解。

108

但是，同月28日，以帕克为司令、纳尔逊为副司令的舰队开进

松德海峡①。哥本哈根遭到炮击，丹麦舰队遭受严重破坏。于是，丹麦缔结了停战协定，并且在获悉沙皇死后，于5月28日签订了和约；瑞典也已于5月18日签订了和约。6月17日亚历山大也采取了同样的步骤。这样，第二次武装中立联盟就结束了；它于冬季成立，虽未使英国受到很大物质损失，但它确实给人们留下了不能立即忘却的印象。波拿巴唯一可做的事情只能是与俄国和好。10月8日，亚历山大正式同意恢复和平。他获得了对他父亲在地中海和土耳其开创的局面的承认：在地中海，他保留了对爱奥尼亚群岛的保护权和在科孚岛的驻军；在土耳其，波拿巴承认他为土耳其苏丹的调停人。法国也同意在埃及问题解决之后撤出那不勒斯，并且同意以符合形势要求的尊重态度对待撒丁国王。最后，德意志问题还要通过共同协商来解决。总之，波拿巴几乎把从保罗手里诈取来的一切都让给了亚历山大，并且，除了换取到一项和约之外，他毫无所得。对波拿巴来说这是一个惨痛的失败。

在埃及的冒险得到的又是一个失败。离开埃及时波拿巴任命克莱贝尔将军继任。后者决定一俟撤退协定签字，他将继波拿巴之后尽快返回法国。克莱贝尔同率领土耳其军队从叙利亚前来的优素福宰相以及英国的西德尼·史密斯于1800年1月24日在阿里什会晤，并达成了一项协定。但是英国舰队司令基思拒绝承认这一协定。克莱贝尔于3月20日在希里奥波里斯彻底击溃了土耳其军队。不幸的是，克莱贝尔于6月14日被暗害。他的继任者梅努将军没有威信，他改信伊斯兰教也未能提高他的威望。他经常和部下争吵，并让士兵评理。为了尽力挽救这支军队，波拿巴派冈托姆率领的舰队增援梅努。这支舰队于1801年1月23日从布勒斯特启航，它是几乎不会遭遇敌人的攻击的，但却胆怯地驶进了土 109

① 即厄勒海峡，在瑞典和丹麦西兰岛之间，是波罗的海出北海必经的通道。——译者

伦港。当舰队于3月底重新启航时，英国远征军已经在埃及登陆，冈托姆就退却了。4月底他又出航，试图使他的援军在的黎波里登陆，那里的帕夏已经同意签订一项条约，但是因为阿拉伯人持反对态度，以致谈判失败。当时埃及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在马耳他被攻占后不久，邓达斯就已命令准备派艾伯克龙比指挥的远征军开赴埃及。这支远征军于3月6日登陆，3月21日在卡诺普击退了梅努的进攻。由于波帕姆的舰队控制着红海，韦尔斯利派来的六千名印度士兵到达了库赛尔；与此同时，二万五千名土耳其军队取道苏伊士地峡进击。6月28日开罗投降，8月30日亚历山大港被英军攻陷。

七月末，当第二次武装中立联盟解体、波拿巴图谋进攻葡萄牙失败后，他提出了新的和平建议。根据这个建议，交战各国要相互归还各自的征服地。但唯一例外的是荷兰将会失去锡兰，并开放好望角作为国际贸易通道。总之，法国愿交出埃及，对于埃及的归属，波拿巴虽然故作镇定，但是埃及的丢失已成定局；而另一方面，法国将保留它在大陆上的全部征服地。英国要放弃马耳他、梅诺卡、厄尔巴、特立尼达、法属安的列斯群岛，实际上还要放弃埃及，而只保留锡兰。虽然英国已经又处于有利地位，这个不平等的建议足以使它感到不满，但除锡兰外它只是提出保留特立尼达的额外要求。它仍然很注意要搞好同亚历山大的关系，所以，并未提出反对归还马耳他，虽然英国只要提出给那不勒斯和撒丁以保证就能讨好亚历山大。然而，它并未为此目的而作出努力。霍克斯伯里只是在关于荷兰问题上试图得到保证，并且要求一个强国为马耳他提供驻防部队，这样，这一强国就会成为马耳他中立的保证国。这个极好机会使法国可以提名俄国为保证国，并使俄国与英国恢复竞争。但波拿巴对此机会并未予以重视。当他威胁说如果不在这些110 预备条款上签字就要中断谈判时，霍克斯伯里于1801年10月1日

让步了，甚至沒有为奥伦治公爵要求补偿，或要求签订通商条约。

人们曾把这种投降解释成是由于阿丁顿内阁的无能所致，但这一理由很不充分。实际上，英国政府仍旧处在危机的压力之下，这次危机在这一年的头几个月就出现了，现在全国各地仍然感到它的影响。这个政府无论如何需要实行节约，并且指望和平可以恢复繁荣。公众听到和平消息所反映出来的欢欣鼓舞表明要求和平是压倒一切的意见。然而在议会和新闻界却提出了抗议和保留意见。温德姆大声疾呼反对这一"致命的条约"，他认为这是个"亡国判决书"，这一条约将会使波拿巴得以进行新的征服。阿丁顿反驳说，既然暂时不可能组织新的反法同盟，最好还是试行一种和平政策；而心满意足的法国或许会关心这一政策。反之，如果法国不信守和约，英国总会再找到盟国的。卡斯尔雷在一封信中表示了同样的意见。皮特赞成政府这一政策，他于11月3日提出令人吃惊的解释说：特立尼达要比马耳他具有更大的经济利益，而保留马耳他就不可能恢复和平；在他看来，锡兰似乎比好望角更可取。他十分重视特立尼达，因为那里生产糖并且是与西属美洲进行走私贸易的重要基地。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出重商主义观点对于战争目的的影响，这种观点一直支配着英国寡头统治的政策。对英国而言，和平不只是一次休战，而且是商人的一次试验。

不久，明眼人就看出，获得持久和平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波拿巴在向圣多明各派遣军队（1801年12月）；1月他就成了改名为"意大利共和国"的西沙尔平共和国总统。在讨论条约最后文本时，波拿巴拒绝在条约内列入一项贸易协定，而要求某些殖民地的特权，要求开放印度自由贸易以及在福克兰群岛的停泊站。这些要求虽然被拒绝了，但却引起了很大的注意。然而阿丁顿仍然坚持他的方针。可以肯定，后来在亚眠的谈判中，英国利益因为英国政府及其代表康华里的无能而再次受到损害。康华里是一个诚实

的人，一名勇敢的军人，但却是一位不高明的外交官。为换取和平而付出代价的法国各盟国，特别是巴达维亚共和国的席梅尔佩宁克，是会乐于支持康华里的，但是直到这些盟国同意初步条款之后，波拿巴才准许他们参加会谈。

111 会谈中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法国的征服地和马耳他问题上。波拿巴要英国承认那些新成立的共和国，英国也愿意承认，条件是他对撒丁国王做“一些让步”。由于在这个问题上一无所得，英国就拒绝了。波拿巴随后宣称：如果“英国的贸易因此而受到损失”，如果这些国家之一想要“与某个主要大陆强国”合并的话，英国就没有理由表示不满。这是一个不祥之兆！至于马耳他，英国接受了塔列朗建议的列强集体保证，然而拒绝同意拆除其防御工事，主张这个岛应由那不勒斯派出驻军，直到重组的圣约翰骑士团能获得足够的力量保持这个岛的独立为止。既然从英国人手中夺得马耳他，波拿巴看到成功已成定局。但是，交出马耳他所附加的条件很多，英国人其实也没有理由感到十分不满，并且他们还等待着事态的发展。英国政府训令康华里坚持其余两点：第一，割让多巴哥作为维持法国战俘费用的补偿；第二，赔偿奥伦治亲王。可是，波拿巴坚决拒绝放弃任何法国领土；至于“奥伦治-纳骚”家族，他说，有关赔偿的谈判正在柏林进行。这个家族的继承者，第一执政的伟大赞美者，表示愿意直接与波拿巴交涉，于是便离开了英国。这样康华里就于 1802 年 3 月 25 日签署了和约。

英国公众舆论虽然比以前有些淡漠，但还是满意的；这个岛国许多居民成群结队奔往法国，想对一个为许多重大事件所改变了的，并被这样一位非凡的人物统治着的国家进行一番好奇的考察。虽然政界的批评日益增多，但议会此次仍然跟着政府走。

作为民族领袖，波拿巴在签订亚眠和约时已经达到他的命运的顶峰。欧洲已同意放下武器，不再反对他对自然疆界的要求。

但是他那种一遇机会就一发不可收拾的权力欲，未能使他对这样的成就感到满足；而法国在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时，如果只关注自己的民族传统和民族利益，它本来会对这些成就感到满意的。波拿巴如果停止干扰英国在海上和殖民地的事业，同意对英国贸易重新开放法国市场，并且满足于对其邻国施加他力所能及的、而又为法国疆界安全所需要的合法的影响的话，那末法国将一无所失。112 然而，甚至在亚眠和约缔结以前，波拿巴就已表明，他并不是这样理解问题的。

四、附庸各国的改革

实际上，法国在没有确实肯定这些屏障其疆界并被它占领的国家能自卫和自治的情况下，是不能够听其自然，不加过问的。现在，在法国使得这些国家实行了政治的和社会的变革之后，它们就难于靠自己的力量建成国家了。在许多附庸共和国中，拥护强大中央政府的联合派在政府组织的原则问题上就不能同联邦派意见一致。荷兰的情况是如此。西沙尔平共和国也是如此：奥罗纳郡的居民，也就是梅尔齐伯爵统治下的米兰人与波河南部各邦的居民，即由阿尔迪尼领导的艾米利亚人经常争吵。瑞士的情况就更加如此，各州都一直念念不忘丧失了的自治地位。

显得更严重的是社会冲突。雅各宾民主派变得十分活跃，他们在自己的俱乐部里慷慨陈词，任意嘲弄贵族和教士。他们虽然只不过是少数，但却是法国人最好的朋友，他们求助于法国人，并且非常乐于按照法国人的意愿行事。象荷兰的席梅尔佩宁克、瑞士的厄斯特里和伦格尔、热那亚的科尔韦托等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及那些象西沙尔平共和国梅尔齐·戴里尔那样归附新政府的贵族，都在不同程度上热情赞成统一和新的社会制度；但是

他们反对民主，并且希望象在执政府时期的法国那样，确保新贵名流占有优越的地位。然而他们在是否赞成共和八年宪法取消选举制度的正规运用这一点上，看法并不总是一致的，特别是在瑞士是这样。虽然他们感到需要依赖法国，他们也不是那么顺从的。在荷兰和瑞士，他们要求法国维护他们国家的完整；在各地人们都希望法国撤兵，希望独立，至于贵族阶级，他们盼望着法国战败，以便旧制度复辟；为达此目的，他们会毫无顾忌地把自己的国家交给其它外国人。可是由于法国人在那里，所以他们便只好充当爱国者的角色。只要波拿巴不干涉他们，他们就愿意顺从。

除这种党派斗争外，预算上的困难也使得政府无法正常地维持下去。战费和占领费的负担从一开始就使财政遭到破坏，经济陷于瘫痪。拥有四百万居民的西沙尔平共和国向法军交付了三千三百万法郎，并为法军提供了估计总值为一亿六千万法郎的军需品。此外，军队也随意为自己征收附加捐税，将领们，特别是缪拉，对本地政府专横跋扈。象驻在荷兰的塞蒙维尔那样的文官们，同样也不是廉洁的。法国文武官员都干预地方政治，并且根据自己偏爱支持这一派或那一派。因此来自各方的请愿者都要求波拿巴按照他们的意愿来改组国家，或者要求减轻他们的负担并惩办他自己的部下。波拿巴象在法国一样可以任意对待这些派别：他憎恨民主派，不信任那些对法国保持强烈独立性的温和派，也不想重建贵族统治。只要尚未同仍然希望收回他的属地的罗马教皇缔结教务专约，只要与英国的战争仍在继续，波拿巴就要持保留态度，而在这一点上他万无一失。因为这些国家形势越坏，他的事情也就越好办；而且，只要占领继续下去，他的军队就不需要他拿出费用。只是在恢复海上和平的初步条款签订之后，情况才开始变化。

在荷兰出现了一些反抗现象，那里的法国代表塞蒙维尔经荷兰的督政府同意起草了一部宪法，以便使政权掌握在可靠的人手

里。他依仗自己的权势把这部宪法提交公民批准，但立法议会取消了这些不合法的决定。奥热罗解散了议会两院，宪法就提交给公民投票表决。由于宣布弃权就被视作为赞成的表示，结果获得了多数票。宪法于1801年10月6日颁布。由宪法产生了一个拥有立法创议权和行政权，包括对官员的任命权的"政务会议"(即摄政会议)，还产生了一个立法院，它的成员经过两级选举产生，每年更换三分之一。事实上，督政府亲自指定了十二名政务官中的七名，其余的则由这七人互选产生；它还遴选了立法院的成员。正象波拿巴所希望的那样，新政府由各派别混合组成，但是清除了民主派、并把所有的官职授予新贵名流。 114

在波拿巴想亲自统治的意大利，改革工作花的时间较长一些。1801年7月间，西沙尔平共和国派遣代表团到巴黎，诉说了国内难以容忍的形势。10月，大家同意在里昂召开一个"协商会议"，以期建立一个新政府。这个"协商会议"由当然委员①、政府选拔的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代表，以及由法院、商会、大学、郡政府和市政机关选出的代表组成；这些人都是在缪拉的密切监视下选出来的。1801年12月29日，四百四十二名代表在里昂会合。塔列朗在会议前夕到达，他把代表们按地区分成几个组，来研究宪法草案并拟出"可以信赖的候选人名单"，从名单中再选出新人员。他煽起了地方主义的冲突，以便由波拿巴出面裁断。波拿巴于1802年1月11日到会，同往常一样亲自调查情况，并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他考虑要把西沙尔平共和国总统职位交给约瑟夫，但是这个重要人物拒绝了，因为波拿巴没有把皮埃蒙特一并交给他。1月21日负责选举总统的委员会选出了梅尔齐伯爵和阿尔迪尼伯爵，但是他们两人也都拒绝了。1月24日，总统职位交与波拿巴，他就接受了，并任命梅尔齐为副总统。两天以后，他把"西沙尔平共和国"

① 指因职位当然有权出席的人，如政府成员、议员等——译者

改名为“意大利共和国”,这样就激起了人们的巨大的希望。新政府定于1802年2月9日成立。行政当局象在巴黎那样行使特权;它包括一名国务秘书和各部部长。此外，总统还亲自从三个选举人团提名的候选人中指派立法议会的成员。但是这一次，当然是波拿巴亲自建立了立法议会和选举人团。最后，还给意大利共和国建立了一个叫作“国务协商会议”的独创机构。这是个永久性的机构，负责处理外交及国家安全等事宜。在热那亚，1802年6月颁布了由萨利切蒂于1801年10月起草的宪法。在那里波拿巴任命了元老院的成员和一个“总领政”,二者构成行政权力机构。本应由三个选举人团选举的咨议院从未组成过。卢卡于12月28日成立了类似的机构。

115

黑尔维谢共和国的历史更是动乱不安。1799年11月间，拉阿尔普向他的同僚建议发动政变，没有得到他们的赞同。得到消息的立法议会予以回击，在1800年1月7日宣告解散督政府，把权力委托给一个执行委员会，多尔德在其中起着支配作用。这个委员会很快地也和议会发生了争执，并要求波拿巴解决。1800年8月7日，被法军包围的议会投降了，并由议会成员组成临时政府负责准备一部新宪法。这一政变是由温和的联合派搞的，他们赞成单一制国家，更重要的是，他们都鼓吹由新贵名流来统治。他们反对雅各宾派，寻求旧贵族的支持，宣布暂时中止实行关于废除什一税、地租和封建赋税的法律，然后又宣布废除这个法律，只保留农民可以出钱赎买这些封建义务的权利。1801年1月，这些温和派制订了一个更具有单一制特点的宪法草案;根据这个草案，政权各机构的成员要通过互选产生。由于他们坚持要求把伐累和巴塞尔主教邦归并瑞士，法国政府代表雷因哈尔建议，在贵族的支持下煽起一次新的革命。波拿巴没有批准这个建议。他完全拒绝了这个宪法草案，并在1801年4月29日提出了一个被称为“马尔梅

松条例”的草案来代替原来的宪法草案。这个条例是后来的“调停条例”的雏形。波拿巴感到联邦主义在瑞士非常根深蒂固，因此不得不给予各州一大部分的主权。不过，大概是由于波拿巴有意从瑞士撤军以便从它的中立中获得好处，因此他不赞成有一个实行中央集权的单一制的瑞士，因为这样会使这个国家变得过于强大。依照“马尔梅松条例”的规定，给予十七个州相当大的自治权，并允许它们制定自己的宪法，条件是要规定有财产资格的选举权。联邦议会选出一个二十五名成员的元老院，他们再在自己中间选出两名“首席长官”，一名主持元老院，另一名与其它四名元老院议员一起组成一个小委员会，行使行政权。中央联邦当局保持着广泛的权力，特别是有任命各州行政长官的权力。

这样的解决没有使任何人满意。联合派在议会中确保多数，把要脱离中央的联邦派从元老院中排除出去，并拒绝执行马尔梅松条例，而通过了一部新宪法，他们甚至公然对抗波拿巴，把伐累的议员拉进他们的圈圈。1801 年 10 月 28 日，法国的代表韦尔尼纳克和舒万·德·蒙舒瓦齐将军宣布解散议会，并建立了一个由贵族中最有才干的人物雷丁领导的临时政府。雷丁清洗了行政机构、压制了出版自由、大赦亡命者、取消了土地税，并重新开放了隐修道院。波拿巴拒绝承认他，要他给温和派以地位，这就在会议中掀起了不和。雷丁的巴黎之行一无所得，于 1802 年 2 月 26 日凭借自己作为首脑的职权颁布一部新宪法。可是在复活节休假期间，韦尔尼纳克趁雷丁不在的机会，策动雷丁的政敌废除了这部宪法。接着召集名流会议，议员最后于 1802 年 5 月 29 日承认了马尔梅松条例，并且任命了多尔德为“首席长官”。伐累州被建成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而普斯河谷则割让给法国。 116

这些变化与法国发生的变化有着明显的联系。共和八年宪法到处都在激励着新贵名流以差不多同样的方式夺取了权力。行政

权在各地都得到了加强，从而有助于建立秩序和稳定局势。在各地，波拿巴都要求撇开民主派，并要求努力使温和派与善意的贵族和解。但是，在意大利，波拿巴把自己看作主人而不是仲裁者，他透露了他的秘密的偏爱，这是他在法国所从不敢公开表示的，更不用说在荷兰或瑞士；在那些国家里他还要保持真正的选举，以待将来再改。在意大利的宪法中，选举人团决不是在投票的基础上，甚至不是在只限于财产资格投票的基础上产生，而完全是由职业团体产生的：第一个团体包括一定数量的土地所有者，第二个团体包括商人和工厂主，第三个团体由各自由职业成员组成。前两个选举人团由他们的成员互选补充；显然是具有“空论”倾向嫌疑的第三个选举人团只限于向政府提出候选人名单。现在只差一步就告成了：这就是直截了当地由国家元首任命选举人团成员。

就事论事，毗邻法国的这些国家的改革本来丝毫没有引起欧洲不安的理由。相反地，人们希望，在使得这些国家能够自己治理自己以后，法国会召回它的军队，并给这些国家以独立，这是法国在吕内维尔和约中——其实没有确定具体细节——已经答应过它们的。事实上，波拿巴于1802年7月的确下令从瑞士撤军；他也同意减少在荷兰的驻军，奥伦治亲王在5月24日已放弃了他的权利要求，他提出把德意志的富耳达和科韦割让给他的儿子作为交换条件。不管怎样，这足以被认为是一个未来撤军的希望。在意大利共和国，梅尔齐希望迟早能得到同样的好处，因为波拿巴亲任总统只不过是暂时的。今天在我们看来，这些纯粹是幻想。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幻想，阿丁顿和皮特同意冒险一试的道路就会缺乏存在的理由。

第三章　波拿巴就任终身执政　118

胜利与和平已使波拿巴成了一位民族英雄；他利用了这一时机更加增强自己的权力，并继续推行个人的政策。正因为对他的功绩感到满意，全国才愿意跟他走；但是，正当和平的局面有利于恢复自由的时刻，他却加强了独裁统治，因此全国不免出现遗憾和焦虑不安的情绪。无论如何，反抗增加了，只有依靠重新使用武力，波拿巴才能够镇压这些反抗。

一、共和九年的危机

波拿巴出发去意大利之后，法国全国上下忧心忡忡。他的战败可能会引起外国军队的入侵，而且肯定会引起新的骚乱，因为从共和七年收获季节以来面包价格再度上涨；在图卢兹一次骚动期间，群众强迫限制粮价。在巴黎交易所，价格正在跌落。马伦哥战役胜利的消息象魔术般地使舆论又平息下来，同时使波拿巴的威望扶摇直上。波拿巴重视报纸的威力并善于利用新闻工作，他从来沒有放松过为自己制造舆论。在他的心目中，自豪和抱负会自然　119
地把眞相变成传说。他出版了一份《后备军通报》，这份通报和《政府通报》及其它半官方的报纸都把整个战役的荣誉归之于他个人。莫罗在霍恩林登战役获胜的消息来得太迟了，不能减弱波拿巴的威望；除此之外，他还想方设法压制这次战役胜利的影响。由于运气比天才更能迷惑人，并使人产生某种迷信的敬畏，所以，倘若人们知道了马伦哥战役的眞相的话，波拿巴的名声必定会更加响亮。

马伦哥的赌博并没有减低那个曾两次奇迹般地逃过了英国巡洋舰的人的声望。

与此同时，波拿巴在听到他不在法国期间的议论和正在策划的阴谋之后就赶紧返回巴黎。1800年7月2日，他进了巴黎城。内心忿懑不平，非常怨恨他的左右亲信，对那些曾想伺机取代他的将军们充满敌意的猜疑；而现在紧张的努力松弛下来，危险已成过去，这次冒险的悲剧性一面使他深深感到自己的地位是如何脆弱，因此他又充满着浪漫主义情调的感伤。但是，类似的感想从来只能使他心情郁郁而意志更坚。他毫不迟疑地利用了他的政敌陷入一片混乱的时机。

保王党立刻土崩瓦解。他们发动叛乱的种种准备，只剩下了几伙盗匪。威克姆溜回到英国，设在奥格斯堡的王党机关作鸟兽散；该机关某些成员妄图在拜罗伊特重新纠集起来，但是富歇命令普鲁士警察把他们逮捕入狱。英国中断了对它所雇佣的孔德亲王军队的资助，并且解散了这个队伍。1800年9月7日，波拿巴终于答复了路易十八："您不应该再期望回到法国来，如果您要回来，就非踏过十万死尸不可。"这位国王从米塔瓦被驱逐之后，躲在华沙，后来又从华沙到了英国。波拿巴和保王党之间彻底决裂了。

共和派也很清楚，波拿巴的胜利会给他们钉上枷锁。在波拿巴的左右亲信中，有许多曾盼望他阵亡或垮台的人，现在他们变得更加热切地向他建议，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必须重建世袭君主政体，以使他的权位具有原先缺乏的稳定性。他们之中最积极的是罗德雷和斐扬派，这些人虽然已经归附了共和国，但是他们骨子里还是君主主义者。塔列朗自然是支持他们的。一贯狂妄的吕西

120 安·波拿巴抛出了一本题为《恺撒、克伦威尔与波拿巴之间的对比》的小册子，首先说出了其它人不敢说的话。这本小册子可能是他叫丰塔内写的。第一执政一回到法国就指派丰塔内在华盛顿逝

世时发表一篇悼辞，他从此官运亨通，更不必提他已是埃利兹·波拿巴的情夫了。但是，所有这类活动都遭到了反对。富歇虽然同各界各派都有联系，甚至在圣热尔曼郊区也因他的秘密效劳而博得好感，但他仍被看成是一个左派的领袖。这不是没有充分理由的。的确，他是一个对人不抱任何幻想的怀疑论者，爱钱贪权，总是首先为自己打算。但是他留恋自己革命历史的程度比人们想像的要大得多。首先，他生活朴素，平易近人，精力旺盛而又沉着果断；他对恐怖镇压的爱好，虽然是审慎而有节制的，但却也是非常自然地适应他那警务部长职务的需要的。其次，他真诚地愿意尽其力所能及拯救法国革命的成果、并且阻止旧贵族重掌国家大政。最后，特别是他具有一种炽热性格，隐藏在恬静外貌下面，这种外貌掩护住他好讥评时政的习惯，尖酸刻薄的谈吐，和对充当国民公会特派员时期的眷恋，当时他也曾以至高无上的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波拿巴重视他的才能，但却对他心怀疑惧，他始终感到，富歇随时可能会闹独立性。在1804年以前，富歇对那些君主政体的计划都一直持敌视态度。他在波拿巴的家族中找到了支持。没有生下子嗣的约瑟芬担心世袭的王位继承制会导致离婚。波拿巴对自己家族的贪得无厌很不满；如果情况迫使他从自己的兄弟中间挑选继承人的话，他准备迎接一场大风暴。此外，他也不打算勉强从事，并且认为，这时有关君主政体的种种谈论都为时过早：和约还未缔结，国家的改革尚待完成，最后，议会各院还没有驯服。因此吕西安遭到贬黜，他的内政部长职务移交给夏普塔尔，而他受命出任大使。

尽管如此，波拿巴仍然在伺机增强自己的权力。几起谋反案给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这仍然是马伦哥战役胜利的一个后果：那次战役之后，雅各宾派和保王党失去了一切希望，其中有些亡命之徒试图采取暗杀手段。从共和八年底及其后不久，相继破

获了三起雅各宾派的阴谋：9月14日，逮捕了三个人；接着又在10月10日逮捕了阿雷纳、托皮诺-勒布伦和其他二人；最后，在11月8日，又逮捕了谢瓦利埃和一名共谋嫌疑犯。这些阴谋眞实与

121 否却一直是成问题的。第二起阴谋似乎是背着富歇破获的，富歇觉察到自己处境危险，于是就大事宣扬第三起阴谋。正当政府在制定一项放逐雅各宾派的计划时，保王党粉墨登场了，这就大大地方便了这项工作的进行。6月卡杜达尔从布列塔尼派了几个舒安分子到巴黎去组织一次运动。跟踪他们的警察只逮捕到其中某个马尔加德尔的小贵族，幷把他枪毙了。圣雷让、利莫埃朗和卡邦三名阴谋分子竟制造了一颗定时炸弹。12月24日晚，在波拿巴到歌剧院途中，这颗炸弹在圣尼凯斯大街爆炸了，当时有二十二人死亡，五十六人受伤，但是波拿巴却安然无恙。在当时的舆论中，人们自然只能一致认为"此事是雅各宾派干的"。日益接近帝位的波拿巴尤其痛恨这些"弑君者"，他似乎也是这样认为的。12月25日，当议会各院祝贺他幸免于难时，他高声怒咒"那些败坏共和国声誉、幷用各种过激手段，特别是他们在九月事件中①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用类似的手段来毁坏自由事业的人。"12月26日，波拿巴在参政院宣称："血是必须流的"。事实上，稍后在1801年1月13日、20日和31日，早先已被逮捕起诉的雅各宾派不是被枪杀就是被送上了断头台。

然而，主要的结果还是，对雅各宾派的大规模逮捕，接着又未加审讯就流放了他们。从谋杀波拿巴那天夜里起，富歇确实一直把责任归咎于"英国金币"——他确实知道谁是眞正的罪犯。利莫埃朗被耶稣会会士克洛里维埃尔和尙皮翁·德·西塞的姐妹窝藏起来，因而得以逃脱，后来他成了一名神甫，而卡邦则于1月8

① 指1792年9月巴黎革命群众，在出发抗击外敌入侵前，镇压狱中反革命分子的群众运动。——译者

日被捕，圣雷让于1月28日被捕。但是已太迟了，何况，波拿巴也不愿改变他的既定目标。参政院拒绝对放逐表态，它声言这是一个“政府措施”。1月5日又作为“有助于维护宪法的一项措施”提请元老院批准这一行动，在一百三十名被放逐的人中有舒迪厄[1]和两名前议员塔洛和德特雷姆，波拿巴一直没有饶恕他们在雾月19日所进行的激烈抗议。其中还有一些著名的革命家，如被称为“美国人”的富尼埃、罗西尼奥尔和勒佩尔蒂埃。富歇用拖延时间的方法从中救出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二十六人直到1804年才被送往圭亚那，六十八人在1801年以后被运往塞舌尔群岛；有一半以上的人在流放中死去。此外，其他的共和党人大批受到监视。同时，富歇也逮捕了大约一百名保王党人，有的被判刑坐牢，有的未经审判就拘留起来。至于卡邦和圣雷让终于受到审讯，并于4月21日被送上了断头台。这样，波拿巴主义的恐怖再次打击了左派和右派。“这是他从未背离过的唯一的一种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斯塔埃尔夫人写道，“这样他就以拉此打彼的手段在那些人中结交了朋友。”这一回左派成了打击的主要目标，可以说左派因此被彻底粉碎了。但是受到打击的不仅仅是雅各宾派。议会各院没有被召集起来就放逐法令进行投票，因为不能绝对肯定它们是否会接受这一法令。所以，波拿巴于12月26日宣称，“玄学家是造成我们一切麻烦的一类人。”十分明显地构成了对议会的威胁。此后，他又转求之元老院。作为“宪法保护者”的元老院却暗中赋予自己违犯宪法和更有理由的修改宪法的权利。结果，第一个“元老院决议案”在共和九年雪月十三日（1801年1月5日）通过。这些元老院决议案使波拿巴有可能不需要议会其他各院在法律上的赞助就可以亲自立法，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而修改

122

① 舒迪厄，山岳党人，1793年在建立雅各宾专政过程中，曾坚决对吉伦特派和丹东派作过斗争。——译者

共和八年宪法，而这部宪法沒有规定任何修宪的程序。

1800年11月间及其以后，在放逐雅各宾派的同时，波拿巴已在考虑采取某些镇压措施，这些措施虽然不那么令人注目，但对全国总的形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在他看来，问题就是要一举平息舒安分子的暴乱和制止抢劫。煽动起舒安分子暴乱的卡杜达尔那时正出沒于布列塔尼一带的农村，虽然不断地遭到追捕，但是他却一直未被捕获。由于保王党人布尔蒙的帮忙，富歇终于成功地收买了卷入舒安分子暴乱的某些人，这些人奉命杀掉卡杜达尔或者把他交给警察。但是，布列塔尼的保王党有一个钻进政府各部的十分活跃的反警务的组织，因此，当两个名叫贝克德里厄弗尔和迪夏泰利埃的舒安分子叛徒被指派去杀害他们的头头时，卡杜达尔就得以先把他们逮捕处死，可能是伊尔-维兰郡的郡守博里亲自出卖了迪夏泰利埃。舒安分子的猖狂激怒了波拿巴。1800年9月23日，安德尔卢瓦尔的前郡守、元老院议员、国有产业的重要购买人克莱芒·德·里斯在他的歇尔河上的阿泽别墅里被绑架了，同时在11月19日，菲尼斯太尔郡的主教奥德利安被暗杀了。运送国库基金的车队不断遭到匪帮的袭击和抢劫。象在共和八年一样，波拿巴又采用了严峻措施。共和九年花月18日（1801年5月 123 8日），派出了由贝尔纳多特率领的、并带有军事法庭的三个纵队。扫荡进展得很迅速。到年底，卡杜达尔返回了英国。即使如此，仍然有分散各地的舒安分子残存下来。除了少数死心塌地的人之外，大多数是把叛乱视为谋生手段的社会渣滓。

不管盗匪是假借宗教的或是国王的名义，这些人几乎到处都有。当然，他们不只限于在山区，如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有“巴尔贝”①在搞走私买卖，就是象诺尔和博司这样富饶的地方也出现了盗匪。他们用火刑折磨遭难者勒索金钱，所以人们通常称他

① 指阿尔卑斯山里的走私者。——译者

们为“火夫”。这并不是新现象；农村人口中有很多是一年里有部分时间失业的零散工和依靠自己的微薄收成不能维生的农民，尤其在歉收年份更是如此。农村中总是有成群结队的乞丐和游民，因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不法之徒。战争和国内动乱造成经济失调与乡间警政瓦解，使这种灾难更大大恶化了。农民比城市居民更加看重治安问题，因为他们一般更容易遭遇危险。既然治安是正常的和有成果的劳动的首要条件，因而，对于全国来说再没有比恢复治安更为有益的事业了。所以波拿巴的威望将因此大大提高，就象当年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一样。

困难不只是在要抓到强盗，那是让军队增援宪兵队就能办到的事，而是在于能做到依法判处他们。证人和陪审员都知道他们是易于遭到报复的，因此有些人保持沉默，另一些人从宽发落罪犯。共和八年，许多轻罪案件已改送法庭判处，并且已授权郡守监督遴选陪审员，而这个权力原属治安法官行使。但是效果却仍旧微不足道；何况镇压的迟缓至少部分地削弱了镇压的效果。在类似情况下，旧制度下王国政府曾借助于一种特殊的审判制度即“宪警法庭”简化手续就地判决正法：“拿获即刻绞死”。波拿巴也求助于一种非常手段，在西部、普罗旺斯和莱因地区已设立军事法庭，他丝毫没有要废除这些法庭的意图。然而，他也愿意以永久而正规的形式恢复旧制度的简易的镇压办法。

这就是共和九年雨月十八日(1801 年 2 月 7 日)法律的目的。124 这项法律授权政府在波拿巴认为适当的郡(他选定了三十二个郡)里，各设一个特别刑事法庭，由一名庭长、两名普通刑事法庭法官和另外五人(三个军官和两个文官)组成；这些人都由第一执政任命。他们对无业游民、积犯、与诸如此类人犯，以及大批惯盗犯罪如夜盗、路劫、凶杀、纵火、伪造货币、煽动性集会、非法携带武器等进行终审判决，不得上诉，也不得要求重审。次年，共和十年花月 23

日（1802年5月13日），在每个郡都设立了另一个特别法庭审理欺诈罪，但是在没有特别刑事法庭的郡里，这个法庭也可以审理多种盗匪案。此外，共和十一年葡月26日（1803年10月18日），根据一项元老院决议案，许多郡停止实行陪审制度；这样就使刑事法庭的法官实际上构成一种特别法庭，虽然还没有军官干预。总之，由于这些特别法庭一直保持到他垮台为止，波拿巴在法国的大部分地方都废除了陪审制度。由于特别法庭现在委任他们当中的一名成员进行预审，所以根据同一理由也就废除了起诉陪审团。最后，在还存在着正规的司法制度的地方，由于检察官职务的变化及诉讼程序的改革，司法制度也都加强起来。共和九年雨月7日（1801年1月27日）"保安法官"代替了初审法庭中的政府专员，其任务是起草公诉状；预审部分地变成了秘密的预审，证人在被告不在场时作证。原告和证人不出庭，目的是为了避免遭到匪帮的报复，因此起诉陪审团就只得根据书面证据来作出决定。

尽管采取了所有这些措施，我们也不应该认为，波拿巴已成功地在农村迅速地恢复了井然的秩序。不管他怎样考虑，制止行乞和流浪并不是他力所能及的。即使是名符其实的盗匪也经过长时间之后才镇压下去。在来因地区，法国政府好不容易才逮捕到申德尔汉内斯——一个真正的"卡图什"，[1] 当地居民相当喜欢他，因为他特别喜欢袭击犹太人。尽管如此，但到了帝国的初年，情况已经无疑地大有好转。既然特别法庭不是用来达到政治目的的，它

125 们触动的只是社会上的坏人和犯罪者，因此这种法庭没有遭到公众舆论的谴责。至于说到政治嫌疑犯，波拿巴通常用军事法庭来对付他们。新的司法改革不仅严惩了职业罪犯，还可以用来阻止

① 卡图什是十八世纪初法国一伙"盗贼"的有名首领，被捕受车刑而死，但是他的机智和大胆的故事却在民间广泛流传。——译者

那些走投无路的穷人被迫走上暴乱的道路，象在 1789 年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良善之辈"守法的公民不加区别地看待饥饿的暴民和罪犯，而共和九年的法律也是如此。这肯定是波拿巴所期望的，因为，据夏普塔尔说，他最害怕的是饥饿暴动。

在放逐雅各宾派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建立特别法庭，这引起了议会各院中共和派的极大不安。保民院的辩论很激烈；立法院投票的结果是一百九十二票赞成，八十八票反对。对波拿巴不再抱任何幻想的共和派没有放过这一表示抗议的机会。尽管如此，还必须给他们以公正的评价：这些新贵名流赞成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但不是一个武断专横的政府，在他们看来，这些非常措施在执政府时代并不比在山岳派统治下的国民公会时代更符合原则。然而波拿巴不愿受任何原则的约束，甚至不受宪法的约束。共和十年他在参政院发表演讲时直截了当地说，"一部宪法决不应妨碍政府进行工作，也决不应逼得政府去违犯它……每一天都不得不违犯成文法，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不这样就不能前进。""政府诚然不应是暴虐的……；但是它不可能不采取某些专断的行动。"简而言之，宪法只是为开明专制点缀门面而已。保民院的辩论也激起了波拿巴的愤怒。"在保民院中有一打或十五个只适宜扔到水里去的玄学家。他们是我衣服上的虱子。我是军人，是大革命的儿子，我决不容忍把我当成一个国王那样来侮辱。"于是，共和九年的危机导致波拿巴与捧他上台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之间的决裂。但是现在，波拿巴想要他们批准教务专约，而在他所有的重大措施中，他们最不赞成的恰恰就是这个教务专约。

这个议会反对派是自己委任的，因此在全国得不到支持。各个利益集团得到了满足，而且，和平和社会秩序的改善有利于商业的复兴。一家新的发行钞票的银行在巴黎创办起来，这就是通称为"雅巴银行"的商业银行。法兰西银行和它的竞争者所发行的钞

126 票使得投机商能够把硬币拨到外地，从而能在外地刺激经济发展。连年歉收引起了农产品价格空前上涨，这就提高了有土地的农民或佃农的购买力。在经历过督政府时期那样令人不满的通货收缩之后，这些人当然喜欢这一意外之财；他们感激第一执政，因为他表现出非常关注国家产品的产量，并且极力鼓励生产。国家财政状况也有显著的改善。军事征服有助于减轻预算的重担，因为法国军队现在能够在国外取得给养。租税在定期征收，共和十年的预算实际上表明，收支相抵还略有节余。在大城市中，城市通行税正在逐渐取代私人动产税，这就使得富人非常满意。至于地产税，政府正在研究在各公社之间确保较为公平地分配负担的方法。后来在共和十一年，每个郡里都有一些公社着手进行了可耕地面积的测量登记和净产量的估价工作。

国库的情况仍然引起人们的关切。共和十年热月30日(1802年8月18日)，政府企图通过创办一个一般税收专员的办事处或联合会，而在国库部的工作中取消某些中间包税人，目的就是要迫使一般税收专员贴现他们自己的证券；但这一尝试失败了。票据继续在跌价中销售。然而，对于国民来说，主要问题是清算了债务。如同在督政府时期那样，清算债务是靠宣布破产来完成的。1797年发行的大大贬值了的“三分之二”公债券，如果人们不愿意象以前一样拿来偿付购买国有产业，则可以随意以票面价值的二十分之一兑换成带有百分之五利息的政府统一公债。共和六年发行的公债和拖欠的债务非常缓慢地分别按百分之三和百分之五的利息整理合并进政府公债中去。但持券人仍然很高兴，因为共和九年风月30日(1801年3月21日)的法令起码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好处；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结果在共和八年底的恢复最少对工资收入者和公务人员用现金支付薪水和年金。对于国家军需供应商，波拿巴高兴的时候就付给他们现钱。

这并不是说，对法国财政方面的信心很足。尽管还债金库采取了措施，但证券交易所中的政府公债的市价仍然很疲软。亚眠和约签订之后，利息百分之五的法国政府统一公债的市价为四十八至五十三法郎，而利息为百分之三的统一公债在英国市价却在六十六至七十九法郎之间波动。但是，如果资产阶级感到自己可能被一次新危机所摆布的话，它是不愿意给波拿巴制造困难，从而促使这场危机早日爆发的。遭受痛苦的只是平民各阶级。共和八年收获之后，在巴黎，一个四磅重的面包价格上涨到十三苏。到了1801年，所有的食品都涨了价，因而也减弱了吕內维尔和约所带来的快乐情绪。共和十一年的收成相当可怜，甚至在大面积耕作的地区情况也是如此。那年冬季，在巴黎，面包上涨到十八苏，在小城镇和乡间，每磅面包涨到七苏——和英国的面包价格相同。不再能出口粮食的布列塔尼的面包沒有涨价，这是唯一的例外。 127

为了应付危机，波拿巴转而采取了旧制度曾用过的办法。警察厅长又重新把面包商组织成行会共同负责，而且强迫他们建立储备谷仓。这一措施的结果使许多小面包铺破产消失了。1801年11月17日，政府授命夏普塔尔从国外购买粮食，但由于政府短缺钱财，因此就又一次要求助于银行家：五名银行家负责每月要弄到五万公担粮食，结果还是不够。共和十年花月，波拿巴起用了曾遭贬黜的乌弗拉尔。结果保证了巴黎的供应，面包价格保持在十八苏。这样做就得需要供应一百多万公担粮食，要化费二千二百多万法郎；由于粮食按低价卖出，使国家亏损一千五百五十万法郎。首都以外的地方又出现司空见惯的现象：乞丐成群结队，农民受到煽动，纵火案四起，市场经常发生骚乱。虽然面包比1789年还要贵些，但是这次动乱沒有造成威胁性的形势，这是由于沒有同时发生政治的和社会的骚动，同时也由于刚刚实行了加强镇压措施：共

和九年雨月18日法律已产生效果。不管怎样，民众的骚动只能会促使有产者更加依附于波拿巴：他变成了社会的捍卫者。危机在共和十年的夏季达到了顶点，这正是波拿巴准备改任终身执政的时刻，这场危机大大有助于他达到自己的目的。

二、教务专约

然而，为了使社会秩序完全恢复，关键问题始终是要在国内解除反革命的武装，波拿巴很久以来就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128 罗马天主教会和解。那些顽抗派教士仍然是难对付的。执政们的一个特派专员从伊尔-维兰郡的雷东写道："不能指望与拒绝宣誓的教士和解。"假如宗教和国家一直保持分离的话，他们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罗马天主教徒们是不会承认国家与宗教分离或信仰自由的；他们充其量只会接受宗教容忍，交换条件是要给他们一种特权地位；只有付出这样的代价，他们才会同意解除武装，起码暂时会如此。于是，波拿巴决定做到这一点。共和八年热月30日（1800年8月17日）波拿巴在罗德雷面前斥责有些人"认为，只要神甫保持沉默，就应把他们扔在一边，不去搭理他们，如果他们捣乱，就把他们逮捕起来。这就好象是说：'有些人在你的房屋周围举着火把，你别管他们，假如他们放火，就逮捕他们'。"那么该怎么办呢？"用照顾他们的利益的办法，把他们的首领争取过来"，而首要的是选择好这些为首的人。波拿巴稍后对蒂博多说，"由英国收买的五十个亡命的主教现在管理着法国的僧侣。必须消除他们的129 影响；要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罗马教皇的权威。"这就是要签订教务专约的基本理由。

象路易十四曾经想要做的那样，要请求罗马教皇免去法国一些主教的职务，就等于是给法国最古老的传统之一，即教会的"高

卢主义”[①]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个传统与波拿巴毫不相干，他唯一关心的是君权的“高卢主义”。唯一可能触动波拿巴的是蒂博多提出反对的话，“你永远无法使他们真心诚意地拥护革命。”波拿巴是藐视这一判断的。象曾寻求罗马教会协助的其他人一样，他相信自己强大到足以把罗马教会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使保王党人失去僧侣的支持，从而削弱保王党人，这还不是教务专约带来的唯一好处。在新并入法国的地区，尤其是在比利时和来因地区，虽然并不关心波旁王朝的事业，但是当地僧侣是否效忠法国仍然关系重大，因为这些地区从来没有组成独立的国家，居民主要是服从神甫；因此，如果要使这些地区的居民归顺法国，最好先争取僧侣。其次，波拿巴还注意到，即使在拥护法国革命的人士中，也有不少人在思想感情上仍然依恋传统宗教，并且对教会的分裂深感遗憾。如果有人能办到使天主教会同 1789 年的原则实现和解，那怕是表面上的和解，他们对这个人该是何等感激？哪个购买教会产业的人，当他听到僧侣永远不再要求他归还这些产业时，能不感到高兴呢？

波拿巴也指望将来会获得另一种好处。他希望把贵族和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争取到自己这边来，因此他也不能忽视宗教复兴对他们的影响。1801 年初，德尔皮什神甫创立了圣母修道会，后来名声很大，象马蒂厄·德·蒙莫朗西和他的兄弟，以及拉埃内克[②]这样的著名人士很快加入了该会。慈善性质的圣会又重新出现了；夏普塔尔在巴黎和某些郡守，象贝藏松的德·布里都自愿赞助这些组织。宗教又在社会上受到尊重，文学作品抓住了这一主

① 高卢主义（Gallicanisme）法国天主教会中反对教皇权威至上的一派主张，这一派并不脱离罗马教会，但维护法国教会一定的独立性。——译者

② 蒙莫朗西（1767—1826 年），出身大贵族世家，1789 年当选三级议会代表；是自由派贵族，后来是君主立宪派。拉埃内克（1781—1826 年），杰出医学家。——译者

题。有些作家乐于恢复写宗教主题，并很重视用它来左右文化界的风尚。自诩为"教会之母"的让利斯夫人正在创作大量的宣传德行小说；觉察到这种趋势的夏托勃里昂正在写他的《基督教的真髓》一书，这本书后来在庆祝教务专约签订的1802年复活节感恩颂典前夕出版了，它以其美学价值来证明天主教的真理。象丰塔内那样有政治头脑的一些作家则看得更远些，他们认为，恢复宗教有其社会意义：宗教必然能维护新的等级制度。既然波拿巴正是要巩固这一等级制度，因而他完全赞同他们的看法。他对罗德雷说过，① 以后又对莫莱重复过：

130

"没有财产的不平等，社会就不能存在，而没有宗教，就不能保持财产的不平等。当一个人饿得要死，身旁却有另一个人饱得要吐的时候，他是不能忍受这种差别的，除非有一个权威对他说：上帝的意志就是这样，这个世界上必须有穷人也有富人；但是，在来生和在永生中，贫富之分将完全不同。"

除此以外，丰塔内机敏地看出，政府也将从一项协议中得到好处。1801年4月18日，他写给吕西安的信中说："没有宗教，就没有政府。精明的征服者是从来不同神甫争吵的。可以既迫使他们就范，又利用他们……你可以嘲笑占卜师，但是最好还是同他们一道吃献祭的小鸡。"

虽然争取罗马教皇似乎还不是最困难的工作，但要完成这一任务却也不容易。1800年6月25日波拿巴路过维切利时向马蒂尼安尼主教提出一些建议，由他转达罗马教皇。庇护七世和他的前任不同，他不是好斗的，而是个温文尔雅，并且有些意志薄弱的人。在与法国革命讲和的问题上，特别是在要抛弃那些自称为教皇做出了牺牲的主教的问题上，他仍然犹豫不决；而且他也还要冒疏远路易十八和天主教各国的危险。1800年8月，那些不赞成同

① 这段话是1800年8月波拿巴在马尔梅松花园中对罗德雷讲的，记在后者的《日记》中。——译者

法国革命和解的红衣主教宣称，对宪法的忠诚宣誓是非法的。这是庇护六世从来也不敢做的一项决定，而庇护七世却谨慎地不动声色。另一方面，要拒绝对天主教会，同时也对教皇国如此有利的一项提议，看来也是不可能的。这后一种考虑的确是权衡得很重的。首先，法国军队仍然能到罗马来，庇护七世既不信任占领着他的首都的那不勒斯人，也不信任仍然占据教皇属地的奥国人。其次，通过免除法国主教的职务，罗马教皇就有权任免"高卢主义"僧侣，这项权利是法国从来不肯承认的。

波拿巴事先答应了这一点之后，教皇首先以充分的理由提出要求恢复罗马天主教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红衣主教斯皮纳带着指示被派往巴黎。11 月 6 日到达后，他就立即会见了波拿巴的谈判代表贝尼埃。贝尼埃原是旺代乱党的宗教首领，他刚刚投诚到波拿巴的阵营里来，一心指望成为巴黎的大主教和被提拔为红衣主教。法国的方案中自然没有提到国教，但由于斯皮纳的坚持，贝尼埃让步了，而波拿巴也没有从中看出什么害处。这是出于误会，因为，在这个领域里，波拿巴也缺乏法律上明确的概念；他把罗马天主教称为国教或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只是想要给教会一笔拨款，并给它超于其它教派之上的特权地位。塔列朗和奥特里夫使波拿巴认清了问题，他们指出这样会毁掉信仰自由和国家世俗化这些基本的革命成果。从此以后，波拿巴就只承认罗马天主教为大多数法国人信仰的宗教，这是他毫不动摇的立场。

争论的另一点是主教们的辞职问题；尽管教皇小心谨慎，但是这问题牵涉到他的利益太大，以致斯皮纳最后也没作出让步。谈判之所以拖延下去，是因为罗马教廷在等待着战争的结果；当法军占领了教皇各属地和罗马本身的时候，教皇只好让步。1801 年 2 月末，谈判的速度加快了，波拿巴派卡考尔到罗马去催促此事。由于罗马教廷拖延答复，5 月 19 日，波拿巴指示卡考尔，要求对方无

131

保留地接受法国的条件，如果对方拒绝，就中止谈判。庇护七世刚刚写好一封信，建议做某些修正；但是卡考尔自作主张，在返回巴黎时把罗马教皇的国务卿红衣主教孔萨尔维带往巴黎。6月2日到达后，孔萨尔维就开始逐条力争，但终于在1801年7月16日早晨两点钟最后签订了教务专约。

根据教务专约，罗马天主教被宣布为大多数法国人同时也是执政官们信奉的宗教，假如一个非天主教徒继任政府首脑，就必须另行谈判。宗教仪式可公开举行，但应遵守世俗政府为保证公共安宁而制订的必要的规章。国家支付主教和教区神甫的薪给，后者的人数应相当治安法官的人数。[①] 国家允许恢复大教堂圣职会和主教管区的修道院，但是不给他们捐助资金；国家还许可天主教徒捐款成立基金会。教皇答应劝告顽抗派主教放弃教职，如不能做到，就免除其教职。波拿巴也应对宪政派主教提出同样的要求，这样来结束教会的分裂。和约没有提及修道会，因而，它们仍然无保留地处在教皇的直接管辖下。根据1695年敕令的精神，主教的权力也大大地增加了：他们有权指定教区神甫和下属人员，这是主教在旧制度下未曾拥有过的权力。作为交换条件，波拿巴获得了一个由他挑选的新主教团、教士的忠诚宣誓、在礼拜仪式结束时为共和国做祈祷，教会答应不再要求收回已出售的教产，以及重新划定主教管区。主教由第一执政提名，而由教皇授予圣职。就波拿巴来说，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他认为，通过控制主教，他就会控制他们的教士，由于害怕顽抗派教士难以驾驭，他宁可把教区的教士置于主教团的监管之下，而不愿意亲自监视他们。至于那些隐修院的修士，他打算容忍他们，但是要限制在对他有利的范围之内。

132

① 根据共和十一年雨月8日（1803年1月28日）的法律规定为三千至三千五百名。——英译者

罗马教皇批准了教务专约，并派卡普拉拉红衣主教作为他的使节到巴黎去监督专约细节的实施；10月7日，波拿巴委派参政院参政官波塔利斯担任宗教部督导官。此人既是个高度虔诚的信徒又具有“高卢主义”思想，但他不久就作了很多的让步。在1801年曾经举行过一次宗教会议的宪政派主教没有反抗地顺从了，尽管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代表格雷古瓦对教务专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顽抗派主教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八十二名主教中有三十六名拒绝顺从，在新并入法国的领土上的十三名主教中有一名也不服从教务专约。这些顽抗的主教抗议剥夺他们教职，他们的一些信徒仍跟着他们走。结果，在很多主教管区里，反对教务专约的教派继续存在着，并延续至今，这就是所谓的“小教会”，虽然他们的信徒从来不是很多。尽管存在着反对派，但还是很快就准备出了一份新主教名单。由于教务专约没有为宪政派主教保留任何职位，所以罗马声言拒绝为他们授职，由于波拿巴毫不动摇的决心，才迫使教皇同意对十二名前宪政派主教的任命。在这十二名中间，竟然没有格雷古瓦。十六名已经递上辞呈的前顽抗派主教也被任命了，其中包括埃克斯的尙皮翁·德·西塞，图尔的布瓦热兰和波尔多的达维奥。除此之外，又增加了大部分从接受教务专约的神甫中提升的三十二名新主教。由于卡普拉拉坚持要新任命的前宪政派主教承认过去的错误，而他们拒绝认错，于是整个安排在最后一刻又陷入了危机之中。代表法国政府谈判的贝尼埃用模棱两可的办法解决了问题，这是1668年为调解教皇和詹森教派[①]的高级教士之间的争端所用过的办法：他只是让卡普拉拉相信，分裂派已经发表令人满意的口头声明。应该补充提一下，这个十分圆滑的人物所得到的报赏只是奥尔良主教的职位。

现在留下的问题是要议会各院批准这一和约。参政院公然表

① 詹森教派是天主教的一个异端教派，崛起于十七世纪末。——译者

133 示反对，10 月 12 日的会议是非常激烈的。波拿巴刚刚禁止了敬神博爱教的集会，这是很难平息人心的。11月 22 日，立法院选举了反宗教的《宗教的起源》一书的作者迪皮伊为主席；11 月 30 日，元老院选择宪政派主教格雷古瓦填补空缺。在保民院中，几乎一致地反对教务专约；沃尔内遭到波拿巴一场有名的责骂。政府中的反对派找到了两个机会来表示他们的激怒：一个是与俄国订立的和约，他们严厉地批评了这一和约，因为和约提的是"法国的臣民"而不是"法国的公民"；另一个是《民法典》，除了关于戶籍的标题外(因为它明显地排斥任何国教)，他们于 12 月 28 日否决了《民法典》开头的一些标题。至于军队的情绪，那是一清二楚的；7 月 20 日，即教务专约签订的第二天，富歇指示要搜捕那些不接受教务专约的教士；波拿巴不得不让他撤回这个命令。看来，教务专约肯定要遭到挫折。

塔列朗建议对反对派作一些让步，办法是，在实施教务专约时必需制订一些补充规章。因此，政府公布了"天主教组织条款"作为教务专约的补充，事先沒有通知罗马教皇，教皇也不敢提出抗议。这些条例使"高卢主义"成为国家的法律：它规定修道院要讲授 1682 年的宣言；教皇圣谕的公布、主教会议的召开、教士圣职的授任、修道院的创办以及教义问答的编撰等等都须经政府批准。世俗政权还取得了规定鸣钟、仪仗和教士服装的权利。条例还规定了新的教区划分和教士薪俸，从薪俸中要扣除革命时期法律所已发的年金。公社可为附属的小教堂人员和低级教士提供住所并发给薪俸，但这项规定对公社不是强制性的。

这还不是全部办法。为了显示天主教并不是又变成国教，于是又制订了"新教组织条款"。对改革派和路德教派牧师也一视同仁发给薪俸；卡尔文教徒则由捐款最多的信徒组成的一些教务监理会管理，由最老的牧师担任该会主席；路德派教徒设有各堂教务监

理会负责管理。“新教组织条款”成为新教徒的宪章，与教务专约组成一体，教务专约又有“天主教组织条款”加以补充，因而构成了一部自成体系的完整法律。尽管采取了这样的调节措施，但也还不能肯定与教皇的协议就会得到议会的支持。但是，波拿巴已经 134 开始警惕起来，特别是他正在酝酿其它重要措施，而这些措施也必定会遭到反对。举行一次新的政变才足以使议会各院投降。

三、清洗保民院和就任终身执政

1802年1月4日波拿巴撤回了提交给议会各院的所有议案，有如波塔利斯曾经预言的那样，使议会各院处于“法律禁食”的状态。三天以后，参政院宣布，议会各院会期因此应被认为已告结束，而且宣布，现在应着手更换到共和十年任期已满的五分之一的议员。鉴于宪法中没有规定卸任成员的选定方法，此问题便提交给了元老院。很明显，这些成员应由抽签来选定，人们本来以为，元老院会采用抽签办法，因为它和其它各院一样怀有某种不安。但是元老院可能受到了恐吓，如果它表现得不驯顺，就要对它施加武力；而最重要的是，如果它让步屈服的话，就答应给予新的好处，不管怎样，元老院以四十六票对十三票决定由它自己提出卸任的成员。这样做的结果就免除了保民院中的最杰出的“空论家”的成员如邦雅曼·贡斯当、谢尼埃、多弩、然格内、拉罗米居厄尔和萨伊等人的职务。他们被第二流的人物，一些文武官员所替换。只有卡尔诺一人例外地留了下来。吕西安·波拿巴变成了保民院议员，这样他就重新进入政界，以便能起他在雾月时同样的作用。他向保民院提出了共和十年芽月11日（1802年4月1日）的规章，这个方案把保民院分为三个组，各组秘密审议法案。不久以后又有一项执政的命令规定，法律草案事先要在第一执政主持下的特

别委员会里由各组的“报告人”和参政院负专职的参政官共同审查。这样就不致于在公开的会议上出现任何争论。“不应有任何反对意见，”波拿巴说道，“什么是政府？如果它得不到舆论的支持，就什么也不是。它怎么能够抵消一个随时公开攻击它的议会讲坛的影响呢？”同样也变得可疑的参政院也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因为它不再能控制法律的起草工作。最后，波拿巴在由他任命的心腹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里，着手准备他那些雄心勃勃的纲领，其结果提交给参政院通过只是走走形式罢了。

135

议会各院被压服之后，剩下的危险只有军队的叛乱。波拿巴利用和平的机会遣散和清洗部队；意大利方面军被调到葡萄牙；来因方面军被派往圣多明各。尽管如此，在军队中仍然存在着显著的不满，因为不能按时发军饷，而且，尤其在这饥荒的年代，士兵们都怀念他们在战斗中有利可图的冒险生活。巴黎简直是充满了百无聊赖的将军们，他们嫉妒他们的上司，都不相信他的军事天才、而只承认他运气好。波拿巴总是说，“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不自认为具有同我一样的权利。”他们都自命是共和派，但他们的公民精神却大可怀疑。他们谈到要把法国分成几个大军区治理；倘若他们得逞，他们之间很快就会打起仗来，国家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即使现在就要实施军事独裁，那也只应有一个独裁者，因此在这一点上，全国又是支持波拿巴的。

在与波拿巴敌对的将军中，最显著的是莫罗和贝尔纳多特。莫罗已经断然与他的对手闹翻。他的妻子和岳母甚至怂恿他和波拿巴断绝社交往来；而《政府通报》却暗示，莫罗在德意志曾违法乱纪。但是他在脱下军装后甚至比在担任军职时更加优柔寡断。而贝尔纳多特看来比较有能力，作为驻扎在雷恩的西路军统帅，他随时可以发动兵变。实际上，尽管他有傲慢自大的气派，但由于他过多地考虑自己的利益，以至不敢轻举妄动。他在督政府任陆军部长

时，错过了共和七年夏季夺取权力的机会，而现在的形势却大大不利了。他在参与夺权的活动中，坚持要元老院首先采取行动。在巴黎，从3月到6月举行了许多密谋反叛的集会，并且试探了包括富歇在内的某些文职官员的意见。与此同时，三名军官于5月7日被捕，其中一名是多纳迪厄将军；5月20日，贝尔纳多特的参谋长西蒙将军向军队秘密地散发了两份攻击波拿巴的煽动性宣言。136 这两份宣言落入了巴黎警察厅长杜布瓦手里，他为抓住了上司的把柄而高兴。而后富歇以"诽谤阴谋"罪逮捕了西蒙将军及其同伙。波拿巴对此事秘而不宣，因为他不想让人谈论军队中有人反对他。有嫌疑的军官不加审讯地被关在监狱里；正规军第八十二团被运往圣多明各，到那里就有去无回；而里什庞斯和德凯恩将军被派往殖民地去，拉纳出使里斯本，而布律纳出使君士坦丁堡。拉奥里退职了，勒古布转入后备役。贝尔纳多特却未被触动，这是由于波拿巴考虑到贝尔纳多特的妻子朱丽叶·克拉莉，她是波拿巴原来的未婚妻，后来因为约瑟芬的缘故而被抛弃了。尽管如此，贝尔纳多特还是被罢了官。从来没什么事情使波拿巴这么强调他的所谓的"反军阀主义"，其实这只是对他旧日袍泽心存戒意而已。这种戒心表现在1802年5月4日他向参政院发表的名言中："毫无疑问，文官是要高明得多。"在这种场合他是以文官自命的。富歇给那些受牵连的政界人士通风报信，劝他们躲避起来。斯塔埃尔夫人到她在瑞士科佩的别墅去了；当她在1803年试图返回时，波拿巴下令将她驱逐出法国。

波拿巴的种种忧虑从没有成为严重事件，因为它们决没有使事态的进展放慢速度。1802年3月25日签订了亚眠和约，它象是一个信号。在从4月8日到5月19日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整个政体全然改观：共和政体改变为君主政体，反革命正式归附，新贵名流的权势加强了。共和十年芽月18日（1802年4月8日）

立法院通过了包括教务专约等有关宗教的法律。十天以后，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了感恩颂典来庆祝法国革命和罗马教会的和解。接着在花月6日（4月26日）通过了一项元老院决议案（实际上是十五天前在一个特别委员会上准备好的），答应赦免亡命者，条件是在共和十一年葡月1日（1802年9月23日）之前回国、并且宣誓忠于宪法，只有罪恶深重者不在赦免之列，他们的人数不过一千左右。花月11日（5月1日）法令决定建立国立中学，这些学校颁发奖学金将会造就大批公务人员和各种自由职业者，使他们成为政府的拥护者。花月29日（5月19日）一项法律创立了荣誉军团。它包括十五个"大队"，每个大队由二百五十名军团成员组成，他们是由波拿巴从新贵名流中遴选出来的。既有武官也有文137 人。从国有产业中拨给每个"大队"二十万法郎的年金，作为军团成员薪俸、住所和疗养院的费用，而他们则要宣誓"为共和国服务而献身"，"击败一切复辟封建制度……的图谋……"并且"竭尽全力维护自由与平等"。荣誉军团的确是一支有功勋的公民的组织而不是国家的装饰品，因为当时甚至没有给它的成员颁发一枚特别荣誉勋章。最后于5月8日至14日，波拿巴的权位转变成为终身执政。

虽然元老院的屈服和对保民院的清洗使雾月党人资产阶级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但仍然可以察觉出一些反抗。创立荣誉军团法令在参政院中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在立法院中仅以一百六十六票对一百一十票通过。至于宪法，波拿巴成功地废除了它，但只是以不断滥用权力，并与他身边具有君主制思想的成员如康巴塞雷斯、罗德雷、塔列朗和吕西安的合作下才获得成功的。亚眠和约于5月6日送交元老院，并要求这个机构决定采取什么方式最适合酬答第一执政，以表示"全国的谢意"；但是5月8日当一名元老院议员提出设立终身执政时，该院只赞成重选"拿破仑·波拿巴"连任十年

第一执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官方文件上第一次出现了波拿巴的鼎鼎大名的教名①。这一计不成之后，波拿巴据说是依照康巴塞雷斯的出谋划策，于5月9日顺水推舟回答了元老院的提议：如果人民的愿望"命令"他这样做的话，他将接受这一提议。然后，一个特别会议接受了由罗德雷起草的草案，其中提出，除了终身执政之外，还授予波拿巴指定自己继承人的权力。这个决议竟被提交给参政院通过，虽然这并不在参政院的权限之内。富歇没有参加会议，五、六名参政官缺席。然后，波拿巴慎重地删去了决议中罗德雷加上的关于指定继承人的条款。本来无权参与宪法修改的保民院和立法院也通过了由三执政之一任终身执政的公民投票。象共和八年一样，这次公民投票也是公开投票，而在决定公民投票过程中靠边站的元老院则被指派负责清点票数，这简直是讽刺。热月14日(8月2日)元老院宣布波拿巴为终身执政。

波拿巴不失时机地命令制定一部新宪法，参政院和元老院于8月4日未经讨论就批准了这部宪法，其中一条授权第一执政在他认为合意的时候，或在遗嘱上把他挑选的一名继任候选人提交元老院通过，如果元老院不同意，波拿巴可以依次再提出两名候选人，第三次提的就不能再被驳回了。这样波拿巴就擅取了他曾拒绝向人民要求的权利。对于继任人的安排如此曲折，有人解释是由于在选择合适的继承人之初所产生的困难。波拿巴没有孩子，约瑟夫和吕西安就为继承权而争吵。这种继承权，如吕西安所说的，就象是继承"先父的遗产"一样。如果偏爱一名雾月党人，势必招致其它雾月党人的强烈忿懑。这一困难问题本来可以在路易·波拿巴和奥坦斯·德·博阿尔内的儿子查理身上得到解决。事 138

① 即出现"拿破仑"之名。按欧洲习惯，只有帝王才用教名称呼，在拿破仑未称帝前，正式文件只能称他的姓"波拿巴"。拥戴他称帝的人在他登基以前，早就只尊称他为"拿破仑"了。——译者

实上，波拿巴曾想从这对夫妇过继一个侄子；但是查理直至10月10日才出生。因此，看起来尽管波拿巴控制了报刊和议会各院，但是他仍然看到了把一项太露骨的君主制的建议提交给公民投票的危险性。所以他用武力取得了他未敢请求的东西。另一方面，则有人认为，那些把法国革命的命运和波拿巴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并把他视为唯一能够保卫自然疆界的革命人士发现，他们自己在逻辑上不得不使他成为一位君主，以便得到他们所希望的稳定局面。事实上，正如蒂博多十分正确地看出的：在这一点上，终身执政和世袭继承本身都只不过是虚幻的保证。波拿巴的统治实质上是建立在胜利基础之上的军事独裁统治，只要他在战场上仍然保持胜利，并不是非要这些措施不可。正如波拿巴自己所说，如果反法同盟一旦进入巴黎，"这些元老院决议案还会有什么意义呢？"他一旦死去，谁还会关心他的遗嘱呢？"有谁曾经把路易十四的遗嘱放在眼里？"崇敬他的法国和成为他的俘虏的雾月党人都顺从了他的要求。获得作为民族化身和成为全国第一公民的荣誉都不足以使波拿巴满足，他甚至明知自己因缘际会做出的伟大功业不过是过眼云烟，但他仍一意孤行要称王称帝。

仍然必须指出的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对他的要求表示赞助的同时，仍然谨慎地提醒他在雾月结成的盟约。这些人中就有罗德雷，他自己谈到了代表着主要社会利益的重要机构，这些机构会得到宪法的保障而与政府联系在一起；无疑，这意味着要给议会各院、特别是元老院某种真正的控制权。这些共和派还指出，现在行政权已很强大，足以给公民恢复一定程度的自由权。夏博在保民院提议国民应感谢第一执政，当他把关于公民投票的法律呈递给波拿巴时，他胆怯地暗示了这种需要："波拿巴的思想非常伟大和[139]豁达，他决不会脱离那些创造了法国革命与建立了共和国的自由原则。他非常珍惜真正的荣誉，决不致以滥用权力来玷污他已经

取得的莫大荣誉。”“空论家”若尔当在一本很快被查禁了的小册子《为终身执政而举行的公民投票的真正含义》中更加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主子是不会宽恕的。果月二十六日（9月13日）富歇失宠了，他所管辖的警务部与司法部合并。罗德雷最后也被剥夺了参政院组长的职位和掌管国民教育的权力。波拿巴当时的答复是，独裁统治仍然是必要的：在英国，反对党在宪法范围内有它的地位；而在法国，反对党就成为反革命和雅各宾派的活动范围。既然他已经恢复了反革命分子的公民权，他就完全可以提醒“革命人士”，如果举行选举未必会对他们有利。“政府必须掌握在革命人士手里；这是他们唯一拥有的东西。”波拿巴的合作者沒有和他争论这一点，但是他们提醒他，他们将和他一起分享政权，这曾经是他们之间的谅解。

相反地，共和十年宪法反而缩小了他们参与政权的范围。第一执政独揽缔约权、特赦权，独自指定元老院、最高法院和第二、第三执政的候选人，以及从选民提出的候选人中遴选治安法官等权力。他特别保留了以系统的元老院构成法来解释或补充宪法的权利，这就使后来在建立帝国时沒有遇到象在设立终身执政职位时所引起的那样多的困难。他还僭取了通过颁发一般的元老院决议案来暂停实施宪法、解散保民院和立法院以及撤消法院判决的权力。他建立了枢密委员会，在每次会前由他指定其成员，这个机构起草他所提出的元老院决议案，而只有他才有立法的创议权。被授与这种过高权力的元老院进行了适当的改组，虽然它仍然由互选增补成员，但是只能从波拿巴提出的候选人中选出，波拿巴并有权直接任命四十名附加元老院议员。不久，波拿巴于共和十一年雪月14日（1803年1月4日）侵夺了任命元老院秘书处的权力，同时他在每个上诉法院管辖区都设立了一个元老院议员庄园，每个庄园拨有国有土地和宅邸，这是波拿巴在薪俸之外赠与

那些最听话的元老院议员的。最后，新宪法还授权元老院议员得兼任部长和政府的各种高级职位。另一方面，其它议会各院的权限则大为削减。立法院失去了召集例会和选举主席的权力。保民院被缩减为五十名成员，并且在宪法中列入一项取消保民院发言权的条例。参政院把它的优先地位让给了元老院，并且有枢密委员会在和它抗衡。虽然波拿巴继续在向参政院提交新法案，但是他现在不通过它也可用元老院决议案来制定法律。

140

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废除了元老院终于在三月刚刚发表的“名流名单”。波拿巴的借口是起草过程中曾遇到困难，而实际上是他感觉到这使议会各院拥有太多的选择自由。毫无疑问，他也希望每个郡恢复他认为合适的代表机构，以便使新贵名流高兴。因此他建立了选举人团制度来代替“名流名单”。在基层，由各区公民大会提名治安法官和地方议会的候选人，并提名县选举人团的候选人和郡选举人团的成员，后者是从六百名纳税最多的公民中选出的，这样一来，选举人的财产资格就终于出现了。县选举人团为保民院和立法院中每个空缺席位提出两名候选人；郡选举人团为立法院和元老院中每个空缺席位提出两名候选人。这样议会各院就具有地方代议制的性质。由于选举人团必须在它们自己成员以外选出两名候选人之一，因而它们就不完全是寡头性质的。第一执政对这些选举人团有着巨大的影响，因为他不仅指定它们的主席，而且还可以给县选举人团追加十名成员，给郡选举人团追加二十名成员，并且授权政府官员加入选举人团。

既然选举人一经提名终身任职、并且只有在选举人团成员有三分之一的缺额时才增补空缺，这样就使选举减少到最低限度。此外，直到共和十二年，新近被选定的公社新贵名流才独自组成了区议会，而他们组成的选举人团继续起作用，到帝国灭亡之前一直没有变动。新贵名流的垄断权就这样得到巩固并且加强了。请倾听

吕西安于1803年3月24日对塞纳郡的选举人团演讲时所说的话吧:“我们的新选举法原则……不再是建立于虚幻概念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唤起我们保持公共秩序愿望的社会与财产的基础上。今天,选举权以逐渐的、稳健的方式变成为最开明、最关心良好秩序的阶级独享的特权。”但是实际上，这个阶级从此只有依靠波拿巴才能保持它的地位。 141

四、波拿巴的社会政策

共和十年的重要法律不限于扩大波拿巴个人权力；它们还显示了在他头脑里正在形成的社会概念。在参政院会上，波拿巴批判了从法国革命中产生的个人主义社会。他把这个社会描述为“一盘散沙”,并且强调了必须在“法国的土地上投上一些大块花岗石”,以便“给法国人民指明方向。”明白地说,波拿巴想要用利祿与荣誉组成一些依附于这个政权的利益集团，并期望这些集团对工资劳动者施加影响，以便赢得平民各阶级的忠顺。这就等于是复活旧制度下官民之间的中间组织或行业集团,但必须警惕,不能使这些组织再能够对抗国家或蜕变为寡头统治。波拿巴机敏地指出,资产阶级将从中得到好处。他认为：贵族是靠血统、阶级偏见和教会的等级结构而结成一个集团的，而“咱们，咱们却是各自分散的”；因此，荣誉军团应“把革命人士集聚在一起”。然而，这些社会集团将有待于他、并且只有他一人去创立；刑法甚至规定，凡成员在二十人以上的一切团体都要经他批准才能成立。这样，人们就清楚地看到，他个人的权力因此也大为增长。议会各院就是集聚革命人士的一个社会集体,荣誉军团是另一个集体,选举人团又是另一个集体。除这些集体之外还有由波拿巴不断增加的官吏也是一个集体。他们被组织在各部门等级森严的制度中工作；公费 142

生将被培养成为官吏。波拿巴在共和十一年芽月十九日(1803年4月9日)任命了十六名协理专员①。但这只是个开端。他们隶属政府各部和参政院，并且要形成一个与法国革命或旧制度都沒有联系的高级行政核心。在这个体系中法官占据了显要的地位，他们的薪俸微薄，因此只能从富裕的资产阶级中选拔。共和十年

143 宪法规定了法官的等级和专业训练制度。司法官也都组织成了团体：辩护士会从共和八年就已存在；公证人和公共拍卖人从共和九年就已联合起来。实业家们也沒有被忽略，有商会、制造业公会、经纪人公所，而代理商的再现不只是适应了工业技术上的需要，也是既定的社会计划的一部分。如果只凭波拿巴为所欲为的话，人们一定会看到行会复活。

象波拿巴当时所设想的那样，社会的阶梯等级制度建立在财富的基础之上。因为他是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夺取政权的，所以不可能出现别的局面。的确，空论家们打算以对所有的人实行免费教育的办法，使有才能的人同有财富的人能取得领导国家的职位。但是，已据有财富的人很自然地倾向于把持领导权。此外，只要那些"才能之士"仍旧处于贫困状态，波拿巴就同有钱人一样对他们存有戒心，视他们为革命的火种。所以波拿巴和富人一致同意，只能用他们充任技术性的官员，象过去的贵族政治和君主专制时代那样做法。当波拿巴宣称自己是法国革命的代表时，他总是把这场革命归结为废除特权，其后果则是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的抬头。他的个人专制一倾覆，人们就可以看出，共和十年的社会制度已经为"七月王朝"打下了基础。

---

① 这些协理专员被推荐为未来的参政官、法官和其它高级行政官吏。因此他们一方面在政府与参政院中间、另一方面在政府与议会各院中间起着行政联系的纽带作用。他们负责给参政院各组的会议提出报告，并得出席全院大会，但除回答要求作解释的要点之外没有发言权。——英译者

《民法典》成了新社会的圣经。1800 年 8 月 12 日，波拿巴指定一个由特隆歇、波塔利斯、比戈·德·普雷亚梅纽和马尔维尔四位法律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起草民法，草案于 1801 年 1 月完成，但是波拿巴与议会各院的冲突中断了《民法典》的讨论，直到 1803 年才恢复讨论。法典最后于 1804 年 3 月 21 日以《法国人的民法典》的名称颁布了，后来改称为《拿破仑法典》。波拿巴只是在涉及家庭法时才直接参加了民法的起草工作。他的注意力集中于加强父权和夫权，剥夺未经认领的私生子的财产继承权，并削减已获认领者所继承的份额，以及保留离婚的规定，这一项是出于为他个人着想。

象波拿巴所有的成就一样，这部法典也有它的二重性。一方面它肯定了封建贵族的消灭，并且采纳了 1789 年的社会原则：个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世俗化、信仰自由和选择职业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这部法典在欧洲成为法国革命的象征，不论传入什么地方，它都提供了现代社会的基本法则。虽然这一特点 144 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已经丧失其光彩，但是，如果不认清法典当时具有的创新之处，则将是对拿破仑时代历史的歪曲，并且将妨碍我们理解法国统治扩张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法典也体现了反对共和国民主成就的反动倾向。它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设想，首先关心的是确保财产所有权，把这种权利视为自然权利，是先于社会的、绝对的、属于个人的权利，并且保障实际占有的所有权。有关契约的各项规定涉及到的几乎都是财产问题，而有关雇用问题的规定只有两条。家庭问题有很大部分也是从保障财产所有权的角度考虑的。结果，关于婚姻契约的详尽规定使婚姻成为金钱交易，而法典对血统关系如此重视，所考虑的也就是继承权的问题。

波拿巴和他的法学家心目中的国家利益，是民法起草工作中的另一个主导思想。正是波拿巴在涉及诸如地下资源，或为公益

而征用土地的情况下，尤其是以遗嘱处理财产的能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财产所有者的权利。家庭对国家有很大的价值，因为它是约制个人行为的那些社会实体之一。被法国革命削弱了的父权因此又得到加强：父亲无需司法机关的认可就可把他的子女监禁六个月；他完全有权控制他们的财产；同样，他也可以支配他妻子的财产；虽然夫妻财产共有制是习惯法的一部分，但他往往可以随意处理它。但是，象所有的团体那样，家庭也可能变得十分强大以至于能够对抗国家，因为它自发产生的自然结合力非常强大，所以情况就更加如此；从家庭就可能又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贵族阶层。由于这个原故，国家把家庭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父亲遗嘱的权力被重新建立的"特留份"[①]所限制，继承权被宣布是一件有关社会秩序的事，因此就由法律加以规定。从这个观点来看，民法典遭到旧贵族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尖锐批评，因为它确定遗产分散，从而限制了他们的经济实力。

对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民法典除去禁止终身合同和永久雇用，以保护他们的人身自由之外，别无其他规定。民法典宣布了劳动自由和在法律面前公民平等，实际上象国民制宪议会所希望的一样，抛弃工资劳动者，使他们置于经济竞争的一切危险之中，并且把劳动力视为只不过是一种商品。民法典拒绝接受1793年出现的关于承认公民有生存权的主张。由于在工资争议中只承认雇主的供词为可信的，因此民法典甚至歧视工资劳动者，从而背离了法律上平等的原则。此外，国家还以治安法的名义出面干涉，因为既然穷人一无所有，他们就会违抗民法典，使雇主提出的惩办不守纪律的诉讼归于无效。共和十一年芽月22日（1803年4月12日）法律重申了对工人结社的禁令[②]；在12月1

145

① 法律保障子女继承父母遗产的部分，父母不得以遗嘱予以剥夺。——译者

② 即重申1791年6月14日国民制宪议会通过的"勒·沙白里埃法"。——译者

日一项法令强迫工人携带地方当局颁发的工人手册，不能出示工人手册的人被禁止雇用。

法国社会的演进产生了资产阶级并使之获得政权，民法典也是法国社会演进的结果。从法典的细节上看，它的历史标志就更明显。拿破仑时代的法学家主要是从多马和波蒂埃[①]的著作中吸取了法典所需要的东西。他们两人都已经开始从事条理化编纂法典的工作，后者专心致力于编纂法国南方保存的成文罗马法，前者献身于编纂习惯法。法学家们把这项学术遗产与法国革命的成就结合汇编在一起，并删除某些不妥条例，从而使民法典成为一部折衷的法典。民法典对地产特别注意，因为地产仍然是当时财富的主要形式，但它却很少涉及到工业财富、公司组织和信贷，这也是它的历史特点之一。总之，民法典决不是理论家的创作，不是理论家硬加给社会的、与生活实际无关的一部抽象法律书，而萨维尼和其它德意志法学家所提出的批评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些批评家内心里充满贵族阶级思想感情，而民法典正是否定这种感情的。

波拿巴关于国民教育的主张是，它应当与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和政权的专断性质协调一致。他说，教育必须“普及全国”，并且是“政府首先要关心的事”。夏普塔尔的教育方案被认为野心太大，于是改由富尔克鲁瓦主持，起草了共和十年花月11日(1802年5月1日)的法律，把初级学校交给公社市政当局管理，就象在旧制度统治下那样。波拿巴和当时大批资产阶级人物都同以前的伏尔泰抱有同感，他们认为，教育穷人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都是件麻烦事。至于为培养教育未来领导人物的传授专门知识的

① 多马(1625—1696年)和波蒂埃(1699—1772年)，法学家，曾整理旧制度下法国各省因地而异的法律，为大革命时期的立法工作和《民法典》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译者

中级学校，情况就不同了。这些学校是仿照普利坦内——原来通称为路易大王中学——建立起来的，这所学校是法国革命唯一保留下来的旧学校；在督政府时代，该校曾恢复为寄宿学校，新办的“中央学校”就沒有。共和八年(1800 年 3 月 22 日）当时的內政部长吕西安·波拿巴对它进行了改革。每个上诉法院管辖地区都要有一所国家提供经费的国立中学。同时也规定有由私人开办、但由政府批准和监督的中级学校；共和七年，政府开始指派这些学校的教师。政府在国立中学设立了六千四百份奖学金，其中两千四百份授与军官和政府官员的子弟，其余四千份留给中级学校的优等生。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奖学金迎合了“空论家”的愿望；但在实际上穷人是申请不到奖学金的，它成为只是对文武官员有利的补助金，成为使小资产阶级依附于大资产阶级、并把其中最优秀分子吸引过来的诱饵。他们成为公务员或经济部门的领导者，就不再会有变成动乱的因素的危险了。私立教育机构原则上继续存在，虽然塞纳郡郡守弗罗肖最少在巴黎有权批准和监督这些学校。天主教的教士立即从这种宽容中得到了好处，在有关初级教学的问题方面，波拿巴从沒有给教士设置任何障碍；基督教学校的修士再次变得活跃起来，并于共和十二年在里昂建立了一所学院。因为他不重视妇女教育，所以便允许恢复了一些培养修女的修道会。可是国立中学和教会男子中学彼此间很快就发生了冲突；这导致拿破仑对各级国民教育都实行了控制。

然而，正在波拿巴确立资产阶级的社会权势时，他却已在表现对这个阶级的不信任。他在参政院谈到财富时毫不留情地说：“不能把财富当作某种资格、权利的证明。富人往往是一无所长的懒汉，富商则通常只是依靠高价出售或偷盗而致富的。”他对金融界人士更沒有好感。很清楚，他并不是反对各种形式的财富，而只是抨击反对那正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动产。首先，它是一种不易控制

的财富，不论是对它实行征税还是没收。其次，它每时每刻产生出一些新人物，这些人无所凭借因只靠自己发财致富而感到自豪，并且更小心翼翼地维护他们的独立性，因此他们趋向于打破波拿巴竭力建成的社会结构。为了登上帝位，波拿巴自然转向拥护君主政体的各派，而在君主政体下，君主依靠土地贵族的支持，反过来他则保证贵族对农民的奴役。这一理想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时波拿巴甚至还没有考虑要重建贵族阶级；但是他已想要与反革命和解，这是出于个人偏爱，而不是从民族利益考虑。在共和十年宪法颁布之后的几个月里，使那个时代的人最感诧异的就是这种和解的进展。 147

教务专约按部就班地在实施。埃梅里深恐拿破仑侵越专约规定的权益，便在圣使卡普拉拉的左右对勒絮尔方丈施加影响，使卡普拉拉倾向和解，而波塔利斯有时虽不免流露对"高卢主义"传统的依恋，却也尽力使卡普拉拉感到满意。

在新任命的各级僧侣中，顽抗派占了优势，这是势所必然的。原来的宪政派的主教也因政府加以限制，不得不让顽抗派教士占优势，如果不是这样安排，他们也找不到足够数量的宣誓派教士。例如在下来因郡，宪政派主教索里內在三百五十一名教区和小教堂神甫中，只能派十六名"宪政派"教士，还占不到百分之五；至于原先虽属顽抗派主教，如加来海峡郡的拉图尔·德奥弗涅和北滨海郡的卡法雷利，却派了约百分之十二的宪政派教士，前者在六百三十四个圣职中派了七十八个，后者在三百四十个圣职中授与"宪政派"教士四十三个职位。另一方面，有一些前顽抗派主教迫使1791年的宣誓派教士宣誓顺从，这就等于要他们悔过；即使郡守们反对这一做法，充其量也只不过是能使宣誓书的措词搞得含糊些罢了。宪政派主教遭到了他们下属教士的无礼对待，而普通神甫的遭遇则就更坏。富歇在他发出的通报中坚持应维护信仰自由，

他不加掩饰地认为有权把主教看成政府雇员或警察的辅助人员，即视为精神的宪兵队。然而他失宠了，波塔利斯几乎总是站在反对郡守一边。为了安抚主教，加来海峡郡和罗讷河口郡的郡守终于被撤职了。从共和十年“组织条款”一颁布就遇到重重障碍。高级教士被尊称为“阁下”；教士服装又重新出现了；宗教仪仗和教堂钟声又自由地恢复了；主教被允许把“承天主慈悲与圣座恩典”加上他们的称号。波塔利斯虽然不掩盖他个人的感情倾向，但他拒绝强制规定礼拜日休假，他认为习惯很快就会形成自然。他准许恢复教堂婚礼公告；尤其赞助主教竭力想获得监视政府官员的权利。他写信给尙皮翁·德·西塞说：“在向政府报告涉及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方面，您处于比任何人都更为有利的地位。”布伦的县长马斯克莱虽然对教士不信任，但仍然告诫他属下的市长，不论他们个人的信仰如何，由于职务的约束，他们仍然应遵奉宗教。

148

低级的不享有薪俸的教士立即抱怨起他们的可悲境况。农民对他们沒有敌意；但多数人对他们很冷淡，沒有人愿意养活他们。虽然“组织条款”规定宗教礼拜是免费的，但是信徒的捐款要分配给教区神甫和分教区神甫，而捐款的旧习惯就迅速地恢复了。主教开始公布预期的捐赠数额，并且获准成立旨在保证教区物质福利的委员会。不领薪俸的低级教士既不能从信徒那里得到住所，也得不到薪俸，因此波拿巴从共和十一年开始迫使行政机关“考虑”这些事情；他还把沒有卖出的教会产业还给了教区神甫。这些措施收效不大；但是不久到了帝国时期，国家对于教会变得日益慷慨起来。这样教务专约就成为天主教教士扩大影响的起点，从而为他们后来在复辟时期的得势做了准备。

亡命者的归国沒有象教务专约那样激起舆情大哗，但是此事仍然给人们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值得一提的是，波拿巴在就任终身执政时曾收到许多祝贺信，但在颁布大赦令时则连一份都

没有收到。在此后十年里大赦令把亡命者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象对其他人一样，只要发出“密扎”就能够把他们监禁起来。因此，他们通常都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但是这既不能限制他们横行乡里，也不能阻止他们企图强迫那些买下他们产业的买主归还，或让赎买回他们的产业。国有产业的买主大为惊慌，特别是自从1803年7月23日波拿巴下令清算买主未付清的差额，就更引起了人们的忧虑，人们甚至竞相拍卖，因为这给人们造成的印象是产业出售本身可能成问题。如果一任波拿巴为所欲为，1793年7月17日那项曾无偿地废除封建地租的法律就可能会被修改，从而既给业主补偿又可增加国库收入，这些地租有许多同国有产业有关。可是波拿巴不敢无视参政院的决定，1803年2月19日该院宣布决不能修改这一法律。一些回国的亡命者已经参加了政府工作：塞居尔被派到参政院；塞吉埃在巴黎上诉法院任职，吕伊纳公爵进了元老院；1804年约瑟夫-玛丽·德·热朗多成为内政部的一个司长。另一方面，波拿巴还使他的一些高级军官如朱诺、内伊、拉纳、奥热罗、萨瓦里同贵族的女儿结了婚；但也有几个人，如迪罗克和马尔蒙，则宁愿同金融家通婚。

149

融合在一起的气氛在第一执政的宫廷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很快地使杜伊勒里宫比马尔梅松表现出更多的旧制度的气象。迪罗克已经是杜伊勒里宫的总管；1802年11月，约瑟芬得到一种正式的显贵地位，从那时起她就由从旧贵族中选出的四名贵妇陪随。就是在这四名贵妇的陪伴下她同波拿巴到比利时去的。宫廷的礼仪规定越来越细；波拿巴本人穿起丝袜，在佩剑上系有“摄政式”的绒球。老百姓再次被那些装束、车辆、身着制服的随从、祝宴和歌剧院的化装舞会弄得眼花缭乱。当波利娜·波拿巴的丈夫勒克莱尔将军于1803年1月在圣多明各去世时，宫廷丧礼也恢复了。1802年8月15日，一个新的圣徒节，圣拿破仑的节日被规定下来；

而7月14日和葡月1日的共和国节日的庆祝只是为了摆摆样子而已，到1804年就停止举行。1803年，硬币铸上波拿巴的肖像。

沙龙也紧紧追随着宫廷的情调。这个新兴的贵族阶层与暴发户和金融界人士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波拿巴为这个贵族阶层规定了一些礼仪，这是革命前的贵族所不具备的。他使约瑟芬离开了她以前的好友塔利昂夫人和阿姆兰夫人，并且唤起了妇女们的品德观念。但是这种严格的伦理永远只不过是表面的粉饰而已，波拿巴本人就是恣意寻欢作乐的人；他关心的只是保持外表的丰采，并且给别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事实上，这个社会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社会，它因为十八世纪的贵族太不“检点”而谴责了他们的闲散和放纵。此外这个阶级的演变还远未完成，“荣誉军团”的命运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波拿巴由于独自任命了军团的“大政务会”成员而破坏了他自己制定的法律，于是推迟对“军团”成员的任命。他已经感到，由他建成的这一组织似乎与法国革命的记忆的联系太紧密了。

到1802年末，许多征兆已昭然若揭地显示了波拿巴的真正意图。这样，从民族的角度来看，亚眠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波拿巴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法国人民的最大要求莫过于和平，波拿巴已给了他们和平；他们热爱法国革命的社会成就，而波拿巴维护了这些成就。对自己的领袖感到满意和自豪的法国人民还没有开始意识到他正在滥用权力，也没有意识到他要做的事都是违反他们自己的利益的。但是他们不希望他们的领袖成为皇帝，更不希望他创造一个新的贵族，但此时波拿巴的内心里已经同共和国以及平等的观念决裂了。他们对自然疆界的获得很高兴，并且丝豪不希望超越这些边界，但此时他们的主人却已经这样做了，这就使得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法国人民仍然把他视为民族英雄，但正是在这一时刻他已经不再是这样一个人了。

第三编　提尔西特条约前帝国的对外征服（1802—1807年）[1]

151

波拿巴的同时代人以及早期论述他的史学家，都用所谓拿破仑的“野心”来解释帝国的对外征服和帝国本身。当然不是说有野心就可以为所欲为，还要有机会，他的野心抓住了这些机会，而如果明智占了上风并考虑民族利益，他本应放过这些机会。后来的 152 一些史学家认为，这样用“野心”解释似乎过于简单化。这些史学

---

① 全编参考书：

关于拿破仑的外交政策，提出主要论点的有：

梯也尔：《执政府与帝国史》，共二十卷（巴黎，1845—1862年）；

索雷尔：《欧洲与法国革命》，第6—8卷（巴黎，1903—1904年）；

布尔热瓦：《对外政策史纲》，第2卷（巴黎，1900年，第六版，1920年）

德里奥：《拿破仑与欧洲》，共五卷，（巴黎，1910—1927年）；

阿尔蒂尔-莱维：《拿破仑与和平》，（巴黎，1902年）。

以上主要论点经皮埃尔·米雷加以概述和评论：《拿破仑一世对外政策的一个新见解》，载法国《近现代史杂志》，第十八卷（1903年），第177—220页和第353—380页。在梯也尔看来，拿破仑的主要目标是击败英国，英国的对策就是煽动组成反法同盟；但是拿破仑的野心也有助于挑动起反法同盟。布尔热瓦也认为拿破仑总想进攻，其原因则是遐想东方的幻景。德里奥发现拿破仑有一个雄图大略：首先以加洛林帝国为模式，然后以罗马帝国模式而重建欧洲的统一。在索雷尔看来，拿破仑只不过是在捍卫自然疆界，而自然疆界的取得不断引起反法同盟一再组成；法国合并许多地区其目的在于保卫自然疆界以后免受侵略（班维尔的《拿破仑》，巴黎，1931年，完全照搬索雷尔这一论点）；而阿尔蒂尔-莱维甚至声称拿破仑是一贯盼望和平的。米雷在他杰出的文章中指出，上述这些论点没有一个能说明全部史实，米雷的意见是：不能把拿破仑的政策归结为一个单一的和明确的目标，一旦达到这个目标，他就会完全心满意足。从根本上

家中的一派只愿意把波拿巴看做是法国自然疆界的捍卫者：共和派使他出来任第一执政，继而又让他当皇帝，目的就是为了要他替他们保住自然疆界，这项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是法国大革命遗留下来的不幸的遗产，这迫使他去征服欧洲，并且终于毁灭了他。这一派史学家认为他是大革命的战士，他所做的一切无非为了自卫而反抗欧洲旧制度下的帝王；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些史学家不过是照搬"老兵"们的偶像崇拜所形成的、后来拿破仑本人又在圣赫勒拿岛上散布的神话传说。另一派史学家不愿贬低个人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反对把拿破仑仅仅看成是命运的工具，他们坚持要从他本身找出他的政策的原动力，他们认为可以从贯穿他的政策的宏图壮志中找到这种原动力。在一些人看来，这种宏图壮志就是要夺取英国的海上霸权，这样看来，波拿巴的历史，至少从亚眠和约破毁以来的历史，只不过是路易十四发端的对英斗争的最高潮，因此是与旧法国的传统一脉相承的。在另一些人看来，招致他坠入深渊的是遐想东方的幻景。还有一些人认为，他与其说是个法国的人物，不如说是个欧洲的人物，因为他想首先恢复加洛林帝国①，然后重建罗马帝国——西方的和基督教的文明的一统天下。

来说，米雷的话是正确的：只有年事渐高，或可使拿破仑性情变得沉着起来，对外征服或能中止。然而上述其他各家的论点仍各有其价值：拿破仑战争确是英法争夺海上和世界霸权的最后阶段；各大强国无疑都希望一旦时机许可就夺回法国所征服的地方。从1806年起拿破仑即想把欧洲大陆组成一体，这种趋势是很明显的；我们甚至可以同意，如果听任拿破仑为所欲为，他也会非常乐于保持和平。最后，欧洲与拿破仑为敌，也可用贵族对革命的法国和对这个暴发户的深仇大恨来解释，而令人诧异的是：上述史学家中竟无一人主张这一论点。遐想东方的幻景的作用似乎是最无足轻重的论点。

晚近又讨论这一问题的有多伊奇著：《拿破仑帝国主义的起源》（美国，坎布里奇，1938年），但未提出任何创见；还有在勒努万主编的《国际关系史》第四卷，《法国革命与拿破仑帝国》（巴黎，1954年）一书中，著者菲吉埃主张"民族仇恨"之说，并强调旧欧洲反对拿破仑的斗争具有"深刻的"社会性质。

① 加洛林帝国（800—987年）为查理大帝所建，其皇朝即因查理之名而称为加洛林皇朝；帝国据有今西欧法、比、瑞士、西德和北意大利大部地区。——译者

在上述各种解释中，每一种都包含一部分眞理，但都是以偏概全。那些捧波拿巴上台的人确实想要保住自然疆界，而为了捍卫自然疆界就可能试图越过这些疆界；但是，如果认为这就是唯一的，或最可靠的保卫自然疆界的办法，并且认为他在扩大征服时一心想的只是民族利益，那也是不确切的。英国确实是与他周旋到底的顽敌，并且一打垮了他，就断然地战胜了法国；但是，如果他果眞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专只针对英国的计划，那他对大陆的政策就会迥然不同；曾造成很多问题的大陆封锁本身就是大帝国建立的产物，并不是建立大帝国的原因。沒有比长驱直入君士坦丁堡或印度更能使这位新的亚历山大大帝①乐意的事了；但是，除一时心血来潮而外，他的大部分事业同这种梦想沒有联系。他常自比查理大帝与恺撒，有意把西方世界从政治上联合起来；但是，驱使他行动的决不是存心复古。关于拿破仑的传说揭露了反法同盟帝王们对法国大革命战士的深仇大恨，可见传说之中也有眞知灼见。而令人惊异的是，有很多史学家竟忘却了这一点；但是，拿破仑并不是限于防御而已。 153

沒有任何合乎理性的解释可以把拿破仑的全部对外政策统一起来，因为他同时在追求几个不同的目的，有些至少在我们现在看来是彼此矛盾的。归根结蒂，还是要回到他的"野心"上来。然而，他的同时代人由于目睹喧嚣一时的穷奢极侈的新的豪华排场、放荡的胡闹、贪婪的皇族的争吵、官吏的贪污盗窃，因此虽不否认其天才，但鄙视其"野心"，视之为与常人无异。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形象清晰了，显示出他的奥秘在于：勇于冒险、迷于幻梦、任性冲动而不能自制。

---

①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约356—323年)，马其顿国王，二十岁即位，曾征服希腊、埃及、波斯，直到印度河。——译者

154

第一章　法国和英国：战端重启（1802—1805年）

从亚眠和约到1805年战争之间，在这段关键性的岁月里，拿破仑的个性特征比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为明显。同英国签订的和约只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只要大陆战争沒有重开，使波拿巴能在1799年上台的解决办法——一个扩大了领土而爱好和平的法国同称霸海洋的英国对峙——并沒有被废弃。普莱斯堡和约之后，问题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一、波拿巴的经济政策与亚眠和约的撕毁

阿丁顿内阁决心认眞试行保持和平，并且相信和平会保持一段时间；这是很难加以反对的。他废除了所得税，把海军开支削减了二百万英镑。海军大臣圣文森特暂时停止造舰，并且解雇了海军造船厂的工人。木材供应商由于他着手调查他们侵吞公款的案件，和他闹翻了，于是造船厂的材料供应很快就断了。然而政府在自己党內遭到了反对。托利党內持不同意见的人相信，和平会使法国重新武装起来，从而对不列颠帝国发动新的袭击，所以他们就象一百年前辉格党人一样呼吁作战到底。这些托利党的反对派控制了一部分报纸，法国的亡命者佩尔蒂埃帮助他们咒骂法国革命和波拿巴的军事独裁。英国商业界人士在托利党这两派意见之间举棋不定。和平危害着很多行业的利益：许多军事工业苦于停工；英国商人就要失去他们对波罗的海和德意志商业的垄断，尤其

155

156

是失去了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归还法国的殖民地意味着英国贸易的减少，仅仅荷属圭亚那的贸易就减少了一千万英镑。最后，在亚眠和约签定之后，世界市场的价格大大下降，以至中立国，特别是美国，也认为和平是一场灾难。然而一般都认为这些不幸只是暂时的。这些托利党人敲起的警钟给人留下了一个印象，但在海上和殖民地，危害似乎还不是迫在眉睫。至于大陆，英国舆论对它并不过于关切。真正问题却是要弄清楚：波拿巴是否会把法国及受它控制的一些国家的广大市场向英国的商业重新开放，因为假如不建立对英国人有利可图的商业关系，英国人就不会长期容忍这项条约的存在。1802 年 5 月，外交大臣霍克斯伯里重申，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人赞成和平，就需要加速重建商业关系。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一执政的经济政策。

拿破仑同一切开明专制君主一样，总是非常注意经济的进展；这的确不是因为它能改善人民的处境，并使平民各阶级分享文明的成果，而只是出于政治的动机。因为发展经济就有希望建立健全财政，有利于人口的增长，从而使军队获得新的兵源，最后由于减少失业和增产粮食，从而确保"秩序"。因此，他对各种不同的生产部门的关注是不平衡的。一心考虑着战争的拿破仑对商业界和金融界是不信任的，因为这两界的活动是超越国家界限的，并到处同英国有密切联系。他对工业很感兴趣，尤其关注那些消耗本国原料的工业。他认为，一个军事大国的力量，象斯巴达或罗马这样军事强国的力量，是寓于农业之中的；农业提供好士兵，在必要的时候，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是重农主义的，随着他疏远资产阶级而考虑重新创立土地贵族，他就从另一个方面来接近这个学派。然而，正象往常一样，每当他遇到具体困难，他从来都不屑拘泥于一家的学说。虽然他偏爱农业，他却总是不愿给予出口粮食的权利，因为正象共和十年的经验所证明，面包价格一上

157 涨就会引起群众的骚动。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和一般平民想法一样，痛恨囤积粮食投机的商人和粮农的“利己主义”。工业危机使得工人失业，引起了同样的问题；所以他需要非常照顾棉纺工业，尽管它所使用的是进口原料。

在波拿巴所面临的一切实际问题之中，最需要他注意的是货币问题。英国是允许适当的有控制的通货膨胀的，它使物价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因而对生产起到了刺激作用；而法国除了银行发行的有限的纸币外，仍然不得不使用硬通货，这种通货总是被人贮藏起来，因此总感到金币不足。这种情况使法国的经济遇到了麻烦，因为资金继续不足，而且昂贵。波拿巴总是不断责备法兰西银行在贴现商业证券方面所持的过分谨慎态度，他很想看到这家银行在外地多设分行，使信贷得到广泛使用。硬币的不足使国库负担沉重，因而对国家的财政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发行指券失败之后，波拿巴无论如何不愿采用纸币，因为用纸币就要用政权力量去强制流通，这样势必有损他的威望。象科尔贝尔①在类似的情况下必须为路易十四解决财政问题一样，波拿巴也转变为重商主义者，他认为，法国必须少从国外购买货物并增加出口，或征服外国，以取得金属而保护其硬币的供应。

因此执政府尽力鼓励生产，特别是生产奢侈品。1800 年建立的统计局重新进行由救国委员会和弗朗索瓦·德·纳夫夏托②所开始的调查工作。它通过郡守从事法国经济和人口的调查，而且在随后的几年里发表了调查结果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为了统一国内市场而采用了十进位的公制，不过这种公制只是很缓慢地才获得通用。共和十一年芽月 17 日（1803 年 4 月 7 日），把货币制

① 科尔贝尔(1619—1683 年)，1664 年起任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译者

② 弗朗索瓦·德·纳夫夏托(1750—1828 年)在督政府时期曾任督政官(1797—1798 年)，后改任内政部长，进行了一些改革，包括首次举行人口普查等。——译者

度固定在金与银的为一比十五又二分之一的比率上，但是，由于贵金属缺乏，不能保证铸造足够的硬币来代替旧通货。然而新政权坚决稳定货币，因为法郎的法定价值以白银为依据(一法郎为四又二分之一克纯银，或五克九成纯银)。而旧制度下的里弗①从来没有过法定价值，所以计算上的货币和实际使用的货币在价值上第一次完全相符。商业的管理委托给了一个总委员会；随着帝国的诞生，商业管理又由参政院中的一个组负责。1801 年 3 月 19 日，商业交易所改组了；1802 年 12 月 24 日，商会重新出现了；1803 年 4 月 28 日，十六个海港被指定为国际贸易港，并准予建立保税仓库。1801 年底，在夏普塔尔的主持之下组织了一个"全国工业促进会"；作为内务部长，他恢复了督政府时期举办工业展览会的做法。1803 年 4 月 12 日，制造业公会出现了。巴黎农业协会则于 1798 年就已重新成立起来。波拿巴和科尔贝尔一样，本性就倾向于通过行会进行管理。工匠会因为恢复了他们的垄断权而高兴，某些商人会欢迎那些针对家庭手工业者或雇工的管制规定。警察厅长以"公共秩序"为借口设法把面包商和屠宰业各组成公会。可是，第一执政当时还不敢走得更远，因为受到参政院支持的银行家和大实业家都强烈反对任何限制劳动自由的规定。共和十一年芽月 22 日 (1803 年 4 月 12 日) 法律只限于规定商标注册制度。另一方面，财政状况也不容许波拿巴按他本来的意愿那样大举兴办公共工程，同时也没有能力直接资助鼓励私人企业；甚至稍后到资金较为宽裕时，拿破仑也拒绝直接资助私人企业；他只给加工订货，并在经济发生危机时，为了避免失业现象，拨出贷款给私人企业建立库存。因此在科尔贝尔的制度中，还没有使用的只有保护关税而已。

许多强有力的理由表明应当采取最后这一步骤。让一巴蒂斯

158

① 法国古银币，约重五克，汉译或作"锂"。 ——译者

特·萨伊所极力主张的自由主义经济还远未被人们普遍接受。费里埃在 1805 年出版的《论政府与商业的关系》一书中仍然坚持科尔贝尔的重商主义。甚至在亚眠和约签订之前，有人就不断攻击英国的走私活动，战争一结束，走私活动更为猖獗。棉纺工业家大喊大叫地说，如果又恢复 1786 年条约①，则随着该条约产生的严重危机势必重现。织布业依然是极其繁荣的，纺纱业虽然有些进步（棉花进口量前十年的年平均数五百万公斤，到共和十二年上升为将近一千一百万公斤），却不能满足人们的期望。尤其是在高支纱方面，无人能与英国工业竞争。波拿巴沒有撤销督政府对英国商品的禁令；他并且在 1802 年 5 月 19 日还批准暂时提高关税率，对英国殖民地商品的征税至少比法国殖民地的同类商品高百分之五十。

159

在亚眠和约以后，波拿巴并非不愿和英国订立一项商务条约。科克贝尔·德·蒙布雷和一些商界代表被派往伦敦；英国提议恢复 1786 年的条约，但可适当修改，并允许法国采取一些临时措施照顾本国工业。1802 年夏天，商会宣称断然反对禁止英国商品进口，夏普塔尔建议政府接受伦敦的提议，同时要求英国按从葡萄牙进口雪利酒和波尔图酒的同样条件准许法国酒类进口，并且也允许法国丝绸输入英国。他也忠告法国不要把关税定得太高。他说："我在等待我们的工业家开始大声疾呼。"如果给工业家适当照顾的话，这个方案是站得住的。科克贝尔却提出相反的建议：法国输入英国多少商品就准许英国输入法国相等价值的船货。夏普塔尔反驳道，这样的建议意味着颁发特许证，并会造成只对少数人有利的对外贸易垄断。夏普塔尔称之为"荒谬"的特许证制度事实上

① 1786 年的英法条约减低了英国货物输入法国的关税，以致英货充斥法国市场，打击了实力较弱的法国工业，造成了大量工人失业；法国制造业的资本家和工人都对政府不满。这个条约加深了 1789 年革命前夕的经济危机。——译者

就是后来在1811年实行的办法。在自由竞争和禁止通商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制定适当的保护政策的余地，如果取得英国同意的话，这是夏普塔尔所倡议的，也是法国工业非常需要的。波拿巴要在大工业家的要求和民族利益（它需要和平）之间作出抉择。最后他事实上支持了禁止通商。

波拿巴对维护和平是不感兴趣的。他告诉蒂博多："一个第一执政不同于那些蒙上帝恩典的帝王，他们把他们的国家视为世袭的财产……而第一执政需要取得辉煌的成就，因此他需要战争。"他很谨慎而不公开说出这种想法，因为国民不会赞成这种想法。"让外国人先开仗，这对我更为有利。"但是，他补充说，"他们将是首先再动武器的人。"他既抱这种态度，当然就会鼓励他们先动手。无论如何，禁止通商保证了硬币的积累，有助于备战工作，直到变成一项战争的武器，法国大革命期间就是如此。人们认为建立在 160 举债和通货膨胀基础之上的英国经济和财政结构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脆弱了。奥特里夫于共和八年、盖尔于1801年、拉萨尔于1803年，还有《政府通报》本身都用各种笔调反复表达这一意见。虽然威胁法国的危险毫无疑问地存在着，然而法国却又错误地认为自己单枪匹马就能使英国在经济上遭到毁灭。波拿巴也大有这种错觉，因为作为一个军人、一个独裁者，他蔑视这个既无陆军和又无政府可言的商人寡头统治。他把英国比作迦太基，而他自己则要扮演伽图和西庇阿①的角色。商业条约已无人再提：有一些商船被拿捕了，因为发现它们运载了英国的货物。然而法国的对外贸易从1799年的五亿五千三百万法郎上升到共和十年的七亿九千万法郎。英国资本家知道经济斗争将会继续下去，他们厌

① 伽图（公元前232—147年），在罗马反对迦太基的"布匿战争"中坚决主张摧毁迦太基。西庇阿（公元前235—183年），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大败迦太基的罗马将领。——译者

弃这种对自己毫无好处的和平。

因为殖民地产品是法国对外贸易的主要项目之一，所以尽早收复仍旧属于法国的安的列斯群岛就成为当务之急。甚至在亚眠和约签订之前，波拿巴就向圣多明各派遣了一支远征军。杜桑-卢维杜尔这时控制了全岛，而且于1801年5月9日颁布了一部宪法，名义上仍属于法国，实际上归他自己统治。然而他终于向法国远征军首领勒克莱尔将军投降，但却在1802年6月7日被捕，解送法国，1803年4月7日死于法国日乌堡里。与此同时，里什庞斯再度占领了西印度群岛中较小的岛屿。虽然英国不能再阻碍法国去征服安的列斯各岛，但却不安地注视波拿巴对路易斯安那的计划：北海沿岸正在准备一次远征，打算把维克托将军派往那里去。舰队预定在1803年3月启航，但是出发的时间推迟了。在准备远征期间，西班牙已禁止美国船航行密西西比河。由于法国和西班牙是盟国，荷兰受法国控制，所以墨西哥湾似乎任凭波拿巴的摆布，从而也控制了西属西印度群岛上的走私，法国在这里处于一种有利的特权地位。然而，这种前景不必英国出来干预就消失了。若干时候以来就垂涎西属佛罗里达的美国不希望看到法国在新奥尔良立定脚跟。新当选的总统杰佛逊同他的国务卿麦迪逊和加勒廷试图实行共和党的和平、裁军和压缩开支的纲领。纵然杰佛逊对法国有好感并对莫尔丰丹尼条约的签订感到高兴，他却不能不顾美国的舆论。因此他透露：如果法国留在路易斯安那，美国在即将来临的战争中将参加英国一方。1803年4月12日，杰佛逊的大使门罗到达巴黎，带来一项波拿巴已经同意的建议：购买路易斯安那的领土。随后于5月3日签订的条约规定给波拿巴八千万法郎，在扣除应付美国的赔偿，并给办理交款的银行家霍普和巴林的佣金之后，只剩下了五千五百万法郎。

这时，起义已经遍布圣多明各全境，这是由于恢复奴隶制引起

的。在波拿巴身边的亲信随从里，白人种植场主的代言人很多(更不用说约瑟芬本人了)，他们认为奴隶制是在殖民地迅速恢复生产的最得力的方法。但是，恢复奴隶制并不是迫切需要的，因为，甚至在已经实行共和二年雨月16日法令①的殖民地，督政府的特派员和杜桑-卢维杜尔本人都已经实行了强制劳动。波拿巴最初倾向于确认这个制度，而把奴隶制仅限于存在奴隶制的岛屿上——例如在马斯克林群岛，那里把国民公会法令视为一纸空文；又如英国占领下的马提尼克岛，那里从来没有能接到这项法令。最后，波拿巴让步了。的确，1802年5月20日法律明确规定在殖民地将"保持"奴隶制；人们从这条法律可以推论出，在已经废除奴隶制的地方，就不再恢复奴隶制。但是，波拿巴却作出另一个决定，他命令里什庞斯在瓜德罗普岛重新实行奴隶制，因而激起了一次起义。在圣多明各，勒克莱尔宣称实行这一措施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但是，黑人都知道将要遇到什么不幸的事了，9月，杜桑的部将克里斯托夫和德萨利纳轻而易举地在全岛发动了起义。法国军队由于黄热病而大批死亡，迅速遭到削弱。勒克莱尔病死，他的继任者罗尚博是种植场主的支持者，他在进攻黑白混血人的战争中使法军伤亡殆尽，由于波拿巴禁止这些混血人进入法国和与白人通婚，已经激怒了他们。太子港法军于1803年11月9日投降，少数被围困的驻防部队设法苟延残喘到1811年。

英国人虽不喜欢看到法国重建它的殖民帝国，但他们也不会为阻止它这样做而提早重新开始战争的。但是，威胁英国的属地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而这恰恰是波拿巴所干的。一个新的宏伟的设想激励着他向地中海方面扩张，这就是说，目标就是埃及。亚眠 162
和约终于使土耳其人决定同法国人签订和约（1802年6月26

① 在雅各宾专政时期，1794年2月4日国民公会通过的法律，在法国全部殖民地上废除奴隶制。——译者

日），并为法国人开放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海峡。一个名叫吕芬的法国代办立即着手在地中海东岸各国重建领事馆。法国在1801年和1802年还分别与的黎波里的帕夏和突尼斯的别伊缔结了条约。1802年8月，一支舰队强迫阿尔及尔总督也同法国订立了条约。君士坦丁堡已经很担心法国在伯罗奔尼撒、艾奥尼纳和塞尔维亚人中间搞阴谋，并且感到有被瓜分之虞。8月底，塞巴斯蒂亚尼上校经过的黎波里前往埃及，然后又访问了叙利亚，他到处都设法和本地的首领建立联系。卡韦尼亚克被派往马斯喀特；德凯恩于1803年3月6日启航前往印度，随行的重要参谋人员之多足能把印度士兵组成若干团队。所有这一切使得英国得出结论，波拿巴正在计划对埃及和印度发动一场新的进攻；为了谨慎起见，一定不让他完成准备工作，特别是不能放弃马耳他岛。但是，英国人继续占据该岛就是破坏亚眠和约。

波拿巴在欧洲大陆的政策给英国人提供了不交出马耳他的借口。波拿巴不顾席梅尔佩宁克的再三要求，拒绝从荷兰撤军，他辩解说，和约的条款还没有履行。虽然波拿巴放弃了那不勒斯的各港口和教皇各属邦，他却在1802年8月吞并了厄尔巴岛，9月吞并了皮埃蒙特，10月在巴马公爵去世之后占领了巴马。在瑞士，法国军队刚刚撤完，雷丁就在1802年8月27日夜间领导山区的一些州起义。起义者在施维次召集了议会。苏黎世、伯尔尼和弗里堡都在其掌握中。合法政府到洛桑去避难，答应沃州起义农民废除封建赋税，同时允许以国有产业来赔偿地主的损失，可是并无任何效果。因此，这个政府只好向波拿巴请求援助。第一执政于9月30日进行调停，强迫起义者解除武装。内伊进军瑞士，议会从英奥两国那里只听到一些好听的话，却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只得自行解散，雷丁被捕。12月10日，在巴黎召开了一个协商会议，指派了一个委员会同几名法国元老院议员一起讨论波拿

巴关于制定宪法的计划。波拿巴命令委员会为各州草拟宪法，草拟的条文后来附入1803年2月19日的“调停条例”中。十九个州各都有自己的宪法，大都规定了有财产资格的选举权，尤其在以前由贵族统治的各州里是如此；在那里，宪法规定保证革命前的城市贵族的统治。这些州恢复了大部分自治权，特别是处理国有产业和解决封建赋税和宗教事务的权利。这就使得反动势力几乎在各地 163 都取得了胜利，宗教自由只在原已存在的地方才得到了保证。表现国家统一的就只剩下各州的平等权利，它们被禁止各别结盟，瑞士人在全联邦居住和拥有财产的自由，国内关税壁垒的废除，以及一个软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包括一个议会，每个州根据其重要性在议会有一个或两个表决权，还包括一个行政长官，即联邦主席的官职，由六个主要的或者说“执政的”州的首领轮流担任。波拿巴指定路易·达弗雷为第一任总督，他是一名法国的瑞士卫队前任军官，代表弗里堡州。1803年9月27日，瑞士联邦和法国签订了一项为期五十年的防御同盟条约，并且重订了为法国招募四个团、每团四千名新兵的条款。但是联邦却没有常备军，而且波拿巴甚至不允许瑞士成立总参谋部。

与此同时，法国利用根据吕内维尔和约规定补偿来因河左岸被剥夺了的王侯的机会，在德意志扩充势力，进展很快。德意志帝国议会曾拒绝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解决这个问题，并授权一个委员会就此事与法国相商。奥国外交大臣科本兹企图以提议结盟来对法国施加影响，但却徒劳无益。波拿巴和俄国的亚历山大已经同意共同解决此事。事实上，以普鲁士国王为首的所有德意志王侯都去巴黎谈判，他们以合计总额达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法郎的巨款贿赂塔列朗，以保证尽可能争得最好的土地。乔治三世自己接受了奥斯纳布吕克主教邦。美因兹的选侯达尔贝格热心为法国效劳。唯有萨克森很不高兴，因为它没有要求补偿的权利。1802

年6月3日，法国和俄国邀请帝国议会批准在巴黎制定的计划。奥国表示不赞成，并且占据了帕骚，此地是决定要给巴伐利亚的；但是在各王侯的一致抗议下，奥国不得不撤离帕骚。最后是波拿巴在12月26日缔结的条约中为它保留了一块地方，从而挽回了奥国的面子。1803年2月25日德意志帝国议会批准了"帝国大法"。

这个新的帝国组织法废除了各教会邦国，从而完成了1555年和1648年的世俗化过程，[1] 同时把五十一个自由市减为六个。普鲁士获得了几个主教邦：帕德博恩、希尔德斯海姆、埃尔富特和明斯特的相当大一部分；巴伐利亚得到了弗赖津主教邦和帕骚的一部分；巴登得到了曼海姆和海得尔堡两城市，以及斯皮尔、斯特拉斯堡和巴塞尔等各主教邦的在来因河右岸的领土；其它各邦则按其比例大小各分得一份。分得最少的奥国获得了布里克森和特伦特两个主教邦以及帕骚主教邦的一部分；它把布赖斯高和奥尔特瑙割让给了摩德纳公爵；由于奥国的影响，托斯卡纳大公接受了萨尔斯堡和艾克斯塔特主教邦。奥国沒收了它自己领土內被剝夺了的王侯们的土地和财产。

164

对于罗马天主教会来说，1803年的"帝国大法"是一场大灾难，它可以与十六世纪的大灾难相比：教会丧失了将近二百五十万臣民，损失了岁入两千一百万弗罗林；十八所大学以及所有的隐修院脱离了宗教控制；在大主教选侯中，经过这次大改组之后幸存下来的只有美因兹的达尔贝格，而他又被调往累根斯堡。奥国除丧失其威望之外，还眼看着神圣罗马帝国难保，因为符腾堡、巴登与黑森—卡塞尔等新教各邦都成了选侯，就使得新教徒在德意志各

① 1555年的奥格斯堡条约结束了路德教派诸侯同天主教诸侯的混战；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条约结束了"三十年战争"。这两次条约都加强了世俗诸侯的地位。——译者

邦中和在选帝侯中都一跃而为多数。尽管奥国竭力想保住帝国骑士[1]和各骑士团地位，在“帝国大法”中为他们争取到保留规定。但他们不久就消失了。德意志领土的打乱调整，只有法国能从中取利，因为整个南德意志都倒向法国一边来反对哈布斯堡王室。普鲁士取得很多，但仍未能满足它的欲望；为避免与英国发生纠葛，普鲁士不敢接受汉诺威并同法国结盟的建议。随着和平的降临，普鲁士不再能控制北德意志。1802年6月10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梅默尔会见了俄国沙皇，亚历山大在那里和路易莎王后发生暧昧关系，这种关系使他后来一直和霍亨索伦王室联在一起，但是普鲁士国王感到他自己不像是俄国的同盟者，倒象是俄国的被保护人，所以颇感受到轻视。

英国目击了这一切巨变，但却无能为力。这些变化纵然没有破坏亚眠和约的明文规定，但在英国看来却是与条约精神不符的。英国在感到愤慨的同时，也感到快慰，因为它知道俄国与奥国都关心瑞士的命运，而且奥国在丧失意大利之后，又失势于德意志，心有不甘，正如阿丁顿所预见的那样，英国又将会找到同盟国。直至1802年10月，英法关系一直是相当好的。对于«政府通报»颇多不满的阿丁顿甚至接受波拿巴的抗议，对佩尔蒂埃提出了控诉。直至9月10日，内定派赴巴黎的英国大使惠特沃思得到的训令还完全是心平气和的。但是法国在意大利吞并领土，特别是对瑞士的干涉（这次干涉同1798年那次干涉一样引起很大震动[2]）使得英国从根本上改变了态度。霍克斯伯里表示“深感遗憾”。“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我们需要法国政府的合作。”“英国希望恢复签订亚眠 165

① 详见第189页(原书页码。——译者)

② 1798年瑞士爱国人士拉阿尔普等领导起义，反对伯尔尼的寡头统治。2月，法国军队在布律纳统率下开进瑞士，劫掠了伯尔尼的国库。法国督政府把瑞士邦联改为单一制的黑尔维谢共和国，制定了一部法国式的宪法。法国这次干涉瑞士，引起欧洲大陆专制国家很大震动。——译者

和约时欧洲大陆的状况，别无其他。”在他的心目中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即法国每扩张一次，英国就要求补偿一次。最符合法国利益的做法至少是要赢得时间；它只有四十三艘战列舰，虽然还计划建造二十三艘，但却要到1804年才能完成。波拿巴在给德凯恩的训令中预料到了战争，但是认为不致于在1804年秋季之前爆发。然而他反驳说，英国“应履行全部亚眠条约，别无其他。”塔列朗的恐吓则更是火上浇油：“随着第一声炮响，就会诞生一个高卢人帝国，”并且劝告波拿巴“使西方帝国重见于今日。”即使如此，霍克斯伯里也没有加剧这一紧张局势，还是让法国大使安德列奥西和英国大使惠特沃思各赴任上。这种显而易见的软弱表示只是更加激励了第一执政。1803年1月30日，正当英国行将完成从埃及撤军的时候，他在《政府通报》上发表了塞巴斯蒂亚尼将军的报告，其中提到了“一万士兵足以再征服埃及”的名言。这一类挑衅的话使人思想混乱不解。尽管他曾对吕西安说，他这样做是指望刺激“约翰牛来战斗”，但是他清楚地知道法国还没有准备好。但到10月间塔列朗也宣称，如果英国要让世界相信“第一执政由于不敢而不去做某一件事情的话，那他就会立即去做的。”这种声明既缺乏理性，又有损民族利益。

事实上，霍克斯伯里的忍让姿态完全是暂时的。他在1802年11月25日写信给惠特沃思说，“由于法国最近某一次侵略行为而使英国卷入战争，这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即使这是一种明智的政策。我们的政策是必须设法利用这些侵略来为将来同俄、奥两国建立联合防御体系。”早在10月27日，他就明确地向俄国建议结盟以维持欧洲现状。亚历山大那时正专心致力于同法国一起处理德意志的事务，所以最初对这一建议置若罔闻。但是波拿巴 166 的东方政策终于触动了他：就象在1798年法国对埃及的远征那样，它使俄国转而接近英国。亚历山大认为，假如他得不到马耳

他，那么宁可让英国人得到这个岛屿，也比让法国人得到它要好些。因此在1803年2月8日霍克斯伯里获悉，沙皇希望英国推迟撤离马耳他。这一消息是在塞巴斯蒂亚尼的报告在《政府通报》上发表之后到达的，真是来得及时。9日，霍克斯伯里指示惠特沃思，在从马耳他撤离之前，英国要求法国政府对其行动作出“令人满意安心的解释”。

接着在波拿巴与英国大使之间进行了多次激烈的争论。2月20日，波拿巴在给立法院的一份咨文中谴责了伦敦主战派的行径。3月8日，乔治三世在议会开幕致词时回答了这种谴责，他提醒人们注意法国的军备情况；议会即通过征召民兵。当时，英国留在马耳他是有根据的，因为亚眠和约中所规定的条款还没有履行：亚历山大提出要先修改条约，他才肯充当保证人；普鲁士亦步亦趋。而此时已决定继续占领马耳他的阿丁顿则利用这一机会，以便迅速扭转形势。3月15日，他提出要在马耳他占领十年，作为由于法国进行新的扩张而给予英国的补偿；塔列朗答复愿在亚眠和约的范围内举行谈判。与此同时，霍克斯伯里于4月14日得知，尽管俄国又表示拒绝缔结同盟，但却答应在土耳其受到攻击时给予援助，并重新提出它在马耳他问题上的忠告。26日，惠特沃思交给波拿巴一份最后通牒。

英国人突然采取的坚决态度使第一执政周围的人感到不知所措。富歇在元老院告诉波拿巴，“你自己与我们大家一样，是革命的产物，而战争又使一切都成为未定之数。”3月，有人从中奔走告诉惠特沃思说，只要进行适当贿赂，第一执政的亲属可能会答应使波拿巴平息下来，而且只要塔列朗也能得到一份好处的话，他也会帮忙的。俄国表示不安也使波拿巴感到十分烦恼：3月11日，他再次写信给沙皇，要他放心，并请他劝说英国人平静下来。他现在要求沙皇从中调停，并建议让英国人占领马耳他一两年，然后把它移

交给俄国。阿丁顿答复说，不能接受这一建议，惠特沃思于5月12日离开了巴黎。至于是否把断绝邦交视为宣战，英国政府还保留有抉择权，但这与欧洲大陆的惯例正相反，英国的战舰在海上不预先警告就开始拿捕法国商船，于是这被法国斥为“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①”的不折不扣的海盗行径。

事实上亚历山大接受了调停的邀请；波拿巴这一邀请又巴结了他，此外，占领马耳他正中他的下怀，这样就可以把英、法两国排除在东方之外。俄国大使沃龙佐夫要求说明英国拒绝调停的理由，阿丁顿答复说是由于他还没有时间请示国王。阿丁顿态度如此强硬，一反常态，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受了主战派——可能是皮特——的干预。这种态度在国内没有造成好印象，辉格党人不遗余力地予以谴责；英国要过了一些时间才能适应这种形势。但是波拿巴是如此气势汹汹，使英国很快纠正错误，比在法国革命时期要快得多。

英法决裂的责任问题成了激烈争辩的话题。虽然波拿巴的挑衅是无可争辩的，但英国在有希望取得俄国合作的时候起，却先破坏了条约，并主动发动了预防性的战争，这也是事实。英国的辩护理由是要保持欧洲的均势，但这种均势却不推及到海洋，因为在英国人的眼中，海洋是上帝为英国人创造的。波拿巴与英国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只是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

二、法兰西帝国的建立（1804年）

战争给中立国的海运带来了利益，但同时却阻碍了英国的贸

① 阿尔比恩(Albion)为大不列颠岛古名，盎格鲁撒克逊人到该岛后，公元五世纪始有英格兰之称。Albion原意为白色，因该岛沿海山崖多呈白色，故后世又称英格兰为阿尔比恩，即“白垩岛国”。现在用阿尔比恩称英国为较富诗意的字眼。波拿巴用之则谓自古以来英国即背信弃义，骂得较文雅。——译者

易，并且引起了英镑贬值；但战争使法国贸易受到的打击更大。波拿巴以没收敌人的货物，尤其以逮捕和监禁英籍臣民来报复英国对法国商船的沉重打击。尽管他认为英国拿捕法国商船是他采取行动的正当理由，但他这样的反击措施却被认为是太过分了，而且对法国商人无补于事。亚眠和约签订以后，法国商人大量投资造船业，很多人为此破了产，其中就有法兰西银行的一位董事巴里荣。所有的银行均直接或间接地投资于海运业，因而都面临着破产的威胁。证券交易所也受到了影响：利息为百分之五的证券3月份还值票面价值的百分之六十五，到5月下跌到百分之四十七。意识到危机临头的波拿巴根据共和十一年芽月24日（1803年4月14日）法律改组了法兰西银行。莫利昂曾不断谴责法兰西银行的股东，这些股东享有为他们自己的票据贴现的特权，并且分得优厚的红利，而后又在银行股票价格上升中搞投机。根据新法律，红利限定在百分之六，贴现工作委托给一个商人委员会办理，但从1805年的情况看来并无任何真正的改进。对于波拿巴来说，加强法兰西银行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这家银行的资本提高到了四千五百万法郎，并有了储备金。它取得在巴黎发行钞票的垄断权，并且吞并了其对手商业贴现银行。作为报答，法兰西银行同意贴现在一两个月后可以收集的收税专员的期票。商业和国库仰仗法兰西银行的帮助都能渡过风险，而不致遭受重大的损失。 168

波拿巴的声誉并未受到损害。既然英国撕毁了亚眠和约，并且未经宣战就开始敌对行为（这是它的一贯做法），他完全可以把责任完全推到英国身上，而不会受到反驳。遭到攻击的法国除了团结在其元首周围之外别无其它选择，在面临英国政府又开始怂恿和资助的新的保王党阴谋的情况下，全国的决心更加强了。所以战事重开后的第一个结果是国民让波拿巴获得了皇帝称号和世袭继承权。

卡杜达尔一直不断地使他的同谋者进行阴谋活动；从1803年初以来，他的两名间谍被捕入狱。8月21日，他亲自在下塞纳郡的比维尔登岸，从那里来到巴黎，许多同党把他隐藏起来。据他自己说，他是想要绑架波拿巴，而不是要暗杀他；但已决定，倘若波拿巴抗拒就杀掉他，显然，这个企图就是要杀害他的。阿图瓦伯爵的到达将作为这次行动的信号，但他一直没有来。与此同时，到处又出现了保王党的骚乱，西部又出现成帮的盗匪。另一方面，拉若莱将军正力图把皮什格鲁与莫罗撮合在一起。他们两人之间已经通过一位叫作达维德的神甫建立了联系，这个神甫已于1802年底被捕。拉若莱于1803年8月底赴伦敦，12月又返回来，皮什格鲁也很快随之而来。莫罗同意与皮什格鲁会面，但鉴于舒安分子卡杜达尔参与了这项阴谋活动，他就不同意参加。最后参与这项阴谋活动的第三条线的线索被梅埃·德拉图什破获了，他以前是雅各宾派，后来成为一名间谍；他在伦敦和某些亡命者集团接触联系之后，建议他们与共和派阴谋分子合作。随后他设法到了德意志，在慕尼黑英国使节德雷克把自己的种种策划告诉了他：要在来因地区煽起叛乱，並维持与阿尔萨斯通消息，以便准备使当甘公爵率领的一支由保王党亡命者组成的队伍能进入法国。

其实叛卖活动到处都有，而第一执政只发觉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在德累斯顿，亚历山大的间谍昂特雷格伯爵通过"巴黎女友"，约瑟芬的一位密友详细地了解波拿巴私生活的情况，并通过"巴黎友人"了解他的政治动向，此人是塔列朗的一个助手，似乎是未来的帝国大军的兵站总监达律，或是他的父亲，他把一些外交文件提供给昂特雷格。在大法官雷尼埃平庸无能的指导下，警察的搜索毫无结果。尽管富歇动用了他自己的情报系统为第一执政效劳，但波拿巴在1804年初对这一切还是所知有限。2月，他决定采取行动。有两名囚犯在拷问下供出了"有位亲王"即将到来一事，并

供出了关于和莫罗谈判的情况。于是莫罗立即被捕，当时"恐怖政策"似乎再度提上了日程：关闭栅栏、搜查住宅次数增多、中止陪审制度、任命缪拉为巴黎总督。警察不久就抓获了皮什格鲁和卡杜达尔。同时梅埃·德拉图什报告说，当甘公爵就住在巴登的埃登海姆，离斯特拉斯堡不远，他还说亡命者正在奥芬堡集结。波拿巴认为，这位公爵即是阴谋分子等待着的那位"亲王"。3 月 10 日，在一次有富歇和塔列朗参加的会议之后，他决定绑架当甘公爵。

绑架交由旧贵族出身的科兰古侯爵执行，并由奥德内尔将军作为他的助手。科兰古未能在奥芬堡发现任何亡命者的军队，但奥德内尔却在 3 月 14 日至 15 日夜间于埃登海姆逮捕了当甘公爵。20 日，另一次会议决定了执行步骤。这位公爵于下午五时被带到万森，夜间十一时被带到一个军事法庭受审，次日清晨二时被枪决。尽管他的文件没有表明他与卡杜达尔共谋，但却有证据说明他被英国收买了，并且他盼望指挥入侵阿尔萨斯。他不是被宣判为阴谋分子，而是被宣判为接受外国津贴要入侵法国的亡命者。假如他是在法国本土或在敌国被捕，就可以合法地宣判他死刑。但是在一个中立国绑架他，波拿巴却十分明显地损害了法国的利益，因为这给欧洲列强提供了一个求之不得的借口。随即审判了一批阴谋分子。有二十人于 6 月 9 日被判处死刑，波拿巴赦免了其中十二名大部分出身旧贵族的人，其余的(包括卡杜达尔)都被送上了断头台。皮什格鲁被发现勒死在他的牢房里。莫罗被判释放，但是法官奉命重审；这次法官宣判他服刑两年，后来减刑为流放。在审判过程中，资产阶级及出入于沙龙的上流社会人士情绪激昂。罗德雷于 6 月 14 日写道，"对政府的仇恨和漫骂就象我在法国革命前所曾看到的那样剧烈，那样肆无忌惮。"这种情绪在剧院里和在法院里都有所表现。波拿巴政权同旧势力的和解一时遭挫，已

170

经接受了一项外交职务的夏托勃里昂辞职了。但是这些激烈的批评者并不考虑要诉诸人民，新闻界保持缄默，从全国的动向来看，不是表示漠不关心，就是表示拥护波拿巴。

波拿巴周围的人，以及希望重新得宠的富歇这一次都催促他要趁热打铁利用这一机会。他们向他建议，世袭制度的建立将会解除刺客们的武装：这纯是稚气十足的议论，因为假如波拿巴遇害，这个政权就肯定会被推翻。真正能肃清暗杀活动的是实行恐怖措施和改进警察监视制度。但是议会各院却装出一副认真考虑这个借口的样子，以便表明在建立世袭制中它们不是没起过作用的。此外，共和派对当甘公爵被处死一事是满意的："我很高兴"，保民院议员居雷说，"波拿巴与国民公会是由同样材料制成的。" 3月23日，元老院宣布，"修改制度"的时机已经到来。在征询参政院的意见时，它表示反对世袭统治的原则，但在4月23日，居雷使保民院通过同意建立世袭制。于是波拿巴答复元老院说，"贵院已认为有必要建立世袭制。"并未作出这样的决定的元老院只好默认。5月16日至18日，起草了一部新宪法，然后以元老院决议案的形式于共和十二年花月28日(1804年5月18日)颁布，最后由公民投票批准。"共和国政府"付托给一位世袭皇帝，这位世袭皇帝领取二千五百万法郎的皇室费，并获得除他私人庄园之外的皇室领地的收益。在建立宫廷和管理皇族事务方面，他有权自由处理。

171

主要困难在于规定继承法规。"世袭"一直总是"长子继承权"的同义语，然而波拿巴无子，他自己甚至也不是家庭的长子。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不外乎象在罗马帝国时代那样，让皇帝保留指定自己的继承人的权利。事实上，波拿巴保有认领嗣子的权利，但他却拒绝给那些可能继承他皇位的人这一权利。即使如此，他还是极为忠于他的一族的，而不愿意全然摈弃他们。然而，他的兄弟们却

拒绝把他们的继承权让给路易·波拿巴的儿子。他们享尽了荣华富贵，但却不知道感恩，在他们的母亲的支持下，这些人给拿破仑制造了无数的烦恼。吕西安刚娶了儒贝尔通夫人（一个破产了的投机商的寡妇）；随战舰到安的列斯群岛服役的热罗姆跑到美国与一个商人的女儿结了婚；改名叫波利娜的波莱特不征求她兄长的意见就嫁给了博尔盖泽亲王。还有缪拉的妻子阿农齐阿塔（现在重取教名卡罗利娜），以及嫁给了那位荒唐的科西嘉人巴乔基的玛丽亚娜（后来叫作埃利兹），这两姊妹都因波拿巴没有封她们为公主而大发雷霆。最后决定，如若没有亲生的或认领的后嗣，那么继承人就是约瑟夫，约瑟夫之后即是路易。吕西安因为拒绝与其妻离婚而被剥夺了继承的权利，他于是离开法国住到意大利去。

象在共和十年那样，元老院要利用这样时机表达想取得一些宪法保证的愿望，不过这一次是正式提出。元老院想要变成一个拥有否决权的世袭团体，这一权力使它能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至于立法院，丰塔内要求还给立法者发言讨论的权力，并让该院主席职位具有"稳定性"，实际上就是指他自己。但实际取得的结果是，元老院取得了指定两个常设委员会的权力，这两个委员会分别负责维护人身自由及出版自由。它们仅有权听取申诉，并且在调查之后宣布：有这两种自由受践踏的"推定"。与此相反，警察又经改组，并在更大程度上加强中央集权；富歇在7月10日又重新成为警务大臣，法国被分为四个警务区，分别由对他负责的四名参政官掌管。除此之外，政府机构很少有什么改变。拿破仑更趁此机会掌 172
握了不受限制地选定元老院议员的权力，并宣布，亲王们即他的兄弟们同六名帝国大勋爵是元老院当然成员。

由于规定了亲王和大勋爵，以及高级官员（包括十八位元帅及若干宫廷大臣），共和十二年宪法就标志着创建新贵族的重大步骤。帝国宫廷规模日大，金碧辉煌，奢侈豪华。关于优先位次的

共和十二年收月24日（1804年7月13日）法令将礼仪推行到整个政府机构。与旧势力和解的事很快又恢复进行了。从这时起拿破仑热中于要创立一个新的贵族阶层，他很快地把荣誉军团变成了单纯授勋的装饰品。当决定邀请选举人团的代表参加他的加冕典礼时，他特别指出，这些代表要从有名望的世家中挑选。在典礼举行的那天，他发泄出对平民各阶级的蔑视，"法国眞正的人民是各区的长官、各选举团主席和军队"，而不是"两三万鱼贩子以及类似的人……；我看他们只是一个大城市的堕落的愚昧无知的社会渣滓。"

因此，拿破仑不能把民众的委托视为新皇统的眞正基础。象矮子丕平[①]一样，他要求教皇为他授圣职，这样王权神授说就能恢复，并可写入教义问答中。塔列朗与贝尼埃在巴黎同圣使卡普拉拉谈判；在罗马，皇帝的舅父红衣主教费什也在同孔萨尔维进行谈判。作为前宪政派教士的费什，曾被任命为里昂大主教、红衣主教以及派到圣座前的大使。鉴于拿破仑不久前对当甘公爵的处决，庇护七世害怕得罪各列强，当然有理由犹豫不决；但是因为他希望修改组织条例，而且也许还希望收回其属邦，最后他还是同意了。保王党顿时喧哗叫嚷起来；约瑟夫·德·梅斯特写道，教皇已经"使自己堕落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傀儡小丑。"教皇所得到的只是那些过去拒绝向正统派屈服的宪政派主教对他的顺从；即使如此，斯特拉斯堡的索里內主教仍然拒绝否认"教士法"。庇护七世甚至未能幸免于受屈辱。1804年12月2日在巴黎圣母院，拿破仑从教皇手中夺过皇冠自己戴上；在教皇退席后，他又宣誓忠于自由和平等。约瑟芬也是由她丈夫加冕的。但在加冕典礼前夕，她还耍了令人不快的一招，她告诉教皇，他们只举行过世俗婚礼沒有经过宗教仪式；因此拿破仑只得答应补行宗教仪式，这就使得离婚变得更

173

① 矮子丕平，法兰克国王(751—768年)查里大帝之父。——译者

为困难。

虽然加冕典礼的戏剧性仪式（这个场面经达维德的名画流传后世）满足了拿破仑的心愿，但却沒有增添他的威望。人民用怀疑的眼光瞧着这种稀奇的仪仗，以及在十二月全月不断举行的庆贺宴会。沒有人相信拿破仑的权力会因此而巩固起来。由于重建了君主政体，并加强了政权的贵族政治的性质，他只不过使他个人事业与民族事业更分离开了。夏普塔尔说，“在那些日子里，法国革命的历史对我们说来就象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历史一样遥远。”对夏普塔尔及和他一类的人来说，情况可能如此，但是在人民之中，法国革命的精神却并未消逝！拿破仑曾许诺人民要实现和平来赢得民心，但他却在重启战端时，终于自己登上帝位。现在沒有任何东西阻碍他为所欲为了：帝国的征战扩张、专制统治和贵族政治一发而不可收拾，而惊惶失措、忧心忡忡的国民只能跟着常胜的恺撒的战车奔跑，以免遭到亡国之灾。

三、入侵英国的计划。特拉发加海战(1805 年)

英法之间的战争拖了两年多还胜负难分。双方都在经受了始料未及的重重困难。1803 年，英国有五十五艘战列舰，法国有四十二艘，其中仅有十三艘处于战备状态。这种压倒的优势使英国一开始就掌握了制海权。法国各港口再次被封锁，商业受到打击，而英国的商船则除私掠船外几乎无所畏惧，他们恢复使用护航舰队保护商船以对付私掠船。英国迅速重新占领了圣卢西亚、多巴哥以及荷属圭亚那。即使如此，阿丁顿还是被斥为作战不力。战舰多已陈旧，新造船舰极少，因为圣文森特不能够组织木材的供应。虽已开征间接税，但财政仍令人感到不安。从对马耳他问题的调

174

停以来，阿丁顿政府与俄国的关系一直很冷漠，而且在共和十二年保王党阴谋的问题上这个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损害了它的名声。

拿破仑加紧扩军备战，但他缺乏经费。共和十二年，财政又出现赤字。对自己权力很自信的拿破仑终于采纳财政大臣戈丹的意见，他恢复了间接税。“难道我没有宪兵、郡守和教士吗？”他吼叫道，“如果有人胆敢造反，我就绞死他五、六个，其它人就都会缴税了。”共和十二年风月5日（1804年2月25日），他成立了综合消费税局，并任命弗朗塞·德·南特为局长，但只限于对酒类征收适当的税。至于国库，巴尔贝-马尔布瓦开源无术，不得不求助于银行家及供应商。1804年，法兰西银行的一名董事德普雷伙同两名金融家米歇尔和塞甘组织了一个“联合商行”，于1805年收购了所有未兑现的收税专员期票。在一定程度上，这家商行附属于范勒尔贝格的粮秣供应公司，但是它的幕后的大老板却是乌弗拉尔。① 这一年的4月，乌弗拉尔提出以百分之九的利率借给政府五千万法郎，其条件是政府要把原来欠他的并拒绝归还的二千万法郎算作这笔新借款的一部分，这样事实上就把利率提高到了百分之十五。6月，乌弗拉尔借出了一亿五千万法郎，其中的四千二百万要算作倒帐。巴尔贝-马尔布瓦则以指定的税收和国库债务作抵押。德普雷保证所有证券在法兰西银行贴现，这样该行事实上搞了变相的通货膨胀。法国各盟国被迫捐献。从1803年4月起，法国派军驻扎在符利辛根城和荷兰的布拉班特；虽然荷兰希望保持中立，它不得不于6月25日同意提供一万六千名士兵以及法国要求的所有战舰。给戈多伊下了最后通牒迫使他也照此办理；10月19日，他答应每月捐献六百万法郎；12月19日里斯本政府也同意支付一千六百万法郎。不过西班牙和葡萄牙均未对英宣战。另一方面，法国

175

① 作为一个粮食承办商和投机家的联合组织，这家商行的主要业务是向法国国库提供资金，并供应军粮。——英译者

人重新占领了那不勒斯各港口，1803 年 5 月莫蒂埃从荷兰侵入了汉诺威，解除了军队的武装，然后占领了易北河口的库克斯港以及埃姆斯河上的梅彭。但所有这些还不能迫使英国投降；即使法国海战得手，也只能给人以遥远的期望。因此，拿破仑决定以入侵来威胁敌人。

拿破仑没有忽视爱尔兰：1803 年，那里曾爆发一次起义，但被镇压了下去；拉塞尔和埃米特被处以绞刑，法国未能及时赴援。然而，他最关注的是 1801 年的计划。军队集结在布伦大营；1803年12 月 2 日，这支军队被称为“英格兰方面军”。这样集结部队的好处是把军队同全国隔离开来，并以从事一桩伟大事业的希望来赢得军队对他个人的效忠，这样集中的部队也可在必要时掉头在欧洲大陆上大举出击。1805 年 1 月，他宣称，这支集中的军队别无其他目的。而实际上他是竭力想掩饰当时已十分明显的挫折。毫无疑问，拿破仑曾经多次下决心要横渡英吉利海峡，鉴于联合王国的军事形势，这是很可理解的。1804 年初，英国正规军不到十万人。民兵按理应有七万二千人，为了逃避征兵中签而加入志愿部队的为数极多，据说超过三十多万。1803 年 7 月 27 日，议会也通过“全国总动员”，强迫年龄在十七岁至五十五岁之间的所有男人接受军训；最后于 7 月 6 日，决定成立“增援部队”，用抽签办法征募。但所有这些军队都没有作战力：万一在法军登陆的情况下，政府似乎计划退到威尔士的乡间去打游击。可以断言，法国人有可能不发一枪就占领伦敦。只是这一点对拿破仑就具有足够的吸引力。

英国人对于这样的危险作了充分的准备。国民动员运动显出甚至比 1797 年更加激励人心；关于这一切，有华兹华斯为后人留下了著名诗篇为证。1804 年 2 月，皮特开始抨击内阁；多数党分崩离析，到 4 月底，阿丁顿辞职。皮特希望组织一个全国联合政府，但是国王拒绝接纳福克斯入阁。因而与福克斯言归于好的格伦维

尔也拒绝参加新内阁。这样，皮特不得已只好与阿丁顿的同僚一起组阁，他甚至不得不在 1805 年把阿丁顿本人也拉入内阁中。因此皮特再也不能象从前那样在议会中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他的地位由于追究海军部另一件贪污事件而进一步削弱。在一些盗用公款的人中，有他的密友邓达斯（当时已封为梅尔维尔勋爵）在内，后者为此被迫辞职。但是无论如何，皮特还是给英国的政策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性。而且他还结了新的同盟，由于拿破仑的政策而投向英国的俄国，结果主动提出与英国结盟的建议。他还组织起志愿部队，最后把他们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他把民兵与“增援部队”合并起来组成后备部队，并从中抽调一万人加强正规部队；为了取得海军承办商的协作，在供应舰队器材方面，他给那些承办商以自由处置权。战列舰逐渐增加到一百一十五艘。他大抓了海防工作，并以恢复所得税来稳定财政。他最成功的措施是在 1805 年 4 月任命巴勒姆勋爵查理·米德尔顿接替邓达斯的海军大臣职务。正是由于米德尔顿对舰队在海战中出色的指挥，才有特拉发加海战的大捷。在这一战役胜利之前，英国的舆论是没有信心的，但皮特与巴勒姆从未失去他们那泰然自若的神态。拿破仑拥有一支军队这一点现在倒是无足轻重的，主要的障碍仍是横渡海峡。

显然拿破仑一方面总是心存侥幸：他不是不顾英国的舰队而远征过埃及并且又回来了吗？另一方面，他是个地中海人，所以他起初没有足够估计到多佛尔海峡的种种困难：它那汹涌澎湃的浪潮，湍急狂暴的海流以及变幻莫测的风云。最初，他曾计划用炮舰和平底船开道，这种船与弗拉芒各运河上的驳船相似，能装载大炮，并用桨划行。部队要由商船运送；但是必须承认商船数量不足，1803 年 9 月决定军队也要乘坐平底船。拿破仑下令从荷兰到大西洋沿岸各处都建造平底船，但是英国舰队却决不会让它们集中在一个地方。尽管如此，1804 年还是有一千七百多艘平底船集

结在布伦港及其邻近的港口，设置了一些码头以训练这些水兵。海军大臣德克雷和舰队司令布律克斯海军上将看出，每次涨潮能开出布伦港的船只不超过一百艘，敌人舰队就有足够时间出击这些船。虽然海上风暴可能使敌人不致出来截击它们，然而这些平底船却不能冒险出航，除非是在风平浪静的天气里。这样就使得拿 177 破仑需要派遣战舰在海峡一带进行扫荡；总之，他被迫要再次进行一场海战。

在海战方面拿破仑显然处于劣势。英国人不但在数量上占优势，而且还拥有相当多的三层甲板的战舰。这种战舰胜过古典式的装有七十四门炮的炮舰，并在上甲板上装有大口径短炮，这样就大大加强了火力。霍姆·波帕姆爵士采用了一种新的有效的信号系统。英国战舰装备较好，水兵久经战争锻练，他们的海军将领，尤其象纳尔逊这样的人，都是从参加过战争的舰长中选拔上来的。一向困守在海港里的法国水兵和战舰却不具备这种素质。法国的海军将领也不具备这种素质，他们只能指挥他们自己所统帅的分舰队。但是英国舰队尽管有这些优点，却由于分散停泊而有被各个摧毁的危险。在法国几个海军基地之中，受到英国舰队严密监视的只有布勒斯特；罗什福尔座落在难以封锁控制的比斯开湾上，眷恋于汉密尔顿夫人① 的纳尔逊逗留在那不勒斯水域，因而土伦也只是处于纳尔逊的远距离警戒之下。这样，法国舰队是能够出航的。倘若法舰一旦启航，英国海军部已经计划在乌桑岛② 集结舰队；只要英国舰队封锁着英吉利海峡的入口，英国本土就无所畏惧了。即便如此，还不能完全忽视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不管人们怎么说，对突然袭击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

① 汉密尔顿夫人是英国驻那不勒斯公使汉密尔顿的妻子，纳尔逊的情妇。——译者

② 乌桑岛属法国菲尼斯太尔郡，位于布勒斯特港外。——译者

1804 年 5 月，拿破仑决定，他的舰队只要都冲破封锁，即可在布勒斯特救援冈托姆，随后扫清英吉利海峡。他于 8 月到达布伦港，16 日他在那里颁发了荣誉军团勋章。但是事实证明准备不足。布律克斯与拉图什-特雷维尔先后死去。从 1804 年 9 月到 1805 年 3 月，由于拿破仑在意大利肆意兼并，奥国准备立即发动进攻，看来拿破仑势必要放弃入侵英国的计划。拿破仑命令他的舰队启程到安的列斯群岛，去攻击那里的英国殖民地。但只有海军上将米西埃西的舰队能够驶离罗什福尔；他在美洲未能会合其它法国舰队，便返回法国。

但随后大陆上战争的危险从表面看来减少了：直到 1805 年 7 月 15 日，拿破仑才理解到反法同盟的真实意图。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已在威胁西班牙的英国，在 1804 年 10 月 5 日截夺了数艘装载着财宝的西班牙大帆船。12 月，戈多伊终于向英国宣战，他把他的舰队交给法国皇帝指挥。由于戈多伊在国内的地位正在受到 178 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夫人的威胁，他就派了自己的代表伊斯基耶多向拿破仑建议瓜分葡萄牙，以便为他自己在那里开拓一块封地。这使得拿破仑大受鼓舞，他又回到他那宏伟的计划。对安的列斯群岛殖民地的远征现在变成了战略行动：法国各舰队要在安的列斯群岛会合，在给敌人制造了混乱之后，舰队将折回英吉利海峡，必要时就展开战斗。这个计划看来可能很高明，但这首先需要物质条件和指挥能力，而这两者都是法国缺乏的。此外，拿破仑自己就没有一个前后一致的指挥计划：既然最后决定作战，他又不允许冈托姆从布勒斯特突破封锁，这样就使得后者不能有所作为，整个重担就落在缺乏胆识的土伦舰队司令海军上将维尔纳夫身上，以致毁了整个计划。

1805 年 3 月 30 日，维尔纳夫指挥着十一艘军舰启航(在加的斯西班牙人又加入了六艘)，一开始他就忽视了歼灭守卫直布罗陀

海峡的奥德的部队。随后他驶向马提尼克岛，于5月14日才到达那里。与此同时，英国舰队除了违背训令的纳尔逊未到外，都在乌桑岛集结。直到4月19日，纳尔逊一直在驶往埃及的航线上搜寻维尔纳夫；他最后接到了情报，就匆匆赶到直布罗陀，在那里他才获悉维尔纳夫已经西去。5月11日他全速赶往安的列斯群岛。这要冒很大的危险，因为敌人可能已经开往英吉利海峡，或者可能已与其它舰队在美洲海面汇合，这样他们就具备了足够的力量来打败纳尔逊。海军部由于受到公众对牙买加安全问题担忧的影响，便批准了这个大胆的行动计划。纳尔逊的大胆主动精神固然十分可嘉，然而结局仍然可能是灾难性的；但他赌赢了。在安的列斯群岛，维尔纳夫等待其它法国舰队到来，但没等到。他只接到了拿破仑的紧急公文，皇帝在其中终于亮出了他那宏伟的计划，命令他等待一个月，然后折回与费罗尔和罗什福尔的舰队会师，来解除英国对布勒斯特的冈托姆的封锁。

6月4日纳尔逊到达巴巴多斯之后，开始搜索法国人。当维尔纳夫获悉这种情况之后，他决定立即折回费罗尔，希望能摆脱纳尔逊的追踪，但徒劳无益。纳尔逊派遣了一艘快速双桅船去通知海军部，接着于6月13日即驶向欧洲。但是他仍然担心维尔纳夫可能到埃及去，所以他就驶向直布罗陀；由于巴勒姆曾命令海军上将考尔德在菲尼斯特雷角截断维尔纳夫的归路，英国的舰队再次分散开了。7月22日，维尔纳夫遇上了考尔德的舰队。在遭遇战中考尔德拿捕了两艘军舰后撤退了，让法国人进入了费罗尔港。另一地方，接替了米西埃西的阿勒芒从罗什福尔出海，游弋了几个月，既没有遇上友舰也没有碰上敌舰。从8月12日至15日，英国人再次在乌桑岛附近集结他们的力量，但是立即被康华里海军上将调遣分散了，他为东印度护航舰队的安全和克雷格将军所率赴援那不勒斯的部队滞留里斯本的安全担心，于是考尔德被派回费 179

罗尔，而纳尔逊则返航英国。维尔纳夫对这一有利时机一无所知，所以根本没有利用这一机会。8月14日，维尔纳夫启航出海，看到自己舰队的情况不佳，又听到关于敌舰正在全速赶来的虚假情报，他感到十分沮丧。他接到的7月16日命令是，要他在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时，可驶往加的斯。他遵照命令于8月18日在加的斯下锚。即使他在布勒斯特突破封锁并击败康华里，他也来得太晚了。8月24日，拿破仑指挥大军向德意志进军，并命令舰队解除战备。

维尔纳夫的错误在于没有立即驶往土伦，而使自己困于不断得到其它舰队增援的康华里和考尔德的封锁之中。9月28日，纳尔逊终于负起指挥舰队作战的任务。不过法、西联合舰队躲在港口里是能得到掩护的，而且还牵制着三十三艘英国战舰。但是拿破仑命令舰队不惜一切代价去进攻那不勒斯，此举正中纳尔逊的下怀。当维尔纳夫于10月19日得知有六艘敌舰为补充给养而前往得土安时，他便率领三十三艘战舰启航。21日，正当他们在特拉发加角一带排成六公里长的队形行进时，纳尔逊赶来，向他们展开进攻。在10月9日的一份备忘录中，他曾指出，他将从垂直角度向敌人发动进攻，而不是一般惯用的并排作战方式。这就得把舰队排成两列，从中间切断敌舰队形，一列舰队吃掉其首部，另一列则歼灭其尾部。事实上，英国舰队并没有保持预想的队形。攻击进行得相当混乱，因为纳尔逊认为法、西联合舰队会转头驶向加的斯。尽管如此，他的计划还是成功了：法、西联合舰队的中部及后部全部被歼。率领先头的十艘战舰的海军上将迪马努瓦投入战斗较晚；他的四艘战舰当时逃脱了，但几天后还是被俘获了。夜晚，一场暴风雨结束了这场灾难。法、西联合舰队仅有九艘战舰回港，四千三百九十八人死亡，而英国人仅有四百四十九人死亡。纳尔逊也受了致命伤。维尔纳夫被俘，他受尽了皇帝的辱骂，在返回法

国时自尽身死。

英国终于可以喘口气了。确实，反法同盟使得登陆英国成为一桩不可能的事；但是得胜的拿破仑随时可能重新执行他那攻英计划。然而纳尔逊的胜利使这一计划无限期地拖延下来。同时也宣告了海战的结束。到后来英国人就可以利用西班牙人的起义而把战争推到欧洲大陆上。然而在当时，英国人比以往更不愿在大陆上作战，这样，特拉发加海战的唯一积极后果是拯救了那不勒斯。看来这次海战只是确认了英国的海上霸主的地位。在拿破仑看来，特拉发加海战只不过是一个不幸的插曲，人们是很容易理解这一点的，因为只要他在大陆上立于不败之地，英国就永远不会打败他。 180

四、封锁

拿破仑的事业至少可以确保他掌握主动权。只有招架之功的英国再也无力从事征服新的殖民地。唯一例外的是韦尔斯利，他继续在印度扩张。他吞并了阿瓦德的一部分，控制了卡纳蒂克，并建立了对苏拉特和坦焦尔的保护关系。他利用马拉塔人内讧的时机在那里也采取了行动。马拉塔王公之一霍尔卡把丕什瓦巴杰劳从浦那赶了出去；韦尔斯利却把巴杰劳于1803年5月护送回到浦那，这样把他变成了受保护者。韦尔斯利随后又对道拉特开战，后者的父亲辛地亚在十五年前，在1788年征服德里时几乎要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韦尔斯利又袭击了贝拉尔王公拉古吉·邦斯勒。1803年9月23日，他在阿塞战役中打败了道拉特，在阿尔加翁击溃了拉古吉·邦斯勒，这两位统治者都割让了他们的部分辖地。1804年，霍尔卡也拿起了武器，成功地击溃了蒙森上校的部队，但他自己后来也以失败告终。第二年，大莫卧儿皇帝阿林沙的

国家沦为英国的保护国。尽管获得了这些利益，但韦尔斯利的自行其是与目中无人的态度还是激怒了东印度公司，并使得已经焦头烂额的英国政府感到担忧。韦尔斯利辞职，并于 1805 年 8 月15日启程回国。

英国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始终是如何利用他的海上优势取得贸易的垄断地位。它全力恢复了有关封锁的规定。从 1803 年到 1805 年，它的虚拟封锁的范围甚至扩及法国占领下的汉诺威。与此同时，英国在 1803 年 5 月 18 日开始重新颁发特许证，甚至允许用中立国船舶载运敌货进口。对敌人的殖民地贸易重新实行了 181 "1756 年规则"①，但对也能为它服务的中立国则实施得并不严格，予以适当照顾。在欧洲，中立国只得顺应形势，屈从英国；而对美国的关系则很快就发生困难。美国航运事业的进展日益遭到英国妒忌；斯蒂芬在他的《伪装下的战争》(1805 年）一书中认为，"迂回路线"② 有助于欺骗，所谓"中立化"的敌货甚至没有卸船，也没有按照美国的规定征收关税。由于英国海军部从未明确地规定在何种情况下"中立化"才算有效，所以一些捕获法庭就开始数以倍增地没收货物。1806 年 4 月 18 日，美国国会采取了报复行动，它宣布，在 11 月 15 日以后禁止英国货进口。但是这时拿破仑实施了大陆封锁，于是形势就起了变化。

由于波罗的海和亚得里亚海仍然没有被封锁，所以英国能够象在前次战争期间所做过的那样重新组织它的贸易，因而损失甚

---

① 在"七年战争"(1756—1763 年)时，法国海军处于劣势，不能用本国商船维持对本国殖民地的贸易，因而将平时保留给本国商船的贸易，向中立国荷兰的船舶开放；于是英国认为自己有权拿捕从事这种贸易的中立国船舶及其所运载货物，理由是：它们已参加了法国的商船队，从而给自己取得了敌性。英国这种主张被称为"1756 年规则"，简言之，即战时中立国的通商应限于平时的通商范围，否则即成为合法捕获品。1793 年英国对法战争后，变本加厉推行" 1756 年规则"；主要是针对美国。——译者

② 这一名词的详细解释，见本书第一编，第二章，四、封锁与中立国。——译者

少。1803年它的出口从二千五百五十万英镑下降到二千零四十万英镑，但在1805年回升到二千三百三十万英镑。再出口受到的影响较大，从1802年的一千二百七十万英镑下降到1805年的七百六十万英镑。英属安的列斯各岛(世界上糖的主要供应者)的糖的产量继续上升，价格不断下降，因为尽管英国的消费不断增长，但进口过剩。糖价从1805年的每公担五十五先令下降到1807年的每公担三十二先令。连年丰收和开垦土地(由于1801年圈地条例促成)的结果使面包价格下降到每磅两便士，这就使得地主要求加强谷物法，他们的要求在1804年得到了满足。这说明为什么从法国入侵的梦魇下解脱出来的英国舆论，在提尔西特和约签订前，一直处于一种漠不关心的状态，它漫不经心地瞧着大陆的事态。

这一时期拿破仑的经济政策没有引起英国人太大的关注。1803年6月20日，他重新下令禁止英国货进口；他原先指望入侵英国，后来又把全副精力倾注在他的大陆战役上，但是不管史学家怎样看法，他认为在这期间这项禁令只不过是次要的措施，他甚至没有很严格地执行这一规定。事实上，他依然忠实地执行着有节制的政策，这一政策从他上台以来就替代了督政府的政策。他对中立国的贸易未加任何限制，结果中立国成了交战国之间的中间 182 人，使伪装中立国货物的交战国货物依然来来往往。大陆封锁完全符合构成拿破仑重商主义思想一部分的保护贸易主义思想。而且，封锁政策是为满足工业家的愿望而制定的；它排除了外商的竞争，但却不排除必要原料的进口，也不妨碍本国货物的出口。海关税表表明，这一政策不仅是针对英国的。共和十一年，精制糖与糖蜜，不论来自哪个国家，一律不准进口。1804年3月13日和1805年2月6日，棉织品及殖民地产品的关税都提高了。1806年3月4日，对殖民地产品又加征收附加税。由于这些货物主要来自英国，因此可以默认，封锁并无实效，而这时拿破仑的封锁政策其实

并不是一种作战的手段。

最狂热的保护主义者总是那些棉纺企业主，特别是纺纱厂厂主，因为英国棉纱进口量从1804年的三十一万公斤增至1806年的一百三十六万八千公斤。里昂的工厂主也同样强烈要求排除意大利的竞争，他们要求把皮埃蒙特的生丝专门供应给他们。从不断上升的海关税率可以看出，工厂主的影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逐步地使拿破仑采取了他原来并不想采取的措施。夏普塔尔不同意这样做，巴黎的商人也不同意，他们在1803年通过商会谴责了所有的贸易禁令和针对中立国的所有措施。1806年2月22日，拿破仑终于下令禁止进口漂白布、印花布、软棉布、灯心布及金属器具；但他允许继续进口其它棉纱，杂货以及各种丝缎带，但要征收附加税。到1805年，已拥有超过一百万纱锭的棉纺业又取得了更大进展，纱锭的生产从1806年的二百万公斤上升到1808年的四百五十多万公斤。里昂的工厂主也得到了满足：尽管1803年和1806年的法律准许不单从里昂，也可从热那亚和尼斯出口皮埃蒙特的生丝，但是海洋被封锁确保了里昂人的垄断地位。他们还在意大利王国谋取好处，1808年，他们把通商条约强加给意大利，这一条约减低了法国进口货的关税，并且由于税率的特惠而保证了里昂对意大利的生丝贸易。

然而有些迹象表明，拿破仑也顺着督政府的老路滑下去，他因183 封锁没有起作用而烦恼。1804年3月13日，他下令禁止进口“直接来自英国”的货物，并命令中立国要出示货物来源地的证件。另一方面，他的民族经济主义的倾向很自然地与战争热狂融合在一起，这表现在1806年2月22日对成包棉花突然征税的措施上；毫无疑问，这一措施使工业家极为不满，并导致增加了对亚麻及苧麻的使用。最后，法国的反英政策逐渐也施加于自己的盟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在1806年甚至强加于瑞士，对瑞士只有棉纱

是破例开禁的。至于英国同德意志的贸易，则由于法国对汉诺威与库克斯港的占领而受到阻碍，这是督政府沒有做到的事。很多人仍然相信，只要扼杀了英国的出口贸易，就能击败它，蒙加亚尔的著作再次表达了这种信念。

总的说来，拿破仑对英国的封锁沒有采取对策，这种封锁超越了传统的重商主义的措施，也比交战国之间通常采用手段更为严厉。拿破仑耐心地容忍英国施加于中立国的强横要求。这一点甚至体现于他在 1806 年 3 月 4 日在参政院所发表的演说中，使人感到惊讶的是，这时他非但无意加强封锁，反而在等待和约缔结，以便着手完善他的禁止进口制度。“在与英国媾和四十八小时之后，我将下令禁止进口所有外国货，我将颁布一项航海条例，它规定，我国的港口只许法国船舶进入。”但是当拿破仑在大陆上赢得了摧枯拉朽般的节节胜利，并建立起大帝国时，他的大陆政策激起他的权力欲，从而使一切翻然改观。

五、第三次反法同盟的起源

由此可见，不能说拿破仑的大陆政策是他对英作战的后果，说成仿佛是由于不能在海上或以入侵其本土战胜英国，他就封闭欧洲大陆市场来摧毁英国。他当然不会沒有过这种想法；但是这种想法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以往的征服扩张使这项政策奏效。这种想法也不能解释那些激怒大陆列强的轻举妄动和侵占行径。假如我们这样说就会更加接近于事实：尽管欧洲大陆的君主们象英国一样不安地注视着拿破仑在扩张势力，尽管他们內心仍旧充满对这位革命民族的领袖的仇视——他们通常称他为“科西嘉人”“篡位者”，或者象玛丽亚-卡罗莉娜所称的“罗伯斯庇尔的继承人”，更不用提其它浑名了——假如沒有英国的援助，他们是不能够拿起武

184

185

器的，因为他们是分崩离析，贫困不堪的。亚眠和约的撕毁使他们有希望获得英国援助，因为英国有钱资助参加反法同盟的国家，而且组成同盟对它最有利。然而在 1803 年，他们显然缺乏主动作战的精神，至少在德意志各邦是如此，奥国甚至在 1802 年 12 月 26 日承认了自吕内维尔条约签订以来在意大利境内的变化。即使反法同盟的组成是可能的，甚至象是就要发生的，但是决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设法推迟同盟的建立，耐心等待，直至英国象在 1801 年那样必然陷入的困难之中(这些困难不单是由法国造成的)，这是最符合法国民族利益的政策。但是这种平淡无奇的政策拿破仑从来没有想过。不尊重任何人，相反地自高自大，这只能加速同盟的组成，并且要冒可怕的风险，注定了要挑起连绵不断的战争，除非征服整个欧洲方得罢休。再没有比这样的前景更能适合拿破仑的性格。

1803 年之前，与俄国和好一直是拿破仑外交政策的基石；而两国失和是沙皇造成的，这样沙皇就能主动发起组成反法同盟。当时二十六岁的亚历山大一世是一个放荡堕落妇人的孙子，而其父是一个疯子，因此他生来就有一种病态的变幻无常的性格，而他所生长的环境及早婚更加重了这种特点。叶卡捷琳娜把他托付给瑞士沃州人拉阿尔普教育，此人侈谈自由主义，却没有把它的精神灌输给他的学生，保罗又使他接受普鲁士式的严格的体格训练。他随时都可能堕入这个凶恶残忍的宫庭的陷阱，因此变成一个矛盾交织的人：既单纯而又敏锐狡猾；既胆怯而又固执；既性急而又懒散；既侈谈道德而又放荡淫逸；这是一个“北方的塔尔马[①]”，一个好色之徒，一个轻易变节的拜占廷帝国的希腊人[②]。他即位后轻易地就获得了自由主义者的声誉。在很快地贬黜了杀害他父亲的凶手

① 塔尔马(1763—1826年)是法国革命期间杰出的演员。——译者

② 欧洲俗语指诡计多端的人，特指在赌博中作弊者。——译者

帕伦和潘宁之后，他便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对西方文明有一定兴趣的人，如曾在日内瓦和伦敦逗留过的柯楚别依和诺沃西尔佐夫，和在巴黎留过学、曾受教于罗默①的斯特罗格诺夫。除这些人之外，还有跟他一起寻欢作乐的伙伴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他是个波兰民族的叛徒，为人机智，但却缺乏品格。这些人组成了"密友委员会"或叫做"非正式委员会"，在这一组织中酝酿着有关宪法改革 186 的各种设想，而元老院的贵族们则要求将该"委员会"纳入政府之内。与此同时，亚历山大把拥护旧制度的人也留在身边，如他的侍从武官多尔戈鲁基亲王、炮兵司令阿拉克切夫，以及东正教圣教总会代表哥利津，后者使沙皇逐渐地沉溺于神秘主义。由于那批自由主义的"朋友们"认为，俄国实行自由的条件尚未成熟，并且有充足的理由不主张解放农奴，所以亚历山大在他的统治时期可以大胆随便地时而重用这一派，时而重用另一派，这要根据他自己倾向于法国还是反法同盟而定；当然，不管起用哪一派，他一直是个专制帝王。1802 年 9 月 20 日，俄罗斯元老院成为监督司法的机构，并在立法事宜中取得了规谏权，但这种权力刚一试行很快就被废弃了。新建了八个部，但是各部大臣仅仅是业已存在的各行政合议机构的首席官吏而已。除了西耶弗斯在里沃尼亚省根据 1804 年 2 月 21 日的命令答应对农奴实行某些改革之外，政府没有为农奴采取什么重要措施。唯一进步的措施是由新设立的国民教育部在多尔巴特、哈尔科夫及喀山建立了大学。

自我陶醉、虚荣心胜过勃勃野心的亚历山大，在外交政策中也侈谈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特别是想哗众取宠；所以他一开始

① 吉尔贝·罗默(1750—1795 年)，起初学医，深受卢梭教育思想影响，1791 年当选立法议会议员，参加"平原派"。1792 年又当选国民公会议员，从接近吉伦特派转而拥护山岳派。1795 年巴黎人民牧月起义(5 月 20 日)冲入议场时，罗默挺身而出主张接受人民的合理要求。起义失败后，被热月党人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听到宣判后自杀而死，被称为"最后的山岳党人"之一。——译者

就把波拿巴视为自己的敌手。他很早就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批德意志人，他们吹捧他为自己祖国的保护者和欧洲未来的解放者。这些人一般都曾是法国革命的赞美者，由于波拿巴恢复了君主政体而使他们的幻想破灭。他们之中著名的有克林格尔，他曾参加过狂飙运动，并曾被保罗一世聘为私人医生。他写道，“从受尽蹂躏的欧洲将出现一位王子，他将反抗威胁我们的肆无忌惮的蒙昧主义和政治迫害者，而变成人道、正义与文化的保护人。……这个人将是他！”随着他日益沉溺于神秘主义，亚历山大越来越相信自己就是这位新的救世主。他很自然地把这个天启使命同他保持与扩大俄罗斯帝国的愿望合而为一。根据特欣条约的规定，并作为1803年帝国大法的保证人，他自诩为德意志各邦的保护者，在这些邦的王侯中他有很多亲戚，恰尔托雷斯基遵照亲俄主义的家庭187 传统，劝说沙皇重建波兰，并封他为王。然而亚历山大梦寐以求的和俄国由来已久的野心都是觊觎君士坦丁堡。因此当恰尔托雷斯基在1804年出任外交大臣之后就起草了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计划。他利用彻底重画欧洲大陆地图的机会，把恢复波兰的设想纳入这个计划。此时亚历山大先迫使土耳其苏丹承认俄国对多瑙河各公国的保护关系：1802年，沙皇发布一道敕令，除守备队之外，将所有土耳其人逐出这些公国；敕令规定所有官职均由希腊人或罗马尼亚人充任，没有俄国同意不准撤换公国国君。从1783年起，格鲁吉亚君主就接受俄国沙皇的保护，1803年国君赫拉克里斯死后，格鲁吉亚很快就被并入俄国，俄罗斯的统治从此便越过了高加索山。这样，亚历山大的侵略野心就使得他与埃及的征服者波拿巴发生了冲突。他推断，如果让波拿巴在德意志建立统治的话，君士坦丁堡就可能落入他的手中。亚历山大从来不是想与拿破仑瓜分欧洲，他只是在等待从他手里夺到欧洲。

波拿巴的东方政策引起沙皇的不安，沙皇便靠拢英国一步，并

间接地鼓动它撕毁和约。但是当法国要求俄国出面调解时，他就后退一步，对英国疏远起来。法国的提议满足了他的愿望；他不但可以扮演所罗门①的角色，而且还能取得马耳他。尽管他的驻巴黎和伦敦的大使马尔科夫和沃龙佐夫执行着亲英政策，但他于1803年6月5日正式接受了法国的邀请。7月19日，他提出自己的建议：马耳他将接受一支俄国军队驻防；英国将占领毗邻的小岛拉姆佩杜札；法国则继续占领皮埃蒙特，条件是给其国王补偿；意大利各邦、荷兰、瑞士、德意志以及土耳其的中立由欧洲列强共同给以保证。总之，他想以调停英法间争端为口实而充当整个欧洲大陆的仲裁人。法国如接受这一调停将一无所失，因为它的自然疆界不成为问题，甚至也不危及它对意大利的控制。就波拿巴本人来说，他本不想被这样的条件束缚手脚，但他即使赞同沙皇的条件，实际上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6月27日英国已宣称它将不交出马耳他。然而波拿巴已经占领了汉诺威和那不勒斯的各港口，在沙皇看来，这对他是一种侮辱。于是在8月29日，波拿巴最终拒绝了俄国的建议，理由是这个建议极其偏袒英国。他极为粗暴地对待马尔科夫，并要求召回这位大使。亚历山大于10月28日同 188 意了这一要求，只把奥布利尔留在巴黎担任临时代办。现在他意识到，波拿巴决不会承认他是欧洲的最高裁决人，这使他深为恼怒。劫持当甘公爵一事终于使这两个人彻底决裂了。亚历山大以德意志的保护人自居，在帝国议会上抗议这种破坏德意志中立的行动。波拿巴从圣彼得堡召回了他的大使，并带着侮辱性的讥讽口气问道，假如为英国所雇佣的刺杀他父亲的凶手在邻近俄国边境地方定居下来，亚历山大是否"不会迫不及待地把他们抓起来"。奥布利尔接着申请护照，于1804年9月底离开巴黎。

亚历山大既与波拿巴发生冲突，必然就倒向英国。但是由于

① 所罗门，古以色列王，近东地区流传有很多关于他判决案件的故事。——译者

他仍然对阿丁顿抱有不满，所以直至皮特重新掌政之后他才以明确的姿态开始接近英国。然而仍不容易取得谅解。沙皇为了仍然充当他曾经扮演过的角色，希望组成一个总的联盟来使欧洲实现和平，并完全重新绘制欧洲地图；他甚至谈到恢复海洋自由。1804年6月29日，皮特只建议英俄结盟，其目的是为了从法国夺回比利时和来因地区。9月11日诺沃西尔佐夫带着谈判结盟的训令出使伦敦，训令是照抄他的副手修道院长皮阿托利草拟的备忘录的。备忘录的精神依然是野心勃勃，但为了迎合皮特，提出了要法国退回到它原有的疆界。莱维森-高尔于11月出使圣彼得堡，建立联盟的条件开始渐趋形成。瑞典的古斯塔夫四世于12月3日与英国结盟，1805年1月同俄国结盟。亚历山大要求英国与俄国在科孚岛的军队合作，以救援那不勒斯，1805年4月，克雷格将军启航到地中海。但是直至4月11日两国才签订条约，英国答应为俄国参加反法战争的十万名士兵提供补助金一百二十五万英镑。征服地的分配问题将留待以后再定，但已取得谅解的是：荷兰将取得比利时，普鲁士将得到来因河左岸北部一带。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强迫法国复辟波旁王朝，但双方同意竭力使法国接受复辟。条约签订后，亚历山大企图立即加以修改。他通过诺沃西尔佐夫最后一次试图以牺牲英国人为代价与拿破仑达成协议，然而英国人却丝毫没有想到俄国人会有必要这样做。

这样，在准备战争的同时，谈判也在进行着。俄国与英国同意189 增援在波美拉尼亚的瑞典军队，这支军队将入侵汉诺威与荷兰。在那不勒斯，俄、英与玛丽亚-卡罗莉娜达成了协议，她在拿破仑于1804年5月要求撤换国务大臣阿克顿之后就执政。11月签订了一项条约，由一名法国亡命者达马斯男爵指挥那不勒斯的军队；同时，纳尔逊控制着西西里。此外英、俄还对君士坦丁堡施加了压力，那里的土耳其苏丹拒绝承认拿破仑为皇帝。可是，单从南北两

方威胁法国还是不够的；要打败法国，俄国人还必需保证能假道德意志或奥地利。

在德意志，俄国人并未取得任何进展。实施1803年的“帝国大法”继续激起德意志各王侯反对奥地利，奥地利正试图在帝国议会中恢复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平衡，奥国尤其要维护“帝国骑士”的利益。在“帝国骑士”的名下，包括三百五十名封建领主，其中有很多伯爵和男爵，他们领有一千五百处封地，总面积达十一万公顷。他们组成三个部分——施瓦本、弗兰科尼亚和来因，他们直接臣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各自有权进行统治。他们的子孙一般由于家道贫困而去作教士，或进入政府供职，尤乐意在奥国为官。事实上象梅特涅、施塔迪翁、达尔贝格和施泰因一类的人家庭出身就是如此。他们已经由于把教会产业拨归俗用受到伤害，而现在又看到他们自己为那帮贪婪的王侯所垂涎，这帮王侯要把他们降格为“间接附庸”①，也就是说，要把他们变为隶属王侯的臣民。普鲁士在弗兰科尼亚开了先例，其它王侯也就跟着仿效；1804年1月13日，施泰因抗议纳索公爵吞并了他的两个村庄。奥国根据1803年“帝国大法”撤销了这些“间接化”的降格措施，并威胁因此向法国求援的巴伐利亚。奥国态度如此强硬，可能是由于维也纳已风闻共和十二年巴黎发生谋刺波拿巴的阴谋案。1804年3月3日，即下令逮捕当甘公爵的前一周，波拿巴向奥国发出一份最后通牒，奥国立即解除了武装。这次危机产生的后果是：当瑞典和俄国抗议法国侵犯德意志领土时，南德各邦闭口不言。1804年秋，拿破仑出巡来因地区，有些王侯来美因兹觐见以巴结他。他们就组成

① 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封建阶梯制度中，德意志各邦的王侯都是皇帝直属附庸，“帝国骑士”封地虽小，却独立于其他大邦之外，只臣属于皇帝。神圣罗马帝国既瓦解，大邦兼并小邦，把“帝国骑士”降为自己的附庸，成为皇帝“间接附庸”(prince médiat)，即“降格附庸”。这是波拿巴·拿破仑兵力扩及德意志造成的影响，小邦林立的封建割据局面逐渐被消灭，有利于此后德意志的统一。——译者

一个来因联盟问题交换了意见；拿破仑想让欧仁·德·博阿尔內娶巴伐利亚的奥古斯塔公主，但是这位公主已与一个巴登的亲王订了婚；达尔贝格建议全帝国与罗马教皇签订一个教务专约，但是德意志各邦拒绝了这一建议，它们宁愿同教皇个别交涉，从而加强190 各自的独立地位。不管怎样，南德意志各邦现在都在转向法国这一边。

如果普鲁士明确支持南德意志各邦反对奥地利，情况就会不同，但普鲁士只顾自己，而在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周围始终有一个“亲法派”，內阁大臣洛巴德就是这一派的头面人物；这一派人会很乐意接受波拿巴关于普、法结盟的建议。外交大臣豪格维茨的态度则较有保留，有时也建议对法国采取坚定态度，然而他过于看重自己的官位，以至不敢坚持己见。1804 年 4 月初接替他的哈登堡自夸采取一种更为有力的政策；然而事实上，他并不比他的前任更坚定。英法之间的战争使弗里德里希-威廉进退维谷：乔治三世以汉诺威选侯的身分宣布了中立，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宁愿让普鲁士占领他的领土，而不愿被法国征服。对普鲁士来说这真是恢复 1795 年的中立联盟的极好机会，这个联盟曾使它得以称霸北德意志，并象 1801 年一样，这也是一个重新占领汉诺威的极好机会。在这个问题上，普鲁士谨慎地决定先取得俄国沙皇的同意，然后再采取行动；亚历山大怀疑普鲁士与法国有秘密协议就加以反对。豪格维茨建议动员军队，并要求法国在汉诺威只限于索取金钱捐献；但是国王拒绝这样做。这位大臣于 1803 年 6 月28日又重申前议，他指出，由于法国占领汉诺威和库克斯港，使普鲁士的贸易受到危害。弗里德里希-威廉却愿派洛巴德去会晤那时正在比利时的波拿巴，建议法国同普、俄建立三角联盟，其条件是：在汉诺威的法国军队保持当时的水平，并要恢复贸易。但是这一尝试失败了。豪格维茨随后建议，如果法国人撤离汉诺威，普鲁士保

证全德意志的中立。波拿巴仅仅同意重新开放港口，条件是普鲁士同法国结成盟国。普鲁士国王勉强同意了这一点，波拿巴就认为普鲁士因此承担了义务，也应保证维持意大利及土耳其的现状，这在事实上将会使普鲁士与奥、俄两国为敌，而给普鲁士的只是获得汉诺威的希望而已。1804 年 4 月，普、法谈判陷于破裂：普鲁士对汉诺威垂涎欲滴，但却只肯以它本身的中立为条件。

正在此时，逮捕当甘公爵一事使弗里德里希-威廉再次感到驻在汉诺威的法军近在咫尺的威胁，他最后放弃了在法、俄两国之间搞平衡的企图。亚历山大早在 1803 年 7 月就建议签订的防御同盟条约，终于在 1804 年 5 月 24 日签订，俄国应允当拿破仑加强 191 在汉诺威的兵力，或扩张越过威悉河以东时，提供五万名士兵。战争的借口在十月里的确出现了，当时英国驻库克斯港的使节乔治·朗博尔德被富歇下令逮捕了，富歇希望从他的公文中发现与共和十二年阴谋案有关的证据。哈登堡希望利用这一机会进行军事动员来要求法国从汉诺威撤军，但弗里德里希-威廉仅只要求释放被捕的人，当拿破仑把他释放之后，整个事件也就解决了。

在一段长时期内，奥地利和普鲁士一样，也没有什么指望。吕内维尔条约签订之后，奥地利恢复元气颇为不易。查理大公力图劝他的哥哥改革统治方法，允许大臣有职有权，并允许他们参加会商议事。1801 年 9 月 12 日，成立了一个由三个部组成的内阁。然而这也没有用，因为弗兰茨依然要独揽大权专断一切。不过他起码还是允许于 1801 年 1 月 9 日提升为军务院主席的查理大公在他的参谋长迪卡和他的顾问法斯本德的协助下负责改组军队。但是经费缺乏：1801 年至 1804 年间，国债从六亿一千三百万盾增加到六亿四千五百万盾，流通的国库券从二亿零一百万盾增加到三亿三千七百万盾。结果通货膨胀为害极大；1801 年，按票面价值百分之十六贴现的纸币现在却按百分之三十五贴现。物价上涨，

以致必需增加工资和薪俸。投机使少数人致富，但却毁了那些有固定收入的阶层。1804年影响到全德意志的饥馑更加深了苦难，同时人们仍拒绝打击特权等级享受的纳税豁免权，如果取消这种特权，那将不难重整财政。在这些情况下，正如查理大公所言，奥国亟需休养生息。外交大臣科本兹和有影响的科洛雷多伯爵也持有这样的见解；以恢复同法国结盟而自诩的科本兹与法国大使尚帕尼密切合作，每当波拿巴一提高嗓门，他就让步。

尽管如此，在维也纳还是有一个主战派。一些奥地利人，象施塔伦贝格伯爵和施塔迪翁，就属于这一派，但是起主要作用的则是已组成反法同盟的那些国家的大使——俄国的拉祖莫夫斯基、英国的佩吉特、瑞典的阿姆费尔特，他们正是在几个俄国贵妇人的沙龙里展开阴谋活动。他们通过当时宫廷图书馆长约翰·冯·米勒，与沙皇驻德累斯顿的代表昂特雷格伯爵取得联系，后者也被奥国所收买。通过施塔迪翁和当时驻萨克森的大使梅特涅，他们把弗里德里希·冯·根茨拉进他们一伙。在柏林负债而破产的根茨于1802年9月接受了奥国宰相府顾问一职，但却没有停止接受英192 国的津贴。尽管这伙人都是得人钱财替人效劳，但他们个人也都是仇视法国革命的，特别是阿姆费尔特，他是一个死硬的贵族，根茨称之为“最后一位罗马人①”。根茨本人游说弗里德里希-威廉参加这次圣战未成后又希望争取弗兰茨。奥国的大臣们不信任他，仅仅把他作为一个政论家而加以利用；这样他就只得到僚属的待遇，因此他猛烈抨击科本兹与科洛雷多，并且夸大他们的软弱无能的缺点。

事实上，科本兹决不是无所作为的。他对英法之间的战争感到不安，因为他忧虑的是，在海上不能取胜的波拿巴可能会以奥国

① 在欧洲历史上，有些人颂古非今，崇拜美化古罗马人。这里根茨与阿姆费尔特臭味相投，故吹捧他大有古人之风。——译者

为牺牲品而在大陆进行报复。同时他意识到，这次战争使他处于一种有利的讨价还价地位，从1803年起他开始向伦敦要津贴，后来他终于拿到了手。法俄之间的破裂又给他提供了新机会。1803年9月1日，多尔戈鲁基到达维也纳，受到热情的接待，并请他提建议。1804年1月，俄国提出愿出兵十万，以迫使法国重新接受吕内维尔条约的规定。科本兹宣称，俄国这点援助是不够的；除此之外，他也无意冒犯法国，弗兰茨更是如此，他说，"法国沒有做什么伤害我的事。"

法兰西帝国的宣告成立改变了一切。反革命派惊呼狂嚎，根茨写道："法国革命已经被我们时代血腥悲剧的不可思议的结局认可了，甚至几乎是郑重批准了。"如果说维也纳宫廷也被此事搅动起来，那特别是因为它对神圣罗马帝国和哈布斯堡王室利益造成了严重后果。拿破仑采用皇帝的称号而不用国王的称号，这不只是尊重大革命的传统；而且还意味着是针对整个欧洲的，因为到当时为止仅仅有一位皇帝，即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人，基督教理论上的首领。在法理学家看来，帝国不一定非得是德意志帝国不可，教皇加冕礼(哈布斯堡王室久已废而不用)在巴黎举行同在罗马举行一样有效。拿破仑巧妙地把这种尊严归于他的国家，自称法国人的皇帝，并否认有统治全球的野心；然而人人都看出，既然一个新皇帝出现了，则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因此，尽管弗兰茨二世决定承认拿破仑也称皇帝，但他要求，当他在1804年8月11日改称奥地利皇帝时，也将得到同样的承认。他暂时还兼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他显然料到有朝一日会被赶出德意志的。此外，由于传统把意大利王国与神圣罗马帝国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也担心法国可能在意大利进行新的扩张，在这一点上他沒有看错。因此，法兰西帝国的创建就加速了第三次反法同盟的形成。 193

科本兹第一步是想要试探普鲁士的意图，但是由于他没有提出任何实惠的东西给普鲁士，这种试探就毫无结果。当他在十月获悉诺沃西尔佐夫前往伦敦时，他推测，同英国结盟的俄国可能会置奥国于不顾，于是就与亚历山大签订了 1804 年 11 月 6 日条约，虽然条约是防御性的，但它却规定“在需要以其它形式动用共同的兵力的情况下”，双方将洽商采取联合行动。到 1805 年 1 月有消息说，意大利共和国将要变为一个世袭王国；为了不妨碍自己的手脚，科本兹决定排挤掉不赞成与俄国结盟的查理大公。查理大公处事有独立见解，因而长期以来就使弗兰茨皇帝感到不快，皇帝对他不断无端指摘，以致使这位大公不得不辞职。迪卡和法斯本德也受到冷落，颇受英国称赞的麦克将军应召主持总参谋部。即使如此，弗兰茨还是反对发动进攻，科本兹本人也犹豫不决，结果就使得焦急等待的俄国以废弃协约相威胁。拿破仑一系列新的侵略终于巩固了俄奥两国的协约。

拿破仑的附属国和同盟国都没有按照他的意图行事。荷兰依然听任走私活动继续进行，荷兰议员拒绝通过为增加军备而征税或举债。1804 年 9 月，拿破仑指出需要修改宪法。1805 年 3 月 22 日，席梅尔佩宁克受任为拥有全部行政权的首席行政长官；立法权授与了“拥有最高权力”的议会，议员由公民从政府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选出；候选人由席梅尔佩宁克挑选，这还是第一次。这一切都安排就绪之后，财政部长高格尔便能着手实施财政改革。

具有更大影响的事件是意大利共和国的消亡。共和国副总统梅尔齐仿照法国组织了行政和司法体系，签订了教务专约，创建了一所学院，重新开设了一些大学。为了镇压盗匪，他取消了陪审制度，设立了警察厅长的职务，建立了宪兵队，并建立了特别法庭。公共工程增加了，辛普朗通道建成了。精力充沛、精明能干的财政部长普利纳采用了征收间接税，清偿了债务，整顿清洗了财政部人

194

员，改进了帐目管理。最后还建立了地方军队，征兵制度终于在1803年成功地实施了。然而这些改革没有使人高兴，而是更把人激怒了，公共舆论依然非常敌视法国人。虽然梅尔齐很照顾贵族，但却几乎得不到他们的支持；立法院显然难以驾驭，它拒绝采取建立登记注册机构和征收遗产税等措施。梅尔齐本人希望法国军队撤离，得到独立。1803年5月，他向奥国政府提出一项古怪的建议，内容是建议把包括威尼西亚在内的北部意大利统一起来，而置于前托斯卡纳大公的统治之下。当波拿巴得知此事后便产生了疑心，促使他决定亲自控制意大利共和国的事务。

法兰西帝国的建立给拿破仑的意大利计划带来了最危险的因素。自从查理大帝以来，所有的罗马皇帝不是伦巴第的国王就是意大利的国王，所以拿破仑也必须如此。早在1804年5月，他就把他的意图通知了梅尔齐。意大利的一个委员会制订了一部宪法，但是当皇帝发现宪法对他的权力作了若干限制的时候，他极为愤怒；因此他把委员会成员召到巴黎，颁布了他的全部条文。他似乎已经意识到把王冠加于自身的危险，因为他曾首先提出让他的哥哥约瑟夫作国王，1805年1月1日，他写信给奥国皇帝，向他保证，新成立的王国将永远与法兰西帝国区分开来。但是指望将成为法国统治者的约瑟夫拒绝做意大利国王，路易也代表他儿子同样表示拒绝。结果，拿破仑安排于3月18日通过一项元老院决议案，宣布他兼任意大利国王。5月18日他在米兰为自己加冕，并指定他的继子欧仁·德·博阿尔内作副王。对奥地利，他只答应随着和平的到来，当从马耳他和科孚撤军时，他将让位给他的一个亲属。这样，吕内维尔条约遭到了破坏。在他的驻热那亚代表萨利切蒂策划下，利古里亚共和国决定与法兰西帝国合并，拿破仑便于6月6日把这个共和国划分为法国的三个郡，这就再次违反了条约。除此之外，拿破仑于3月18日把皮昂比诺公国赠给了他的妹妹埃

利兹，并于6月23日封他的妹夫巴乔基为卢卡公爵。这两块领地是皇家采邑，拿破仑通过这样赐赠，目的显然在于表示他以罗马皇帝继承人自居。奥国不再犹豫了。6月17日，帝国议会决定加入英俄同盟。恰在这时诺沃西尔佐夫途经柏林去巴黎，受权表示同意法国据有来因地区及比利时(安特卫普除外)；6月25日，亚历山大取消了诺沃西尔佐夫的使命。7月16日，奥地利的温青格罗德将军与麦克磋商，决定了作战计划。7月28日，皮特和亚历山大终于批准了4月11日在圣彼得堡签订的英俄条约，但在马耳他命运的问题上沒有达成协议。奥地利于8月9日也在条约上签了字。然而它还在向巴黎进行试探，希望获得法国一些让步就可以不必参战。由于沒有取得任何结果，奥地利于9月11日侵入了巴伐利亚。

195

在此同时，双方都尽了很大努力说服争取德意志各邦。弗里德里希-威廉对于沙皇的责难仍然固执地充耳不闻，7月15日，他拒绝集结在波美拉尼亚的军队假道普鲁士，这就给拿破仑帮了大忙。亚历山大要求会见国王，但沒有成功，于是便威胁说要强行通过西里西亚。恰尔托雷斯基感到大有希望：9月23日，沙皇到达恰尔托雷斯基家族的城堡普瓦维；他在那里谈到要夺回在瓜分波兰时普鲁士所得到的一份领土，并扬言要复兴波兰。其实亚历山大却是在欺骗他的朋友，因为他只是企图威胁普鲁士国王，希望把他争取过来。

至于拿破仑，那年冬天他对在威尼西亚集结军队感到焦虑之后，直至七月底他也沒有什么怀疑，只是到8月23日他才意识到危险。尽管如此，他于8月8日以答应把汉诺威给普鲁士作为诱饵，试图把普鲁士争取过来；8月22日他派迪罗克到柏林去谈判，普鲁士国王回答说，他只同意在吕內维尔条约的基础上保持和平，才肯与法国结盟。在普鲁士宫廷和军队內部，主战派开始形成；路易莎王后一直对亚历山大表示同情支持，也从未减少对拿破仑的

憎恨。但是包括军队在内的大部分普鲁士人仍然赞成执行中立政策。由于其它地方需要贝尔纳多特的部队，皇帝决定从汉诺威撤军，并许诺由弗里德里希-威廉的部队占领，如果这位国王想利用这个机会，那机不可失，他不应错过。拿破仑预料到这位国王对此会感到极为满意，起码暂时会放弃参战的念头。这种估计完全正确。拿破仑在受奥国威胁的南德意志各邦中进行得更为顺利。8月25日，巴伐利亚与法国结盟，9月5日，符腾堡原则上也追随巴伐利亚的做法。早在1803年已端倪可察的德意志的四分五裂过程就这样完成了。 196

拿破仑在意大利也施展了相同的手腕。9月10日，那不勒斯王后玛丽亚-卡罗莉娜与俄国结盟；9月21日，拿破仑与那不勒斯大使加洛侯爵签署了一项撤军条约，因为他要派这支军队到阿迪杰河一带。他还占领了伊特鲁利亚，甚至不顾教皇的抗议占领了安科纳港。那不勒斯的费迪南四世由于害怕维尔纳夫的进攻而批准了这一条约。特拉发加海战之后，玛丽亚-卡罗莉娜扔掉了假面具，11月19日，一支英俄联合舰队把一万九千名士兵运到那不勒斯登陆。但已为时太晚；拿破仑已经赢得了胜利。

第三次反法同盟一直被认为是存心要剥夺法国的自然疆界。反法同盟如若获胜，势必夺回全部或部分法国的征服地，这是不在话下的。不过有待说明的是，英国于1803年、俄国和奥国于1805年挑起战争并不纯粹是为了这一目的；这一点没有任何证明，甚至英国方面也没有。首先，这种十分明显的侵略精神是由一直未被人们重视的强烈欲望和利害关系助长的：英国满脑子的经济利益盘算及海上帝国主义的政策；亚历山大的妄自尊大及个人嫉妒心；在维也纳影响很大的欧洲贵族的敌对心理，这种仇恨法国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的冲突。其次，更为清楚的是，拿破仑就好象在赌博一样，拼命煽起这种郁积着的仇恨心理，使各强国无不惊恐万

状，甚至使最怯弱的奥地利也被迫走极端。且不说法国民族的利益，只从他个人政策的观点来看，绑架当甘公爵、建立帝国、过早地触怒英国、使俄国的东方野心惴惴不安、特别是改意大利共和国为世袭王国，以及吞并热那亚等等对于保持他的政权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尽管他沒有吉伦特派的革命热情，但他也向各国帝王与贵族恣意挑衅，而吉伦特派已曾为此而受到责难；他执行了强横的侵略政策，而督政府已曾为此而遭到轻蔑的批评。

不管怎样，亚眠和约被撕毁之后形成的第三次反法同盟终于决定了他命运的道路。这并不象有些人所主张的那样，他的最后倒台从此就是注定了的；要使拿破仑垮台还有待他犯下更多的错误和发生某些不可预测的偶然事件。但是从此时起，他除了征服全世界之外，已别无其它选择。

第二章　拿破仑的军队　197

吕内维尔条约签订之后，波拿巴便着手清洗军队内部的厌战分子和不可靠分子。他裁减了许多军官，遣散了至少参加过四次战役、总数达八分之一的精锐部队的士兵。从 1801 年到 1805 年，他花费了四年多的时间来改组军队，并重新审查和改进他的作战体系，这个体系在 1805 年和 1806 年付诸实施时将震惊世界。波拿巴的独创天才充分表现在精心制订的战略原则和建成对战略原则不可或缺的战术部队上面。除此以外，他大体上仍然忠实于法国革命所采用的办法：混合编制和从士兵中晋升始终是他的军队最重要的特征。虽然波拿巴在战争准备中表现了极高的组织能力和对细节的慎重考虑，但是他对每次战争总是临机处置。

一、征募与晋级

征募新兵仍根据共和六年的法律，这项法律已补充了许多行政规定，最后于 1811 年把所有这些规定都编纂成一部法律。这部 198 法律规定，所有从二十岁到二十五岁的法国男子都得服兵役；但是为了免得使政府帮助供养应征者的妻子儿女，它又允许有许多例外。首先免服兵役的是那些已婚男子，以及在 1798 年 1 月 12 日前已有孩子的鳏夫或离了婚的男人。公共舆论忽视了限定的日期，而一般都把免服兵役视为永久性的。然而由于法律有明文规定，所以 1808 年以前的征召，甚至追溯既往的征召入伍，都没有放过已婚男子和成为鳏夫的父亲。不过，征募新兵的军官倾向于不

征募这几类人，或把他们列入“备取”，也就是说，编入已中签的一部分新兵之中，这些人只在应召新兵不足额时，才应召入伍。最后，按照 1808 年 9 月 10 日元老院决议案免除了这几类人的兵役。因此到帝国末期匆忙结婚者数以倍增。另一方面，赡养家庭者受到相对的优容，在教务专约签订之后，对神学校学生则更是如此。最后，在共和八年只是一种优待的“顶替”制度，根据共和十年花月 28 日(1802 年 5 月 18 日)的法律变成了一种权利。

出于财政的也有经济的考虑，为了保存劳动力，共和六年法律规定，除了祖国在危急中的情况之外，不征募所有适龄者入伍，而 199 是由议会每年规定一定的新兵名额，首先从年龄最小的适龄者中征募。在执政府时期，新兵的征募大体同在大革命时期一样：本已为数无多的每年新兵名额由立法院通过决定，然后摊派到各郡。在原则上，郡议会和县议会再给各公社分配名额；各市府自己选择医生检查新兵体格，指定免役人员，批准顶替兵入伍，如有异议最后上报郡守决定。

兵役制度如同帝国其它制度一样，朝着同一个方向演进。从一开始“顶替制度”就已优待新贵名流。1805 年 9 月 24 日拿破仑以元老院决议案规定了名额，此后就剥夺了立法院在这方面的权力。另外，许多市政府玩忽职守、庸碌无能和舞弊作恶，以致怨声载道。于是象剥夺市政当局财政权那样剥夺了它们在征兵中的职能，地方征兵改由专职官员主办，这就大大有利于平民。政府禁止各市政当局用投票方式抽征新兵，而鼓励用抽签办法征募新兵。郡守和县长日益频繁地干预兵役制度的实施。共和十年热月 18 日(1802 年 8 月 6 日)，每个郡都成立了一个由郡守和数名军官组成的巡回征募委员会，目的在于重新审查所有因健康不合格而免服兵役的人。1805 年的战役又引起决定性的变化：按照 8 月 26 日法令剥夺了地方议会的分配名额的职能。从那时起，名额分配改

由郡守和县长负责;后者开列适龄新兵名单,以抽签方式选择应召新兵,并负责主持体格检查,不过检查要经征募委员会复审。中签应征入伍新兵仍然保留由志愿兵代替入伍的权利:这叫作“替换”;此外中签新兵还可以雇人代替:这叫作“顶替”。甚至在新兵编入团队之后,还可以雇人顶替。入伍新兵的分配是由皇帝或他的大臣决定的。每一个团派出一名军官以顾问的名义参加征募工作;这名军官由一个护送队陪同,把分配给该团的新兵带到新兵训练站。除了1800年由阿让维利埃负责、1807年由督导官拉居厄·德·塞萨克管理的征兵局之外,新兵征募工作没有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但是征兵制度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至于新贵名流的滥用职权,贪污受贿,拿破仑无疑地有所制止,但是他也不能做到彻底杜绝。 200

虽然这一制度做到了合理利用人力,但是由于取消了平等,由于把大部分负担转嫁给穷人,因而改变了兵役制度的全民性,所以也带来了不利的一面。1805年到1811年顶替兵的价格上涨得不很多,但是在科多尔郡价格从一千九百法郎波动到三千六百法郎,以致新兵名额中只有百分之五的人能有钱雇人顶替。但是,征兵之所以终于为人民憎恶,那是因为在1805年之后一直在打仗的缘故。被征来的新兵从来没有进过兵营,而是尽快地开赴前线,投入战斗。无休止的战争不允许他们退役:士兵只有在残废的情况下才能回家。1803年军队仍然还有十七万四千人是在1792年到1799年间征募的;而且他们的退役还遥遥无期。此外,随着皇帝的冒险事业的不断扩增,征募数字也不断地增加,而且1806年之后都是提前征募新兵,虽然法律并没有此项规定。直到1813年,确实并没有任何一年的适龄入伍者是一次全部被征入伍的,但是那些没有中签的人,甚至那些已雇人顶替的人也都是毫无保障的,因为谁也不能阻止发布补充征募新兵的征召令,从尚未入伍完毕的各

年适龄应征者中补征。早在 1805 年，拿破仑就从 1800 年至 1804 年每年适龄男子中补征了三万人。

对当时的人来讲，这些要求似乎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在旧制度统治下还闻所未闻。不过必须指出，从 1800 年到 1812 年拿破仑一共仅仅征募了一百三十万人，其中从法国原有领土①内征募的占四分之三稍多些。甚至把 1812 年和 1813 年的巨大征兵数字(超过一百万人)考虑在內，那些实际上被征募的男子的比例沒超过适龄的男性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一。科多尔郡从三十五万居民中提供的新兵总数仅为一万一千名，占百分之三点一五；北滨海郡从五十万居民中征募了一万九千名士兵，占百分之三点八。正如在法国革命时期那样，拿破仑不得不追捕规避兵役者和逃兵；早在共和八年，他们的父母就要被罚款，1807 年之后，他们的家又都受到驻兵监管。宪兵和国民自卫军的别动队在全国各地搜捕逃犯。这些措施的确很有效，因为触犯军纪的人在 1812 年之前一直为数不多：201 例如在科多尔郡，从 1806 年到 1810 年这样的人不足百分之三。共和八年、共和十年以及 1810 年拿破仑三次大赦他们。因此，国民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更为顺应强制兵役制；只有最后由于军事失利而出现大量征兵的时候，国民才变得难以驾驭了。

由于不断地进行战争，拿破仑的军队通过不断的混合编制加以补充，这个原则产生于法国革命。每个战役一开始，新兵部队不管服装和武器好坏，都分成小股部队奔赴前线。皇帝在 1806 年11月 16 日写道，"新兵不需要在训练营里呆八天以上"。他们在开赴战场的路上学习基本军事技术，如此而已！一旦编入团队，他们就和久经战阵的老兵混合编制在一起，在战斗中获得他们所能得到的知识。即使在战争中有短时休整期间，也不注意操练，因为操练被看成是沒有用处的。拿破仑的士兵和兵营中训练出来的士

① 即不包括从 1789 年以来合并入法国的新领土。——译者

兵毫无共同之点：他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士兵一样，是仓促上阵作战的斗士，并且还保留着同样的独立性。既然由普通士兵提升的军官们是他昨天的战友，并且他自己也可能在明天被提升，因此他很不注意“军队的”精神；对他来说形式的、机械的纪律是难以容忍的；他往往随便离队，到时候回队，只有在炮火下才服从命令。很少有军队容忍违犯纪律到这种程度；在这种情况下，集体示威，个别抗命以及哗变经常发生。拿破仑为此大发雷霆，但他总是对军队表现出比政府特派员更加纵容的态度；他认为士兵基本上是一名战士，而他最关心的是他的战士是否渴望战斗、并且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

这种在敌人面前表现出鼓舞着个人的主动性、大胆、自信并使军队具有集体精神的热情，也是大革命的遗产之一。无套裤汉的激情、对平等的热爱、对贵族的仇恨、对教权主义的激烈反抗无疑地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了，但是这些情感并没有熄灭；1805 年它仍然十分热烈。在老卫兵看来，被人亲昵地称作“小伍长”的拿破仑从来不是一位帝王，而是在反对各国帝王的战争中的一位领袖。从大革命中也迸发出了一种意气风发的民族主义感情，这是一种属于“伟大民族”的自豪感。皇帝用颁发“告士兵书”的方式，精心地哺育着这些情感，在这一点上，他承继救国委员会的办法，使战争成为一种得到群众拥护的事业。

如同国民公会和督政府的军队一样，拿破仑的军队的威力，主要也是从为个人才干开辟了发迹道路的社会革命中得来的。在军 202
队里，平等表现在从士兵中擢用军官。共和八年宪法授权总司令选用军官。即使拿破仑表示有意恢复军事贵族，但是他基本上还是凭军功大小决定任命。资历是无足轻重的；知识水平本身很少引起重视；打胜仗不取决于受教育多少，而是几乎完全依靠大胆和勇敢。每次战斗之后，负责晋升的上校军官从团内选拔战功突出的

人填补阵亡军官的空缺，士兵是对他在提升问题上表现得公平与否的最好的法官。拿破仑也根据同一标准任命高级将领。在一个正在巩固等级制度的社会里，正是军队给有才干的人提供了出人头地的大好机会，因此，军队强烈地吸引了有抱负的青年人。军队中的优秀分子理所当然地热望投入战斗，冲在前面，他们带动了其他人，或者至少在战场上弥补其他人的短处。拿破仑从未停止过鼓励这种对荣誉的渴望，起初颁发滑膛枪和军刀，即表示荣誉的武器，后来颁发荣誉军团勋章。同时他还大大增加了精锐连队和军团的数目，其中最得意的是身着闪闪发亮、五彩缤纷的检阅军服而显得异常突出的近卫军。

这个制度实行的结果是，相对地讲军官比士兵所受过的训练高不了多少。由此而带来的不利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拿破仑从未和任何人在一起商量制定战略思想和指挥作战；除此之外，只要有在战略运用方面很熟练、有经验的勇敢的将军们就足够了。总参谋部不是一个能对战斗进程施加影响的自主机关；那些在机关里工作的军官只是处理实际任务：皇帝下圣旨，他们转达。总参谋长贝尔蒂埃是一位优柔寡断、才能平庸但规规矩矩、唯命是听的将军，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名“传送陛下敕令”的少校而已。拿破仑在1806年写信对他说：“严格遵守我给你的命令”，“只有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贝尔蒂埃亲自告诫一位元帅说：“没有人了解他的思想，你的职责就是服从命令。”拿破仑的副官，如马尔博、费桑扎、卡斯特朗、古尔戈和他的侍从武官，如迪罗克、穆东、拉普、德鲁奥、萨瓦里和贝特朗，都是由于他们具有敏捷的判断力和尽职的热忱才从行伍中选拔上来的。他们根本不具备左右军团司令官的权威；他们只不过是主人的耳目而已。这些人总是奉命出差各地，他们发回视察该地形势的报告。然而，如果拿破仑不能同时到各处巡视，认为有必要指定人代他外出的话，他就派出一个心腹，如缪拉、拉纳、

203

达武或马塞纳，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副总司令或军队的临时司令官，也只有他们才有权制定战略方针。因此，真正富有才干的将领并不需要很多。

由此可见，拿破仑的军队并没有整套的制度；它不断地经历着临时出现的变化。军队的力量在于发挥个人的勇敢和指挥官的天才。各兵种在组织方面的革新无关紧要。步兵仍然分成战列步兵和轻步兵或称流动步兵，他们的战术没什么重大的变化。共和十二年葡月1日（1803年9月24日）规定的骑兵建制，此后成为标准的分类法，即分为轻骑兵（狙击骑兵）、主力骑兵（龙骑兵）和重骑兵（胸甲骑兵）。由于国民公会和督政府的努力，骑兵比步兵训练得要好一些。在缪拉和许多勇猛的骑手率领下，奥国的骑兵是没有什么可怕的。炮兵是按照骑、步兵团组成的，步兵的炮被取消了。工兵组织为一些独立的营，架桥兵也属于工兵营的编制。近卫军的编制在共和十二年热月10日（1804年7月29日）确定下来，那时这支部队有三分之二是富有经验的老兵；它包括五千名步兵和二千八百名骑兵，这两个兵种被分为掷弹兵、轻骑兵和轻武装搜索兵。再加上一百多名马穆鲁克①、一个轻炮队、海军陆战队、宪兵队、甚至拥有一个当时法国军队中唯一的辎重队。至于军械则没有什么变化。1777滑膛枪准确射程为二百米，每三分钟至多打四发子弹。格里博瓦尔炮②每分钟发射两发实弹，重量达四磅、八磅或十二磅，在六百米以内效果极好。在四百米之内效果良好的

① "马穆鲁克"原意白奴，是埃及统治者从中亚和近东各国掠夺和购买来的，包括许多种族和国籍的奴隶，起初把他们组成卫队。但他们逐渐掌握兵权，在十三世纪中取得政权，建立王朝，达两个半世纪多，在1517年被土耳其人打败。此后马穆鲁克军官集团仍是埃及封建割据势力。1798年波拿巴远征埃及打败了马穆鲁克骑兵，招了一些马穆鲁克加入法军。——译者

② 格里博瓦尔（1715—1789年），法国炮兵将军，他改进了大炮的火门，设计了较轻便的野炮架。——译者

榴弹和霰弹偶尔也使用。也使用一种六吋榴弹炮。拿破仑非常重视炮火，因此就非常重视炮队。然而他自己的炮队炮的数量为数不多：1806年以前，每师只有十二门炮，就在这一年才出现了一个有大约五十九门炮的总停炮场。1808年平均每千人中还只有两门炮。马尔蒙对这种落后状态应负部分责任；1803年，他曾经着手进行改铸全部大炮的工作，但是当1805年战争又起时，他被迫放弃了这个工作。但是还有些更为深刻的原因：装备工具缺乏，而最重要的是运输能力不足；既不能搞到更多的炮车也不能得到充足的弹药。

拿破仑的军力由于不断战争和扩大征服，也由于他日益增长的贵族倾向而逐渐削弱。随着共和国时期的老兵数量日减，而入伍新兵骤增，因此混合编制的效用变得越来越小，1809年，军队开始建成完全是新兵的师。要使从士兵中晋级这一制度发挥其优越性，有赖于每次战役有相当数量的阵亡军官，以便为新人的提升腾出位子。起码在1812年之前，阵亡军官为数不多。特别是高级将领比比皆是，而一旦荣任元帅，他们所追求的只是保持钱财和荣誉，因此便希望和平与安逸。如果只由皇帝一人独断专行，这种弊端可能会发展得更为迅速，因为这符合他的政治意图，符合他要建立一个包括出身贵族、富人和军官子弟的军界优秀核心的社会理想。他建立了一所陆军中学，在圣热尔曼设立了一所骑兵学校，在枫丹白露创办了一所军官学校，这所学校于1808年迁到了圣西尔。拿破仑也考虑到要重建1791年解散的“亲卫队”①：按照这种方针，他于1800年创建了“后备志愿队”，1806年创建了“宪兵队”。他鼓励组织从出身名门的国民自卫军的成员中征召的地方“仪仗队”，1805年9月30日，他把这些原供检阅用的部队列入军队编

① 亲卫队（garde du corps）是旧制度下国王个人的卫队，1791年宪法对国王卫队加以法律限制，废除了个人的卫队。——译者

制。虽然军官们愿意让自己的子弟到军校学习，但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不愿意送他们的子弟去。此外，拿破仑意识到有招致军队,特别是近卫军不满的危险。宪兵队和仪仗队于1806年被取消了，只是在1813年后者才又恢复起来。只有在意大利王国,1805年6月26日建立的王室仪仗队成了军官养成所，这就揭示了拿破仑的真实意图。

军队的民族性质也减弱了。1800年以后,法国部队中来自新合并地区的士兵占相当大的比例，而且这一比例随着新的扩张而不断增加。此外,拿破仑还恢复了旧制度的习惯做法,即尽量征募外国人入伍。他有瑞士团和波兰团，1803年组织了汉诺威团和爱尔兰团，1805年又创建了两个“外籍”团。这些外籍部队与日俱增。最后帝国军队包括有属国和盟国的部队：1805年以后有意大利人、荷兰人和南德意志人。他们的数量增加得如此之多,以至在1812年法国本土上的法国人在帝国军队中只占少数。 205

正是这个制度的成功暴露了某些随之而来的弱点。随着战场的增加,拿破仑如不能亲临现场就往往暴露出：他的将领中很少有人能独当一面,统帅全军。内依、乌迪诺和苏尔特在独立指挥作战时表现庸碌无能。人们认为,拿破仑要对这种庸碌无能负责,因为他剥夺了这些司令官所有的主动权。这是沒有根据的指责。虽然如同所有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一样，他独自指挥战争全局不和别人共同商量,然而在选择具体作战方法上,他还是留给他的将军们相当大的活动余地的。只是他在选拔高级将领时，沒有使他们具备应付大规模战争的必要训练。另一方面，扩大征服地使交通线随之延长,幷需不断分兵占领新征服的领土,这就又构成了另一个弱点。由于拿破仑总是想用决定性的打击一举结束战争,所以军队缺乏后备力量。除了提前征募下年度适龄新兵之外,沒有其它办法补足军队兵员；只有依靠盟国甚至最靠不住的属国的军队，才有足够

兵力驻防所占领的土地；在前线，精锐部队的战士不断地减少。以共和三年牧月28日（1795年6月16日）法律为基础、根据共和八年宪法规定所重建的国民自卫军本来是能够为国防军提供兵员的。但到1805年，它只是存在于纸上；9月24日，皇帝命令重新组织国民自卫军，他自己保留选派军官的权力；但在事实上，他只不过是组织了精锐的连队和仪仗队而已。后来，他部分地动员了国民自卫军，例如用在保卫沿海区域；不过直到1812年，他沒有把国民自卫军同他的军事制度紧密地联系起来。

1805年还沒有出现令人不安的征兆。拿破仑在布伦大营命名的帝国"大军"，于8月26日开始向德意志进军。它是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军队。将近四分之一的士兵在法国革命期间参加过所有的战争，另外的四分之一左右参加过1800年战役，而其余的人是在执政府时期入伍的，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和老兵们完全融合起来。各级军官几乎都亲身经历过战斗，然而他们年岁太大：九十名校官超过了五十岁，有些超过了六十岁。另一方面，高级军官很年轻，作风泼辣。这支军队只花费了三年的时间就把"大帝国"的疆界扩张到了涅曼河畔。

206

二、战争准备

在旧制度之下，战争总是在毫无准备之下进行的。一旦战争爆发，就必须征募官兵。变为大承包商的军需供应商不问贵贱地购买货物，充塞他们的仓库，囤积装备。他们敲诈国王，而他们的代理人吸尽士兵的骨髓。政府力图建立监督制度，但是军需官却沒有职业良心，足以抵制腐蚀。这种弊端的显而易见的原因似乎是由于财政匮乏的结果；而深刻的原因则是国家的经济情况，经济还十分薄弱，以至不能支撑现代的战争，也不足以维持一个廉洁的、

胜任的官僚机构。这样，王政下的政策总是超出它力所能及的范围。同样不得不仓猝作战的山岳派做过非凡的努力，以便废除私人承包商，使供应业务国有化，并且要求公务人员忠于职守，廉洁奉公。热月9日政变之后，共和国处境与王政时期不相上下。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一仍其旧，而由于军队数量剧增和战争旷日持久，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了。

象雅各宾派一样，拿破仑非常厌恶军需供应商；并且同他们一样，在缺乏足够金钱和人员的情况下被迫仓促行事，但由于他依靠的是新贵名流，他就不能诉诸雅各宾派的做法。正象他为了充实国库被迫求助于金融家一样，他现在要维持军队也不得不求助于这些人。1805年，范勒尔贝格等人保证为国内军队提供粮秣；战争爆发后，某些公司负责专营面包、肉类、饲料、医院和所有运输设施，包括大炮的运输设备，所有这些经营都可获得一定的保证利润。共和九年，创立了一个炮队运输营，只有近卫军才拥有自己的行李辎重队。拿破仑做了很大的努力来厉行账目核实。共和十年，把军队的行政管理部门组成军政部，由德让领导。军队的财政机构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早在共和八年，核实军队数字的任务就不再由军需官负责，而改交给叫作审核员的官员专门负责。前者与后者都对帝国大军的兵站总监维尔曼齐负责，1806年达律接替了他。皇帝非常喜欢亲自清查名目繁多的账目和发现账目错误。虽然他查对收支账目只能偶尔发现没有落账的交易和不正当的支付。但战争时期匆促任用的军需官依然营私舞弊，民愤很大。拿破仑于1808年5月18日写道："他们叫我给已死的士兵发饷"，况且，他从未能防止他的将军们征收强制捐献以饱私囊。

1805年，拿破仑已拥有将近四十万步兵，但是在和平时期他不能适当地维持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普通士兵每天得到五苏，但是国家仅仅配给他们一份口粮，在战争时期配给一份肉。即使

207

是这一点微薄的军饷也不能按时发给。就在 1805 年出征的前夕，拿破仑注意到士兵的“军饷不足”；1806 年底军饷拖欠了五个月。由于经费缺乏就不可能储备食品、鞋、军服以及进行战役所需要的运输工具。拿破仑只得先注意武器和弹药。1800 年，他曾说明需要贮备三百万支滑膛枪，但他从未获得这么多的枪枝，而且这个数字本已超过了国家的生产能力。到 1805 年，只制造了十四万六千支滑膛枪，据估计，仅一次战役中的损失就相当于这个数字。炮兵部队就更加供应不上，大炮的损失只有靠夺取敌人的军械库来弥补。如果说弹药的供应没有引起严重问题的话，那是因为节 208 省使用弹药的缘故；在耶拿，第四军团仅仅发射了一千四百发炮弹。至于军马一直是供不应求，尽管拿破仑特别关心此事。由于法国不能保证足够的马匹，不足的部分都从被征服的国家补充。

至于其它东西——食品、鞋、服装，原则上应是以战养战。贝尔蒂埃在 1805 年 10 月 11 日给马尔蒙的信中写道：“在皇帝发动的大举进攻的战争中，仓库是不存在的，军队要在入侵的国家中获得给养就全靠军团的总司令了。”人们会争辩说，在作战前夕，拿破仑非常努力布置给他的士兵烘制面包和饼干，分发鞋子。但是，首先是为时太晚，再则他的命令也没有全部贯彻。1805 年，许多士兵只穿着一双鞋就渡过了来因河，而 1806 年许多人身无大衣就开赴耶拿；至于面包，他们能够得到多少就带多少。拿破仑的战争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迅速行军为基础的，这种战争体系适应财政拮据的情况：以他所拥有的运输工具而论，即使有更多给养也赶不上军队的需要。士兵出征时装备很差，因为拿破仑每次作战时都指望速战速决。这种速战速决的胜利成为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因为后方没有准备人力物力支援战争；如果军队被迫退却，或者敌人顽强抵抗，甚至敌军在投降之前来得及实行破坏的话，法国军队就会只因弹尽粮绝而遭覆灭。

当战争在无准备的情况下进行时，它总是以牺牲士兵为代价的。象达武这样煞费苦心按时为连续行军的部队筹办军需品的将军是寥寥无几的。士兵通常从居民那里掠夺他们所找到的一切；但是由于队伍接连不断通过，因而后来的就一无所获。士兵们忍饥挨饿，有时浑身湿透，往往睡眠不足，要么饿得要死，要么酩酊大醉，因而他们便落得疾病缠身。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健康。医务工作依旧处于极其受忽视的状况。虽然国民公会征召内外科医生入伍充当军医官，但是督政府出于经济原因决定在和平时期立即把他们遣散，而拿破仑也一仍其旧。除了象拉雷、佩尔西、科斯特这样杰出的军医首长之外，医务人员比庸碌无能更低一筹。他们只使用简陋不堪的医疗设备，从当地居民中征用必需品并招募他们 209 做护士，就这样建立起野战医院和临时医院。这简直是人间地狱，佩尔西在他的日记中描绘了这个地狱中的恐怖景象：医院里极端痛苦的炮弹重伤病员、不用麻醉药的截肢、坏疽与溃烂，难以形容的污秽、疥癣、虱子以及斑疹伤寒。拿破仑绝对禁止把伤员运回遥远的后方，特别是不允许运回法国；由于缺乏卫生设施他们会在途中死掉的。当时的死亡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用令人毛骨悚然的措辞描绘的，这是可以理解的。泰恩还是一再说，在执政府和帝国时期有一百七十万人死亡，而这个数字还只限于从1789年的疆界范围内征募的人。可是，既然从在这疆土范围内征募的士兵总数从未超过这个数字，那就是说全体官兵有去无回，更不必说被俘的了。事实上从1800年到1815年间实际损失可能不到一百万人，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其中有三分之一失踪，这些人肯定不是都死了。这个数字还要加上从1789年以后法国新合并的疆域内征募的大约二十万法国人，以及从盟国和属国征募的大约二十万人。尤其不应忘记的是，阵亡人数仅占死亡总数的一小部分：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阵亡百分之二，在滑铁卢战役中阵亡数目最

大，占百分之八点五。其余的人或者因为受伤、患病而死在医院里，或者因疲惫不堪、饥寒交迫而亡。

拿破仑对待供应问题的态度引起许多可怕的后果。法国的占领变得日益不得人心。抢劫与掠夺成风，这就使纪律大为松弛，士气极为低落。强行军使得部队把残废者与掉队者抛在后面，他们聚众结伙，无所不为。悲惨的境遇常常引起兵变。最糟的是，拿破仑的军事体系是以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的地方为依据而制定的，主要是伦巴第，在那里他曾经进行过头两次欧洲战役。当他侵入北德意志、波兰、西班牙和俄罗斯时，地理条件就使得他的战争体系行不通了，于是军队便陷入了危境。

三、战争指挥

在旧制度的最后年代里，法国的军事学家曾论证了由弗里德里希二世加以完善的传统作战方法的不利方面：一支不连贯的部210 队，沿着单一的道路以线式队形缓慢行进，不能控制整个作战区域，因此不能迫使敌人迎战或在敌人坚守阵地时进行机动迂回。然而，要等到法国革命才使战争突破墨守成规的作战方式。随着兵员数量的增加和发动群众战争，法国革命的将军们不得不把军队组成为师，以便于指挥。不过很快发现这种新编制仍有不妥之处，因为随着师的数目逐渐增加，总司令要协调各师间的行动就很感困难。骑兵和炮兵分别编入各师，所以便不可能集中使用它们的力量。督政府时期曾断断续续地试行过一种较高一级的部队编制即军团，1800年莫罗曾指挥过三个军团，每个军团包括四个师，但是没有后备队。拿破仑从法国革命的实际经验中以及从吉贝尔和布尔塞①

① 吉贝尔(1743—1786年)，法国军官、军事学者，著有《兵法总论》；布尔塞(1700—1780年)著有《山地战原理》。——译者

的教导中引伸出自己的战略思想；但是在马伦哥战役中他才最后确定了部队的编制：每个军团有两个或三个师，尽可能配有少量的骑兵；大部分骑兵组成独立的兵种，炮兵后备队则直属最高统帅指挥。执政府时期，这种组织运用到了全军。这些师和军团的力量仍然是不断变化的。1805年，一个军团包括二至四个师，总人数在一万四千人到四万人之间；一个师由六个到十一个营组成，人数从五千六百人到九千人不等；一个团包括一至三个营。次年，军队实行了较为正规的规定，每师有六千到八千人，每团由两个营组成。

拿破仑的军事天才表现在使几个军团协同行动的能力。这种 211 艺术在于部署和指挥几个军团如何进军，以便能够控制整个作战区域，使敌军无从脱身；同时，各个军团还得要保持相当近的距离，以便能够集中部队进行战斗。军团的部署一般采取容易变化的梅花阵形。在向敌人开进时，随着某些军团发现自己容易遭到突然袭击，战线就逐渐收缩。有时，如在艾劳①，军团在确定朝一个较远的前进方向之后，就在战场上进行集结，以便就在前进中迂回和包抄敌人。战役的总布局需要两个不同的战斗计划，它取决于拿破仑是打算同一支单独的敌军部队作战，还是希望在几支敌军之间占领中心阵地，如1796年至1797年在曼图亚周围的战斗，或者如在1813年的情形那样。无论如何，部署根据环境而变化，从未拘泥于一种方式，拿破仑的战略是一种艺术，虽然也有一些原则，但在判断形势和作战实际中从不受这些原则的拘束，从不损害他丰富的想象力。

胜利取决于拿破仑的当机立断与胆略，其次取决于部队风驰电掣般的行动。突袭是取胜的重要因素，因此，它要求绝对保密。总是主要以骑兵为掩护的军队只要有可能就利用河流、山脉作为行军的天然屏障，虽然隐蔽自己、迷惑敌人是很重要的，但发现敌

① 参看下章第六节——译者

人的行动也同样是很必要的：掩护部队和情报机构就起了作用，情报机构利用外交官，各色各样的特务（或许应该包括神秘的基尔曼斯埃格伯爵夫人在内），尤其是利用间谍，象臭名昭著的舒尔迈斯特这样的人，很乐意一仆事二主，两边讨好。一旦部队沿行军路线前进，拿破仑就不再很重视与法国相连接的交通线了，因为他总是期望战役在短时间内结束。另一方面，作战路线却是他严重关注的事，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护。这些路线是连接部队与后方指挥部所在要塞之间的道路，指挥部所在地随着部队的前进而推进。由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小分队守卫各驿站驿路，保持部队和法国的212 联系。因而，在拿破仑看来，要塞的作用很大，它们既是作战基地，又可据守河流和山口，可用来作桥头堡幷掩护部队。然而，要塞沒有起到在革命前的战略中那样重大的作用。在纯以迫使敌人决战和歼灭敌人为目标的战役中，要塞本身从来不是战役的目标。

在战场上，拿破仑力求迫使敌人全线作战以耗尽其后备力量。这一任务要用最少的兵力来完成，以便完整地保有一支密集的突击部队；然后，他就用步兵和大炮的火力对准威胁敌人的侧翼和退却路线，从而挫伤敌军的士气。最后，当拿破仑认为敌人已被大大地削弱时，他就投入生力军，击溃敌人，幷无情地追击溃败的敌人。这种追击是拿破仑战争的最新颖的特点，只有少量军队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从来也不敢下令这样追击的。拿破仑指挥战斗确是无与伦比的，但他幷沒有改变基层单位的战术，这是他从未论及的一个题目。在原则上，部队的基层单位仍遵循 1791 年的操典：师以旅为单位组成两道防线，一个团在前面展开，另一个团则成密集的纵队队形。但是，事实上，大革命时期的军队部署方法仍然保持未变：步兵往前面派出一群精心挑选的散兵，他们在地形的掩护下前进；第一线的步兵逐次跟进，通常以同样的方式投入战斗。就是这种随意的机动灵活的射击打乱了敌人的阵脚，敌人习惯于对付线式

队形，在这种队形里，士兵依次成三列(后两列成立式)，这就提供了准确的目标。一听到冲锋号，法军第二线步兵就以密集的纵队前进，几乎从来都无需动用刺刀，因为到这时敌军往往掉头逃跑了。战术毕竟经历了某些变化。斗志昂扬的法国人倾向于用刺刀大规模冲锋来缩短射击战斗的时间；随着没有经历过炮火的新兵数量的增加，指挥官们变得更喜欢使用纵队。然而，一旦英国人，甚至德意志人改革战术以适应这种新方法时，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拿破仑战争艺术的弱点之一也许是缺乏对基层作战单位战术的重视，而当反法同盟各国军队有所改进并发挥其有利条件时，法国的弱点是没有随之改进自己的战术。

由于财政困难的限制，拿破仑的战争势必要速战速决，这就确 213
保了皇帝的威望。无坚不摧的威力和迅速结束战斗的无懈可击的机动灵活的致命一击，直到今天仍然唤起人们富于浪漫色彩的敬佩。战役进行的迅速与勇猛成为拿破仑火焰般性格的标志。就象供应军粮的方法一样，他的指导战争的思想是在他所进行的最初几次战役中形成的。群山环抱的波河盆地使敌人无路可逃。盆地面积相当小，巧妙铺开的部队很容易控制它，因此部队能够来回运动而不致精疲力竭；这个盆地相当肥沃，足以为部队提供补给，使其得到恢复。军队到了南德意志，距离拉长了，因而已经倍感艰辛；但南德意志还是分为几块地区，所以仍然能运用原有的作战方法。但是一旦军队打进北德意志、波兰和俄罗斯漫无边际的原野，情况就不同了。敌人现在能够逃跑了，由于距离遥远，行军把军队搞得精疲力竭，军粮供应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沿路都要分兵驻守占领地，以致在开始战斗之前军队就分散了。经济情况不能提供必需的运输工具，军事组织依然如故，后备力量缺乏。拿破仑的战略完全是以地中海区域为依据，这种战略没有预见到新的地理条件，因此便不能成功地完全适应这些新的条件。

214

第三章　大帝国的创立
（1805—1807年）

拿破仑即位的头一年，在严重的财政危机下进行的1805年战役使他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奥斯特里茨战役的胜利拯救了他，他控制了德意志，并开始组织大帝国。这样就招致了新的反法同盟的形成，而反法同盟的失败又把整个中欧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并且由于提尔西特条约的签订而巩固了"大陆体系"。

一、1805年的财政危机

拿破仑命令帝国大军开赴德意志之后就返回巴黎为战役做紧急准备。他发现工商界焦虑不安，惊慌失措的民众挤到法兰西银行的大门口，国库空空如也；而王党分子则满怀希望。长期以来，国库大臣巴尔贝-马尔布瓦的处境极为艰难，法兰西银行正在被通货膨胀所压垮。这家银行除了拥有已经直接为国库贴现的二千七百万法郎期票外，银行的一名董事德普雷又强加给它二千万法郎期票，这是国库部推销给"联合商行"的，更不必谈法兰西银行应负担的税收证券了。但由于乌弗拉尔在西班牙的财政投机活动——当时最大的投机冒险——这种灾难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215　查理四世的财政状况处境可悲。西班牙自从1804年以来饥荒严重，它在墨西哥国库贮存的银币皮亚斯特已经不再运到。答应每年给拿破仑的补助金早在1804年6月就已拖欠了三千二百万法郎。乌弗拉尔把这笔款项预付给法国国库，国库把收税官的

新证券交给他作为抵押。由于以前曾给西班牙舰队供应粮食，所以乌弗拉尔掌握着的墨西哥国库的支票总数达四百万皮亚斯特；他的兄弟在美国费城开设了一家商行，他亲自证实了在墨西哥国库中存有七千一百万皮亚斯特，只要一有机会便可运往西班牙。乌弗拉尔出面担保，他有办法把这笔钱财运到欧洲，用来偿还法国和他自己。拿破仑对这种前景当然很高兴，乌弗拉尔得到皇帝的许可于1804年9月启程赴西班牙。

到马德里后，他便以豪华的排场、善辩的辞令与丰盛的礼品眩耀于宫廷。戈多伊热切地答应把西班牙拖欠的补助金偿还乌弗拉尔，并同意他以每公担二十六法郎的价格向西班牙提供二百万公担小麦。由于在法国，特别是在法国西部，粮食有剩余，乌弗拉尔每公担只花费十八法郎。拿破仑总是热望讨好农民并急于使硬币流入法国，便欣然批准出口特许证，条件是法国政府要收取一半利润。乌弗拉尔接着又热心和那个负责维持银币价格的保证银行打交道。他答应立即借款给保证银行，此外还给一笔为期五个月的信贷。他获得的保证是取得在罗马教皇同意下即将出售教会财产的权利。保证银行拥有烟草专卖权与汞矿开采权，乌弗拉尔要求取得这两项权利。西班牙对英国宣战后，乌弗拉尔给停泊在半岛各港口的法国和西班牙舰队提供粮食；为了支付这笔花销，他从在阿姆斯特丹经营霍普银行的一个朋友拉布谢尔那里借了一千万盾。

由于乌弗拉尔做出了这么多贡献，他就处于转运墨西哥白银问题的有力地位，他竭尽全力为这些财富的转运求得皮特的帮助，而皮特正因在印度搞商业活动而需要白银。1804年12月18日，乌弗拉尔收到了西班牙政府给他的墨西哥国库的五千二百五十万皮亚斯特的支票；他把其中一部分送给了巴尔贝-马尔布瓦，而后者没办法只好交付他更多的收税官的证券。已完全被拉过去的查理四世与乌弗拉尔合伙，承包了将来从美洲装运硬币的

所有运转业务。但是乌弗拉尔由于经营得手以至不想就此止步：他邀国王与他合伙经营西属美洲的全部贸易。他取得了西属美洲贸易的专利权，并承担保证国王可能需要的一切运输业务，条件是，他将获得一笔佣金，并取得每只船为他装运三分之一货物的权利，而查理四世则支付一切开支和承担所有风险。乌弗拉尔为这笔交易取得了空白特许证，上面沒有填写船只所驶向的目的地；他准备把这些特许证卖给美国人。然后他就出发去阿姆斯特丹，拉布谢尔起初有些不知所措，但终于在1805年5月6日同意替他承担墨西哥皮亚斯特的转运业务，并接受使用特许证的贸易。然而乌弗拉尔被迫事先同意霍普银行在最后决算时无论结果如何付给它所应得的盈利。

由于乌弗拉尔依靠拉布谢尔——他是最有影响的伦敦银行家、皮特的密友巴林的女婿——来取得英国的默许合作，因而就使这次业务成为具有国际性质的事件。实际上皮特同意了这种做法，甚至派出四艘英国帆船巡洋舰去装载首批白银，购买白银的款项由英格兰银行付给了拉布谢尔。但是为了运送其余的资财和利用贸易特许证，拉布谢尔派出了达维德·帕里什(一位有名的汉堡银行家的儿子)到费城，另外还派出了两名代理人，一名到新奥尔良，另一名到韦腊克鲁斯。他们计划把墨西哥的皮亚斯特用美国船只运往美国，在那里，把皮亚斯特预付给商人，以换取运货到欧洲的代理商的支票。贸易特许证也以分享一部分利润为条件出卖给美国商号。交易直到1806年才得以进行，到1807年因杰佛逊宣告禁运而中止。整个交易将会使霍普银行和拉布谢尔获得九十万英镑，折合法郎是二亿二千五百万；而乌弗拉尔将只会分得二千四百万法郎。在这时候，拉布谢尔不得不与拿破仑达成协议。那些维护乌弗拉尔的计划的人有理由认为，这些计划能够获得成果；但是他们忘记了，皇帝不会赞同一个使外国银行、实际上是一家敌

国银行发财的计划。他们尤其是沒有认识到实际上是由法国付出这笔钱的。

运输银币皮亚斯特和利用特许证的贸易要取得成果需要较长的时间。在这期间，必须付款购买运给戈多伊的小麦，并须提供承诺给保证银行的资金和信贷。这些钱现在由法兰西银行拿出，它贴现了由保证银行发出的一部分票据和收税官的证券，这些证券是由巴尔贝-马尔布瓦只作为保证金而抵押的。因此当拿破仑踌躇满志，自以为做了一笔好生意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他在为整个活动提供资金！这时，就巴尔贝-马尔布瓦而言，他使法兰西银行贴现了西班牙票据，这些票据，相当于他从乌弗拉尔那里接受的皮亚斯特银币储备量。再者，德普雷和范勒尔贝格还沒有收到国库应付给他们供应粮食的款项，而且由于资金缺乏，他们采取了接受通融汇划票据的办法，这种票据使他们得以筹款和取得附加信贷。联 217 合商行的所有股东开始互相开支票，甚至虛立户头为自己开支票，所有这些"包袱"集中压在法兰西银行身上，而银行却也毫不犹豫地全部承兑了这些支票。到 1805 年 9 月，这家银行的纸币发行额为九千二百万法郎之巨。要不是因为德普雷是法兰西银行的董事，要不是巴尔贝-马尔布瓦的秘书罗杰受贿一百多万法郎的话，造成这样的局面将是不可想象的。

乌弗拉尔仍旧泰然自若，他相信西班牙会偿清所有的债务，而且法国的信贷情况会保持正常。而实际上，西班牙交付小麦贷款很缓慢，保证银行由于难于在短期内卖掉教会财产也就不能承兑它的任何证券。1805 年夏季，巴尔贝-马尔布瓦向乌弗拉尔索讨他承诺的皮亚斯特。为了抚慰巴尔贝-马尔布瓦，乌弗拉尔开始用他所能得到的那么一点点皇家公债来购买皮亚斯特；以后不久，皇家公债的票面价值下跌了百分之五十八，乌弗拉尔停止了付款，他认为运来皮亚斯特已不可能，因为他发给西班牙的信贷已遭

冻结。在这个时刻，法国又将进入战争；巴黎股票交易所的投机商利用战争迫在眉睫的形势，从中赚钱；而民众便挤到法兰西银行提取存款。到9月底，这家银行的现金储备下降到仅有一百五十万法郎。起初，银行寻找种种托辞拖延支付，但最后被迫宣布停止部分支付。乌尔姆战役之后，恐慌情绪稍有平息，但在特拉发加海战之后，人们看到战争又拖延下去，恐慌情绪再次继起。11月，几家私人银行倒闭，其中主要有雷卡米埃银行和埃尔巴斯银行。

自8月底开始，法国国库的状况引起拿破仑严重的不安。加来海峡郡的军需官已发不出军饷，在斯特拉斯堡需要借款一千二百万法郎，但须有特别担保才能借到。因而相当多的士兵只穿一双鞋就渡过来因河是不足为怪的。最终还是士兵以自己的痛苦、甚至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他们主上仓促作战和金融家的投机生意付出了代价。不久，范勒尔贝格无力继续供应已出征的部队和国内驻防部队；9月23日，他只好吁请国库贷款，而国库也只得求助于法兰西银行。更为糟糕的是，政府后来授权范勒尔贝格，只要开一张简单的收条，他就可以从收税官的钱柜里领取现钱。这样一来，等收税官的期票到期时，法兰西银行收到的只是收条而已。1806年1月1日，范勒尔贝格亏损一亿四千七百万法郎，所以只好解除契约。拿破仑曾这么谈到巴尔贝-马尔布瓦："如果我被打败，他就会是反法同盟的最好帮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位大臣的唯一过失在于他的无能。皇帝暗示过有一个在皮特的赞同下策划的阴谋，它的目的是要让前亡命者塔隆主管法兰西银行。不幸的是，我们对此所知无多。无论如何，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奥斯特里茨大捷消弭了这场可怕的危险。

218

虽然1805年的危机主要的是财政和金融危机，但不要忘记，在奥斯特里茨战役的一年里，整个经济，无论在农业或是工业部门，都遭受了打击。在默尔特郡，或多或少是同过去一样的原因导

致了危机；但更严重的是又造成农产品价格的周期性下跌，象在革命前的经济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农产品价格下跌减少了大多数居民的购买力。这就造成了信贷紧缩，而高利贷重要性日益增长。这一切造成的最重大的社会后果，一如既往总是加深了民众的苦难。

二、1805年战役

拿破仑幸好碰上奥国还沒有做好战争的准备。查理大公的改革几乎还沒有开始：1802年，他曾以长期服役制代替终身服役制，但是这一改革直到1805年才生效。虽然他订出免除兵役的规定，但也不能阻止人们规避兵役，在二千五百万人口中，每年登记适龄应征的只有八万三千名。匈牙利议会于1802年拒绝实行义务兵役制和征兵；它同意每年只提供六千名士兵，战时外加一万二千名（只给一次）。从技术上看，奥国人最多只能建立一个提罗耳人猎兵团。当麦克掌握了军队的指挥权以后，他制订了新的条例以增加步兵和轻骑兵，并从1805年8月1日起修改了操典，然而 219 他这样做只能制造混乱。另外，奥国的财政状况也使得这一切努力落了空。平时编制还缺少八万三千人，有九万七千人在休假，三万七千名骑兵沒有马，沒有一座大炮备有运载马车。临时凑合的程度比法国更甚，奥国军队发兵时比它的对手装备更差。

此外，麦克为俄国将军温青格罗德所误。率领俄国第一支部队的库图佐夫仅带来三万八千人，而不是原来答应的五万人；计划应紧跟他来的布克斯赫弗登直到11月才到来。而归根到底，同在1799年一样，奥国主要关心的仍是意大利，它把查理大公率领的六万五千人的主力部队派到了那里，另派约翰大公率领的二万五千人到提罗耳还不算在内。在德意志，不久就成为麦克将军部下

的费迪南大公只率领一支六万人的部队，再加上在福腊耳贝克有一万一千人，兵力所以如此之少的借口是俄国人即将前来会师。费迪南原想在累赫河东岸等待俄军，但麦克向弗兰茨皇帝担保，拿破仑此来不可能超过七万人。麦克决定推进直到黑林山，于9月11日渡过了因河并占领了巴伐利亚，巴伐利亚的军队退至美因河北岸。

然而，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是在德意志战场。拿破仑当然应把他的军队从布伦港开赴德意志，各个击败反法同盟各国的军队。马塞纳仅率领四万二千名士兵坚守在阿迪杰河上，因为意大利动荡不安，在皮亚琴察周围和皮埃蒙特不断发生暴动。拿破仑起初决定把帝国大军集中于阿尔萨斯：十七万六千人分为六个军团、外加一个骑兵后备队和近卫军；从布勒斯特开来的第七军团直到十月底才到达。接着，他于8月24至28日，发觉集中阿尔萨斯会使前进中的纵队延误战机，而且会使他们与从荷兰赶来的马尔蒙和从汉诺威赶来的贝尔纳多特会师不易。因此他命令他们改变路线向帕拉蒂纳前进，在那里从9月25日起渡过了来因河。然后军团在缪拉的骑兵掩护下转向东南，朝着乌尔姆以下的多瑙河上的各个目标前进。拿破仑获悉敌人已在乌尔姆集结的消息后，于10月7日命令他的士兵开始在多瑙沃尔特附近横渡多瑙河。他后来失去了与敌人的接触，因为担心麦克南逃，他便命令他的军团成扇形散开，派贝尔纳多特到慕尼黑去截击俄军，使达武居中，而主力部队则向乌尔姆和伊勒河挺进。实际上，遭到突然袭击的麦克要220集中他的部队有很大困难，而且他的两个军团于10月8日和9日在韦尔廷根和京次堡附近遭到沉重打击。后来麦克决定向北出击以期切断法国的交通线。被派去控制北岸的内伊，仅仅派杜邦指挥的一个师渡过河去。杜邦的师于11日在哈斯洛克遭受严重挫折，奥国的韦内克军团和费迪南大公得以设法沿北路逃跑。但是

麦克于14日得知法国人向西奔伊勒河前进，他以为他们正在向来因河退却，于是就回到乌尔姆去截击法军的退路。拿破仑急忙包围敌军，并命令内伊在埃尔欣根强渡多瑙河。奥军四面受围困，于15日投降。韦内克军团在缪拉的追击下于18日缴械，费迪南大公只率领几个残兵败将逃到波希米亚。总共四万九千名奥军被俘；唯独金迈尔一师得以逃脱。然而这场战役并不像某些人所断言的进行得那么整齐有秩序，军队经历了不止一次的战术上的挫折。阴雨和大雪使得部队的行军困难异常。费桑扎写道："除俄罗斯战役之外，我从未遭受过这么大的折磨，也从未见过军队如此混乱。"

这时内伊追击约翰大公进入提罗耳，并到达德拉瓦河流域；与此同时，奥热罗占领了福腊耳贝克。在意大利，马塞纳进攻查理大公，在卡尔迪埃罗一战中未见分晓，后来查理率领军队向莱巴赫撤退。拿破仑不失时机地挥师前进，直扑俄军，使已经到达因河的库图佐夫仓惶溃退。然而，由于在恩斯以东的多瑙河河谷突然变得狭窄起来，以至追击放慢了些。马尔蒙和达武不得不越过山地，而莫蒂埃被调到北岸，以阻俄军渡河；但库图佐夫在克雷姆斯设法避开了缪拉，11月11日，他在迪恩施泰因几乎消灭了莫蒂埃的一个师。缪拉在向维也纳推进时，施计巧夺了多瑙河上的几座桥梁，使得法军能够前进并越过了摩拉维亚的布尔诺。然而，库图佐夫已在这些地方与布克斯赫弗登的部队和一支奥国军团会合；另一支俄军也即将到来。

拿破仑这边的形势转入危境。他已知道自己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在南部奥国的几个大公可能把他们的军队集结起来；在北部，存在着普鲁士干涉的威胁。匈牙利按兵不动，弗兰茨于十月间再次拒绝匈牙利语为官方使用的语言和割让阜姆而使匈牙利深为不满；议会没有钱装备一次"起义"或总动员。匈牙利人对拿破仑没有

敌意；当达武占领普莱斯堡时，帕尔菲宣布中立；摄政王约瑟夫大221公虽然表示不赞成中立，但他的态度表现十分犹豫，以至被怀疑是想自己称王。普鲁士的威胁则更为险恶。为赢得时间，拿破仑命令贝尔纳多特率军假道属于普鲁士国王的安斯巴赫公国；这是前几次战役中已有先例允许通过的。这一次，弗里德里希-威廉甚至预先没有得到通知，他勃然大怒；作为报复手段，他允许俄军假道西里西亚，然后不与拿破仑磋商就占领了汉诺威。亚历山大认为这是个适当的时机，便于10月25日到达柏林；他受到热情洋溢的接待，普鲁士的主战派大为振奋：当时已到普鲁士供职的米勒以及哈登堡都加入了主战派的行列；汉堡的书商佩尔泰斯呼吁普鲁士不要对奥国的命运置之不理；就连达尔贝格也于11月9日在议会宣称必须维护帝国的完整。11月3日，亚历山大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在波茨坦签署了一项协定，普鲁士国王同意向拿破仑提出调停，要法国遵循吕内维尔条约的规定；如果法国拒绝调停，他就要率领十八万人参战，其中还不包括萨克森人，他们也已答应与普鲁士合作，也不包括黑森人，他们仍在犹豫，但黑森军队已由布吕歇尔统帅了。从10月15日起，施泰因为开辟必要的财源，开始发行纸币，并用国库的支票来支付那些军需品供应商。然而国王仍然坚持让拿破仑在12月15日以前明白表示态度。带着最后通牒的豪格维茨经过很长时间，直到11月28日才到达布尔诺；然后他又被送到维也纳①，拿破仑指示塔列朗敷衍豪格维茨。实际上，弗里德里希-威廉已经又动摇了，即使不象他后来声称的，他命令过豪格维茨不惜任何代价地维护和平，他也命令过要竭尽全力保持和平。由于担心拿破仑与奥国达成协议而调转头来反对普鲁士，他便决定等待事态的发展。

即使拿破仑不知道波茨坦协定，他仍然感到了危险；由于不能

① 维也纳已于11月5日被法军攻占。——译者

追击敌人到奥尔莫乌兹，他便切望敌人来进攻他：他假装害怕的样子，后撤军队，筑起堡垒防守，并试探要与沙皇谈判。库图佐夫识破了这一计谋，但是多尔戈鲁基和沙皇身边的亲信都劝说亚历山大发动进攻。12月2日拂晓，集结在奥斯特里茨以西的戈尔德巴赫河西岸的法军透过晨雾看到奥俄联军正在前进，准备发起攻击。联军总数为八万七千人，用以对付七万三千名法军，但他们是沿着十六公里宽的战线铺开的，目的是要包抄法军的右翼，并切断其去维也纳的退路。联军按照他们的计划开始从中央阵地普拉岑高地下来，拉纳指挥的法军左翼，尤其是达武指挥的右翼，在敌人猛攻下岿然不动。处在中路的拿破仑突然下令，命苏尔特猛攻高地。法军把敌军切成了两段，迂回包抄了他们的左翼，打得敌军溃退。奥俄联军损失总数达二万六千人；法军损失八千至九千人。亚历山大感到很受屈辱和恼火，宣布他要回俄国，奥地利于12月6日签署了停战协定。 222

既然没有等到普鲁士下决心反法同盟即已瓦解，拿破仑就轻而易举地把奥地利孤立起来。从12月10日至12日，他加强了与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的联盟。7日，他接见了豪格维茨，对他很粗暴；14日，他再次召见普鲁士特使，告诉他奥国正在要求把汉诺威交给前托斯卡纳大公，并给他接受与法国结盟的最后一次机会。在这样的恐吓之下，豪格维茨屈服了，在12月15日签订了肖恩布鲁恩条约：普鲁士总算吞并了汉诺威，但却被迫割让了纳沙泰尔公国以及安斯巴赫侯国，第二天拿破仑就把后者赠给了巴伐利亚，以换取贝格公国。12月24日，弗兰茨撤了科本兹和克洛雷多的职务；26日，他批准了普莱斯堡条约。奥地利让出了从坎波福米奥条约中得到的威尼西亚的全部领土包括伊斯的利亚一部分和达尔马提亚，和它在南德意志的全部领地，以及提罗耳和福腊耳贝克；而获得了萨尔斯堡，这是托斯卡纳的费迪南用来换取巴伐利亚

的维尔茨堡的。帝国骑士就这样落到了他们的敌人手里。升格为拥有主权的王国地位的巴伐利亚和符腾堡，还有巴登，解脱了与神圣罗马帝国的一切封建附庸关系。这样一来，奥国完全被驱逐出意大利，并且，除了仍拥有皇帝虚名之外，它在德意志的全部领地也荡然无存。

三、大帝国

拿破仑于1806年1月26日返回巴黎之后首先在莫利昂辅助下整顿财政，莫利昂已取代巴尔贝-马尔布瓦任财政大臣。4月22日，拿破仑对法兰西银行及时采取措施，把它交给由皇帝任命的一名总裁管理，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莫利昂改革了会计制度，迫使税收专员签署为期四个月的期票，并且于7月14日建立了公款存付银行，以便调节货币流通；此后，税收专员们除非真的把税款存入该银行，否则他们所收税款就不能再得到利息。解决1805年财政危机则更为艰巨。1月27日，皇帝召见军需供应商，在这一次令人难忘的场面里，皇帝以处死相威胁，迫使他们把所有的资产交给莫利昂；由于贝尔蒂埃走露风声给乌弗拉尔，所以他能把一些资财隐藏起来。供应商的有价证券、信贷和仓库被清查结算，他们被迫继续其供粮业务，而只能得到应得粮款高达一千八百万法郎的半数。但是仍然还有欠款六千万法郎，这笔债要由西班牙来承担，尽管它只收入三千四百万法郎。查理四世被迫从拉布谢尔的霍普银行那里请求再借一笔贷款交付法国，并求得罗马教皇同意再征用一批教会财产。拉布谢尔自己不得不放弃了还没有获得汇票的一千万皮亚斯特。整个事情拖延了多年，最后，由于范勒尔贝格和乌弗拉尔不能偿付西班牙的债务而宣告破产；乌弗拉尔于1809年因债务问题而被捕入狱。但是这一恢复国家财政的巨大任务并没

223

有妨碍皇帝从事内政改革：他还要筹备编纂多种法典，1806 年决定创办帝国大学。

然而，所有这一切不过只是细枝末节，因为奥斯特里茨大捷激起了他的想象力的新飞跃。在南德意志，重大变化接踵而来。奥地利在德意志的领地被瓜分了：巴伐利亚国王得到了艾克施塔特主教邦、提罗耳和福腊耳贝克；符腾堡获得了乌尔姆和另外一些领土；巴登侯国割去了布赖斯高、奥尔特瑙和康斯坦次。从 1805 224 年 11 月起，符腾堡首先进攻帝国骑士的领地，德意志其他王侯也急于并吞骑士领地。既然他们享有充分的主权，这些王侯就竭力效仿拿破仑的治国手段，符腾堡国王终于摆脱了他的议会。但是拿破仑无意让德意志土崩瓦解。1806 年 1 月，拿破仑建议成立一个新的邦联，以他为保护人。一部宪法将规定邦联成员国的权利和义务，并由一个拥有必要权力的议会来实施。拿破仑已经迫使他的德意志盟国在各国内给予新并入的附庸以特权地位——这是干涉它们内政的绝妙借口，他还强烈表示希望这些盟国采用《民法典》。这些新国王感到愤慨，因为他这样做是想破坏他们刚刚获得的主权。符腾堡的弗里德里希一世大叫道，"这是对我的政治生命的一个致命打击"；巴伐利亚的大臣蒙特热拉只愿意缔结临时的联盟。这些国王既不敢同法国决裂，便都屈服了。1806 年 7 月 12 日，十六位王侯宣布脱离神圣罗马帝国，他们组成了来因邦联，并答应给他们的保护人提供六万三千名士兵。

但是拿破仑也非有他们不可，因为普鲁士很不可靠。联合决议规定了宪法和成立议会，然而它们却被无限期地延搁起来，从未见天日。此外，王侯们因顺从拿破仑而获得新的领土作为补偿：奥格斯堡和纽伦堡两个自由市划归巴伐利亚；法兰克福划给了达尔贝格。几个小邦的君主只是为了不致被吞并沦为"降格附庸"而依靠自己的亲缘关系加入了邦联，如雷严伯爵，他所以升格为侯爵是

因为他是达尔贝格的侄子，在他的四千臣民中要提供二十九名士兵；还有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公主，她的丈夫是博阿尔内的朋友，她的儿子与缪拉的侄女结婚，后来成为罗马尼亚国王的祖先。其余没有参加邦联的所有较小的邦都被并入了较大的各邦，沦为附庸：诸如施瓦岑贝格、考尼茨、利内、图尔恩与塔克西斯等家族。也有升格的邦，如：巴登、贝格、黑森-达姆施塔特等公国升格为大公国；纳索成为公国；达尔贝格获得来因邦联大首领的头衔①。

留下来的唯一问题是要消除神圣罗马帝国的残迹。至于奥国，它要抵抗是不可能的，因为拿破仑以俄国占领了科托尔港为托225 辞而把他的军队留驻在布劳瑙。帝国大军仍然驻扎在德意志各盟国，开销当然要各国支付，这虽然给拿破仑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来缓和法国的财政状况，但却招致了各盟国对法国的不满。蒙特热拉夫人在写给塔列朗的信中说："我喜欢法国人，因为他们赶走了我们的敌人，恢复了我们的正统君王；但是我憎恶那些象吸血鬼一样地榨取我穷困可怜的祖国的人。"民族意识开始在德意志蔓延开来；巴伐利亚书商帕尔姆开始到处贩卖反法小册子，拿破仑枪毙了他。1806 年 8 月 1 日，帝国议会宣布自行解散。弗兰茨二世根据通知的要求，于 8 月 6 日放弃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这样，由巴塞尔和约②肇端的这出悲剧便结束了它的最后一幕。

与处理德意志问题相比较，使荷兰适应新的政治形势不过是一场儿戏。2 月 6 日，塔列朗通知席梅尔佩宁克必须使荷兰适应新的形势，3 月 14 日，拿破仑向海军上将弗尔许尔表明了他的意图：他的弟弟路易将任荷兰国王，否则他就要吞并这个国家。执行

① 达尔贝格男爵(1744—1817 年)，原为美因兹大主教，是神圣罗马帝国七个选帝侯中居首位者，并兼帝国议会议长。由于他热心与拿破仑合作，拿破仑把法兰克福给了他，并让他担任来因邦联的元首。——译者

② 巴塞尔和约是 1795 年 4 月 5 日法国与普鲁士缔结的和约，普鲁士退出第一次反法同盟。——译者

议会召集了特别会议，进行了“伟大的工作”，并于5月3日俯首听命地接受了拿破仑的主张，唯有席梅尔佩宁克拒绝屈从。在一项条约中保证了王国的完整，并与法国分立；路易于1806年6月5日即位为荷兰国王。

在意大利，威尼西亚被并入意大利王国；马萨和卡腊腊给了埃利兹；瓜斯塔拉授予了波利娜，而她随后又把此地卖给了意大利王国。最大的变化是那不勒斯的波旁王室的垮台，1805年12月27日，拿破仑在一项有名的敕令中宣布“那不勒斯王朝已不复君临”。马塞纳轻而易举地执行了这一宣判；俄军撤离那不勒斯退守科孚岛；英国人满足于继续占领西西里岛，他们利用该岛进行军事演习；波旁王族流亡到巴勒莫。加埃塔一直抵抗到6月18日。在卡拉布里亚，成群的暴动者立即纷纷揭竿而起。然而拿破仑直到7月份还认为，一切都已解决，3月30日，他将那不勒斯的王位交给了他的哥哥约瑟夫。然而，那不勒斯却在酝酿着象后来西班牙战争那样一场游击战。玛丽亚-卡罗莉娜没有放下武器。她只率领六千人，但煽起了武装暴乱。暴乱的骨干分子无所不包，从贵族罗地奥直到拦路强盗佩扎（别称弗拉·迪亚沃洛），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都领导过1799年的叛乱。很多教士援助了他们。卡拉布里亚居民缺乏民族意识，对波旁王朝的命运几乎是漠不关心的，但是法国的占领使他们的负担过于沉重，并且解除他们的武装更使他们愤怒；因为，居民从事抢劫习以为常，这是由于该地经济状况、走私以及强大的“黑手党”酿成的。牧民和农民认为资产阶级和贵族是最拥护法国人和新思想的人，所以他们把王后的呼吁视为允许抢劫上层阶级财产并普遍地抢劫各城市的表示。 226

英国人不赞成这一煽动民众暴动的呼吁，他们认为暴动的军事价值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他们在夺取了卡普里岛和蓬扎群岛之后决定冒险登陆，这样做就促成了这场暴动。7月1日，一支五千

二百人的英军在斯图尔特爵士率领下于圣欧菲米亚湾登陆。他们于7月4日在迈达遇上雷尼埃将军统帅的六千多法军，雷尼埃毫无准备，命令士兵手持白刃冲锋。英军步兵岿然不动，等到他们逼近，英军以排炮射击击溃了他们。这是威灵顿后来在塔拉韦腊战役到滑铁卢战役使用的杰出战术的第一个范例，不幸的是拿破仑完全没有重视这种战术。法国这次大败变成了普遍暴动的信号，暴动充满骇人听闻的恐怖景象。马塞纳和雷尼埃用残酷无情的屠杀一步步地重新征服了卡拉布里亚。劳里阿城夷为平地，弗拉·迪亚沃洛被处绞刑，监狱和囚船充塞犯人。尽管如此，暴动的影响仍很大：它使法国人付出了极高的代价，英军得以占领勒佐直到1808年，四万法军被牵制得寸步难行。

与此同时，拿破仑占领了里窝那，使英国人不能利用这个港口，他并且把一个西班牙师调驻伊特鲁利亚。这时在意大利仅有的独立国就是罗马教皇国。

早在加冕礼以前很久，庇护七世就一直担心法国在意大利的进展。他被迫同意于1802年9月并入法国的皮埃蒙特实施教务专约，随后他又不得不同意大利共和国签署另一教务专约。然而后一条约还能使教皇差堪告慰：它承认天主教为国教，优待教士，对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按教会成规解决。但是1804年1月，梅尔齐补充了一项法令，它宣布原有法律凡教务专约没有明文禁止的，仍然维持有效。庇护七世抗议把这些新的组织条例强加于人；皇帝只做了含糊其词的答复。然而，1805年5月26日卡普拉拉在米兰为拿破仑兼领意大利国王加冕之后才一个月，拿破仑就发布了两道敕令，事先未经罗马教廷同意而擅自改组宗教生活。他确实增加了僧侣的收入，但同时却减少了教区的数目，取缔一些隐修院，并且限制了僧侣的数目。更有甚者是他于1806年1月1日把《民法典》推行到意大利王国。除了伊特鲁利亚王国新君主忠顺于

227

罗马教会之外，在意大利各地——卢卡、巴马、皮亚琴察和那不勒斯——教会都成为众矢之的。庇护七世曾以为法国出售教会财产等世俗化措施是较小祸害而加以容忍，但看到把《民法典》推行于意大利势必也把世俗化推行到意大利，他就感到忧心忡忡，因为他把意大利视为自己的禁苑，至少从宗教意义上说是如此。

德意志的情况给教皇带来的忧虑也不少。1803年“帝国大法”的后果变得日益严重，因为各邦君正在使教会产业世俗化，并且未和罗马教廷商量便控制管理起教士来。恺撒—教皇主义① 甚至也在巴伐利亚赢得胜利。既然各邦君此时已统治信仰不同宗教的居民，他们便抛弃了“民随君教”的原则，并且公然宣告容忍政策，因而就朝着国家世俗化的方向大步前进。起初罗马教廷想与维也纳谈判缔结一项德意志教务专约，但是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除非法国施加压力，没有办法迫使德意志各邦君接受这一专约。特别是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后，创立大帝国既是企图称霸世界的象征，恐怕迟早有一天会向圣门神职挑战，因此，大帝国的创建使庇护七世迟迟不愿默认拿破仑为天主教世界的世俗元首。

然而尽管有着这些灾难折磨，教会还是从拿破仑的保护下获得了巨大利益，如若教皇不同时也是一位世俗君主的话，庇护七世决不愿与皇帝决裂。但教皇确是这样的人，所以拿破仑不会允许教皇损害他的统治。教皇宣称要守中立，但没有用，因为中立并不包括反法同盟的成员国那不勒斯王国在内。当英军和俄军于1805年在那不勒斯登陆时，他们是可以从那里侵入意大利王国的；庇护七世无力阻止他们假道，这样的事件正是他的亲信左右所欢迎的事件。

---

① 即世俗政府不受罗马天主教控制的理论，从“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一语而来。——译者

因此，法军占领了安科纳，继之又占领了契维塔韦基亚。庇护七世提出了抗议，拿破仑于1806年2月13日的答复是：要庇护七世加入自己的"体系"、驱逐英国人并禁止英国人进入其领土。当罗马教皇拒绝时，皇帝召回了法国驻罗马大使费什。孔萨尔维的政策破产了，于是他便提出辞职。这是最后的决裂，此后拿破仑再也不给庇护七世写信。

228 四月间马尔蒙进入达尔马提亚，丹多洛被指派为那里的"行政长官"。然而一支俄军从科孚岛出发，与奥国串通夺取了科托尔港口，在腊古扎①，法国的莫利托尔将军遭到了门的内哥罗人的攻击。拿破仑利用这一时机迫使维也纳答应给他假道奥属伊斯的利亚的权利。就这样，他一登上奥斯曼帝国的门坎，便立即想要插手其内部事务，1806年这一年标志着他的东方野心的复活。在艾奥尼纳，普克维尔已经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领事；雷因哈尔被派往摩尔达维亚；达维德负有使命到波斯尼亚的帕夏那里去，帕夏正陷于与塞尔维亚人的冲突之中。奥斯特里茨大捷加强了法国对土耳其苏丹的影响，他终于承认了法国皇帝，并派遣了驻法大使；作为回报，拿破仑派塞巴斯蒂亚尼往君士坦丁堡，他是8月9日到达的。与此同时，土耳其与受英国支持的俄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但马尔蒙的第二军团事实上仍然是象驻扎在意大利的军队那样被牵制在达尔马提亚。

1805年的战争异乎寻常地扩展了拿破仑经略的范围，以至使得法兰西帝国变成只不过是"大帝国"的核心，而"大帝国"本身便开始由一些法律文件组织起来。皇帝把他新创建的各国视为"联合的国家或真正的法兰西帝国"。虽然他任意引据许多历史先例，但他所采用的组织却是独具匠心的。最高一层是些国王和王

① 腊古扎（意大利语）今南斯拉夫杜布罗夫尼克，达尔马提亚港口；不可与意大利西西里岛上同名的腊古扎相混。——译者

侯，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是世袭的，拥有主权的，如约瑟夫、路易、缪拉，缪拉是3月15日被封为贝格大公的。其次是附庸的王侯，他们也拥有主权、甚至也是世袭的，不过他们的领地只限于在“采邑”之内，每当所有权改变时，这些领地就要另行赐封，象这样的情况有：皮昂比诺的埃利兹、成为纳沙泰尔亲王的贝尔蒂埃。在他们之下是既不拥有军队又无钱财的王侯：本尼凡托亲王塔列朗、蓬特-科沃（这两块领地一直是罗马教皇和那不勒斯国王争夺的对象）亲王贝尔纳多特。再低一层是单纯的采邑，这些采邑只有实利没有主权：拿破仑在那不勒斯王国保留有六个公国，在威尼西亚创立十二个公国，以分封给一些功勋卓著的法国人。

这还不是全部。这些王侯和国王从理论上讲是独立的，但象所有其他人一样，他们个人都是拿破仑的附庸，虽然他们的国家并非采邑。实际上，他们是法国皇族的一部分，共和十二年宪法规定，皇族要受1806年3月31日颁布的特别法规的约束。这项法规为皇族创造了一个特殊的法律身份；它授权帝国元首监护未成年者和对成年者实行家长的权力，包括批准他们结婚以及监禁他们的权力。此外，各亲王，甚至是享有主权的亲王，仍然是帝国的大勋爵。这样，庞杂的组织结构很大部分是按照家族公约的概念建立起来的，它既令人回忆起波旁王室的姻亲组织网，又反映出拿破仑对其氏族的眷恋。在他看来，家族关系是最为牢固有力的关系。因此他也把这种政策扩展到各盟国。1月15日，欧仁·德·博阿尔内终于与巴伐利亚公主奥古斯塔结了婚，同时皇帝认领了他，虽然他并不因此享有法兰西皇位的继承权。约瑟芬的侄女斯特凡妮·德·博阿尔内也被认领了，并让她嫁给了巴登大公的继承人。贝尔蒂埃不得不抛弃维斯孔蒂夫人而娶了巴伐利亚的一位公主。第二年热罗姆跟符腾堡王室攀了亲。出于同样的动机，现在再加上切望得到一位直系继承人，这就预示了皇帝势必将离婚

229

再娶。

应时而生的大帝国仍然是罗马帝国概念的首次体现，这种概念已暗含于拿破仑在1804年所采用的皇帝称号之中。他现在毫不犹豫地公然以西罗马帝国的复兴者自居，并且要求拥有他的"杰出的先人"查理大帝所拥有的种种特权。这些历史权利的要求特别有损于教皇国的地位，这是理所当然的。拿破仑1806年2月13日的信提醒庇护，虽然查理大帝曾是由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他仍然视教皇为受他庇护的人；他把授予罗马教会的世俗领地只是作为他自己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拿破仑也是这样。他对庇护七世写道"陛下是罗马的教皇，而我是罗马的皇帝，"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充分体现皇帝威严的简洁公式已经表明，大帝国甚至是在它建成之前，已显出它只不过是一统天下的开始。

四、与普鲁士决裂(1806年)

这样一种政策本不能指望带来全面的和平。可是客观形势却使这两个仍然干戈相见的强国有和谈余地。在英国，皮特在他的政策又遭到灾难性的失败和反对党猛烈的攻击之后，于1806年1月23日忧愤而死。辉格党再一次要求让欧洲大陆听天由命，他们认为和平是中止法国入侵的唯一手段。福克斯说，"如果我们不能削弱法国的庞大力量，那末，制止它的发展对我们终归有点好处。"换言之，他建议再次实行阿丁顿的试验，尽管当时并没有出现1801年危机的征兆。虽然他的朋友们未必都同意他的想法，但是他们都愿意谈判，只要能使他们掌权就行。国王召见了格伦维尔，后者坚持要福克斯入阁：这一次他成功地把福克斯拉入内阁，让他负责外交部。辉格党的领导人——格伦维尔、谢尔本的儿子佩蒂勋爵、格雷勋爵的儿子霍威克勋爵和厄斯金，再加上现在成为西德默斯

230

勋爵的阿丁顿，组成了"人才内阁"。

激怒了英国公众的是辉格党的国内政策：他们停止施行爱尔兰的戒严令，并且正再次考虑解放天主教徒问题。然而没有人反对试探和平。主战派由于普鲁士的态度而遭受挫折，因为普鲁士为了获得汉诺威而甘愿同法国结盟。当英国于5月11日对普宣战、并封锁德意志北海沿岸时，普鲁士关闭了它的波罗的海各港口，禁止对英贸易，从而引起了商业利益集团的恐慌。早在2月底，福克斯因为通知法国一项谋害皇帝性命的阴谋而重新打开了通向巴黎的渠道；塔列朗报以和谈的建议。亚尔默斯勋爵——他一直被拘留在法国，是一些上层人物的密友，——作为居间调停者出发到伦敦，并于6月17日作为具有全权的中间人返回法国。福克斯拒绝谈判任何协议，除非俄国也参加谈判，他也拒绝以亚眠和约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他坚持以"实际占有"作为谈判基础，但把汉诺威归还英国作为例外。拿破仑原则上并不反对，因为他考虑到可以给普鲁士找到某种补偿；然而他却不让普鲁士知道事态的发展，因为他知道普鲁士一定会反对的。

与此同时，亚历山大也决定参加谈判。普鲁士的背叛使得恰尔托雷斯基的影响增加了。他于1月间劝告沙皇放弃为欧洲仲裁的宏伟计划，而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俄国的利益上，即集中于东方。他认为奥斯曼帝国的形势对俄国是大有可为的。1805年3月，塞利姆三世正式建立起他的新的常备军，土耳其近卫军步兵从此感到不安稳。同时，鲁梅利亚的各帕夏由于担心自己的权位难保，便勾结多瑙河两公国的小邦君拿起了武器，这些小邦君，尤其是伊普西兰蒂，都是被俄国利用的。塞尔维亚人公开造反了。1804年3月，一直与奥国谈判的奈纳多维奇被杀死了，他的同胞在卡拉-格奥尔吉领导下举行起义，在沙皇的支持下，他们要求自治。1805年夏季，他们选出了民众议会，议会创设了元老院，并向 231

土耳其苏丹请愿。土耳其人无力征服他们。恰尔托雷斯基意识到，胜利的拿破仑必将阻挠俄国对外扩张的政策，这一看法不久便得到证实。塞利姆拒绝续订他与俄国在1798年签订的条约，他也拒绝缔结一项贸易协定。6月间，他撤销了“特准令状”，根据这项令状，曾准许列强把归化证书授予奥斯曼帝国的臣民。从1806年5月以来，一支俄军在向德涅斯特河集结，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阿巴思诺特催促英政府派遣一支舰队。恰尔托雷斯基建议在西方采取守势，并且与拿破仑进行谈判：如果后者不干涉俄国在东方的行动，便可达成一项交易，而着手瓜分土耳其。他同法国领事莱塞普斯举行会谈，并于5月12日通知他，俄国大使奥布利尔已启程经维也纳赴巴黎。此外，拿破仑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政策预示着对奥国要发动一场新战争，这一场战争可能会使奥国完全覆灭；奥布利尔后来一直坚持说，他曾接到训令，为了拯救奥国要不惜任何代价缔结和约。

当拿破仑获悉这一使命之后，他改变了态度。他一直在与福克斯谈判，以期孤立俄国；但是换另一种政策引起了他更大的兴趣，因为最难击败的对手是英国。他立刻要求英国把西西里交给约瑟夫，并且补充说，费迪南四世可在其它地方取得补偿。亚尔默斯提出抗议，结果谈判中断了。当奥布利尔于7月6日到达时，他立刻受到诱骗和恫吓，并对他不断施加压力：他被告知，俄国可以232 保留爱奥尼亚群岛并且享有两海峡的自由通航权；甚至可能把阿尔巴尼亚和达尔马提亚交给费迪南，以便在法、土两国之间建立一个对俄国友好的缓冲国。亚尔默斯得知这一建议后并没有反对，虽然他到此时为止仍然拒绝讨论西西里问题。来因邦联的创建终于使奥布利尔做出决断；他确信，如果他不让步，奥国就要完蛋，所以他于7月20日签订了和约。拿破仑在最后一刻以巴利阿里群岛替换了准备给费迪南的巴尔干一些地区。俄国至少是巩固了

自己的地位：它虽然失去了科托尔，但仍然保住了爱奥尼亚群岛，使法国放弃了腊古扎，并把土耳其置于俄、法的共同保证之下；此外，拿破仑答应从德意志撤军。亚历山大在提尔西特和约中也不会得到如此巨大的收获！英国人当时大为震惊。福克斯承认那是“一个使人感到屈辱的协定”，他发现英国再次被抛弃了。亚尔默斯步奥布利尔的后尘提出了一项和约草案，拿破仑于8月6日没有做任何根本变动就答复了他：英国将占有马耳他和好望角，重获汉诺威，同意把巴利阿里群岛交给费迪南，并承认约瑟夫，因而就默认把西西里给约瑟夫。看来拿破仑分别谈判的两面手法似乎即将获得成功了。他在给约瑟夫的信中已经把自己看成是地中海的主人，“这是我的政策的主要的和不变的目标”——至少暂时是这样，因为他心目中还有许多其它计划。

突然间，风向变了。有很多理由使人产生怀疑，亚历山大是否会批准这一和约，因为他刚刚解除了恰尔托雷斯基的职务，此人的政策触怒了强烈仇视拿破仑的亲英派的俄国贵族。7月9日，沙皇任命布德贝格男爵为新外交大臣，他是一个出生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人，他只关心欧洲大陆事务，并颇为同情普鲁士。英国是可以期待从这一任命中获得好处的。此外，福克斯已经改变了态度，他的同僚比他更为严厉地谴责亚尔默斯的草案。一个新的但却仍与法国十分友好的全权代表洛德代尔被派往巴黎，再次要求以“实际占有”为谈判的基础，然而却可以答应交出西西里，其条件是要能为费迪南找到一个稍为象样的补偿。拿破仑拒绝重开谈判，他指望俄国批准条约，以迫使英国退让。但是现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态度使沙皇拒绝了批准这一条约，也许他与法国谈判不过是为了诱骗普鲁士。

毫无疑问，皇帝绝不希望与普鲁士决裂；当决裂时，他深感失望和烦恼。历届革命政府和皇帝本人长期寻求与普鲁士联盟，以 233

便使奥国和俄国变得软弱无力，并将英国人拒于德意志以外。因此，拿破仑对普鲁士的态度完全是仁慈的，如果普鲁士肯象西班牙一样纳入他的“体系”，也就是变成一个附庸国的话，拿破仑把这一点对普鲁士讲得清清楚楚。国王不顾豪格维茨多次警告，固执地坚持一种不幸的想法，拒不接受肖恩布鲁恩条约的原来条款，只肯接受经他修订的条款；在未缔结全面的和约之前他不想吞并汉诺威，而只是占领它，以免与英国的关系破裂。他的胃口也增大，他声称有权保有安斯巴赫、并获得汉撒各城市。当拿破仑于1806年2月1日收到这些可观的建议时，他刚刚得知皮特之死。他宣称，普鲁士的反建议废除了肖恩布鲁恩条约，2月15日，他迫使豪格维茨签署了另一个条约，这一条约强迫普鲁士立即吞并汉诺威，并对英国人封闭它的一些港口，不仅要交出安斯巴赫和纳沙泰尔，还要交出普鲁士还保有的克累弗公国在来因河以东的那一部分，拿破仑把这一部分并入贝格公国，并迫使普鲁士同意法国在威塞尔驻军。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投降了；这是一个他永远不能原谅的可怕的惩罚，而普鲁士的主战派则更加不肯原谅。

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后，暂时心灰意懒的主战派很快又增长了力量。然而一直到最后，在普鲁士仍有一些拿破仑的崇拜者：比洛，未来的独立战争中的英雄的兄弟，他写了一本关于1805年战役的书，他在书中对待普鲁士颇为严厉；布赫霍尔茨，他在自己的《新利维坦》一书中用霍布斯①的哲学来赞颂拿破仑帝国的专制主义；在军队里有马森巴赫，他原籍是符腾堡。另一方面，宫廷是拥护战争的。路易莎王后把拿破仑拿来同温文尔雅的亚历山大作对比，

①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年），英国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在政治思想方面主要著作之一是《利维坦》（1651年）。“利维坦”一词原指基督教《圣经》中巨型怪兽，霍布斯用来象征国家；他认为国家对个人有支配一切的权力，理想的政体是君主专制。他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克伦威尔独裁制造理论根据。——译者

到处散布反对“魔鬼”和“地狱的渣滓”言论。这些情绪赢得了国王的堂兄路易-费迪南、他的妹妹(她嫁给了拉齐维尔亲王)、福斯伯爵夫人以及她的妹妹贝格夫人的共鸣。施莱尔马歇、亚历山大·冯·洪堡、约翰·米勒和默克尔都转变为敌视法国。很多军人，如法尔、沙恩霍斯特和布吕歇尔则急于采取行动。哈登堡支持他们，4月，施泰因要求国王解除他所宠爱的顾问洛巴德和拜姆的职务；在战争前夕王室的亲王们再次提出这一要求。弗里德里希-威廉生气了；可是他也感到焦虑不安，所以就暗中力图重新赢得沙皇的友谊。他派遣不伦瑞克公爵去向亚历山大保证，尽管普鲁士与拿破仑结盟，它永远不会对俄国作战；6月23日，当他得知奥布利尔所负的使命时，又用书面重申了这些保证。至于哈登堡，他与俄国大使阿洛佩尤斯进行了秘密谈判，按照上述方针缔结了一项协定，7月24日，沙皇签署了这项协定。 234

来因邦联的创建更加深了普鲁士的不满情绪。的确，皇帝认为绝不反对普鲁士组成北德邦联，普鲁士在1795至1801年间一直抱有这一伟大梦想。但是他不准汉撒各城市成为其成员，并且告诉萨克森，它完全有拒绝参加北德邦联的自由。黑森选侯也不敢加入。更糟的是，8月初亚尔默思在巴黎就向普鲁士大使卢凯西尼泄露了将要从普鲁士手中夺走汉诺威的消息。布吕歇尔报告说，法军正在来因河一带集结，从弗兰科尼亚也传来类似的警报。这种谣言最后使弗里德里希-威廉下了决心。他确信汉诺威处于危险之中，在没有澄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就通知了沙皇，并于8月9日进行了动员。整个8月他都很苦恼，不知道奥布利尔签订的条约结果将会如何。实际上弗里德里希-威廉自己的决定已经使得奥布利尔条约失去了作用，而且沙皇也拒绝批准这一条约。得知这种情况后，国王于9月6日写信给亚历山大，表示“我除了战争外别无出路”。

正象 1805 年那样，拿破仑直到最后一刻还不肯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情。8 月 17 日，他甚至下令准备把帝国大军撤回法国，因为德意志问题随着弗兰茨的退位已经解决了。直到 8 月 26 日他还称普鲁士动员的消息是“可笑的”，但是到 9 月 3 日，当亚历山大拒绝批准奥布利尔条约时，他才明白了。他从中看出，一个新的反法同盟正在形成。9 月 5 日，他发布了第一批命令；全面的训令直到 19 日才发出。9 月 13 日福克斯死后，他的同僚确信俄国和普鲁士是可靠的，并由于攻陷布宜诺斯艾利斯而受到极大鼓舞；他们又增加了要求。9 月 26 日，他们坚持要求把达尔马提亚给费迪南四世；10 月 5 日，由于拿破仑的拒绝使谈判停下来。他那时已在班贝克，正在去击溃普鲁士的途中。他象上次战役一样临时仓促草率地准备了这次战役。当他到达弗兰科尼亚时，他的命令甚至还没有执行，他解除了维尔曼齐将军的兵站总监职务，而派达律继任。士兵们在没有大衣的情况下就出发了，其中大部分都没有替换的鞋，只带了几天的面包和饼干。然而这次战役象风卷残云一般，所以他们遭受的痛苦较少。10 月 1 日普鲁士已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法军撤到来因河西岸；拿破仑于 7 日在班贝克收到了这份最后通牒；到 14 日，普军已全部覆灭。

235

五、耶拿战役与奥尔施泰特战役。冬季战役（1806—1807 年）

普鲁士却对自己的军队充满信心，而全欧洲也这样相信它。甚至在法国也有不少人认为，只有在摧毁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军队之后，拿破仑的声誉才真正确立起来。自从普鲁士军队赢得荣誉时起，它似乎毫无变化。虽然自从尼德兰和德意志不再能提供兵员以来，征募外籍兵已变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普军里至少仍然

有八万名外籍士兵。军队的其余部分是由从农民中征召来的“区乡兵员”组成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免服兵役，而大部分军官则由容克地主充任。这支全然沒有民族特征的军队，在旷野进行线形队列的战斗训练，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此时普军是由若干营步兵组成，但是他们沒有作为散兵进行战斗的训练。骑兵仍然是很好的，但是炮兵的装备很差，工兵和医务几乎都不存在。指挥战争的理论几乎也不再有任何进展。团以下沒有再划分较小的单位。行军依据军事仓库的所在地而定行程，部队经常为庞大的行李辎重队所拖累。谁也沒有看出来，这支军队在与法国革命的战士相遇时，就显示出它是一支非常落后的军队，也沒有人看出，这支军队的最大缺陷是它已不惯于作战。连长在本连队为所欲为，由于和平时期请长假的人多，吃空额捞了金钱，他们把一场战役视为一场灾难。指挥官年已衰老，缺乏果断；所以这些部队虽然既勇敢又训练有素，但由于缺乏得力的领导而失败了。 236

如果普军不是过于自负，越过易北河、而是留在易北河东岸等待俄军的话，他们是能够避免一场灾难的。就亚历山大来说，他比1805年更加行动迟缓，因为他还注视着土耳其。8月24日，塞利姆单方面地免除了多瑙河各公国小邦君的职务；但是由于俄国最后通牒的威胁，他又于10月15日让他们官复原职。与此同时，米切尔森的军队受命去占领各公国。结果，不仅拖延了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准备工作，而且还使俄军必须在两条战线上作战。

普军以三路主力大军向图林根集中。这三路主力大军是：不伦瑞克公爵和国王率领的六万人；霍恩洛厄率领一支五万人的部队穿过了德累斯顿以便带动萨克森人；吕歇尔带领的三万汉诺威人取道黑森。瓦尔米①的败将不伦瑞克在他的部属中几乎沒有什

①瓦尔米是法国马恩郡东北部一小村，1792年9月20日，法军大败不伦瑞克率领的普奥联军于此，击退了欧洲反动君主对法国革命的武装干涉。——译者

么威望，他既不善于集结部队，也不会掩蔽部队，甚至也不能贯彻作战计划。他打算向美因河进军，以便威胁法军的作战通信线路，而霍恩洛厄则打算穿过弗兰科尼亚森林正面迎击法军。最后，霍恩洛厄向耶拿移动去靠拢不伦瑞克的部队，但他沒有能与不伦瑞克会师，而留下了两个军在萨勒河。普军还沒有来得及集结他们的部队就遭到了袭击。

拿破仑留下路易和莫蒂埃保卫来因河；他的德意志盟国固守后方。9月25日前后，他的主力部队集结在纽伦堡附近，以美因河和弗兰科尼亚森林为掩护。总共六个兵团，再加上骑兵后备队和近卫军共约十三万人。对于拿破仑来说，必须在俄军到达之前击败普军，他担心他们正固守在易北河东岸。当他听说他们正在行军途中时，他推断，他们不是朝着美因兹就是朝着维尔茨堡进发；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与他们在美因河一带交战，迂回包抄他们的左翼将会使他们朝着来因河方向撤退。当看到他们仍按兵不动时，他就于10月7日至9日兵分三路纵队穿过弗兰科尼亚森林，以便切断他们向易北河的退路。內伊和苏尔特未经战斗就进入霍夫村；缪拉、贝尔纳多特、达武和近卫军把陶恩齐恩的一师人赶出了施莱茨；左边的拉纳和奥热罗袭击了萨尔费尔德，在这里费迪南亲王被击败身亡。接着，部队向北进发，然后转头向西挺进；与此同时，缪拉扑向来比锡，他获悉这里的普军正在退却。萨勒河有两个可以涉水渡河的地点：克森和卡赫拉。达武占领了前者；拉纳和奥热罗夺取了后者，然后沿左岸前进，到达了耶拿，并占领了兰德格拉芬山——一个能控制霍恩洛厄扎营处的高地。拿破仑以为普军的主力驻扎在这个平原上，便命令內伊、苏尔特、近卫军以及部分骑兵在兰德格拉芬山集结；其余部队由贝尔纳多特率领从瑙姆堡被调回到德恩堡，受命在必要时向炮声轰鸣的方向进军。

事实上，不伦瑞克和国王率领着七万人正在向克森渡口进军，

237

霍恩洛厄只不过有五万人，而且这五万人甚至还未集结起来。拿破仑于 10 月 14 日投入了五万六千兵力去对付霍恩洛厄。拉纳和苏尔特从兰德格拉芬山长驱直下，击溃了敌人的第一道战线，继而进攻第二道战线，并且迂回包抄了敌人的左翼，而奥热罗因道路崎岖，进击稍慢，最终还是威胁了普军右翼。经过一番激烈抵抗之后，普军大败，溃不成军。率领部队赶来增援的吕歇尔，赶到战场后也只落得同样的下场。在这段时间内，达武带领的二万六千人却担负着迎击在奥尔施泰特附近的普军主力部队的重担；不伦瑞克受了致命伤，他的部队惊慌逃奔，撞上了从耶拿败退下来的逃兵，这些逃兵和不伦瑞克的败军混在一起，更是溃不成军。至于贝尔纳多特，虽然他确实在德恩堡渡过了萨勒河，但是他一向心怀不轨，便与两个战场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普军死伤二万七千人，被俘一万八千人，几乎丢掉了他们全部野战炮。

缪拉、内伊和苏尔特穿过哈次山区追赶敌人残部，俘获二万人，可是却让几个军团逃掉了。法军主力经来比锡直下柏林，达武于 27 日首先进入柏林；他与奥热罗从柏林渡过奥得河，迫使库斯特林要塞投降。对敌人的追击现在变得更加有条不紊了，霍恩洛厄被截断通往什切青的路，于 28 日在普伦茨劳缴了械。布吕歇尔设法到达了卢卑克，但却于 11 月 6 日在那里被俘。当时残留下的普军只有在东普鲁士的莱斯托克的一个分队。远至维斯杜拉河的所有要塞都开门投降，只有西里西亚各城镇和由格奈森诺防卫的科尔贝格除外。民众毫无反抗，文职官员宣誓效忠拿破仑。被征服 238 的地区迅速地被组织起来，并且要交纳一亿六千万法郎的军税(这还没有把强行征用的计算在内)，以便获得法国军队完全缺乏的各种军需物资。

拿破仑马上就开始采摘自己的胜利果实了。早在 9 月 27 日，维尔茨堡大公就加入了来因邦联；12 月 11 日萨克森选侯弗里德里

希也加入了邦联，并接受了国王的头衔；萨克森的公爵们于15日加入了邦联，中德意志的其它王侯最后也都随着加入了。黑森-卡塞尔和不伦瑞克公国，以及富耳达一起被并掉了，富耳达的邦君奥伦治公爵曾站在普鲁士一边参战，因此被剥夺。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本人似乎是甘愿附庸称臣，以便保住自己的王位。卢凯西尼与察斯特罗同迪罗克谈判一项和约，和约规定割让整个易北河以西的普鲁士领土，阿尔特马克除外，并对英国人封闭波罗的海各港口。10月30日签署的这一和约于11月6日由国王批准了。

可是，局势已经发生变化。当拿破仑于10月27日进入柏林时，他在档案中发现了普俄之间的一项协定的证据，于是他开始散播关于普鲁士王后同沙皇亚历山大之间关系的流言蜚语。他很快就明白，俄国将会前来帮助普鲁士，彼得堡的贵族中间爆发了好战的愤怒情绪，东正教将拿破仑逐出教会。11月9日，皇帝决定延缓签署和约，而代之以一项要求以维斯杜拉河与布格河为界的停战协定；国王的军队要驻扎在东普鲁士，在必要时，他们将从那里赶走俄国人。此外，他还宣称，在未能签订一项包括归还法国殖民地以及保证土耳其领土完整的全面和约之前，他将不从普鲁士王国撤兵。11月21日，他的这些意图在提交给元老院的一篇咨文中公开发表了。实际上，普鲁士已被作为抵押品；看来，它所处的被囚禁地位很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随着军队的前进，它有计划地没收了英国货；随着汉撒各城市被占领，德意志现在停止了对英国的贸易。拿破仑在11月21日著名的柏林敕令中宣称，不列颠诸岛"处于封锁状态"，那就是说，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进行虚拟封锁。结果，无论是直接来自英国的船，还是来自它的殖民地的船，都不得驶入帝国的港口。

有人认为"大陆封锁"是"大帝国存在的理由"，情况根本不是239 这样；封锁的扩展是帝国对外征服的自然结果。由于拿破仑没有

控制海洋，因而著名的柏林敕令本身对业已存在的对英国货物的禁令并没有增加任何新东西。富有意义的新情况是，由于中立国无形中受到打击，封锁就会失去自拿破仑执政以来就给予它的那种保护主义的根本特点，从此以后，它变成了一种攻击性的武器。胜利又使拿破仑完全转回到1798年督政府采用的政策上去。联合欧洲大陆反对英国的意志已经形成了，因此就使“帝国的”和罗马的观念在当代政治中具有了现实意义。“我要用陆地的力量征服海洋，”拿破仑这样写道。这就是为什么柏林敕令标志着一个转折点。

普鲁士的谈判全权代表由于眼光短浅而于11月16日接受了停战协定，但是国王却拒绝了这一协定，同时他身不由己地和反法同盟连结在一起。拿破仑不等国王作出决定就一直进军到维斯杜拉河。11月27日，部队到达华沙。可是皇帝不得不在柏林停留一个月以便调集援军和充实士兵装备。莫蒂埃被派遣去占领瑞典的波美拉尼亚，并封锁斯特拉尔松。已表示悔改之意并答应取消与美国人联姻的热罗姆率领德意志各邦部队去包围西里西亚各要塞。1806年度征募的新兵已启程开赴前线。与此同时，向维斯杜拉河的进军已经把波兰问题公开提出来。波兰人在法军进军中就举行了起义，并驱逐了普鲁士的行政官员。参加起义的主要是资产阶级和贵族，但他们的看法不一致：有一个由拉齐维尔公爵领导的亲普鲁士派，其中不止一个贵族从那仿照普鲁士的先例建立的抵押银行中得利；尤其是还存在一个亲俄派。恰尔托雷斯基再次劝说亚历山大抢在拿破仑之前宣布自己为波兰国王，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涅姆策维奇和大主教谢斯琴策维奇的支持，后者痛骂了“波拿巴的虚伪良心”。波尼亚托夫斯基本人直到12月末还在犹豫不决。波兰的大贵族担心万一失败会遭到报复；他们也同样惧怕法国获胜，因为法国的胜利将会解放他们的农奴。

无论如何，不得不与俄军作战的拿破仑不能拒绝别人给予的援助。早在9月20日，他就授权札荣切克将军成立一个由普鲁士军队中逃出的波兰人组成的军团。耶拿战役之后，顿布罗夫斯基将军和韦比茨基将军就受命在起义地区组织三个军团。同样被召去的科斯丘什科则要求给以保证条件。拿破仑无意答应重建波兰国家，因为这将触怒沙皇并会引起奥国干涉。科斯丘什科谴责拿破仑对重建波兰保持缄默是出于自私："他只想到他自己。他憎恶所有的伟大民族性，更加憎恶独立精神。他是一个暴君。"这是一个透彻的论断，但却也是对这位皇帝的保留态度的一种误解：如果条件可能的话，他并不反对恢复波兰人的国家，以便使波兰成为帝国的一个附庸国。但波兰人能否自治呢？他对此表示怀疑，他的某些元帅也否定了这种可能性。何况此时去做也未免言之过早。因此他没有做出任何许诺，尽管瓦莱夫斯卡伯爵夫人——她与拿破仑一起渡过了整个冬天，而且他也在热烈地爱恋着她——一再恳求他。他只在波森为顿布罗夫斯基设立了一个临时行政机构。后来于1807年1月14日在华沙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该委员会推选马拉霍夫斯基为主席。在塔列朗和马雷的监督下，委员会把行政权委任给五名督政官，它着手组织波兰民族的军队，并为拿破仑的军队供应军需品，还开始效仿法国改革司法制度。

面临帝国大军，本尼格森和他的三万五千名士兵已经退却到那累夫河与弗克腊河之间的一个阵地，以等待布克斯赫弗登的四万名增援部队的到来。12月底，拿破仑开始进攻本尼格森。23日，他和达武在恰尔诺沃强渡弗克腊河，并命令拉纳向普乌土斯克进军。其余来自托伦和普洛次克的部队计划迂回攻击敌人的中部及右翼，并包围他们。但当时的天气恶劣，那些坎坷不平的道路影响了行军的速度。贝尔纳多特留在后面，内伊因为追击普军而迷了路。拿破仑力图重整部队秩序，但也无济于事。12月26日，法军

在拿破仑不在场的情况下，对普乌土斯克和戈莱明发动了一场秩序紊乱的进攻；俄军坚守阵地后又能够撤离。皇帝认为自己那些缺乏大衣、鞋子和食物的士兵是不可能在森林和沼泽地里去追击俄军的，因此他就在帕萨尔格河到华沙之间安置了冬营。

延伸如此之远的战线是令人惊讶的。位于森林背后的本尼格森现在向北移动了。1 月末，他渡过了帕萨尔格河，企图进攻贝尔纳多特，后者在向托伦撤退。与此同时，莱斯托克进军远至格鲁琼次。可是拿破仑已经集结他的其它的部队，并且向北进发以切断 241 敌人的退路。本尼格森由于捕获一名信使而得悉拿破仑的计划，因此他能够在帕萨尔格河一带坚持相当长的时间，以便逃跑。在穷追之下，为了保住科尼希斯贝克，他于艾劳应战。虽然拿破仑只有六万人，而敌人有八万人，他还是于 1807 年 2 月 8 日对本尼格森展开了进攻。他首先迂回包抄俄军的左翼，然后正面进攻，可是奥热罗的军队在一场暴风雪中迷了路，因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敌军主动出击，法军用骑兵不断冲锋，费了很大的力量才击退本尼格森。莱斯托克军队的到来使得法军处境更加糟糕；但是正在追击他的内伊终于在傍晚 7 时赶到战场，他迂回包抄本尼格森的右翼；本尼格森后来下令撤退。二万五千名俄军和一万八千名法军阵亡了。拿破仑停止追击敌军，并率领部队回到帕萨尔格河彼岸。他在沃斯特鲁达设立了自己的司令部，继之于 4 月 1 日又将司令部移至芬肯施泰因城堡。

拿破仑赢得了这场死伤惨重的战斗，但是他的计划再次失败了，还必须进行一次夏季战役。他再次陷于危境；他远离法国，在那里战争正在引起一场工业危机，危机迫使他大量增加政府定货和信贷，以避免失业的蔓延。同时，奥国可能会参战，而英国也有可能试图在大陆展开活动。艾劳战役轰动了整个欧洲，它加深了波兰战役遗留下来的印象。艾劳战役表明，拿破仑的战略和大军的力

量很不适应这些平原地区和气候条件。布赖特公司不得不承认在保证运输方面无能为力;乡间只能提供有限的军需品;部队力量减弱了，只有四分之一的士兵能够参加战斗，其余的则要守卫后方。要战胜俄国，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军事上都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

六、夏季战役与提尔西特条约(1807年)

最简单的任务是补充新兵。从1806年9月至11月，后备役242和这一年所征募的新兵的一半被派往来因河，克勒曼又从这里把他们一队队地派往前方去。另一半的新兵也以同样的方法于10月至12月派遣出去。正当拿破仑启程到前方去时，他提前征召了1807年度的新兵;这批士兵也在冬季走上征途了。最后于1807年4月，1808年度的新兵也被征募，这些新兵刚到兵站就被立即派出，装备不齐，并且完全缺乏军事训练。带领新兵也变得困难起来，首次用新兵组成"临时团队"，同一些幸存的干部混合编在一起。帝国总共征募了十一万名士兵;同时，盟国军队由四万人增到十一万二千人，其中有德意志军队、荷兰军队、波兰军队、由拉·罗曼纳侯爵率领的西班牙军队以及意大利军队。1807年7月15日，在德意志境内的帝国大军达四十一万人，为1806年9月兵员总数的二倍。大约有十万人参加了弗里德兰战役。此外，皇帝还在意大利驻扎着十二万人，监视着奥国和西西里岛，另外还有十一万人(其中有一些国民自卫军步兵)保卫着海防。

组织运输和供应要困难得多。私人公司在供应军需品方面的失败使皇帝把后勤工作都军事化了，至少原则上是如此。炮队扩充了，并组织了辎重队;设立了军粮总局，并委派马雷的兄弟负责。243这样1807年战争的结果使得国家的职权扩大了。但是不应由此推断说，这一切改变了拿破仑战争的特征。新的组织机构从未满足

过需要，大部分车辆仍然是在行军途中偶然获得的。军粮总局局长几乎是不管正在战斗的部队，否则就不成其为“以战养战”了。1807年战役期间，拿破仑从法国仅调去三万匹军马用以补充在波茨坦和库尔姆的新马站；他认为就地征用一切军需品却更为经济和便利。在德意志设立了作坊，并和当地的船夫和马车夫订立了运输合同。困难多半仍然还是难以克服的。在货物不能运输的情况下，保持连续不断的生产也无济于事。充塞在维斯杜拉河东部——欧洲人烟最稀少的地区——的战士们所能获得的东西仅仅是能使他们免于饿死而已。到7月为止，法军才收到了二万六千件大衣，五万二千件短上衣，和同等数量的裤子；在后方仍有大批的鞋子储备着没有穿用。俄军方面由于同样的原因，象往常一样深受苦难。而他们的盟军的条件也并不好些，尽管他们是在本土作战。东普鲁士全境遭到彻底蹂躏和掠夺。

拿破仑一边备战，一边进行谈判，试图在反法同盟各国中播下不和的种子，并使奥国保持中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那种坚决的姿态为时不长。12月16日，他把外交大臣的职务交给施泰因，但因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不肯撤换他的亲信顾问，也不肯组成一个政见一致的政府，施泰因拒绝了，这使得国王对他很生气。仍然负责外交的察斯特罗急于同法国谈判，因为他担心自己的产业会被没收。拿破仑在11月16日的停战协定的谈判失败之后曾宣布，除非签订全面和约，否则就不进行谈判。于是国王就听从了劝告，要求俄国和英国赞成谈判，他们同意了，其条件是，法国必须首先提出和平谈判的基础。在这期间，拿破仑由于处境困难，便又想与普鲁士单独媾和，而他自己曾使普鲁士想媾和的建议遭挫。他在1月底向普鲁士建议谈判，并在艾劳战役后派贝特朗到科尼希斯贝克去肯定谈判的诚意。国王派克莱斯特上校去芬肯施泰因作为回访。拿破仑坚持了自己的条件，同时也同意召开一次会议，4月，当普

244 鲁士为会议提交了一份正式建议时①，他便接受下来。6月9日，国王通知了英国；到这时，战役已经接近尾声了。拿破仑从这些谈判中得到的好处是，这些谈判招致了亚历山大对普鲁士的不满。4月2日，沙皇到达梅默尔规劝国王以哈登堡接替察斯特罗；4月23日，他诱导国王签署了巴滕施泰因协定，从而加强了他们之间的同盟。直到那时，普军还沒有失去希望，因为俄军仍在竭力拯救但泽。可是，这座要塞城市的陷落，以及容克地主对盟军过分放肆的行为的抱怨，使得两国关系忽然冷淡下来。因此，亚历山大心中开始模糊地形成了逐渐把他引向提尔西特和谈的思想。

奥地利的态度只能促进沙皇这种想法。新宰相施塔迪翁伯爵急欲进攻拿破仑；但是他断定，法军仍然是个劲敌，对普鲁士和俄国的野心他也感到不安。所以，奥国进行备战，待机而动。自10月以来，拿破仑就一直在交替使用着引诱和威胁手段，他建议结盟，但沒有提出别的，只提出以加里西亚交换西里西亚，并且还坚持要奥国停止武装。施塔迪翁却在故意回避；可是，1月间他却派遣了文森特男爵到华沙与塔列朗谈判，而塔列朗毫不费力地使文森特陷入他的圈套中。施塔迪翁要摆脱其它的谈判代表而且还要不得罪他们则更为困难，他们是：俄国大使拉祖莫夫斯基，跟他一起的还有波佐·迪·博尔戈，一个效忠沙皇的法国亡命者，以及英国代表阿戴尔。召开和谈会议的计划及时地使奥国从窘境中解脱出来。3月18日，施塔迪翁提出一项调停建议，4月7日经过塔列朗同意，这一建议成为正式建议②。当谈判各方都接受了这一调停建议时，拿破仑却突然变得沉默起来，他将塔列朗召到身边，整个5月都沒有给文森特答复。就这样，拿破仑在奥国出面调停之前就可以重开战端，而这是亚历山大决不能原谅奥国的。

① 作者大概是指奥国，不是普鲁士。见下文。——英译者

② 见前注。——英译者

但更令亚历山大激怒的是英国的态度。福克斯死后，他的同僚仍然在当权，霍威克勋爵继福克斯出掌外交部。他们的政策变得越来越显示出岛国的偏狭性。攻占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公众唯一关心的是西属美洲；一些军队被派到了那里去，对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的远征占用了可动用的部队，因此，沙皇要求英国在大陆发动牵制攻击，英国就没有办到。西西里岛本可以作为一个进攻意大利的极好基地，可是福克斯将军是玛丽亚-卡罗莉娜的冤家对头，并且也没有得到增援部队，他宣布他自己不能采取任何行动。英国政府仍然舍不得花钱，它拒绝担保俄国发行的一笔公债。英国政府的外交也不够灵活。它到1807年1月28日才同普鲁士签订和约，条件是要普鲁士从汉诺威撤军；甚至在此之后，英国仍故意冷落普鲁士。英国驻科尼希斯贝克和圣彼得堡的大使哈钦森和道格拉斯既不灵活变通又不干练，并且暴露了他们自己是拿破仑的热情崇拜者。最后，内阁于2月因天主教徒问题而岌岌可危；国王终于答应撤消宣誓条例，但仍拒绝授与天主教徒较高的军阶，在海军中尤其如此。3月7日，内阁辞职；托利党又执政了，并以“不要天主教”为口号进行竞选。政府只是在名义上由波特兰公爵领导；政府的重要部门又由皮特的门徒掌握，他们要恢复皮特的对欧洲大陆的政策，并且在政策的实施中显示出同样不屈不挠的决心。埃格蒙特勋爵之子珀西瓦尔，担任财政大臣；巴瑟斯特出任商务大臣；特别是坎宁出任外交大臣，以及卡斯尔雷出任陆军大臣。然而由于人们不很了解这些人，所以他们的上台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坎宁直到5月16日才任命莱维森-高尔为新任驻俄大使。坎宁对普鲁士仍然心存疑虑，怀疑它想收回汉诺威以称霸北德意志；他认为，在汉诺威只不过是用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取代拿破仑的军国主义，英国则一无所获。他所关心的主要是策动瑞典的古斯塔夫四世破坏他与法国在4月18日签定的停战协定。当夏季战役开始时，

245

反法同盟各国对英国的愤懑达到了高峰。

正值亚历山大枉费心机地等待着英国发动牵制攻击的时候，他自己不得不分调一部分兵力去攻打波斯，和继续进行他所不合时宜地发动的对土耳其的战争。于是拿破仑抓住时机同沙皇的敌人搞好关系，因此欧洲的冲突便扩大到了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就象在督政府时期一样。俄国将军米切尔森已占领了摩尔达维亚，并未发一枪一弹就拿下了布加勒斯特；但是他的部分军队却被召回，因而他只好就此止步。虽然拿破仑怂恿了塞利姆三世对俄宣战，但是鲁斯丘克的帕夏、统帅着多瑙河军队的"旗手"穆斯塔法到5月底仍按兵不动。塞尔维亚人的暴动因而便有着重大的意义，特别是他们在12月12日夺取了贝尔格莱德之后情况就更是如此。土耳其人答应了塞尔维亚人的一切要求，可是现在俄国代理人的影响却占了上风。3月，帕夏苏莱曼及其军队撤退时遭到屠杀，塞尔维亚的民众议会投票决定与沙皇结盟。拿破仑竭尽全力帮助土耳其苏丹；他与艾奥尼纳的帕夏阿里-泰布兰言归于好，并诱使他进攻科孚岛和圣摩尔岛；马尔蒙将大炮和炮兵教官派往波斯尼亚的帕夏那里；一名军官去到在鲁斯丘克的帕夏那里，另一名去到在维丁刚刚去世的帕斯万·奥格卢的继任者那里。皇帝甚至还提出把达尔马提亚的军队派遣到多瑙河去。这一消息冒犯了穆斯林的感情，塞利姆本人也拒绝过于依赖法国；3月间派到拿破仑那里的使节没有与他达成结盟的协议。5月末，俄军侵入了小瓦拉吉亚，以便援助塞尔维亚人，后者正取道克拉伊纳向多瑙河进军；但他们不得不急忙撤退，因为"旗手"穆斯塔法终于渡过了多瑙河。可是他并没有走很远。5月25日，土耳其近卫军步兵在君士坦丁堡叛变，他们杀死了大臣，废除了"新军"，废黜了塞利姆，由塞利姆的堂兄弟穆斯塔法四世继位。"旗手"穆斯塔法撤退了，于是俄军得以同塞尔维亚人于7月17日在纳果廷城下会师。

246

英国人在东方支援俄军，然而他们这样做有自己的打算。英国海军上将达克沃思要求土耳其苏丹恢复1798年的联盟并对法国宣战，苏丹拒绝了英国的要求，达克沃思的舰队便于2月19日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并于次日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塞利姆的使者们敷衍拖延时间，以便让塞巴斯蒂亚尼组织城防；到26日，苏丹便抛下了假面具，达克沃思不得不于3月3日仓惶退出达达尼尔海峡，受到了一定损失。英国没有坚持下去。其实英国无意为俄国利益出力；英国政府宁愿重新占领埃及。自从法军离开埃及之后，土耳其苏丹一直没有能在埃及恢复统治。马穆鲁克人打败了科斯勒夫帕夏，而在其首领穆罕默德·阿里率领下的阿尔巴尼亚军队则取得了独立。马穆鲁克人的分裂有利于穆罕默德·阿里：奥斯曼的别伊巴尔迪西结好于他；穆罕默德·埃尔-埃尔菲则和英国人勾上，而这两个马穆鲁克首领又都与法国领事德罗韦蒂勾结。最后于1804年穆罕默德·阿里将巴尔迪西驱逐出开罗，并与土耳其人断绝了关系，还迫使土耳其苏丹承认他为这个国家的代理总督，1805年又迫使土耳其苏丹承认他为帕夏。英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干涉使得埃尔-埃尔菲替代了他，可是穆罕默德·阿里不肯妥协；后来这两个马穆鲁克首领相继去世，这就使得他能够为所欲为了。为这次失败进行报复的达克沃思从西西里调来一支分遣队，在亚历山大港登陆；他们占领了罗塞塔，但很快就被穆罕默德·阿里所发动的一次袭击所打败。1807年4月22日，穆罕默德·阿里包围了亚历山大港，英军于9月15日签署了撤军协定。 247

当时，英国人在波斯也遭到挫折。波斯王自1804年来就一直同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交战，1806年的一次失败使他失去了巴库和达格斯坦。波斯王同时向拿破仑和印度总督求援。法国派出代表去商谈结盟问题，接着，波斯使团到芬肯施泰因拜会了皇帝，5月7日在那里签定了一项条约。法国同意将波斯置于自己的保

护之下，并同意向波斯提供武器和教官；而波斯则答应支援法国实行计划中的对印度的远征。5月10日，拿破仑给加尔达内将军发出了训令，派他出使德黑兰。

总之，一切都变得对拿破仑有利起来，然而，只有对俄国取得决定性胜利才能粉碎反法同盟。而本尼格森给拿破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但泽和西里西亚（科塞尔除外）都已陷落，法军只要一发起进攻，科尼希斯贝克就会失守，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本尼格森试图以突袭来拯救这座城市，6月初，他贸然向帕萨尔格河挺进，以期击溃在帕萨尔格河右岸扎营的内伊。内伊从本尼格森的包围中逃脱出来，与达武在沿河一带会师，与此同时，其余的法国大军于6月9日向俄军的右翼进攻，以便切断俄军与莱斯托克的二万四千名普军的联系。本尼格森然后退守海尔斯贝格，这是阿勒河上的一个设防阵地。缪拉本应当把本尼格森围困在该地，以保证法军通过唯一可行的大路，可是他却于6月10日轻率地展开全面进攻，从而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损失约一万人，并使本尼格森得以沿着阿勒河右岸撤退下来。拿破仑此时投入攻击正在向科尼希斯贝克撤退的普军。本尼格森想支援普军，发动袭击牵制法军，6月13日，他在弗里德兰渡过阿勒河。他可能就只想做这件事，因为当他在次日清晨遇到拉纳的军团时，他并无意利用自己的优势兵力。这样他就给了皇帝充分的时间以便带领三个军团赶到战场。俄军的左翼在击退了内伊的两次猛攻之后终于被法军炮火突破。桥梁被焚毁，本尼格森部队被追赶到河里，损失了二万五千人。其残部在法军的追击下撤到提尔西特。俄国将领受到这一打击而惊惶失措，认为必须签订停战协定，亚历山大的使节于6月19日被派去要求签订停战协定。他们受到了友善的接待，并于6月21日签署了协定。除此之外，迪罗克19日就向他们提出了签订和约的建议。

248

拿破仑需要和平；如果俄国继续抵抗，他就得渡过涅曼河；这

就需要再次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而战争旷日持久会使奥国有机可乘。就亚历山大而言，他对各同盟国都有不满，也无意孤注一掷了。他的兄弟康斯坦丁是完全倾向媾和的，康斯坦丁的汇报无疑地说服了亚历山大：在遭到入侵的情况下一切都可能发生：军队哗变、贵族谋叛、波兰各省暴动，或许农奴也要造反。亚历山大接着又会见了弗里德里希-威廉，6月22日哈登堡趁机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建议：已不复存在的普鲁士劝说沙皇改变他的全部政策，向拿破仑建议建立三国联盟，对英国作战，并重绘欧洲地图；俄国和奥国将瓜分土耳其，并与普鲁士一起放弃它们所占有的波兰领土；萨克森国王将入主华沙，而将自己的国土让给普鲁士。由此可见，正是普鲁士在引导沙皇与法国结盟并与英国决裂。对英国十分恼怒的亚历山大欣然接受了这样的建议。此外，哈登堡的计划将会再次把他与拿破仑一起树为欧洲的调停人，就如同在1801年那样；因为处在当时的情况下普鲁士几乎是无足轻重的。这恰恰符合于拿破仑的想法；他暂时放弃了征服俄国的念头，并且打算让俄国代替普鲁士作为自己的盟国。这一建议于6月23日送到亚历山大手里，它触动了沙皇的虚荣心。他也许认为他能象捉弄许多别人一样诱惑拿破仑，因此提出举行一次私人会晤。这次会晤是于6月25日在涅曼河中间的一个木筏上举行的。在这里两位皇帝单独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彼此说了些什么：这就是“提尔西特的秘密”。

实现和平与结成联盟并没有什么困难；但是还必须决定普鲁士的命运。拿破仑一分钟也没有考虑过要承认普鲁士为第三方。他以蔑视的态度对待弗里德里希-威廉，并且把他撂在一边。路易莎王后于7月6日前来拜会拿破仑；他很有礼貌地听她的谈话，但她却空手而归。已经原则上同意了哈登堡计划的亚历山大竭尽全力维护他的盟友，但结果在结成联盟时却没有让普鲁士参加。为

此他会被斥责为背信弃义。他无疑地看出了拿破仑是很固执不容
249 商量的，所以就附和了拿破仑的主张。皇帝认为他是根据征服的权利占有普鲁士的，而且可以继续占有它；尽管如此，出于对沙皇的敬意，他愿意同普鲁士签订停战协定，并归还其部分领土。拿破仑想必是还用东方问题的前景来炫惑亚历山大，他们一旦使英国恢复理性，甚至在这以前，就将着手解决东方问题。总之，他使沙皇着迷。

1807年7月7日于提尔西特签署的文件包括一项和约、某些秘密条款和一个盟约。7月9日又增加了一项与普鲁士签订的单独条约。俄国经过这场战争毫无损失；相反地，普鲁士丧失了易北河以西的全部领土，如英国同意割让汉诺威给拿破仑，则普鲁士还能重新获得三十万至四十万臣民。东弗里西亚群岛已经并入荷兰，普鲁士在威斯特法利亚的领土已划入贝格大公国。其余的领土——明登、希尔德斯海姆、哈耳伯斯塔特、马格德堡——都与不伦瑞克、黑森-卡塞尔、汉诺威的一部分、奥斯纳布吕克和格廷根合并组成了将由热罗姆统治的威斯特法利亚王国。拿破仑把汉诺威的其余部分与埃尔富特、哈瑙以及富耳达都控制在自己手中。普鲁士也放弃了它所瓜分的波兰各省，除了西普鲁士的一小块地方以外，这块地方是一边把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另一边把东普鲁士连接在一起的三十公里宽的地峡。被肢解切割剩下四个省份的普鲁士还给了弗里德里希-威廉；但是7月12日所签署的条约又规定在付清赔款以后，法国才从普鲁士撤军。既然没有让沙皇作为一方参加签署这个条约，因此他就无权过问这个协定的实施，这样拿破仑就暂时控制了整个普鲁士。

法俄联盟前途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波兰各省，只有但泽问题已经解决，它现在是普鲁士领土上一个孤立的城市，变成一个自由市，但仍由法国将军拉普继续占领。不幸的是，恰恰是在波兰问题

上，提尔西特会谈的秘密至今仍被隐藏得深不可测。毫无疑问，拿破仑很愿意与沙皇共同瓜分普鲁士；事实上，他已经建议俄国应该扩张到涅曼河。拿破仑似乎要把他已征服的波兰各省送给沙皇，条件是让法国另占有西里西亚。这一建议遭到沙皇的拒绝，在原来普占波兰各省中，俄国只并吞了比亚威斯托克省。假如拿破仑不要求西里西亚并答应归还普鲁士在中德意志的领土，亚历山大也许会接受这一建议的。结果普鲁士的波兰各省被组成了一个华沙大公国。这种解决办法可能是沙皇本人作为一种暂时的妥协方案提出来的；或许又是拿破仑的主意；无论如何，这个有二百万人口的华沙大公国是被置于萨克森国王的统治之下了。皇帝于7月22日经过德累斯顿时，给波兰人颁布了一部宪法。象威斯特法利亚一样，这个新的大公国也加入了来因邦联，三万名法国士兵驻扎在那里。这样就重建了一个波兰国家，只不过没有用“波兰”的国名罢了。实际上，它只不过是法国反俄的前沿阵地而已，所以它一开始就在法俄联盟中埋下了解体的种子。 250

在拿破仑这样把大帝国扩展直到涅曼河时，亚历山大却在放弃保罗一世在地中海所取得的权益。他将科托尔和爱奥尼亚群岛割让给了法国，甚至还从不久前才占领的多瑙河两公国撤了出去，对撤出的条件只是在和约签订之前土耳其人不应重新占领这些公国，拿破仑应在俄土之间充当调解者；如果土耳其苏丹在三个月之内拒绝签订和约的话，法国就将与俄国联合起来剥夺土耳其政府除鲁梅利亚之外的在欧洲的全部领地。至于英国，则由亚历山大出面调停，要求英国归还法国的殖民地，并承认海洋自由。如果调停失败，法国就要采取措施，迫使瑞典、丹麦和葡萄牙加入大陆体系。这样一来，就无异于续订和扩大了1801年的协定；沙皇就能够指望征服芬兰和土耳其；而拿破仑则可征服葡萄牙，同时还可组成一个禁止对英贸易的大陆联盟，普鲁士已经参加大陆封锁；被孤

立了的奥国也难以拒绝这样做。陷于法俄联盟夹击之中的这两个德意志国家沦落到无能为力的地步，因此，也就不可能缔结任何反法同盟。

因此，对拿破仑来说，提尔西特和约是一个辉煌的成就，纵然只是一个暂时的成就。虽然亚历山大似乎是落入了拿破仑的圈套（而他却认为拿破仑是处在他的支配之下），他的虚荣心和反复无常的性格肯定是不会让这种局面长期存在下去的。同一个在性格上不能平等待人的人合作，他是不会忠实地同他平分秋色一起统治欧洲的。毫无疑问，亚历山大既狡猾又诡诈，内心深处确实另有打算。即从一种险恶局面中毫无损伤地解脱出来，他推想，法国会比英国更乐意允许他掠夺瑞典和土耳其。同时，他仍完全有自由251 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重新拿起武器。因此有人认为，是他欺骗了拿破仑。

完全不是这样。在提尔西特进行谈判时，拿破仑对梅內瓦尔说过，他决心不把君士坦丁堡交给俄国人："它就是世界的帝国"。在拿破仑心目中，法俄联盟并不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的，而是俄国纳入了他的体系，因而变为他的附庸国。他不可能不会想到，迟早有一天战争将会再起，可是拿破仑是个只顾眼前的人；他知道，他要重建军队、解除奥国的武装并使西欧完全归于他的统治，就需要和平。法俄联盟就使得和平有了保证，至少在目前是如此；或许这个联盟甚至还会使他能征服英国。下一步如何，走着再瞧。如果俄国在英国失败之前发动战争，那么他就将先征服俄国。但是，拿破仑只要有俄国的支持，那怕是暂时的支持，他就会赢得时间聚集他所需要的力量，以便打败亚历山大。

参考书目(提要)

译者说明：勒费弗尔原著的参考书目附在各编、章、节标题下面，我们集中附在上、下卷书尾。原书所列书目极为丰富，我们只选录一部分重要的原始文献和史学名著，较多选录近年新的研究成果，较少选录杂志论文。较多选录英、法文著作，较少选录其他文字著作。专业读者如需参考原著全部书目，请查看原书。

第一编　革命的遗产

第一章　旧制度与革命的冲突

阅读本章及整个第一编时，请参看本丛书(«民族与文明»)前一卷及其参考书目：G.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51, t. XIII de la collection "Peuples et Civilisations"), 6ᵉéd. revue et mise à jour par A. Soboul, 1968.

有关本书所研究时期的世界通史著作，可选读下列各书：l'Histoire générale du IVe siècle à nos jours, publiée sous la direction d'E. Lavisse et A.Rambaud, t.IX(Paris, 1897); 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t.IX (Cambridge, 1906); R.R.Palmer,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1950);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civilisations, sous la direction de M.Crouzet, t. V: Le XVIIIe siècle. Révolution intellectuelle, technique et politique (1715—1875), par R.Mousnier et E.Labrousse,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M.Bouloiseau (Paris, 1953); Destins du Monde, sous la direction de L.Febvre et F.Braudel:Les bourgeois conquérants, par Ch. Morazé (Paris, 1957); F. Markham, Napoleon and the Awakening of Europe (London, 1954).

有关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史的著作，可选读下列各书：A. Thiers, His-

toire du Consulat et de l'Empire (Paris, 1845—1862, 20 vol.); G. Pariset, Le Consulat et l'Empire (Paris, 1921), t.III de l'Histoire de France contemporaine, publiée sous la direction d'E. Lavisse, avec d'importantes bibliographies; L'étude de Taine, formant la 3e partie d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Paris, 1891—1894, 2 vol.), est restée inachevée; L'Histoire du Consulat et de l'Empire, par L. Madelin, s'est achevée avec la publication du t.XVI et dernier:Les Cent Jours. Waterloo (Paris, 1954).

一、社会的和政治的冲突

J. Godechot, La Grande Nation. L'expansion révolutionnaire de la France dans le monde, 1789—1799 (Paris, 1956, 2 vol.); 同一作者的 La contre-révolution. Doctrine et action, 1789—1804 (Paris, 1961).

二、思想的冲突

关于政治思想史可选看: P.Janet, Histoire de la science politiqu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morale (Paris, 1872, 2 vol.; 4e éd., 1913); G. Sabine,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1937; 4th ed., 1948); J. Touchard,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L. Bodin, P.Jeannin, G.Lavau et G. Sirinelli, Histoire des idées politiques, t.II:Du XVIIIe siècle a nos jours (Paris, 1959; coll. «Thémis»); F.Ponteil, La pensée politique depuis Montesquieu (Paris, 1960).

三、民族的觉醒

F.Meinecke, 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 (Berlin, 1908; 4e éd., 1917); 同一作者的 Geschichte des Historismus im XVIIIten und XIXten Jahrhundert (Berlin, 1927, 2 vol.); A. Soboul, De l'Ancien Régime à l'Empire:problème national et réalités sociales, L'Information historique, 1960, nos. 2 et 3.

第二章 战争的后果与和平的条件

全章的参考书是: H. von Sybel, Geschichte der Revolutionszeit (Düsseldorf, 1859—1879, 5 vol.), 此书有法文译本: Mlle Dosquet, Histoire de l'Europ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869—1888, 6 vol.), 英文译本是: W. C. Perry,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4 vols.(Leipzig, 1867—1869); A. Sorel, L'Europ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885—1904, 8 vol.); Emile Bourgeois, Manuel historique de politique étrangère, t.II (Paris, 1900); H.Fugi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mpire napoléonien (Paris [1954], t.IV de l'Histoir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publiée sous la direction de P. Renouvin); J. Godechot, La Grande Nation.

一、大陆各国

J.Streisand, Deutschland, 1789—1815 (Berlin, 1959); Histoire de Russie, publiée sous la direction de Ch. Seignobos, P.Milioukov et L.Eisenmann, t.II (Paris, 1933); K.Waliszewski, Catherine II (Paris, 1893); 同一作者的 Le fils de la grande Catherine: Paul Ier(Paris, 1912).

二、英国的战争努力

J.S.Watson, The Reign of George III, 1760—1815 (Oxford, 1960); J.Deschamps,Entre la guerre et la paix. Les Iles britanniques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89—1804 (Bruxelles, 1949); J.Holland Rose, Pitt and the Great War (Londres, 1911); G.P.Gooch,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t.I (Cambridge, 1912); R.W.Seton-Watson, Britain in Europe, 1789—1914 (Cambridge, 1947); A.T.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 (Londres, 1892, 2 vol.); W.James, The Nav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Londres, 1824, 5 vol.:2e ed., 1886, 6 vol.); J.Tramond, Manuel d'histoire maritime de la France des origines à 1815 (Paris,1916: dernière éd., 1942).

三、法国及其盟国

关于执政府的历史，请看本丛书前一卷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第五编和第六编及其参考书目。

关于政治制度可看: J.Godechot, 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sous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 (Paris, 1951; de la coll. «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关于经济史和社会史可看: H. Sée: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Paris, 2 vol. 1939—1942); Ph. Sagnac, La législation civil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898); G. Lefebvre, Les paysans du Nord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Lille, 1924, 2 vol.; 2e éd. Bari, 1959). 同一著者的 Études su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954; 2e

éd. 1963) 集中有关农民问题的论文。E. Levasseur, Histoire des classes ouvrières et de l'industrie en France depuis 1789 jusqu'à nos jours (Paris, 1862, 2 vol.; 2e éd. 1903); L. Chevallier, Classes laborieuses et classes dangereuses (Paris, 1958). 此书叙述了巴黎工人的情况。T.S.Ashton,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1760—1830 (Paris, 1955). 关于合并到法国的各郡可看 H.Pirenne, Histoire de Belgique, t.V (Bruxelles, 1920); 关于这一时期历史新的参考书目是: P. Gérin, Bibliographie de l'histoire de Belgique, 1789—21 juillet 1831 (Louvain-Paris,1960). 关于法国的盟国,可看: L.Legrand,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n Hollande (Paris, 1894); A.Fugier, Napoléon et l'Italie (Paris, 1947); R.Herr, The Eighteenth Century Revolution in Spain (Princeton, 1958); A. Fugier, Napoléon et l'Espagne (Paris, 1930, 2 vol.) t.I, Introduction.

四、封锁与中立国

E.F.Hecksher, The Continental System (Oxford, 1922); W.Freeman Galpin, The Grain Supply of England during the Napoleonic Period (New York, 1925); J.Holland Rose, British West-India Commerce as A Factor in the Napoléonic Wars, dans The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t.III (1929), p. 34—46; H.S.Commager, The Rise of American Republic, t.I (New York, 1931; nov. éd. 1939, 1942); S.M.Bemis,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36; nouv. éd. 1946, 1950).

五、英国资本主义的力量与困难

关于英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可看: P.Mantoux, La révolution industrial en Angleterre (Paris, 1905; 2e éd. 1959), 第二版是原著者参照了 Marjorie Vernon 的英译本 (1928 年) 增订而改写的,并由 A.Bourde 补充了参考书目。

T.S. Asht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60—1830 (Oxford, 1948) 有法译本,1955 年,巴黎; T.S.Ashton, An É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The XVIIIth Century (London, 1955);关于英国所遭受的困难,过去史学家普遍认为只是对法战争的后果,而忽视英国资本主义内在的危机和英国与中立各国的冲突所起的作用,好象这两个因素没有起过对法国有利的作用似的。

第三章　拿破仑·波拿巴登台

一、法国的独裁统治

A.Vandal, L'avènement de Bonaparte, t.I: La genèse du Consulat, Brumaire (Paris, 1903); A.Meynier, Les coups d'Etat du Directoire, t.III:Le 18 brumaire an VIII (Paris, 1928).

二、拿破仑·波拿巴

关于波拿巴的早年看: F.Masson et G.Biagi, Napoleon inconnu (Paris, 1895); A.Chuquet, La jeunesse de Napoléon (Paris, 1897—1899, 3 vol.). 要认识拿破仑,最好就是读他的通信集: Correspondance de l'empereur Napoléon Ier (Paris, 1857—1869, 28 vol.), 1870 年续出的第 29—32 卷是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的著作;这部通信集是拿破仑三世命令编纂的,但还没有全部出齐;以后私家编纂补充的主要有: L. Lecestre, Lettres inédites de Napoléon (Paris, 1897, 2 vol.); L. de Brotonne, Lettres inédites de Napoléon Ier (Paris, 1898) 和 Dernières lettres inédites de Napoléon (Paris, 1903); 法国参谋总部历史处出版了由 E.Picard 和 A. Tuetey 主编的 Correspondance inédite de Napoléon Ier conservée aux Archives de la Guerre (Paris, 1912—1913, 4 vol.); A. Chuquet, Ordres et apostilles de Napoleon (Paris, 1911—1912, 4 vol.). 有关拿破仑的回忆录记述了他的一些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谈话;其中最可信的似乎是下列几种: A.C.Thibaudeau, Mémoires sur le Consulat (Paris, 1827); Chaptal, Mes mémoires sur Napoléon (Paris, 1893); P.L.Roederer, Journal (Paris, 1909); Memoires du comte de Méneval (Paris, 1894,3 vol.) et du baron Fain (Paris, 1908) 此二人都曾是拿破仑的秘书; Mollien, Memoires (Paris, 1837, 4 vol.; réeditions en' 1847 et 1898, en 3 vol.); Caulaincourt, Mémoires (Paris, 1933, 3 vol.). Les mémoires de Madame de Rémusat (Paris, 1879—1880, 3 vol.)虽然名声很大，但却是恶意的而又不可信靠,新出的缩本 Mémoires de Madame de Rémusat, 1802—1808 (Paris, 1957) 有 Ch. Kunstler 写的重要的批判性序言。Bourrienne, Bonaparte intime, tiré des «Mémoires», par B.Melchior (Paris, [1961])仍值得参考。关于拿破仑的传记多得不可胜数,我们只举最著名的一些: Au-

gust Fournier, Napoléon I. Eine Biographie (Vienne et Leipzig, 1886—1889, 3 vol.; 2e éd. 1904—1906), 法译本 E.Jeglé, Napoléon Ier (Paris, 1891—1892) 没有译完全书,英译本 1912 年在伦敦出版; J.Holland Rose, The Life of Napoleon I (London,1901, 2 vol.; IIe éd. en un vol. 1929)〔汉译本: 罗斯: «拿破仑一世传»,商务印书馆,1977 年, 北京,上、下两卷(据 1913 年第六版译)——译者〕; P.Lanfrey, Histoire de Napoléon Ier (Paris, 1867—1875, 5 vol.) 写到 1810 年,虽很精辟,但乏善意。最近的一些传记有: É.Driault, Napoleon le Grand (Paris, 1930, 3 vol.); Jacque Bainville, Napoléon (Paris, 1931); F.Kircheisen, Napoleon I (Stuttgart, 1927—1929, 2 vol.), 法译本: J.Guidau, Napoléon. Une vie (Paris, 1934), 英译本: Napoleon (New York, 1932); E.Tarlé, Napoléon (Paris, 1937), Ch. Steber 译自俄文,有J.Cournos 的英译本: Bonaparte (London, 1937)〔汉译本: 塔尔列: «拿破仑传», 商务印书馆, 1977 年, 北京——译者〕; J.M. Thompson, Napoleon, His Rise and Fall (Oxford, 1952); E.Tersen, Napoléon (Paris, 1959). 德国作家 Emil Ludwig, Napoleon (1924) 有英、法等国文字译本,但是否能把这部精彩的、有名的心理分析论述归入历史著作之列, 我们感到犹豫不决。关于法国的拿破仑史学史,看荷兰学者 P.Geyl, Napoleon voor an legen de France Geschiedschrgving (Utrecht, 1946), 英译本: Napoleon, for and against. London, 1949; 关于英国的拿破仑史学史,看德国学者 W.Moilahn, Napoleon in der englischen Geschichtsschreibung von den Zeitgenossen bis sur Gegenwart (Berlin, 1937).

第二编　内安法国　外和欧洲

第一章　法国独裁体制的组成

全章参考书首先要着重介绍 F.Kircheisen, Bibliographie napoléonienne (Berlin, 1902; 2e éd. en 2 vol., 1908—1912), 全书尚未完成。仍看第一编关于法国史和拿破仑传记的参考书。关于执政府, 增看: A.Aulard, 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901; 5e éd. 1921) 的第四编。关于共和八年宪法的准备工作, J.Bourdon 的博士论文 La Constitution de l'an VIII (Rodez, 1941) 提出了一些新文献和一些新见解。对于宪法的研究,增看 M.Deslandres, Histoire constitutionnelle de la

France de 1789 à 1870, t.Ier (Paris,1932); M.Duverger, Constitutions et documents politiques (Paris, 1957; coll. «Thémis»). 关于波拿巴的合作者的传记选看: F.Papillard, Cambacérès (Paris, 1961); L.Madelin, Fouché (Paris, 1901, 2 vol.), 富歇的回忆录也由同一作者整理并加注释在1945年出版; G.Lacour-Gayet, Talleyrand (Paris, 1930—1934, 3 vol.) 看前两卷; E.Tarlé, Talleyrand (Moscow, 1958) 译自俄文原著; J.Pigerire, La vie et l'oeuvre de Chaptal (Paris, 1931).

第二章 欧洲和平的实现

全章参考书同第一编第二章。

关于历次战役的通史有: Colonel E.Bourdeau, Campagnes modernes, 1792—1815 (Paris, 1912—1921. 2 vol.) 附有地图; général Descoins, Étude synthétique des principales campagnes modernes (Paris, 1901; 7e éd. refondue, avec croquis, par le général Chanoine, 1928). 关于意大利战役,法国参谋总部历史处出版有 capitaine de Cugnac, La campagne de l'armée de réserve en 1800 (Paris, 1900—1901, 2 vol.),同一作者加以缩写为 La campagne de Marengo (Paris, 1904). 关于德意志战役,法国参谋总部历史处出版有总题为 La campagne de 1800 en Allemagne 的三部著作。至于拿破仑本人如何论述这些战役: M.Reinhard, L'historiographie militaire officielle sous Napoléon Ier. Etude d'une origine méconnue de la légende napoléonnienne, 发表在 «Revue historique» t.CXCVI (1946) p.165—184. 关于武装中立联盟参看: J.B.Scott, Armed Neutralities of 1780 and 1800 (New York, 1908). 关于亚眠和约,增看 M. Philippson, La paix d'Amiens, 发表在 «Revue historique», t.LXXV(1901), p.236—318 et t.LXXVI (1901), p.48—78.

第三章 波拿巴就任终身执政

关于共和九年的危机,除了第一编第一章引过的J.Godechot,La contre-révolution 外,增看 R.Cobb, Note sur la repression contre le personnel sans-culotte de 1795 à 1801, 发表在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54, p. 23—49. 关于教务专约, 看 A. Debidour, Histoire des rapports de l'Église et de l'État en France de 1789 à 1870

(Paris, 1898); A.Latreille, L'Église catholiqu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t.II: L'ère napoléonnienne et la crise européenne, 1800—1815 (Paris, 1950). 主要的著作是 Bouley de la Meurtre, Documents sur la négociation du Concordat et sur les autres rapports de la France avec le Saint-Siége (Paris, 1891—1905, 6 vol.) 和同一作者的 Histoire de la négociation du Concordat (Paris, 1920). 关于民法典，选看 Ph. Sagnac, Le Code civil, livre du centenaire (Paris, 1904); M.Garaud, Histoire générale du droit privé français (de 1789 à 1804), t. I: La Révolution et l'égalité civile (Paris, 1953; avant-propos de G.Lefebvre), t.II: La Révolution et la propriété foncière (Paris, 1959).

第三编 提尔西特条约前
帝国的对外征服

全编参考书见 159—160 页注。

第一章 法国和英国：战端重启

除第二编第二章已引的 M.Philippson 的文章以外，补充 H.Beeley 的重要文章 A Projet of Alliance with Russia in 1802, 发表在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34, pp. 497—401. 关于经济情况，看 F.Crouzet, Les conséquences économiques de la Révolution. Un inédit de Sir Francis d'Ivernois, 发表在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62, p. 183—217 et p. 336—362 (这篇文章首次发表了 Francis d'Ivernois 在 1802 年起草的一份备忘录«论与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商务条约的利弊»); Documents sur l'état de l'industrie et du commerce de Paris et du département de la Seine (1778—1810), publiés avec une étude sur les essais d'industrialisation de Paris sous la Révolution et l'Émpire, par E. Gille (Paris, 1963). 关于殖民政策看: J.Saintoyant,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pendant la période napoléonienne (Paris, 1931); colonel Nemours, Histoire militaire de la guerre d'indépendance de Saint-Dominque (Paris, 1925—1928, 2 vol.); 同一著者的 Histoire de la captivité et de la mort de Toussaint-Louverture (Paris, 1929); E.D.Charlier, Aperçu sur la formation historique de la nation haitienne (Port-au-

Prince, 1954); A.Césaire, Toussaint-Louvertur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 problème colonial (Paris, 1960; coll. «Portraits de l'Histoire», n°26). 关于入侵英国的计划和特拉发加海战，除了第一编第二章已引的 J. Holland Rose 和 J.Tramond 两书外，增看 A.Thomazi, Trafalgar (Paris, 1932); 同一著者的 Napoléon et ses marins (Paris, 1950); P.Mackesy, The War in the Mediterranean (London, 1957). 关于封锁，除了第一编第二章第四节所引各书外，增看 A.Stephen, War in Disguise or The Fraud of Neutral Flags (London, 1805; réédité en 1917) 和 F.Crouzet, L'économie britannique et le blocus continental, 1806—1813 (Paris, 1958, 2 vol.)的第一卷。关于第三次反法同盟的起源，除了第一编第三章第二节和本编全编参考书以外，增看: A.Bryant, Years of Victory, 1802—1812 (London, 1944); J.Holland Rose, Select Dispatches Rela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Third Coalition Against France (London, 1904). 有关俄国史和亚历山大一世的传记看: grand-duc Mikhailovitch, L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et de la France d'après les rapports des ambassadeurs d'Alexandre Ier et de Napoléon Ier (Pétersbourg, 1905, 6 vol.); 同一著者的 Le tsar Alexandre Ier (Paris, 1931), 是由 la baronne Wrangel 译成法文的; K.Waliszewski, Le règne d'Alexandre Ier (Paris, 1923—1925, 3 vol.); N.Brian-Chaninov, Alexandre Ier (Paris, 1934); L.Czartoryski, Alexandre Ier et le prince Czartoryski. Correspondance particulière et conversations, avec introduction de Ch. de Mazade (Paris, [1905]); Memoires et correspondances du prince Czartoryski avec l'empereur Alexandre Ier, publiés de Ch. de Mazade (Paris, 1887). 关于东方政策: B.Mouravieff, L'alliance russo-turque au milieu des guerres napoléoniennes (Neuchâtel, 1954); V.J.Purgear, Napoleon and the Dardanell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51); G.Lebel, La France et les principautés danubiennes (du XVIe siècle à la chute de Napoléon Ier) (Paris, 1955; «Publication de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d'Alger», t.XXVII).

第二章 拿破仑的军队

全章参考书是: J.Morvan, Le soldat impérial (Paris, 1904—1907, 2 vol.); P.Cantal, Études sur l'armée révolutionnaire (Paris, [1907]) 是

一部很有启发性的书。主要的工具书是: G.Six, 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des généraux et amiraux français de la Révolution et de l'Empire, 1792—1814 (Paris, 1934—1935, 2 vol.); 同一著者的 Les généraux de la Révolution et de l'Empire (Paris, 1947). 有关历次战役的著作中,选看: A.Meynier, Levées et pertes d'hommes sous le Consulat et l'Empire, 发表在 «Revue des études napoléoniennes» t.XXX (1930) p.26—51; 这篇文章经过修改补充,印成单册改名为: Une erreur historique. Les morts de la Grande Armée et des armées ennemies (Paris [1934], 34p.). 有关拿破仑的军事思想选看: lieut.-colonel J.Colin, Napoléon Ier (Paris, 1914); H.Delbrück, Geschichite der Kriegskunst im Rahmen der politischen Geschite, t. IV (Berlin, 1920); E.G.Léonard, L'armée et ses problèmes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58); R.S.Quimby, The Background of Napoleonic Warfare. The Theory of Military Tactics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New York, 1957) 是较为简明扼要的。

第三章 大帝国的建立

本章仍看全编参考书和上引拿破仑和塔列朗的各种传记。关于神圣罗马帝国末日的官方文件见 E.Walder, Das Ende des Alten Reiches (Berne, 1948); J.E.Arenberg, Les princes du Saint-Empire à l'époque napoléonienne (Louvain, 1951), 此书的价值在于有各王侯的名单及其统计数字,尤其是关于各"间接附庸"的统计。关于1806—1807 年德意志战役,看法国参谋总部出版的: commandant P.Foucart, Campagne de Prusse, 1806 (Paris, 1890)和同一著者的 Iéna (Paris, 1887); 普鲁士参谋总部出版的 O. von Lettow-Vorbeck, Der Krieg von 1806—1807 (Berlin, 1891—1896, 4 vol.).关于波兰问题,看 M.Handelsman, Napoléon et la Pologne, 1806—1807 (Paris, 1909); 1964 年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出版一期专号 La Pologne, du siècle des Lumières au duché de Varsovie. 关于外交方面看 H.Butterfield, The peace tactics of Napoléon I, 1806—1808 (Cambridge, 1929), 此书是研究提尔西特和约的最新论述,但还要看 A.Vandal, Napoléon Ier et Alexandre Ier (Paris, 1891—1896, 3 vol.) 的第一卷。